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
主编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 杨元恪 陈振华 译 衣俊卿 校



Marxizam i socijalizam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Marxizam i socijalizam

ISBN 978-7-81129-842-0



9 787811 298420 >
定价：62.00元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 主编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 杨元恪 陈振华 译 衣俊卿 校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 (南) 弗兰尼茨基著 ; 杨元恪, 陈振华译.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2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842 - 0

I. ①马… II. ①弗… ②杨… ③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研究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研究 IV. ①A81
②D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790 号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Zagreb, 1979

Copyright© Predrag Vranicki

This book's right of translation abou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deputized by China Written Works Copyright Society.

Telephone: 010 - 65978906, E - mail: wenzhuxie@126.com.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翻译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

电话:010 - 65978906, E - mail: wenzhuxie@126.com。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MAKESI ZHUYI YU SHEHUI ZHUYI

[南斯拉夫]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杨元恪 陈振华 译 衣俊卿 校

责任编辑 林召霞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21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842 - 0
定 价 6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 ▶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AKS005
- ▶ 黑龙江省社科重大委托项目，08A-002

◀◀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从2010年起陆续推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作为主编,我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两套丛书以重要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我自知,由于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以及所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这两套丛书不能抱过高的学术期待。实际上,我对这两套丛书的定位不是“结果”而是“开端”:自觉地、系统地“开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策划这两部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丛书,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可以说,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无法释怀的,甚至是最大的学术夙愿。这里还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如此强调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并非我个人的某种学术偏好,而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地位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面系统地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研究,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基于此,我想为这两套丛书写一个较长的总序,为的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某些参考。

一、丛书的由来

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也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那时的我虽对南斯拉夫实践派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苦于语言与资料的障碍,无法深入探讨。之后,适逢有机会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就为了却自己的这桩心愿创造了条件。1984年至1986年间,在导师穆尼什奇(Zdravko Munišić)教授的指导下,我直接接触了十几位实践派代表人物以及其他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到观点方面得到了他们热情而真挚的帮助和指导,用塞尔维亚文完成了博士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在此期间,我同时开始了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初步研究。回国后,我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有幸同移居纽约的赫勒教授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她真诚的帮助与指导下,翻译出版了她的《日常生活》一书。此外,我还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进行初步评介的工作。^①

纵观国内学界,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虽然除了本人

^① 如衣俊卿:《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台湾)森大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衣俊卿:《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台湾)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衣俊卿、陈树林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关于科西克、赫勒、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的系列论文。

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较早地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代表人物,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并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些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陆续翻译成中文^①,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只涉及几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并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人们常常把关于赫勒、科西克等人的研究作为关于某一理论家的个案研究,并没有把他们置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野中加以把握。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和自发研究阶段。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同时,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缺位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略,也是不利的。应当说,过去30年,特别是新世纪开始的头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① 例如,沙夫:《人的哲学》,林波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曲跃厚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以及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张一兵、刘怀玉、傅其林、潘宇鹏等关于科西克、赫勒等人的研究文章。

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我一直认为,在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和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两个方面衡量,真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三是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这一基本格局而言,由于学术视野和其他因素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20世纪70、80年代之后的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由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短板”。有鉴于此,我以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广泛吸纳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了一个翻译、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队,以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填补国内学界的这一空白。2010—2015年,“译丛”预计出版40种,“理论研究”

丛书预计出版 20 种,整个翻译和研究工程将历时多年。

以下,我根据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历史沿革、理论建树、学术影响等作一简单介绍,以便丛书读者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个基本划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在某一国度形成的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流派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要显得更为复杂,范围更为广泛。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或理论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或理论家,并陆续对“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了不同的研究,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文集或对他们进行专题研究。但是,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梳理和划界上,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公认的观点,而且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界定上存在不少差异,在称谓上也各有不同,例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端理论家”、“左翼理论家”等。

近年来,我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特别强调其特定的内涵和规定性。我认为,不能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来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在划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时,必须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符合 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流派和理论家。具体说来,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 1927—1993)、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 1923—2010)、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ć,

1922—2002)、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 1923—2008)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 1931—2010)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Agnes Heller, 1929—)、费赫尔(Ferenc Feher, 1933—1994)、马尔库什(György Markus, 1934—)和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Karel Kosik, 1926—2003)、斯维塔克(Ivan Svitak, 1925—1994)等。应当说,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建树,大体上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除了上述十几位理论家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外,还有许多理论家也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拉奇(Veljko Korać, 1914—1991)、日沃基奇(Miladin Životić, 1930—1997)、哥鲁波维奇(Zagorka Golubović, 1930—)、达迪奇(Ljubomir Tadić, 1925—2013)、波什尼雅克(Branko Bošnjak, 1923—1996)、苏佩克(Rudi Supek, 1913—1993)、格尔里奇(Danko Grlić, 1923—1984)、苏特里奇(Vanja Sutlić, 1925—1989)、达米尼扬诺维奇(Milan Damnjanović, 1924—1994)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女社会学家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1936—)、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1922—1999)、吉什(Janos Kis, 1943—)、塞勒尼(Ivan Szelenyi, 1938—)、康拉德(Georg Konrad, 1933—)、作家哈尔兹提(Miklos Harszti, 1945—)等,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霍韦茨(Milan Machovec, 1925—2003)等。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参与度等因素,也考虑到目前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力量的限度,我们一般没有把他们列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些哲学家分属不同的国度,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共

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定位,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支持者。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普遍经历了“斯大林化”进程,普遍确立了以高度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都是要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特征,以及工人自治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产生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因为,1948年至1968年的20年间,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艰巨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几个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刚好在这四个国家中发生,上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他们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反思和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思想理论传统和开阔的现时代的批判视野。通常我们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时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只有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和拓展,同时又具有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当代社会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才能冠之以“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

的要件。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塞尔维亚文版1953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卢卡奇、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卢卡奇的学生组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一样,高度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批判等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再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曾经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活动,这些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活动进一步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人道主义理论定向,提升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上述我们划定的十几位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而且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理论立场,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起、组织和参与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独特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了著名的《实践》杂志(PRAXIS,1964—1974)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Korčulavska ljetnja Škola,1963—1973)。10年间他们举办了10次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

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但他生前也曾担任《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20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西方或是辗转进入国际学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依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例如,在《实践》杂志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物于1981年在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PRAXIS INTERNATIONAL)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一些共同的研究成果。^①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沿革

我们可以粗略地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时间点,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

^① 例如, Agnes Heller, *Lukács Revalu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3; Ferenc Feher, Agnes Heller and György Markus,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New York: Blackwell, 1986; J. Grumley, P. Crittenden and P. Johnson eds.,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t: Essays for György Markus*,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等。

期,第二个阶段是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欧和英美直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时期。具体情况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也是他们比较集中、比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应地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或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活动直接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他们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同时,也批判现存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基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或“革命思想”、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布达佩斯学派的需要革命理论等等;另一方面以异化理论为依据,密切关注人类的普遍困境,像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一样,对于官僚政治、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展示出比较强的理论创造力,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例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沙夫的《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赫勒的《日常生活》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革命》、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不再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而开展学术研究,而是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英美、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他们作为个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学术著作。大体说来,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热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从一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们新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①、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马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瓦伊达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论文集》、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改革》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以赫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以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批判、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文化批判、激进哲学等。他们的一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例如,沙夫作为罗马俱乐部成员同他人一起主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和《全球人道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

^① 参见该书的中文译本——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这里特别要突出强调的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赫勒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写的《现代性理论》、《激进哲学》、《后现代政治状况》、《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等,费赫尔主编或撰写的《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生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马尔库什的《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等。

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

通过上述历史沿革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处在同一个时期;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这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另外两种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建树和理论贡献,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由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理论独特性,片面地断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或边缘性、枝节性的延伸,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地位。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在这里,我想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较,以把握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和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关怀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然而,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背景,这种历史体验的独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传统,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进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基于这种定位,我认为,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其三个理论特色。

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虽然所有新马克思主义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但是,如果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除了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更不要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独特的阐述。他们的主要兴奋点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积累和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得益于东欧理论家和思想家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悟性。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我们可以提及两套尽管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一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①,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②。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II,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参见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I、II、III),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1988、1992年版。

②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宣布“放弃了马克思”后，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阐释。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应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阐述：一是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建构，其理论深度和哲学视野在 20 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建构中毫无疑问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物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析，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题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解；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四是赫勒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阈中，围绕着人类学生存结构、需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独特的阐述，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思路。正如赫勒所言：“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①

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有新马克思

^① Agnes Heller,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 x.

主义以不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维度。但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发言权,他们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照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毫无疑问,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几乎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视野,加以深刻分析,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在这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方面的,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从总体上看,他们大多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代表作中,他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深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认为,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①。此外,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特别

^①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stička revolucija—Očemu je riječ? Kulturni radnik*, No. 1, 1987, p. 19.

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角的、近距离的反思,例如,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危机和危机的解决》,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塞尔维亚:民主的革命》等。

其三,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如前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例如,赫勒在《激进哲学》,以及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用他们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解为背景,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赫勒在《历史理论》、《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与费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理论。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比,这一现代性理论具有比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来说,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反思维度,也包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屠杀”、“极权主义独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现代性经验”^①,在我看来,其理论厚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

^① 参见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3、4 页。

才能达到。

从上述理论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还是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等方面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类型。相比之下,20世纪许多与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都不具备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力,它们甚至构不成一种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探索,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而缺少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再如,一些偶尔涉猎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想作为自己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甚至包括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细微的解读,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相比,他们还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

在分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和理论特色之后,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评价的视角把握它的学术影响力。在这里,我们不准备作有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详细文献分析,而只是简要地提及一下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视。

应该说,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期,其理论已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本国从事学术研究,他们深受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如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所搭建的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平台。这个平台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受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一些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参加了实践派所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开始高度重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洛姆,他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1965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所收录的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德拉·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文章在内的共35篇论文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就占了10篇——包括波兰的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斯维塔克、普鲁查,南斯拉夫的考拉奇、马尔科维奇、别约维奇、彼得洛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哲学家的论文。^①1970年,弗洛姆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作序,他指出,沙夫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个体主义、生存的意义、生活规范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问世无论对于波兰还是对于西方学术界正确

^①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①。1974年,弗洛姆为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他特别肯定和赞扬了马尔科维奇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其他成员在反对教条主义、“回到真正的马克思”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弗洛姆强调,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一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南斯拉夫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发展不只是个别的哲学家的关注点,而且已经成为由南斯拉夫不同大学的教授所形成的一个比较大的学术团体的关切和一生的工作。”^②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继续留在本国的科西克和一部分实践派哲学家),在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占据独特的地位。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有些著作,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等,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一些研究者还通过编撰论文集等方式集中推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谢尔1978年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实践》,这是精选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集,收录了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达迪奇、苏佩克、格尔里奇、坎格尔加、日沃基奇、哥鲁波维奇等10名实践派代表人物的论文。^③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波塔默

① Adam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1970, p. ix.

② Mihailo Marković, *From Affluence to Praxis: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 vi.

③ Gerson S. Sher, ed., *Marxist Humanism and Praxi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78.

1988年主编了《对马克思的解释》一书,其中收录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哥德曼、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同时收录了彼得洛维奇、斯托扬诺维奇、赫勒、赫格居什、科拉科夫斯基等5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①此外,一些专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某一代表人物的专著也陆续出版。^②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际学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③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国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等人一样,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直活跃到目前。^④其中,赫勒尤其活跃,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十余部,于1981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奖,1995年在不莱梅获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奖(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2006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奖(Sonning Prize)。

应当说,过去30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

① Tom Bottomore, ed., *Interpretations of Marx*, Oxford UK, New York USA: Basil Blackwell, 1988.

② 例如, John Burnheim,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Agnes Heller*,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B. V., 1994; John Grumley, *Agnes Heller: A Moralism in the Vortex of History*,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等等。

③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④ 其中,沙夫于2006年去世,科拉科夫斯基刚刚于2009年去世。

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梳理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例如,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到了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所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向^①,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观点^②,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对象世界的论述^③,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哲学的理解^④,等等。这些都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已经真正进入到20世纪(包括新世纪)国际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领域。

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度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了。应当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和困难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越来越重,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

^① 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9页。

^②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52页,即“人名索引”中的信息,其中马尔库什被译作“马尔库斯”(按照匈牙利语的发音,译作“马尔库什”更为准确)。

^③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0~95页,这里马尔库什同样被译作“马尔库斯”。

^④ 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不能停留于中国的语境中,不能停留于一般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必须学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坚持和发展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争得理论和学术上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形成不仅需要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分析,还需要我们自觉地、勇敢地、主动地同国际上各种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和交锋。这其中,要特别重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无论人类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当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现,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和错误,需要我们去认真甄别和批判,但是,同其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相比,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揭示最为深刻、最为全面、最为彻底,这些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也最大。其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曾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接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中,也曾经与东欧各国有着共同的或者相关的经历,因此,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中我们可以吸收的

理论资源、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会更多。

鉴于我们所推出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尚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或者说，我们坚持的研究原则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全面准确地了解的原则，即是说，通过这两套丛书，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具体说来，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数众多，著述十分丰富，“译丛”不可能全部翻译，只能集中于上述所划定的十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在这里，要确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最有影响的著作不被遗漏，不仅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的著作，也要包括那些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著作。以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很多批评和批判，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须加以分析批判。尽管如此，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译丛”之中，如果不直接同这样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进行对话和交锋，那么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会有很大的片面性。二是坚持分析、批判、借鉴的原则，即是说，要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置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置于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置于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比较中，加以理解、把握、分析、批判和借鉴。因此，我们将在每一本译著的译序中尽量引入理论分析的视野，而在“理论研究”中，更要引入批判性分析的视野。只有这种积极对话的态度，才能使我们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真正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结束这篇略显冗长的“总序”时，我非但没有一种释然和轻松，反而平添了更多的沉重和压力。开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对我本人有限的能力和精力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而我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虽然包括一些有经验的翻译人才，但主要是依托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点等学术平台而形成的一支年轻的队伍，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去打一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硬仗，我感到一种悲壮和痛苦。我深知，随着这两套丛书的陆续问世，我们将面对的不会是掌声，可能是批评和质疑，因为，无论是“译丛”还是“理论研究”丛书，错误和局限都在所难免。好在我从一开始就把对这两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定位于一种“开端”（开始）而不是“结果”（结束）——我始终相信，一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被自觉地开启，肯定会有更多更具才华更有实力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好在我一直坚信，哲学总在途中，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哲学之路是一条充盈着生命冲动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上下求索的艰辛之路，踏上哲学之路的人们不仅要挑战智慧的极限，而且要有执著的、痛苦的生命意识，要有对生命的挚爱和勇于奉献的热忱。因此，既然选择了理论，选择了精神，无论是万水千山，还是千难万险，在哲学之路上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地跋涉……

>>> 中译者序言

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 系统理论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是20世纪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家所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当然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相比之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比在20世纪任何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那里,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理论内涵,这不仅是因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理论睿智,而且因为,在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包括被研究者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理论流派中,除了卢卡奇、布洛赫等个别的思想家外,没有哪个流派或者理论家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全程经历了中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直至20世纪末中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整个历史进程。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几乎所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某种方式对于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反思,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了理论探索。其中,在这一理论研究领域,我们应当首推南斯拉夫实践派著名代表人物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 1922—2002)。弗兰尼茨基生于克罗地亚的班克瓦茨(Benkovac),1939年入萨格勒布大学医学系学

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反法西斯战斗,战后重回萨格勒布大学学习哲学,1947年毕业后开始在萨格勒布大学哲学系执教。曾先后担任克罗地亚哲学学会主席、南斯拉夫哲学联合会主席、克罗地亚科学院院士、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1972—1976年间,弗兰尼茨基曾担任萨格勒布大学校长。弗兰尼茨基的著述十分丰富,享有国际声誉,他的理论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系统研究,这反映在他1961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史》(*Historija marksizma*),该书一经出版就为他带来了很大荣誉,此书一版再版,从一卷本扩充为三卷本,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于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Marksizam i socijalizam*,1979)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Somoupravljanje kao permanentna revolucija*,1985)。

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包括对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关于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批判,关于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以及关于当代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的社会主义前景的思考。在这个序言中,我们将围绕着弗兰尼茨基关于中东欧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的理论思考、关于以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几个方面,概要地展示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的重要思想。这几个问题,也常常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中被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二战后中东欧地区关于社会发展 道路的历史抉择

在回顾和反思中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进程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各民族是基于什

么样的历史考量而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或者换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这一历史选择到底是一种被迫的和强加的“选择”，还是主动的和自觉的选择？这是理解中东欧 20 世纪下半叶历史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社会主义实践和命运的核心问题。同时，也只有澄清了这一问题，我们才会在实践层面上深刻理解中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历史价值，而在理论层面上真正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中东欧其他一些理论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思所包含的独特的历史体验和思想内涵。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 20 世纪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的历史发展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中东欧各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不是一种自愿的和主动的历史选择，而是一种被迫的和强加的历史命运，即它们是迫于苏联的压力而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斯大林和苏联的压制下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一些西方学者持这种观点，在我们国内，一些研究 20 世纪末东欧剧变历史进程的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甚至很多对于 20 世纪的这段历史，特别是中东欧的发展历史并不了解的人，也会想当然地、习以为常地断言，中东欧国家是迫于苏联的压力而被“纳入”或者“拖入”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之中的。我们之所以要特别仔细地分析和回应这一流行观点，是因为这种观点的着力点不在于澄清或确证一个历史事实，而在于其中隐含一个重要的历史推论：即认为中东欧地区无论从文化传统还是社会基础都不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具体说来，一些研究者强调，中东欧各民族在其历史体验和民族情感上对俄罗斯怀有深刻的民族仇恨，它们实际上不可能主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由于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这一地区从法西斯统治和蹂躏下解放出来，并且把这一地区纳入战后自己的势力范围，才迫使这些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进而，这种观点强调，中东欧国家在根本上或者文化价值观点上属于欧洲传统，它们更倾向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因此，20 世纪末社

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是必然的。按照这种历史推论,中东欧地区选择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错误,其改革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走向解体是历史的必然,因此,这一地区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也并不具备独特的历史价值。

我认为,上述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实则站不住脚,而且,这一历史推论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会对人类的历史认知和历史意识产生消极影响的论点。如果历史地、全面地、深入地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选择了社会主义,其中不可否认有一些外在的影响因素,甚至是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但是,这一历史选择更多地或者根本上是一种基于深刻历史认知和民族历史体验的自愿的和主动的选择。如果说,历史上俄罗斯帝国曾数次给中东欧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那么罗马帝国、奥匈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等西方列强给中东欧地区所带来的灾难更多更大。特别是,近现代中东欧地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使各民族无法对资本主义认同,因此才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出现困境和危机时,中东欧理论界,特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改革,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只是由于苏联的压力、当时国际的不利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东欧社会主义的数次改革才中途夭折了,到了20世纪末,各种社会矛盾的累积使社会主义改革机遇最终历史地失去,这才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解体。

这样的历史认知不是一般性的、简单的理论推断,而是基于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发展的危机和困境、前所未有的历史冲突和文明危机,以及中东欧地区的具体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想理论进程所做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具体说来,经过千百年反抗外敌入侵和异族统治的不屈的斗争,经过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反抗法西斯等邪恶历史力量

的斗争,中东欧地区的知识界和社会民众对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理念、发展机制以及灾难性后果,都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同时,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的认同感也在逐步增强。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自由主义传统及其核心价值,通过中东欧地区比较发达的大学和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通过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东欧地区有着很大的市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传播、社会主义政党的普遍建立、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波兰尼等人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批判,以及反抗西方列强,特别是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各种先进思想的传播等,都使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在中东欧地区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这种比较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的背景下,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觉地选择历史发展道路的机遇摆在中东欧地区人们面前时,对于这一历史抉择产生重要影响的,除了一些外在的历史条件和因素,最主要的就是中东欧地区人们在社会发展实践层面的直接的历史体验。而在这一左右中东欧地区历史选择的核心要素,即中东欧地区直接的历史体验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的情感和认同明显占据上风。具体说来,随着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东欧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到社会的加速发展和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益处,但是,他们更多地体验的是现代理性文明所带来的深重危机和消极后果。中东欧地区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发展既没有能够阻止外国列强的奴役,使中东欧各民族赢得独立和自强,也没有能够给中东欧人民的生活带来福音,反而是具有“资本原始积累”性质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中东欧人民已经背负的各种压迫和统治之上,又增加了一种更具效率、更加残酷的压迫。因此,在中东欧普通民众之中,很难确立起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好感和向心力。特别是,这些新的、现代的理性统治和束缚,是与千百年来西方列强对这一地区的蹂躏和践踏结合在一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这一地区的人们体会到以现代理性文明为背景的帝国主义的残暴。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帝国主

义的瓜分和掠夺、残酷的集中营和大屠杀给中东欧地区留下了噩梦般的历史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各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和民族带来繁荣和发展、富裕和幸福。相反,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不仅深受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一次成为疯狂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划分世界、毁灭人类的直接牺牲品。波兰再一次被瓜分,其他中东欧国家也成为战争和大屠杀的直接受害者。这种刻骨铭心的历史体验再一次让中东欧地区的人们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

一言以蔽之,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东欧地区的人们不仅已经从理论上了解和体会到西方理性文明所孕育的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大屠杀的内在本质关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全方位地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灾难和悲剧,因为中东欧地区是资本主义灾难,特别是现代性和大屠杀的最直接的和最惨重的受害者。显而易见,在这一历史时期,在中东欧地区的历史选择中,历史的天平是偏向于社会主义方向的。虽然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负面效果和消极后果也有所闻,而且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曾给中东欧地区带来过许多灾难,但是,对于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难中走出来,站在百废待兴的欧洲理性文明废墟上的中东欧地区的人们而言,让他们马上选择一条与曾把他们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般的灾难之中的现代理性文明灾难密切相关的社会体制和发展道路,的确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是比较难的事情。

应当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地区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抉择的上述分析,不仅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也符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基本的历史认知。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因为在他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现实。所以,在这部关于社会主义系统研究的专著的前言中,弗兰尼茨基就专门谈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独特

感情：

我属于这样一代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他们早在战前就在反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最深入的运动中把自己的历史存在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因此，我对于为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进行斗争和力求实现的东西，无论在理论上或情感上，从来都不会无动于衷。^①

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中还特别分析了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的历史趋向所承载的独特的使命。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和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要消除以异化为特征的所有阶级社会。弗兰尼茨基这样概括到资本主义为止的阶级社会：“这些社会具有阶级性质，存在着众所周知的阶级剥削现象，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关系、人格的堕落、利己主义，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剥夺别人劳动；进而，使人的存在得以确立的劳动成为纯粹维持生命的手段；政治领域被分离出来，使它们各自支配其他社会集团和主体；同时这些政治社会具有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性质，因而单纯追求总量和量的增长，以及支配大自然和人的欲望；最后是人对人、阶级对阶级、民族对民族的统治，形成典型的人格二重性。所以这里说的是一个数世纪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形式以及思想异化形式不断更替。”^②因此，社会主义承载着超越所有不合理的阶级社会的沉重的历史使命。

弗兰尼茨基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进步的作用，但是它在进一步发展中又造成了“使人无法忍受的状况，造成新的矛盾”，因而，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内部解决这些根本的历史矛盾和危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9. ——该序言中所使用的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的引文，基本上依据本书的中译文稿，在一些地方做了微小的修改。引文的出处按照该书的塞尔维亚文版标注，其页码对应于本书的边码。——本序言作者

^②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28.

机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则是旨在超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阶级社会形式的运动。

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未解决的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对封建主义而言无疑是人类发展的进步阶段,但是由于它是基于私有制之上,所以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人类发展的非常残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凭借极不人道的手段和行为,凭借公民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而繁荣起来;凭借写进人类历史最令人伤心的篇章的民族战争和殖民战争,凭借损害基本劳动居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危机,凭借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凭借一旦其政权受威胁时实行政治专政等而繁荣起来。从最早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蒲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想家的批判分析,提供了对所有这些矛盾的深刻剖析和丰富材料。假如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没有留下如此斑斑血迹,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如此的历史力量和吸引力。^①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点:即他们并不简单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地区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外力逼迫的结果,而是充分肯定了这一地区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主动性,以及这一地区存在着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思考,当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遭遇到困境和危机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否认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是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现存社会主义模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和追求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深刻的改革。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81.

性的理论分析是同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要源自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反差。这一矛盾和张力的核心在于斯大林所理解和推行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弗兰尼茨基指出,“联系当代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是,必须通过铲除任何形式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铲除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关于人是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实践存在这一思想,以及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主张,乃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本思想,包括由上述论点所产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结果”^①。在弗兰尼茨基看来,这一核心思想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基点,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扬弃普遍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必须通过以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问题在于,在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中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中,现实的历史进程非但没有朝着国家的逐步消亡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建立的方向发展,而且不断强化国家及其官僚机构,限制个体自由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由于东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开始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就被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且通过“斯大林化进程”而普遍采纳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几乎在这些国家刚刚开始社会主义进程时就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而推动社会主义的改革首先要从突破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误区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开始。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0.

在关于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反思批判中,弗兰尼茨基有一个突出的理论特点,即他依据对历史条件和革命进程的分析,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中的作用做了区分。同那种认为列宁应当对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以计划经济和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负主要责任的观点相反,弗兰尼茨基认为,列宁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等强化政权的措施只是在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列宁本人所理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是后来斯大林把列宁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合法化,并且不断强化国家和官僚机构,从而走向了背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一点,弗兰尼茨基特别强调了列宁对于自由和民主的高度重视。虽然在俄国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由于革命是在经济落后、民主传统薄弱、人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度中发生的,并且面临着内部敌人的反扑和外部敌人的干涉的压力,列宁不得不采取高度集中的临时性政治体制和社会控制体系,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等非常措施,但是,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列宁也没有忽视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弗兰尼茨基强调,列宁坚决捍卫党的生活和工作的民主原则,有效地避免了内部官僚化的问题。“大家知道,那时布尔什维克党各级机构的决定是通过完全自由地交换意见,通过往往具有尖锐争论语调的讨论和辩论才作出的。党内甚至经常存在着某些反对派,同时在工人反对派那里有时还有某些根本性分歧。列宁在这方面主张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是,必须彻底做到以民主方式作出决定,然后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使这一决定成为大家(在行动上)必须执行的决定;第二条是,当发生某些原则分歧而使共同的工作和活动无法进行时,每一方都有充分权利脱离党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党。”^①弗兰尼茨基认为,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47.

列宁无论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还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都时刻警惕防止权力的集中和官僚化,他不仅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毫不含糊地坚持民主原则,而且用自己优秀的品格身体力行地践行和捍卫民主原则。

列宁虽是一位非凡的理论家,但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事业,这成为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党,由于它被迫处于地下状态,党内斗争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可能性是很不充分的,必然具有只符合这种情况和类似情况的某些特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它不可能是群众党而只能是中央机关拥有强大特权的干部党,围绕着某些策略和战略问题的党内广泛讨论不能公开进行。党摆脱了地下状态后的历史最好地表明,列宁在这个党里是多么尊重个人的自主权和自由。公开的、自由的和尖锐的讨论、议论和争论是作出每一个重要决定的前提,而列宁本人,大家知道,经常处于少数派或者向多数派坚持自己的建议和观点。列宁党的内部民主制如此发达,以致直到今天没有一个欧洲共产党在党内自由、坦率性和批评性方面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已经相隔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列宁的思想及其个人的伟大之处就更加明显了。^①

因此,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必须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实践做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一方面,必须看到,在当时的严峻形势和困难的条件下,以权力集中和强化国家为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一方面,列宁始终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的重要性,他不但始终坚持党内民主,而且强调要创造条件,增强人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推动国家逐步走向消亡。从这样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p. 88-89.

的理解出发,弗兰尼茨基认为,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向僵化,甚至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因素在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解。具体说来,在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里建立的带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体制,在尔后的发展中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斯大林的做法没有遵循列宁提出的推动国家逐步走向消亡的路径,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即不断强化国家的方向发展。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依据主要是不发达国家迄今的全部经验,这一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基本上可以有两种发展方向:或者社会主义力量,不管其主要动力来自何方,都要始终不渝地进一步努力加深社会主义进程,以实现作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作为社会的新社会政治结构基础的生产者自治、委员会制度;或者走向废除那些以工人监督和工人作决定为表现形式,即以作为工人管理企业的雏形的,自由选举出的各级委员会来进行决策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主义关系的雏形和社会主义的萌芽,从而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关系,而这种关系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在这个时期里占统治地位和拥有绝对权力。遗憾的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苏联所发生的进程,正是沿着第二种方向发展的。^①

因此,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剖析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他强调指出,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非但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不能真正展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而且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首先,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以生产者的联合体或者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主要形式的直接民主并没有得以形成,国有化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和异化的状态。“国有化总是意味着,工人阶级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同积累、计划和扩大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74.

再生产的管理相分离,因此,尽管有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实质上处于雇佣关系之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仍然是某人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管理,而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社会。”^①进而,政党取代工人阶级全面执掌政权,实行高度的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使得官僚制不可避免地强化和盛行。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必须是工人阶级本身而不是什么人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掌握政权。而在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基本上是政治先锋队(政党)掌握了政权,而国家成为政党全面统治的手段。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党和国家的垄断变成总体性的垄断,它的干预不限于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的领域,而且包括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特别是文化和科学领域”^②。弗兰尼茨基认为,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官僚统治必然从根本上断送社会主义,“如果社会停滞在初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上,那么官僚-国家主义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巩固,并且脱离劳动群众,甚至导致官僚-国家主义的反革命,如同斯大林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那样。这样,社会主义的特征就丧失了,关系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变成官僚-国家主义的,而且必然起保守甚至反动的作用。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③。

基于上述分析,弗兰尼茨基认为,不能把斯大林主义所理解和建构的社会主义模式视作社会主义,它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他指出,“把这一制度宣布为社会主义,甚至宣布为共产主义,是最大的历史错误,是肤浅的和没道理的。今天每一个保守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可以根据这一制度所发生的一切,及其他与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制定的行为关系准则相背离的东西,对共产主义轻率地加以指责并败坏其声誉。诚然,资产阶级社会是准备在其他方面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76.

②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82.

③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77.

照旧那样干的。而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新人道主义的理想,今天我们从许多历史进程中已得到证明,共产主义理想是能够实现的,而且正在实现中。正是为了这种理想,必须彻底剖析极权主义的、不民主的、官僚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出现……”^①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弗兰茨基反复强调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历史影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把这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作本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加以批判和拒斥,从而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否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通过“斯大林化”进程而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现存的社会主义世界普遍呈现出带有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僵化模式。从这样的分析出发,弗兰茨基把改革作为现存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以民主和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

改革思想

在对斯大林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深刻的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弗兰茨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构想。一方面,弗兰茨基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和人道主义内涵的理解,把民主建设确定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弗兰茨基紧密结合东欧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阐述了以新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84.

我们首先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建设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入手来展开弗兰尼茨基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家，他们与东欧的社会主义进程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大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教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东欧大学，并且长期在这些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都先后参与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大多都直接参与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讨，并参与各种改革运动并因此不同程度地遭遇波折、挫折甚至打击。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认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都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目标，由此而强调要扬弃政治异化，破除官僚政治统治，推动国家走向消亡，建立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

在这一方面，卢卡奇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领路人，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卢卡奇的思想也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卢卡奇尽管一生因为致力于复兴马克思主义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革而屡遭批判和磨难，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信念。如前所说，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反复强调资本主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选项，同样，斯大林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真正确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才会推动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因此，卢卡奇把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作为新时期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卢卡奇认为，同建立在私有制和自律的市场经济运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形式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人道主义，是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发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生成：

社会主义民主——把人当作是主动的创造物，而这是人的类存在的真实属性，因为他在每天的实践中被迫变得主动——将人类劳动产生的客观化的或者客观的结果转化为

人有意识创造的并且满足人类目的的客体。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框架,在不违反客观固有规律的前提下,允许客观性成为自觉主动的人有目的地设计的工具。这是意识和自我决定对盲目客观性的征服。作为自我决定的胜利,社会主义民主改变了人们的邻居和同胞,使其不再是人们实践的阻碍,而是必不可少的积极的同事和帮手。^①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认同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目标。弗兰尼茨基强调,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理解,而且他们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是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直接民主。“对于马克思或列宁而言,社会主义的根本的东西是在工人直接管理自己的生活进程和生产进程基础上建立社会制度,总之是直接民主而不是间接民主。”^②这种直接民主的核心是创造条件,推动国家逐步走向消亡,并且破除集权的官僚统治,使直接的生产者成为真正的社会管理者,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涵。

同所有实践派哲学家一样,弗兰尼茨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也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出发,强调扬弃人的异化和政治官僚统治,通过自治和分权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宗旨和任务就是要推翻不合理的阶级统治和压迫,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基本的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要实现被奴役的人类的长远梦想,即实现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彻底变革、对资产阶级世界和阶级社会的整个时代的否定,以及建立没有各种政治的、官僚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历史代理人的新人道社会。”^③弗兰尼茨基指出,这也正是无产阶级

① 乔治·卢卡奇:《民主化的进程》,寇鸿顺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②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22.

③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16.

革命要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铲除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根基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前所述,弗兰尼茨基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有化的历史局限性,因为仅仅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还停留于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处于被剥削和异化的生存状态。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要从根本上破除斯大林主义所不断强化的国家和官僚政治统治,以及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由生产资料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强化的国家和官僚政治体制构成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要害是继续使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处于受剥削和异化的状态之中,因此,只有自觉地推动限制权力的集中,推动国家逐步走向消亡而不是强化,才能克服和战胜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得以确立的根基,而真正要实现这一切,需要推动权力分散,并使广大民众在所有领域都能获得参与决策的权力,即走向自治的社会主义。弗兰尼茨基指出,“迄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向我们表明,只有建立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建立工人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在这些原则上逐步对整个社会实行改造,才有可能消除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只有当以自治方式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在指导整个国家发展上而且对社会的政治组织残余和在许多职能上已消亡的国家的残余有着主导的作用时,自治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才能战胜国家社会主义关系”^①。

从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上述理解出发,弗兰尼茨基特别强调了政党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正如我们必须防止国家和政治体制走向强化和极权,同样,我们更要防止政党走向专权。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建立党的统治,而是要建立以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p. 76-77.

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和任务,我们可以补充说,每个彻底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作用和任务,不是建立自己的党的统治并使之永久化。正如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建立国家主义关系即实质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交替掌权和对群众进行管理。重要的、自身是生气勃勃的、运动的目标,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不仅有个人发展的同等机会,而且每个人都有可能尽量直接地管理自己的全部劳动过程和社会过程。在逐步实现自治关系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中——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最终都将是自己人类历史存在的一部分和生产者——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社会管理并消除对人的政治管理的思想。^①

弗兰尼茨基强调,上述这些进程是当代最深刻的民主进程,是事关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否实现,事关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如果共产党或社会党不是从自己开始掌权之时就推动这种民主进程,那么当代的整个民主制度就会停留在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有限范围之内。”^②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目标定位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确立,而他们从不同角度都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途径与自治社会主义模式联系起来。也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艰巨性的认识,弗兰尼茨基把推动国家消亡、克服官僚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历史任务同社会主义所承载的扬弃异化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存社会主义缺乏民主和个体自由的现状的批判,从另一个层面揭示出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严重的、普遍的异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本上都承认现存社会主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p. 95-96.

^②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96.

义存在着严重的和普遍的异化问题。应当说,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理解还是比较深刻和全面的:一方面,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国家的强化、官僚政治的统治、民主制度的缺失、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本身都是政治异化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重要性还包含另一层重要的思想,即揭示社会主义扬弃异化的使命,换言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异化问题上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异化是共生的关系,因而它不具备扬弃异化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则是通过真正的民主建设,扬弃各种异化和物化现象,实现个体自由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中,对异化理论的评价一直是个存有十分尖锐的争议的课题。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者完全否定异化理论,或者把这一理论的适用性严格限定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弗兰尼茨基则认为,我们不仅要承认,现存社会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而且要明确指出,异化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他同其他实践派成员对异化理论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断言:“对于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如果不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都不可能有任何丰富的成果。”^①

弗兰尼茨基对异化的理解同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同其他实践派哲学家一样,他认为,人虽然来自大自然,是自然存在,但是人的本质正在于对自然性的扬弃,人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由此,人具有超越性和开放性的特征,他永远不会被一劳永逸地给定和确定。而正因为如此,人在超越现存,获得新的创造可能性的同时,也有可能走向异化,成为从其本质异化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如前所述,弗兰尼茨基断言,异化是必然的现象,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的存在结构。在他看来,“只要人自己的活动成果作为某种外在

^① *Marks i Savremenost*, I, Beograd, 1963, pp. 167-168.

的东西(政治领域、宗教领域、市场、金钱等等)而存在,作为统治他的力量而与他敌对,那么就存在着异化现象”^①。

由此,异化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迄今为止的历史是异化与扬弃异化相互交织的历史。一方面,人在不断与异化抗争,争取人类的解放,但是另一方面,每一时代都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扬弃异化,旧有异化形式往往为新的异化形式所取代。在弗兰尼茨基看来,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像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已经彻底根除异化现象。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依旧存在。由此,弗兰尼茨基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

同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已不再有异化问题的命题相反,我们最坚定地认为,异化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②

对于这一常常引起人们的惊异、不理解 and 质疑的命题,弗兰尼茨基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首先,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异化社会,但不能由此断言,异化是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这是因为,正是依靠这种无所不在的异化结构和异化意识,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存在下去。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不曾也不会把人从各种异化形式中的解放当作自己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它不会消灭统治人的独立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而只会使之更加坚固。其次,异化并没有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而自行消亡,“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并不代表已经发现那个把一切邪恶变成善良,解决人的一切问题的魔杖”^③。弗兰尼茨基认为,由于历史的继承性,社会主义不得不接受许多代表着人的异化的社会关系。例如,国家、阶级、政党、民族、官僚制等等的存在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异化不可避免。同时,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货币关系以及各种拜物教的存在,必然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中心主义、货币

①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 2, 1964, p. 228.

②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 2, 1964, p. 232.

③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 2, 1964, p. 233.

拜物教、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两重化、道德变形等异化形式很难杜绝。再次,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均存在着异化,但是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一个异化社会而存在;而社会主义原则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允许它作为一个异化社会而存在。因此,社会主义只有将扬弃异化当成首要任务,将扬弃异化贯穿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切方面,才能展示社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弗兰尼茨基得出了基本的结论:“异化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作为异化的社会才能存在。异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克服和扬弃异化才能存在与发展。”^①

弗兰尼茨基不仅在理论层面上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为社会主义改革确立目标和理论基础,而且还结合具体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探索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模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参与本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共同投身于现存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因此,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模式选择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共同追求的社会主义概括为自治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就会发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除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之外,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改革还没有能够形成比较成熟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在自治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的追求中,人道主义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追求,民主政治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目标,相比之下,自治的社会主义是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内涵的相对完整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这一新的模式不仅是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认同的,而且也是南斯拉夫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和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体制。弗兰

^①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 2, 1964, p. 239.

尼茨基认为,虽然南斯拉夫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无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都不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健康发展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经验。因此,我们在这里结合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阐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从1949年12月南斯拉夫联邦委员会和南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联合通过《关于在国营企业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及其工作的指示》和1950年6月公布《国营企业和劳动集体高级经济联合管理基本法》,南斯拉夫开始把国营工厂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实行“工人自治”,正式开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改革。此后的三四十年中,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逐步从工厂企业扩展到社区和事业单位,形成了社会自治的体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包含比较丰富的内容:把国有制改革为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既不属于个人私有,也不属于集团或国家所有,而是属于整个社会,为全体参加劳动的人所有;国家不再具体组织和管理生产经济事务,由企业的联合劳动组织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决定企业的计划、生产、财务、人事和分配;基层联合劳动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工人大会,大会选举出工人委员会行使生产、分配、财务、人事等权力,把民主制度建立到企业和经济制度中;教育、卫生、科学、文化、集体福利等社会事业单位形成“自治利益共同体”,与经济部门之间通过签订自治协议而形成“自由交换劳动”的机制。我们在这里不去探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具体建立,及其成效和成败,主要是从精神史的视角探讨这种自治社会主义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按照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这种自治社会主义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的思想,为扬弃官僚政治等政治异化奠定经济和政治体制基础,把民主的原则和机制落实到经济、政治、社会运动等方方面面。这样的民主应当是直接的民主和普遍化的民主。

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都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理论探索者,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思想基础、理论依据、基本原则和发展前景等。其中,弗兰尼茨基关于自治社会主义的探讨最具代表性,他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对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革探讨最多的理论家。如上所述,弗兰尼茨基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致力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制等政治异化现象的批判,以及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不公正、不民主的现象的批判。他认为,只有彻底的自治制度才能确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首先,弗兰尼茨基认为,只有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破除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主义神话,扫除官僚制等各种政治异化现象,为真正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弗兰尼茨基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与自治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思想,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基本观点在于,通过“生产者的自治”来克服阶级的分裂,建立一种能够促使异化权力、政治等级和官僚制度走向灭亡的社会组织。但是,在几十年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被湮没了,特别是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的思想似乎从历史舞台上和工人阶级的要求中消失了。这是现存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所在。因此,弗兰尼茨基强调,必须重新恢复马克思关于“生产者的自治”的基本原则,通过自治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推动国家走向消亡。他强调,自治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否定,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僚制度的国家主义结构的否定:

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逐渐从国家(包括那些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国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这就是国家的消亡)的意义上,它并不意味着工人在自己的阶级敌人面前解除武装,并不意味着削弱社会共同体,相反却意味着加强社会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代替千百万人

的活动,任何国家(即使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既不能代替那些认识并感受到其共同体的命运,从而自己把握了自己历史的人的热忱;也不能代替那些认识到其支配了自己劳动的产品——这种支配决不是由一种违背其自己的意志之权力相伴随的——的人的热忱。^①

其次,弗兰尼茨基认为,自治制度不仅推翻了私有制,而且也杜绝国家和团体以人民的名义占用生产资料,“由于这一切原因,自治的思想便向私有制或国有制的所有机构和所有形式历史地宣战”,建立起社会所有制这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强调工人委员会、自治、直接民主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所确立起的民主机制根植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是工人阶级和普通公民真正作为自由主体的实质的民主、直接的民主和普遍化的民主。

弗兰尼茨基认为,这种建立在自治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民主应当超越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特征是私有制或国有制和间接民主,以及多党制或一党制,而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的历史性的特征则是自治关系与直接民主的加强和政治领域、代议制与国家官僚的消亡。”^②弗兰尼茨基深刻阐述了自治民主的丰富内涵:

自治的思想和实践的含义是: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他限制并废除所有那些历史地篡夺权利以使自己成为劳动者的监护人和牧师的领域,从而让劳动者一劳永逸地在历史上成为成年人。这种社会主义自治当然再也不能建立在不发达的生产力之上,而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的、集团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原

^①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载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

^②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52.

则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所有的原则之上。^①

再次,弗兰尼茨基认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实基础,而且为真正实现人的自由提供了历史可能性。他指出,一个社会通过国有化消灭了私人资本,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权力,并不能保证实现人的自由,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化政治和国家集权主义制度下,即使是由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仍然处于雇佣关系,因为它支配不了自己劳动的成果,它不但对整个社会发展,而且对自己的生产和分配进程都没有任何重大影响。因此,工人阶级还依旧处于不自由的和异化的状态,只有建立自治关系,劳动者才能逐步成为自己生活和历史命运的主人。“只有通过这些进程才能扩大人的自由的新范围,才能为实现人的总体,为克服片面的职业化、克服在单一范围活动中变得迟钝和个性上的严重偏激(这一直是各种政治操纵和思想操纵的最适合的基础)开辟道路。”^②因此,弗兰尼茨基认为,推进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建设的进程,也就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的历史进程。

四、回到历史语境之中的反思

通过上述关于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的主要观点的概述,不难看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同20世纪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讨相比,的确具有深刻性: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讨没有停留于一般的实践理性或者实用理性的操作层面,而是充分继承和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以及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

^①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52.

^②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88.

文明所积淀的文化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讨又没有停留于一般的纯粹理论形态，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其理论设计者，因而在他们的改革理论中包含了他们对自己所亲历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分析、对现存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类历史，特别是中东欧各民族独特历史体验的深刻反思，因而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

当然，从今天的人类历史进程和人类社会条件来看，以及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实验的视角来看，弗兰尼茨基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一些内容也已经落伍了。例如，他们都基本上没有涉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世界性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与此相关，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更多地集中于政治体制和文化内涵的分析，对于其经济内涵探讨得较少。而且不仅存在着理论上的局限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改革理论还遭遇到了历史实践进程的考验。对于20世纪50、60年代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实验，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命运，历史进程已经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不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判断和评价。当然，我们面对的是这些历史选择和历史进程的灰暗的、令人沮丧的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几次主要改革实验的结局，无论是以和平的还是流血的、妥协的还是激变的方式，都很难说是取得了成功或者突破性的进展，大多以挫折，甚至是以灾变而告终。最好的情形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在很长时间内得以延续，但很难说是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功，建立起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新社会主义模式，而其他的改革最多是改革以挫折或者灾变的方式终止后的一些局部的改善。至于苏联和东欧的现存社会主义的最终结局，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通过一场苏联解

体,东欧各国先后转轨,最终都离开了社会主义发展轨道而画上了一个句号。

然而,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在于,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改革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并不会完全否定他们关于改革的理论探索的积极价值和历史地位。人类与其他动物界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人的历史不会停留和终结于每一个自然的过程和过去,而是不断进行思想的重演,而这种思想的重演甚至构成了更为重要的人类历史。就我们的研究主题而言,中东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选择和历史命运给人类的历史认知所提供的内涵要远远多于上述历史事实本身。我们不能因为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的剧变和历史转轨而回过头去否认中东欧各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和历史真诚性,我们也不能因为东欧几次社会主义改革遭遇的挫折或失败,以及最终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而否定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验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的历史价值。

我一直认为,20世纪50、60年代由东欧改革派政治精英和理论精英联袂设计和推动的几次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重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或没有取得根本性和实质性突破,是人类历史的最大遗憾之一,是人类社会主义探索的最大悲剧之一。我们可以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改革的受挫和失败,使东欧的社会主义,乃至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历史提供的一次珍贵的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救赎的机遇。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不能断然推测“如果”当时的重大改革取得成功,今天中东欧的社会发展将会是什么样,社会主义的前景将会是什么样。但是,我们认真分析这些改革遭受挫折的原因,无论如何,无论何时,都不会是徒然的努力。

毫无疑问,东欧社会主义改革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涉及每一个国度,则情形更为复杂。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从外在的原因来讲,斯大林主义留给苏东的历史遗

产,即专制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太过强大,已经对社会主义事业构成了毁灭性的灾难,这种外来的灭顶的压力和暴力,加上东欧各国本土的维护僵化的和专制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保守力量,就构成了一种社会主义改革很难突破的屏障。从内在的原因来看,虽然我们前述的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包含着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人道主义精神、反对专制和扬弃异化的民主体制,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经济社会体制等重要的、有价值的内涵,并且也努力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重视商品经济的规律等,但是,如上所述,囿于历史条件和思想认识,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没有把如何使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这一世界性难题清晰地提出来,更不要说提出可行的改革思路。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普遍对现代市场经济机制和体制的研究重视不够,甚至还基于对物化和消费社会的批判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和拒斥市场经济。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来提炼和概括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实验的理论探索留给我们的一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特别是需要吸取的教训:历史的进程证明,如果不能破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一世界性难题,如果不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一种有机的,并且高于资本主义的结合,社会主义就很难在当代人类社会获得安身立命和健康发展的基础。这既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曾经面临过的根本挑战,又是当今和今后任何社会主义探索所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尽管如此,我认为,关于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验和理论探索,我们必须形成两点基本的认识:一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思想取向和价值追求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符合人类文明所培育出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的,因此,这些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乃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值得汲取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认知;二是必须充分肯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东欧社

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贡献和他们所提出的改革思想的重要价值。历史的认识和总结是很复杂很难的事情,我们发现,学术界和理论界有一种不求甚解、望风扑影的表面化的看法,有的人认为20世纪50、6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扰乱了社会主义的正常进程,甚至对后来的东欧剧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历史盲视和理论误导,实际上,如果没有东欧社会主义改革一次又一次的不懈探索和追求,以及每一次改革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改善、改变与给世界和人们带来的希望,那么斯大林主义的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会呈现出更加绝望的景象,甚至会更早地走向解体。进而,我们还要看到,在中东欧各国,发起这几次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政治精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某些政治反对派,而是像铁托、哥穆尔卡、杜布切克、纳吉等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或者长期的领导人,是他们以巨大的勇气挑战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霸权,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大幕。而对这些领导改革的政治家和领导集体而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绝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改革理论的积极探索者,是改革实践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持者。如前所述,真正的和实质性的矛盾冲突发生在来自苏联和东欧各国反对改革的保守力量与改革派政治家理论家之间,相比之下,改革派理论家与改革派政治家之间的一些具体分歧属于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即在改革的程度和进度上的认识分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回到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语境中,具体地、客观地分析来自政界和理论界关于改革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以及深入了解当时社会主义改革的艰难性和面临的复杂的矛盾,那么,我们从中是可以获得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更加健康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可资借鉴的启示的。

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20世纪较早地专门探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成果,至今也还是系统地思索社会主义改革课题的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之一。弗兰尼茨基不仅清晰地阐述了

自己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观点,而且还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注解和述评”,很详细地讲解了自己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理论文献。这些资料对于我们全面开展 20 世纪历史条件下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衣俊卿

2014 年 9 月

目 录

| | |
|-----------------------------|-------|
|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 |
|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 衣俊卿 1 |
| 中译者序言 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系统理论探索 | 1 |
| 前言 | 1 |
| 绪论 | 7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起源 | 18 |
| 第二章 放弃原则并开始编造神话 | 27 |
| 第三章 斯大林主义 | 40 |
| 一、制度的定义 | 50 |
| 二、围绕党的争论 | 70 |
| 三、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 85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 | 100 |
| 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 100 |
| 二、社会主义的含义 | 111 |
| 第五章 当代的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 | 171 |
| 一、欧洲共产主义 | 171 |
| 二、社会主义与不发达国家 | 186 |

| | |
|---------------|-----|
| 结束语 | 200 |
| 注解和述评 | 207 |
| 主要译名对照表 | 315 |

前 言

9

有出于各种动机和从不同角度写的各式各样的书。还有一些书则同某些人物及其所处的历史命运相关,同最殷切的要求、向往和希望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我这部著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我属于这样一代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他们早在战前就在反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最深入的运动中把自己的历史存在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因此,我对于为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进行斗争和力求实现的东西,无论在理论上或情感上,从来都不会无动于衷。

如果说我这个战前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情况曾一无所知,或者说那里的情况显得神秘莫测的话,那么 1948 年却作为某种历史基本现象对我产生了影响。开始暴露出来的事实表明,许多事情同社会主义关系和社会主义道德毫不相干。可是,过去和现在发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社会主义,甚至畸形的社会主义能够证明自己与这种丑陋的关系和蜕变的人格没有关系吗?伟大十月革命的历史光辉仍在为新统治制度的黑暗面作解释,并赋予新统治制度以光辉形象,从而妨碍了对真实情况的了解。此外,那里的一切现状都被特别强调为是对十月革命和整个马克思主义

10 的唯一真正的继承,而他们的许多理论家又相信他们干得最漂亮。

只要我还没有实现我的一些想法,只要我要解决的其他一些问题使我无暇系统地分析这一历史现象,我就不想贸然地作出一种抉择。我觉得,以前的分析都是马虎的、不完整的。因此本书中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državnisocijalizam)、国家资本主义(državnikapitalizam)、畸形的社会主义(deformiranisocijalizam)、国家主义(etatizam)^①等范畴,都还划分得不够明确,这首先不能使我感到满意。我利用了第一个机会来做这件工作,这个机会使我能够在完成一定的社会义务后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写这本书的想法始于70年代初,尽管早在30年前这个问题就从理论上和感情上一直吸引着我。对我来说,起码有两个主要的先决条件使我终于想阐明这个问题。一个先决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工作和其他许多小型讨论会使我有了研究所有这些系统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必要视野。另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在同斯大林的冲突中曾努力开创一条以自治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和实际经验,难以想象这本书会取得这些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有迄今我在理论方面下的功夫以及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成就,而且也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实践。

11 我以为,联系当代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是,必须通过铲除任何形式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铲除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关于人是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实践存在这一思想,以及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主张,乃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本思想,包括由上述论点所产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结果。因此,我还向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即依据这一思想来阐明迄今的历史过程,同时把自由生产者联合体这一思想尽可能彻底地,并首先与迄今工人运动

^① “etatizam”,即英文中的“etatism”,在广义上与“statism”相近,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加强国家干预和中央权力的体制,因此一般译为“国家主义”;在狭义上,“etatizam”(“etatism”)与“statism”相区别,特指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制,即“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在本书中,我们根据不同的语境把“etatizam”分别译为“国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译者注

发展中的现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加以阐明。必须对这些问题和迄今的历史实践进行理论分析,并力求分析透彻。所以,与迄今把斯大林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模式之一的大多数说法相反,我的分析使我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同样地,与“自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模式之一的观点相反,我的分析结果也使我产生不同的看法。更不用说在这一分析中,我对过渡时期、发达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等论点,都作了不同的说明和解释。

我并没有打算涉及同这个题目有关的“所有问题”,也不想谈得过于细。本书的每一章都可以构成单独一本书,又可以发挥出其他许多题目,这一点从后面的“注解和述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意图只是:把我认为对理解所有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最重要的东西、我自己能够作出新的说明和解答的一系列问题汇集在一起,综合起来,从思想上把它们搞清楚。本书是我个人的见解和研究成果,而在书末的“注解和述评”中,我收集了许多最重大的争论和其他主张。我的观点是基于我在许多大小讨论会上和一些书中,特别是在我写的《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中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定认识之上的。我的见解在某些方面必然同其他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吻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在本书中我只对我思考并研究了30年之久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因此,我决不认为,我所同意的并在“注解和述评”中援引的那些思想不是对我的观点的论证,而只不过是说明和指明这些观点与我所提出的观点类似或相同罢了。一部著作应从其自身中,即从尽可能正确的前提、分析的逻辑性和连贯性,以及由这些前提而得出的结论来加以肯定。而这一切又应当以具体的历史关系及其发展的趋向和可能性为依据,而不应只凭抽象的美好愿望或理想的要求。同时我想提醒读者,本书的结构使有些问题在一章中没有谈透,但在下几章中又作了阐述。因此读者只有在读完这本书后才能了解到问题的全部。

12

虽然本书也是对我们有条件地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这种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所作的十分尖锐的批判,但是从整个篇幅中可以看出,我决不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专门给别人扣上各种帽子,而赋予自己以解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垄断权。这种行为也是必须加以澄清的一个历史现象。我认为,谁都无权判定某人是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他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谁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能得出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成果,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那是另外的问题。有人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败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声誉,这是事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懂得,在畸形的社会现实中,当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赞扬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意向以及发达的新社会现实的东西时,个别人物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是畸形的。因此,我的带有不同观点和论点的分析和议论,不是为了给这些畸形的马克思主义者扣上修正主义的高帽,或者说他们是右倾的或左倾的机会主义者等等,而是要表明他们离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正确观点有多么远和为什么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在这些理论的制造者的手中都搞了些什麼名堂。

- 13 至于谈到本书的最重要命题之一的斯大林主义,根本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它,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对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这个重大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这里所说的那种思想,究竟像许多人所断言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产物呢,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和背道而驰的东西呢?这是些非常复杂、麻烦和神秘的问题,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系统问题作完整的分析,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我把我的这一努力仅仅理解为对破除某种神秘化东西的讨论作出的贡献,而那种东西就像沉重而坚固的思想外壳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意识笼罩住了。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追求真理,不管这样做是多么痛苦。如果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彻底弄清斯大林主义问

题以及被标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官僚主义垄断和专制问题,那么共产主义者不仅可能起保守的作用,而且可能起反动的作用。这对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肯定是最不好的事情。

“注解和述评”是本书的组成部分。在这部分里我对许多问题作了广泛的讲解,特别是介绍了其他许多观点,因为在正文中为了叙述的逻辑性和连贯性,我不愿打断思路。同样地,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当我提到社会主义者一词时,我想得比较宽泛,既指共产主义者,也指那些具有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为其历史存在和意义而斗争的人。

不管各种舆论对本书是怎么看的,我这本书不但澄清了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来遇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和难题,而且还让人们相信在哲学和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面前不存在“永恒真理”维护者们用来阻挡人们前进的障碍!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78年8月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①

卡尔·马克思

^① 参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译者注

绪 论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震撼着本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仅仅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最锐利思想武器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几十年前社会主义就已登上了历史舞台。情况表明,对社会主义来说,真正的、批判性的和坦率的马克思主义比它所想象的马克思主义更为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预见没有实现,有些是实现了,但往往以预料不到的形式实现。当今世界的许多现象,包括资本主义现象和社会主义现象,使当代人感到极大迷惑。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就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新对抗和新矛盾。

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追求自由的最崇高理想中历史地诞生的,因而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历史上最光辉事业的继续;这些事业表现为人们反对压迫、暴力、经济统治、政治统治或民族统治,以及形形色色的暴戾。古时候的一些人物和一些革命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各个阶段表现革命忘我精神和当机立断的典范。斯巴达克、闵采尔、巴贝夫、农民革命起义和欧洲公民革命公社,通过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家一辈杰出人物,在法国的布朗基分子和公社社员、俄国的苏维埃、德国的斯巴达克团员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及当今其他各种革命运动的革命委员会和公社的一整套

思想中,直接地延续了自己的历史生命。

- 16 马克思主义从所有这些革命运动中获得了最广泛的历史视野,因为它从理论上、思想上给当今的几代革命家提供了最多的东西。其他任何一个运动都没有过这样重要的理论观点,也没有过这样富有思想的伟人。马克思通过对历史和当代文明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对人类历史作出了迄今最深刻的理论探讨,为新人道主义提供了最深刻的理论基础。这当然不是说,问题再也不会有了,所有问题都解答了。恰恰相反,历史不断向人们提出新的问题,而开展创造性的斗争和努力正是人们生存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主义为自由而诞生,为人在其不停顿的历史进程中和创造自己的自由的历史世界中继续迈步前进而诞生,它为批判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而诞生:这段历史,有些人称之为阶级的历史,有些人则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历史,这段历史虽有许多伟大之处,但仍留下了处于依附和被剥夺地位的许多阶层、阶级乃至民族。完全可以理解,客观情况及当时文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曾经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以致无法寻求其他的根本解决办法。当时所取得的任何程度的自由都是历史上可以达到的最大限度的自由,都是历史上可能做到的最激进的创举。因此,必须以应有的尊重心态来评价这些代表人物。关于当代新人即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理论忘记了一点:不仅个人,而且一群人、阶级和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同样懂得要献身于自己当时的理想和更自由的生活。今天之所以有更深刻的变革,都应当归功于许多前辈,他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下以巨大的牺牲和忘我精神,为当代的革命和战胜整个旧世界的可能性奠定了物质的和道义的基础。今天只要一说起新型材料制成的人,就可以从这种人过去和今天的所作所为中得到清楚的认识。当社会主义向欧洲和世界的资本主义发起第一次冲击时,交织着人们的多少喜悦心情啊。被奴役的人类带着多么崇敬和信任的心情来看待这一变革的代表人物,而对这一伟大历史变迁的胜利结局曾寄予多么大的希望啊!可是后来有人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名义都

干了些什么呢？世人看到了斯大林的令人生畏的统治和警察的恐怖、不可思议的非理性的清洗，马克思主义也被意识形态化了，而马克思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对意识形态化的卓越思想！斯大林分子在争夺权力及维护政治和其他特权的斗争中，比自己所鄙视的资产阶级作风更恶劣。他们把最自由、最富有批评性的思想变成毫无生气的、枯燥的教条和干巴巴的条文，而且野心勃勃地把它奉为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这样一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就出现了垄断：对准确解释的垄断，对每一种新的努力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作评判的垄断，对革命的垄断，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垄断，对全部思想的垄断。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新的祭司，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自由阶段谁能想象得到——他们不仅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是鞭挞并毁灭它。他们同其他教条主义者和吹鼓手一样，受制于自己的局限性，认为为了维护他们的天堂可以不择手段，打棍子也开始成为比人性的、人道的和社会主义的语言——人的普通语言——更常用得多的手段！这当然不符合，也永远不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建立在欧洲和亚洲的野蛮时代的传统之上，而是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即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及欧洲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最优秀、最光辉的传统之上。

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及其革命主张来研究早已为人们熟知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很方便的。但是运用这些思想去解释新的进程，理解新的形势和事态，则是很难的，或者说是最难的。而最难点就在于要有勇气批判地、彻底地把这些思想运用于自身，运用于自己的实际。今天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意识形态观念(ideološke mišljenje)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过去和现在无疑都是最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体系之一。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是否发生了同历史上其他许多思想和主张所发生的同样事情呢？当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或后斯大林主义制度下以粗暴的行政措施，即国家和警察的措施阻挠一切自由的、批评的讨论时，当人们不敢逾越规定的提法和观点，主要

18 是上层政治人物宣布的提法和观点时,当政治领域成为检验理论、检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事物的标准和裁决者时,当现代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赞成这种社会)里允许开展比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由得多的马克思主义对话时,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理论上的根本否定,但上述思想体系不正是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思想、成为神秘化的意识形态吗?在那里不但禁止思想的自由交流,而且禁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自由交流。难道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明白,迄今的全部历史已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自由交锋、没有批评、没有争论、没有偏差和错误,就没有思想、思维和科学的发展,并且在这方面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高级裁决者,因为只有历史实践和理论与科学本身才是唯一的最高标准吗?

只有局限在自己的现实和既定的思想活动范围中的视野狭隘的思想家,才会在对待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运动时把自己放在教师爷的地位上,并给每个人贴上各种不同的——从反动性、反苏主义到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批判标签。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允许任何人摆出教师爷的傲慢态度,而总是乐于听取那些开创了革命事业、推动了历史前进并奠定了理论基础的人的充满智慧的经验之谈。然而,当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是否这样呢?如果就欧洲而言,那么只有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性行动中实现革命的。苏联当今这一代理论家,甚至老一些的理论家,是在发生列宁十月革命这个不寻常的历史事件的时候,才出生或刚当上小學生的。因此,我们有过革命实践的人比今天东方的思想家更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后者没有经历过武装革命的战火,以为只要吹起贴有修正主义标签的气球并兴高采烈地把它们放到天空,就能弥补他们在这方面的缺陷。

我们要问:他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做?是不是革命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力?我们看到,不是这样!进行过革命的是那些由于自然规律或被

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清洗而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二代人。是不是“不寻常的”历史观和对情况的估计赋予他们这个权力呢？比方说：认为战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主要的、比法西斯主义更大的阶级敌人，认为它和法西斯主义是孪生兄弟，或者宣布斯大林是第四位经典作家，而其他许多人尚未病愈？或者认为列宁革命队伍中的几乎所有成员，从托洛茨基(L. D. Trocki)、布哈林(N. I. Buharin)到季诺维也夫(G. E. Zinovjev)等人都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或者认为爱因斯坦(A. Einstein)、孟德尔(G. Mendel)或弗洛伊德(S. Freud)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因而就是“反社会主义的”，所以在一个时期里受到排挤？或者认为中国的革命力量非跟蒋介石结盟不可？或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因而对工人运动来说，不论它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开展或是在法西斯独裁下开展，反正都一样？或者认为黑格尔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与贵族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实行的反动统治没有什么两样？或者还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过是黑格尔学说的残余？而这就可能意味着，这些著作和理论也是贵族对法国革命的反动镇压，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或者认为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它很适合于神父的传教)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顶峰，甚至是理论方面至今不可突破的框框呢？或者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说成是由帝国主义走狗和投靠法西斯的刽子手组成的反动集团，也许这是情报局决议通过后作出的绝妙评价吧？或者认为布拉格之春是资本主义复辟？或者正如东方思想家所说的，共产主义在欧洲的一个新思潮即欧洲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反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已？

19

让其他人在其他场合用更多的这类历史上和理论上谬误的例子来补充吧。这样的谬误无论如何没有给这些人以做出上述事情的权力。绝对没有！我还想再提出本书中还要详细谈到的一点。这就是：他们的这种权力也许是从以下的主张和做法中得来的，即实行生产资

料国家所有制,实行国家计划和国家分配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被完全排除在对生产和分配的管理之外;不仅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国家极权化,而且在文化领域也通过规定艺术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等手段,实行国家极权化。难道这就不单是社会主义,而且是发达的、最高类型的现实社会主义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斯大林的臆造?难道他们不知道,任何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后来的一些人,从来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而恰恰是说过相反的话吗?

20 在那些国家里热衷于批评的同志们必须懂得并永远记住:在已有发展自由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有了十分丰富多彩的真正发展。在那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可以自由地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于理论和具体实际的各领域;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不仅对资产阶级文明而且对其本身都能得到发扬。

今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肃得多而且责任重大得多的任务,这使我们不应感到自满。为什么?因为有人在制定政治性指令并对一切不符合守旧的教条主义思想和公式的、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进行形式主义的、激进的胡乱批评和乱扣帽子。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在迄今的社会主义发展中,诸如畸形、谬误和犯罪之类无法用个人崇拜的简单说法一笔带过的许多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要是我们继续这样搞下去,我们要问:产生如此恶劣的统治形式和人际关系形式的社会主义算得上什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任何栏杆前面,而不问在那一边有什么东西!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能满足于把自己的历史实践变成社会主义的范例。在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迄今发展中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含糊。在诸如“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工人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不能含糊。这种“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与“工人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不是去模仿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而是工人阶级对自己的生产和分配享有权力和自治,

是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历史生活行使权力和自治。在国家消亡或国家强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能含糊。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或者其他种类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主义体制下,国家的强化必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今天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不能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就简单地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把一种历史实践(这一实践有着各种畸形、不自由、异化,以及不民主的关系和行为)宣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如果这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那么世界就不会为它而奋斗了!这样一来,有人就会用武力把它强加于人,而这将是任何社会主义的终结!

在斯大林主义制度和后斯大林主义制度下,早就存在着许多禁区。既然存在着这些禁区,又怎能有创造性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呢?如果还想教训别人,而不愿意同别人进行平等的、坦率的和富有思想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对话,难道也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吗?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中早已存在,对话的公开题目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关系;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不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官僚国家主义关系的重要特征是什么;生产者自治和公社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什么是民主关系和什么是人的如下自由权,即既有管理自己历史性生活的自由,又有对那些束缚人或没有很好解决社会主义关键问题的所有进程持批评态度的权力。什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发生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一切不愉快现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这么多非社会主义的东西,难道是可能的吗?难道违背社会主义规律的简单化公式能解决这些难题吗?难道不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不仅要问这一切是怎么可能的,而且要问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法制即使在受到尊重的情况下,也不如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法制的水平高?发达的资产阶级法制还允许人持有并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允许建立直接反对制度的政治团体和党派,即允许广泛的政治自由;允许工人通过自己的工会和政党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允许他们在不

同意其资产阶级政府的措施时进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还允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仅对社会主义，而且对资本主义自由地进行自己的分析，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直接反对这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社会形态下，这些自由不总是存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此经历了千辛万苦；而在依靠工人阶级的国家里，这种自由是不一样的。

22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不满足于这些已取得的自由。他们当然不会轻率地把这些自由说成是形式的，而应该看到，它们对人们为进一步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很懂得，这是伟大的成就，但是今天它们还不能完全建立在当代文明发展已取得的这样的水平上。马克思主义者懂得，上述取得的成果并未使政治和经济异化的一切形式消失，但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是有可能实现的，不过肯定不是通过一个唯一的革命行动来实现。为什么有思考的自由并懂得用批判的眼光估量以往的许多东西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会满足于连“形式上的自由”都不能保证的而且又不能取得我们称之为“富有内容的自由”的这种制度呢？为什么他们会满足于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呢？在这种社会主义条件下，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宣布为特务并被杀害；对千百万人施行暴力；既没有自由工会，也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场所；工人阶级在管理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中没有任何权利；扩大再生产和分配是由别人按他们的标准进行的；对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消极现象抱批判态度的人被剥夺了公民权。总之，在这种社会主义条件下，过去和今天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的东西都没有实现。马克思或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的东西是在工人直接管理自己的生活进程和生产进程基础上建立社会制度，总之是直接民主而不是间接民主。

在对这些课题设置禁区的地方，既没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应当通过自由的探讨来彻底阐明这一切，因为那些态度和行为的后果不仅是灾难性的，而且是今天社

会主义思想不能突破的主要困难之一。如果以为在西德共产党组织只得到百分之几的选票,而公民几乎投了半数票支持社会民主党,仅仅是某些内部关系和较量的结果,如果以为所暴露的缺陷和其他许多不愉快的事件对这里的工人运动(它同东德的状况是截然不同和对立的)没有影响,那完全是幻想。不应该把德国保守派和反动派提出的“要自由还是要社会主义”的基本竞选口号仅仅说成是粗暴方法或竞选把戏,而应看到在迄今发展的既成事实下,这种口号是完全可能提出的。应对此负责的不是德国保守党,而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23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历史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是无原则的。本书不但要总结我迄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且要总结几十年来参与一个革命过程的人们的具体历史经验。在本书中,我将试图根据我迄今的认识,阐明几十年来提出的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关的重大问题。我决不认为,我对迄今为止从某种单纯的和抽象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原则出发而作出的历史性努力都加以议论和反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十分了解社会主义走上历史舞台时所处的困难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任务之一也就在于:尽可能明确地把历史上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违背社会主义出发点的东西同不是必然的,而是专横的、意识形态化的、神秘化的和武断的东西区分开来。凡是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都不会指责列宁在一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不得不把国家和党当作强大的支柱,不得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时期里(这个专政确实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阶段)更加强调这些政治领域和政治机构的意义。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在形势已经大为好转的情况下,在相当稳定以后,还把这种观点宣布为最高原则,甚至使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在这里,一种必然是实用主义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变成了危害社会主义的原则,它比起所有的所谓修正主义分子和所有的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宣传,过去和现在都更有害于社

24 会主义。特别是在欧洲,首先由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来承担社会主义主要挫折的责任的时候已经到了。在不低估今天世界所遇到的困难的同时,我们认为,今天欧洲各国社会发展已达到这样的水平,以致没有任何理由不彻底解决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问题,没有任何理由不把社会主义民主的某些根本问题彻底付诸实践,没有理由回避用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式的和完全负责的态度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固执地坚持某些已认可和已接受的立场,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视而不见,以愤恨的心情反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对话,宣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异教徒,咒骂他们就像攻击教会一样,这一切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符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面前,都不应放下自己的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不是前期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今天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分析面前的是几乎比以前更难的问题,不能用老套套去解决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动荡中极其重要的新现象,以及迄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都是关键性的难题,而在涉及马克思主义时摆出一副某种绝对真理所有者的架子,并给不同意这种“绝对”真理的人扣帽子,是很不负责任和很幼稚的。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勇气面对真理。他们应当向全世界,首先向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说明发生过什么,什么事情必然会发生,而什么事情不是必然发生的;在哪里发生了不该犯的错误或背离社会主义的事情,而这种事情过去或现在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的事业高于个人的利益或情感,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来说,也是如此。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相提并论。

虽然马克思主义比其他理论更符合真理,但它同样有片面性和犯错误的权利。我们的力量正是在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坚强性,所以当我们在犯错误时我们能够正视世界。然而,如果坚持错误,不敢去寻找其他可能的解决办法;如果看到解决问题的其他可能性,却仍然

顽固地孤芳自赏地固执己见,那就会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社会主义的迄今遭遇使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公开讨论许多人认为早已解决了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不用指责,也不用作不必要的自我辩解。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向世界解释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我在本绪论中已提到,其他许多问题在本书中也将提到。新人道主义不仅包括人们在其历史斗争中迄今取得的资产阶级所有权利(我们谈论这些斗争时不应再贬低这些权利,而应持应有的尊重态度),而且将更大地加强个人的历史权利,并在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赋予个人在管理自己的社会生活、自己的劳动和全面发展方面越来越多的、十分彻底的参与。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这种新人道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每日地把这一切变成具体的历史行动,那么他们就没有要求投入历史斗争的权利。

25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许多危机无疑曾经是不可避免的。现成的药方是没有的,情况总是比人们灵机一动地想象出来的更为复杂。正如以前有过的情况一样,个别人本身也兼有各种激情、弱点、伟大之处,以及局限性和天才。在作历史衡量时,人这种片面性是不可忽视的。

如果马克思主义对迄今所发生的事件和所作的努力、对高潮和低潮不是闭眼不看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过去是伟大的,今后也仍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它的革命辩证法不是为了自我辩护,而是为了对人和对己都抱彻底批判的态度而创立的。

我力求不低估这个历史进程中一切伟大的东西,并对那些办不到的事情抱谅解态度,但要最无情地反对那些不是必然的东西。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起源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争论已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我们先不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吸引了欧洲被压迫、被奴役的群众，首先是欧洲的无产阶级。他们不是生活在今天的条件下，而是曾为 12 小时工作日和起码的生活条件而斗争；他们主张自由、解放、取消雇佣关系、消除政治和经济依附及无权地位；主张废除社会特权和实现平等，取缔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建立一个直接表达民意并以民意为依据的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明白，不取消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消除今天劳动者被剥夺的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征不仅是私有制关系，而且是明显的政治和经济的异化，这种异化产生自雇佣关系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国家的政治制度。

迄今的所有争论和讨论都围绕着马克思是不是主张某种中央极权主义，该不该对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决定性的发展负责，因为可以说，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陷入更糟糕的政治和经济异化之中。迄今的所有这些讨论当然都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掌握国家的必要性、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和建立新国家机器，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等论点。与这种思想相反，讨论中

也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即废除一切国家,建立自由公社和实行自治,作为避免资产阶级政权造成的后果和避免国家政治机构对个人自由限制的唯一保障。

28

然而在这方面,人们往往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全部事业。在这一事业中,从一开始,甚至当他们还没有产生关于历史 and 人的新思想时,就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人从当代人所共知的一切异化包括政治异化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而这就意味着首先从国家领域、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形态、官僚机构和军队中解放出来。

后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理论曾企图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中的某种黑格尔学说的残余,并把它同后来成熟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可是他们却完全“忘记”了,晚年成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蔑视和厌恶的心情谈及国家机器,并宣称只有对仍然强大和有经验的资产阶级使用自卫手段及对那时起就应消亡的国家采取最后行动,才能把工人阶级提高到国家政权水平。不应忘记马克思为准备写作关于巴黎公社的历史性著作而写的论文和文件,也不应忘记恩格斯在论杜林的著作中有非常明确而清楚的论述。还不忘记,人们往往不了解列宁在革命前夜面临着夺取政权的直接问题时,十分透彻地研究并提醒过人们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及其论断。

从他们的全部理论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这样一些思想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列为反对国家主义的思想家,但他们也同时看到了在革命变革的最初岁月和最初阶段仅仅作为维持政权和组织基本生活进程的手段从而使社会主义得以生存的暂时政治形态的必要性,但这种政治形态绝对不是扼杀自由和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手段,绝对不是用暴力来清算那些在估计形势和未来发展方面与统治集团持不同看法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手段。

人们往往把马克思说成是主张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直接任务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人们过去

29

和现在都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非常深刻地探讨过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具有极为深远和广泛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一次直接的社会变革、暴力的变革,而且要废除多世纪以来社会关系的制度——用某种术语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关系或阶级关系的制度;不但要废除资产阶级关系,而且要废除依然滋生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关系的权力,废除政治领域的权力、意识形态的权力,总之要废除那些当今世界所共知的人的异化形式。他们的理论既是解放当代社会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的理论,也是使人们摆脱今天人所共知的一切异化形式的理论,这一点也是重要的。这就突出了工人阶级的权力问题,并提出了建立无阶级社会的问题,以及不存在今天这种政治管理和统治的形式,不存在今天这种依附、屈从、不平等和不自主形式的社会的问题。他们的思想贯穿着深刻的人道主义,也只有在这种远景下才能看到各个阶段的实际解决办法和本应有助于实现基本目标的解决办法。因此,使朝着基本目标正常发展成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含混的、不恰当的和无先例的历史愿望。所以,在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必须保证有可能绝对自由地、批判性地研究运动和革命的每个阶段,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不就取得成果与否进行真正的思想交锋,那么任何革命都会有停滞和蜕化的危险。

实用主义的和简单化的革命(即使它是必需的)以及权力的政治形式和国家形式,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来不是目的,而只是废除资本与保证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过程中历史变革的暂时手段。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就在于此。也就是说,不是要在革命以后使雇佣的、依附的、不民主的和无人道的关系永久化——只要政权脱离其他人民,这种关系就必然产生——而是要通过实现公社的某些重要原则,或者通过实现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来建立新的人道关系。关于“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本书还将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虽然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思潮,首先是同无政府主义的思

潮,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符合的,这一思想是作为劳动者的人对自己的历史生活实行自治的原则。人只有掌握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舵盘时,才能完全摆脱异化了的权力与压迫,摆脱对于他所不理解或格格不入的某种目标的各种依附形式,只有那个时候人才最终意识到,他自己才是这一最重要的历史主体,历史是他自己的事业。这肯定是人摆脱其他各种异化形式,特别是意识形态异化形式的最重要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暂且先提及这两位)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解是基于如下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将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里发生,而当时指的是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建立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之上的,而这些革命中各种著名的历史性冲突,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发 展为基础的,这就基本上决定了历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合乎逻辑地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也会是如此。然而,历史既纠正了他们的这种看法,我们也必须对这一思想本身作必要的更正。虽然他们两人已相继作了一些声明,但他们的思想仍受到过于强势的决定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出发点的,既是重要的,又可以平心静气地说是宏伟的黑格尔体系所赐予的。在这一体系中,哲学实际上被理解为对思维和整个存在作理性的、辩证法的解释。全部现实都是理性和思想的有规律的发展,因此哲学才会是科学上严格的,道理上说得通的。在这种哲学中,发展的规律性不仅是使哲学有可能合乎情理地发展的前提,而且也是人们有认识这种客观必然性的自由的前提。

马克思在自己的这种思想方面并没有走得很远,而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又有许多历史经验和事实作依据,于是在他的眼前便展现出一幅能够相当清楚地看到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是由那些带着自己的观点、利益、欲望和³¹

谬误等而投入这一行动的有觉悟的人创造的,他们在许多方面给一定的历史事件打下烙印。但是围绕这一切,他们两人仍然没有得出结论:人们的这一有意识的活动(angažman)在某种意义上会破坏其所设想的决定,也就是认定上层建筑与政治领域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变革首先在社会经济基础最发达的地方进行。这意味着,革命几乎预定要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发生,而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些最发达国家当时就拥有自己的经济潜力,即拥有发达的生产力,那就会把革命理解为世界革命了。

从这些前提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到不完整的,但已初步形成的结论。革命如果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那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欧洲和其他大陆的所有其他国家当时基本上处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形态,或多或少是不发达的,往往比上述最发达的国家落后几个世纪。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以自己的巨大经济力量、发达而人道的新关系、自己的民主传统,以及进一步发扬和提高人的公民权利、消灭剥削和雇佣劳动、达到生活高水平等,对世界的其他部分发生强烈的影响,使其他国家的进程按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加速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有可能立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取消军队的基本思想,因为军队总是使等级关系和官僚主义关系再生,并给每个国家的经济增加很大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人民警察以维持必要的秩序不会是很远的将来的事。这样社会主义就可以按自己的需要不受阻碍地发展,而没有任何外来的压力、竞争和威胁。消除主要生产领域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废除雇佣关系,使国家消亡,实现自由生产者自治、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公社等重要设想,都是这一历史变革的直接任务。

32 对未来的历史进程的这种看法是当时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自始至终(alfa i omega)的认识。在第二国际时期,除了帕尔乌斯(A. L. Heljand Parvus)和托洛茨基,没有一个思想家在世界大战以前考虑过

革命道路和革命进程的其他某种可能性。他们的设想当时至少是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而喧哗一时,基本上谁也没有认真地注意到这些设想。

然而,历史曲折地绕过了当时认为不可逾越的许多东西,并向革命力量提出一个任务,即要解决在当时思想和革命预见中想象不到的问题。尽管福尔马尔(G. Vollmar)曾提出一个想法,即不应只考虑世界革命,还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中突破的可能,但这一思想到了战争初期列宁的分析中(问题是列宁是否知道福尔马尔的这个思想)才有了更明确的轮廓,并成为一种有可能进行的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列宁十分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毕竟是不平衡的,因此不能期望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发生革命,正因为这样,就有可能和必然仅在几个国家里,也许只在一个国家里爆发革命。但是,当列宁认为历史的进程不仅关系到某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总和时,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的进一步分析增添了某些新的东西。列宁在研究历史发展时指出,历史的情况会导致这样一种关系,即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不一定最高的某些国家里,“帝国主义的链条”可能薄弱些,而由于各种历史情况,这些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变得更不牢固,充满着内部矛盾。列宁在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形势时,恰恰是在自己的国家——俄国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因此他设想,在就其社会发展而言远远落后于欧洲最发达国家的这个国家里有可能发生革命,他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增添了关于人的自觉历史行动的某种目标和能动因素的强调,即这种历史行动不一定要同经济基础的发达程度相一致。

这种分析使列宁持一种与托洛茨基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³³提出的几乎一样的观点,这种观点的部分内容作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载入史册,并在十月革命后为一些新的东西所补充。列宁也是主张不断革命论的,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写的著名的“第一篇

告同盟书”中所提出的主张一样^①。但列宁对托洛茨基 1906 年提出的论点却抱否定态度,因为托洛茨基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即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会立即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作为一位伟大得多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列宁认为这需要具备许多特殊的条件,而绝不能事先就说这些条件必将具备。因此,列宁作为一个具体政党和一个革命运动的领袖,既然对运动负有全部责任,就不能把这一运动的整个战略押在一张对许多历史性设想都很没有把握的牌上。

但是,使一个革命迅速过渡到另一个革命的这些条件中的许多条件终于实际上具备了。当这些条件变成历史现实时,列宁立即抓住了有利的历史契机。托洛茨基无疑十分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见解一下子变成了可能的现实。但要实现这一设想,还需要组织得很好的革命队伍。正是列宁为此作了准备。

革命本身是在如此独一无二的情况下爆发的,以致有许多东西可以完全破坏并阻止这一革命。布尔什维克通过临时政府关于停止使俄国濒于绝境的战争和开始哪怕是局部的土地改革(这对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来说完全是现实的和可能的)的决定,是不能够指望提高群众革命情绪和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甚至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按照列宁的估计,也许只要一天工夫,起义就会被反动军队的行动彻底镇压下去。

34 十月革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并且无疑地是近代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但是,它为什么没有按照社会民主运动中原来的设想发生——社会党右翼根本不想承认这一历史事件是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后来又怎样产生斯大林的畸形和一系列非社会主义的举动——关于这一事件的性质直到今天仍然是进行争论的话题。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也是我这本书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不把十月革命前后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8 ~ 199 页。——译者注

的进程观察得更清楚些,就肯定不能充分理解斯大林主义问题。

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早在这整个革命过程刚开始的时候,这种落后条件下开展的革命行动的全部优点和弱点就已经可以看到了。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曾多次强调过这一情况,并指出了列宁和列宁的党所遇到的困难。列宁和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曾清楚地知道,俄国在当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应仅仅从俄国、俄国政治和一个孤立国家的角度,还要从这一时期整个欧洲的历史情况,来考察他们在革命行动方面的决定。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也正是这样做的。从他们当年的许多文章和行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把自己的革命斗争理解为替一个国家(俄国)内的某些阶级集团和政治集团争取权力的孤立斗争,而是首先理解为自己承担的一项历史义务:尽一切可能加速世界革命,或者至少加速欧洲某些最重要的发达国家中的革命。今天谁也不能否认,当时欧洲的形势是革命的。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的革命事件只能证明,布尔什维克理所当然地希望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给无产阶级革命行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性。因此列宁和同志们的意图不是不顾一切地在这种落后条件下自负地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要推动那些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具备更为成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国家加快革命。

正因为这样,我们成为布尔什维克在那个时期作出许多努力的见证人,这些努力使他们同许多运动和许多人物发生冲突。必须从这个方面来看待第三国际的建立,把它看作是加速某些革命行动,特别是德国的某些革命行动的顽强努力。德国在当时无疑是欧洲最重要的环节,布尔什维克同这些共产党的部分领导人[莱维(Paul Levy)、布兰德勒(H. Brandler)等]发生了冲突。到了20年代初他们才清楚地看到,在历史舞台上就剩下他们自己了,虽然一直到大约1923年即德国的革命最终从日程上消失时他们还抱着希望。

35

这一情况无疑曾是影响俄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还需要有很多别的,也是无法预见的因素才会最终发生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大失威信的这种革命蜕变。必须研究制约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一个人类巨大希望的这样一种预料不到的变革的主要因素,并力求对所发生的和所造成的一切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一个历史运动以什么东西和怎样表现出来,是完全无所谓的。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这一历史运动创造了什么。历史上实际的评价往往是按其主要角色所想的和所声明的东西而进行的。我们应该教会这些主角学会按他们的历史行动自己来衡量和评价他们自己的思想!

第二章 放弃原则 并开始编造神话

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所处的形势,不仅是不利的,而且对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较为正常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说过的,当时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而且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在历史战场上不得不只剩下自己,并用自己的孤单的、十分薄弱的力量解决谁也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当时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最多只占10%到14%。居民主要是农民,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专家对苏维埃政权抱消极态度。俄国(包括其各个附属国)曾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小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必然反映到革命的全部过程上。这就表明,阶级力量的对比对布尔什维克这个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从一开始其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某些纲领性目标。

在社会力量的这种对比下,对农民的态度成为革命的最大问题之一。这对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来说,却完全是次要的问题。尤其是在外国干涉之后,革命如果没有劳动农民的支持是完全不可能

38 坚持的。为了确保劳动农民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施行了社会革命党的,即资产阶级民主的、把土地分给农民的纲领,并实行完全形式的土地国有化。罗莎·卢森堡(R. Luxemburg)在《俄国革命》(1918年完稿,1920年发表)一文中批评了这种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因为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原则,是根本不符合俄国社会状况的。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既然希望革命不至于在它存在的第一步就遭到毁灭,便舍此别无他计。

当时那种社会划分,那种阶级力量对比(后面谈到党的问题时我们将会看到),也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某些个别原则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放弃就可能使革命走投无路。列宁同几乎所有人之间,不仅同斯大林之间的差别在于:列宁放弃他在革命前宣布的某些重要原则时,十分清楚地看到这只是放弃,而其他入却把放弃某些原则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善举。列宁把这许多放弃原则的做法看成是必需的,然而只是暂时的后退,以便积蓄力量,求得喘息机会,解决最严重的困难,然后再去实现某些重要的社会主义原则。其他人则把这一切看作继续发展过程的唯一路标。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里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误解,但它有许多原因,而不止一个原因,不仅有主观原因,而且有客观原因。这些原因使得一个光辉的历史时刻、人类的某种希望、革命中充满的无可估量的鼓舞力量和人的英雄主义走上了歧途。当时谁也没有能够真正地预见到表现为这种形式的歧途。的确,早在当年,在列宁时代某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和其他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戈尔特(H. Gorter)和潘涅库克(A. Pannekoek)从左倾共产主义立场出发,吕勒(O. Rühle)则从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出发,此外还有以什利亚普尼科夫(A. G. Šljapnikov)和科隆泰(A. M. Kollontaj)为首的一批工人反对派,更不用说还有无政府主义的各种人物和集团——就已警告:革命有可能丧失灵魂,甚至遭到毁灭。许多警告,特别是左翼共产

党人的警告是正确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局部措施和放弃某些原则的做法中并不存在任何斯大林主义所实施的那种进程中的机械决定论的东西。我们还将进一步说明,由于这种原因,鲁贝尔(M. Rubel)的论点是没有意义的,他把列宁和斯大林几乎画等号,说是没有列宁就没有斯大林。这种历史性的等号是如此“深思熟虑”,致使我们可以把这条线不仅延伸到马克思,而且替马克思责怪黑格尔,还可以把当代文明的一切不好的东西最后都归咎于我们伟大的希腊哲学导师!

39

既不能把所有那些多少妨碍俄国革命更正常发展的东西和所有那些当时迫使列宁作某些让步,并且后来表明是重大的让步的东西归结为一个唯一的,也不能仅仅归结为若干主客观因素,而是一些性质十分复杂的因素。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一系列国内外情况、传统的和未知的事情,并且迫使他们采取完全不是出自列宁那套完整而又深思熟虑的思想的一些措施。这里我特别强调列宁的思想,因为列宁在这方面同几乎所有布尔什维克有很大不同。所以贝特尔海姆(Ch. Bettelheim)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他认为不应称布尔什维克党为列宁主义党,因为这个党的多数党员开始时几乎都不同意列宁极为深刻地观察未来进程的思想。后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领袖和全党在自由交换意见、讨论、说理基础上同意了列宁的思想。这只能表明,党从根本上说是革命的。

但是,正是由于了解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些说法是无稽之谈,说什么列宁作为理论家是一回事,而作为实践家和一个执政党领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似乎对他来说,主要的是夺取政权并维持政权,而不管所宣布的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和他自己的事业如何。这种轻率地贬低或诋毁这样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做法表明,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多么不了解列宁为维护当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性质而进行斗争的全部过程,多么不了解列宁怎样焦虑地关注一切事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谴责那些使已宣布的原则成问题的某些现象。我们将详细地考察这些历史情况的大部分,它们

能够向我们阐明当时和后来革命所经历的哪怕是主要的过程。

40 我们已经提到,这一革命的很大的一个不利条件是工人阶级人数极少。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柱和主力。当时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数量。更重要的是这个工人阶级、整个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它们的政治先锋队提高觉悟的问题。不应忘记,许多人谈到这些事件时不记得,列宁同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共产党人决裂只是几年的事情,在这一时期里,即从1914年到十月革命,欧洲处于战争状态,政治先锋队本身根本来不及清理几十年来在欧洲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形成的许多概念和思想。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之一就是议会道路,即把很大希望寄托在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的国家上。

使当时社会民主党政策威信扫地的是:在革命的形势下,采用非革命的政治斗争手段;在革命形势下应当坚决实行的一种革命政策越来越被资产阶级议会政策所代替;完全不懂得从过去的革命经验中,从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1917年俄国革命等事件中得出革命的结论。社会民主党人由于盲目相信议会道路和工会斗争,主张的正是一种社会主义变革的国家主义思想,因此,正如列菲伏尔(H. Lefebvre)所正确地强调指出的,持这种观点者,拉萨尔分子比马克思主义者多得多。

社会主义者关于国家的这种神话,只不过是使国家和几百年来统治阶级实行的政策继续神秘化而已,这也是管理和统治群众的方式之一。只有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打破这种国家主义的神话,但他们又是带着革命运动的另一些弱点而这样做的。这种国家主义的神话不仅是那个时期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思想上的赘累,而且作为工人运动中经常存在的神话而一直流传到今天。因此,列宁在自己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为清除这种神话而作出的非凡努力,未能在革命事态本身的进程中立即为所有布尔什维克所接受,更不用说为俄国工人阶级所接受,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必须立即指出,欧洲社会主义力量到了这个时候才在建立一种使政权的政治镇压形式得以消亡的社会主义政权和管理制度方面取得初步的经验。工人运动对这一切曾毫无准备,后面我们会看到,几十年以后也没有作好准备。因此,只要我们看到布尔什维克政权薄弱的阶级基础,就不必感到奇怪为何在所有这些方面必然有某种动摇和观点冲突,必然要采取不总是符合一定的原则,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是最有效的措施。同时也不必奇怪为何俄国工人阶级甚至有机会在工人苏维埃基础上实现自治和通过苏维埃的各种形式行使权力的时候,却几乎无痛苦地把这个权力转交给在当时更有能力解决最基本问题的国家权力机构。

41

俄国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以及当时欧洲的其他无产阶级,在管理国家方面都没有任何经验。为了要进行这种管理,今天仍不但需要坚强的革命意志,而且需要许多知识和文化素质。如果我们补充说,在当时和现在,特别是武装革命以后,有必要用武力即各种国家政治手段来保卫无产阶级新政权,因而一定的国家形式仍然是历史的必然的话,那么关于国家的旧信念和神话也就获得了新的鼓励。此外,不应忽视的这样一个事实是,领导这个新国家政权的是因自己的作用、能力和贡献而具有真正的救世主特征的人物;劳动群众对他们的信任几乎是无与伦比的,这就从这一方面加强了一种从根本上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当时的工人运动乃至后来都未将其澄清。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神话在俄国革命后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列宁和几位布尔什维克当时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这一神话最后成了一种固定的思想,不仅在斯大林那里,而且在多数布尔什维克那里,很快地超越自己的对立面,并对革命的继续进程的理解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建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这种国家主义传统要在俄国工人运动和欧洲工人运动中取胜,还要有其他许多情况,这些情况对于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的阶级是不利的,而对于巩固一个越来越代表工人阶级说话,但实质上却越来越脱离工人阶级的政权制度却有利得多。

42

与前一种情况紧密联系并在许多方面决定了社会结构的状况与发展、政治力量的分布与作用及新政权的建立的另一种情况是,在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的传统和经验也是很缺乏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指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苏维埃的粗浅而不成熟的经验,仍然是同政权的问题直接联系着的,而工人自治、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和国家消亡的问题,对当时的整个工人运动来说简直是天书。只有俄国十月革命才使这些思想和形式活跃起来,使其成为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革命时期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到了那个时候,苏维埃的问题才第一次在工人运动史上提出来;它不仅作为政权的新形式问题,即作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而且作为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问题,作为建立一种既废除旧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和旧政权,又废除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新社会组织问题提了出来。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才明白工人苏维埃问题不仅是新政权问题,而且是个崭新的社会组织问题。但是明白这一点的只是工人运动中的一小部分人,俄国之外我们可列举德国和荷兰的革命共产党人罗莎·卢森堡、潘涅库克、戈尔特、吕勒、多伊米希(E. Däumig)等人,以及意大利的葛兰西(A. Gramsci)、陶里亚蒂(P. Togliatti)、博尔迪加(A. Bordiga)等人。在这崭新的社会组织中,劳动者直接管理自己的劳动过程,同时支配自己的劳动和自己劳动的产品,这样就在社会组织的根基中取消了社会经济异化的基础。只要有人还支配和管理着生产(不仅是分配)过程,这种异化就存在着。这是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建立机构的重要问题,但工人阶级及其政治组织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43 社会主义民主的另一个问题,即进一步发扬和扩大公民自由的问题,也是很不清楚的,由于观点和原则不明确,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制约形式,而且要看某些领导是否认为这样在一定时期对他们有利,因此对这个问题有十分不同的解释。不要忘记,恩格斯曾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在党的报刊检查方面的某些不民主的做法。把那些和领导不和的人开除出党的不民主做法是相当普遍的,但这都是社会民主党在

野时的做法。如何实现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健康和顺利发展的不可缺少条件的党内民主,以及在革命过程中对其他政治集团和社会领域如何持民主态度,这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全新问题。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特别是由于困难的内部形势而使得片面的和宗派的观点能够占上风的原因之一。当时不可能设想,这类观点对革命的继续进程竟然如此重要。

以各种形式支持苏维埃思想,但对布尔什维克抱非常消极情绪的其他某些俄国政党的表现,无疑也导致了上述情况。如果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错误和虽不是必须采取却是在国内战争和战争刚结束后的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不必要的镇压,那么孟什维克的行为却是没有多少道理和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在革命变革刚一结束,就同社会革命党人一道退出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拒绝在政治方面同布尔什维克进行任何合作。同样地,社会革命党人(esera)和左翼社会革命党的行为也是如此。由于同布尔什维克有一定的分歧,如在解散立宪会议或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上,他们甚至采用恐怖手段反对布尔什维克。还想补充说的是,由于这些党的许多派别或者表现消极,或者甚至帮助干涉者,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实行政治镇压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当然不是这种行为的唯一的,也许也不是主要的原因。这一行为可以在社会力量的较量中找到深刻得多的背景,而各种社会力量归根结底对政治矛盾和斗争的形式和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机会谈到。

与后来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革命进程和革命的错综复杂情况相比,当时更具决定性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完全强加给布尔什维克的形势**。这就是得到了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帮助的反革命武装干涉,它一开始就中断了在这种落后条件下进行革命和组织新社会关系的正常进程。许多片面的、粗暴的行为,官僚主义武断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假如国家不再次陷入迄今总是把阶级时代人与人相互对立中形成的最野蛮返祖现象暴露出来的国内战争的话。

每一次战争都缩小民主决定的范围,这次战争也必然如此,尤其是新政权没有任何历史经验,而且根本没有得到巩固。当时工农实际政权的主要问题,必然集中到几个重要的生死攸关的任务上,即组织军事力量同沙皇将军指挥下装备精良的反革命军队作战、生产面向前线的主要需要,以及对前线和后方的供应。国家集中制在当时是实行这些措施的最有效手段,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这一名称固然不恰当,但却颇有特征!)制度以及国家的主要干预就成了主要的补救手段。对国家政权直接负责的专业人员承担了工厂中的生产任务,而征收剩余产品和实行实物配给则成为供应前线 and 居民的主要措施。工人委员会不够成熟,以及工人阶级在完全抓生产或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充分监督方面经验不足和缺乏训练,使得列宁这位自治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在这种形势下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我们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工人委员会还没有被取消,工人、工会和党共同的关心和监督也依然保留着。当谈到对生产过程的专业领导时,这种“一长制”的措施使国内和国外,特别是德国的共产党左派的某些人士感到震惊。潘涅库克和戈尔特在这方面正确地看到了这对革命的巨大危险,虽然他们没有完全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当时遇到的几乎不可估量的困难。此外,在这种形势下,工人的社会结构也日益发生变化。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努力集中在动员最优秀的工人,即能够肩负起自治制度的人们到前线最困难的地方去,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去征集和建立营队,到国家和党的机关中的许多岗位上去。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当时的农民在工人队伍中越来越占优势,并带来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说明为什么会有各种误解、各种反应,以及为什么对当时新国家中出现的情况会不理解,为什么由此产生了完全不必要的冲突和悲惨的插曲。

资产阶级和地主反革命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使国家受到严重的破坏(这对一个过时的旧制度也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使革命力量的活动和方针发生重大的转折,即从民主建设苏维埃这个社会主义进程的真

正基础,转向采取集中制的国家行政措施。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行政措施确实包含着蜕化的危险。所有革命力量都如此强烈主张采取这种总要损害民主的国家行政措施和军事措施,使几乎所有布尔什维克分子,甚至有一个时期使列宁本人考虑,可以通过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由于这些措施使革命力量在一个几乎无望的局势下取得胜利,对国家机构万能的信心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神话便获取了新的养分和支撑。这些年代里国家社会主义措施的成功,使托洛茨基或布哈林这样的人物头脑发热。他们不仅把建立国家的这种热忱看成是必须使所有机构都服从工人国家的领导和利益(关于工会国家化的争论是众所周知的,列宁坚决反对这一点),而且认为在这种困难条件下甚至应该使劳动军事化。斯大林的思想在这方面获得十分重要的动力,但它实质上只不过使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神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同时还有由于他特殊的病态的个性而产生的某些特征。

由此可见,虽然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未能把历史车轮拖回到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的旧关系上去,但在很大程度上却使车轮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46

促使一场伟大革命沿着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悲惨结局的道路发展,必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影响或决定了这一进程朝着丧失社会主义所有重要特征的制度——斯大林主义的制度转变。这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在国内战争的困难时期结束以后,政治舞台上最后只剩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在每个党的机体中,甚至在它还不是执政党时,都会有某种官僚化、等级制关系、限制民主,利用掌权地位并出于各种其他目的操纵自己的党和它的职能。这是许多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从米歇尔斯(R. Michels)和韦伯(M. Weber)到当代的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就遇到的问题。只有一个执政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已荡然无存。那些抱有当时多少共产党人人为之献身或决心为之作出最大牺牲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人不能想

象：在一个以世界革命起家的党里竟会发生后来所发生的怪现象。

然而，迄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只是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很大的谬误，在工人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里，如同在所有党里一样，必然也会产生蜕化过程，而当只有一个党执政时，这种过程会来得更快和更加不可避免。关于这个问题和制止这种倒退（*involucija*）现象的措施，本书将有机会更详细谈到。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没有得到其他一些政党和其他相应社会团体的任何政治支持的掌权者所遇到的考验只有极个别的运动领袖能够完全地经得住。一些共产党迄今都没有明确地制止上述年代里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已十分明显的这些进程。列宁曾竭尽全力反对这种进程，后来的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也这样做。

47 布尔什维克党在那以前，由于遵循了列宁到 20 年代初一直十分严格捍卫的某些原则，而避免了内部官僚化的这种进程，坚决捍卫了党的生活和工作的民主原则。大家知道，那时布尔什维克党各级机构的决定是通过完全自由地交换意见，通过往往具有尖锐争论语调的讨论和辩论才作出的。党内甚至经常存在着某些反对派，同时在工人反对派那里有时还有某些根本性分歧。列宁在这方面主张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必须彻底做到以民主方式作出决定，然后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使这一决定成为大家（在行动方面）必须执行的；第二条是，当发生某些原则分歧而使共同的工作和活动无法进行时，每一方都有充分权利脱离党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党。

第一条原则应当是，每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都应有毫不含糊的、完全光明磊落的立场，如果它们不愿意蜕化为官僚主义的党，不愿意蜕化为不革命的组织的话，如果它们不愿意看到在选拔干部方面有有损于党的生命力、原本性、勇气和政治远见的消极做法的话。布尔什维克的这一切正是发生在 1921 年初，即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在情况比任何时候都困难和复杂的形势下。当时党的紧密团结（至少当时列宁的评价是这样，也许由于

同各个派别的争论已疲惫不堪才使得团结如此紧密)是使国家摆脱混乱、饥饿、贫穷、开小差、农村里抢劫、工厂关闭、生产停滞等现象的唯一保证。从心理上和政治上是完全可以理解列宁在这种形势下的做法的。这也许是被一切困难弄得走投无路的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行动。尤其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列宁的原则立场,而是作为不得已的临时措施,因为当时他就认为,所有那些仍然不同意中央和党的观点的人有充分权利在报刊上公开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列宁当然相信,在他(这个领导的特点是总是有很大的耐心、诚实、讲究策略、保护自己的战友)的领导下能够避免党内削弱民主制的某种危险。列宁正是在上述原则基础上为党内已取得的東西而奋斗的。他的战友们不是那种动辄责怪像列宁这样权威人物的人。列宁从革命一开始,就经常通过他在《布列斯特和约》、工会思想、工人监督、民族与自治问题、外贸的国家垄断等方面作出的最大努力,并以其固有的观点明确和立论有据,在党内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他在这个时候没有料到,他再也没有时间成功地克服由于作出上述决定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蜕变。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整一年后,列宁的健康状况预示:当代共产主义最伟大的人物即将离开历史舞台。

48

列宁的去世也是导致后来预料不到的、如此令人不快的革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今天我们如果读一读列宁的最后著作和所谓遗嘱,就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列宁曾反对斯大林留任总书记职务。列宁在这里透彻地看到了某些人物的品格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当我们谈到最终影响革命的这种复杂情况的所有重要因素时,领导人的构成、他们的特征以及他们的个性和存在的关系对后来的进程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时中央里几乎在各方面都不相同的两位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自然大大地促进了这种不良进程的发展。托洛茨基是欧洲类型和有欧洲文明的人物,他也喜欢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但他不搞小动作,没有不诚实和不真挚的行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所以不搞幕后操纵,并且是他第一个发出反对党的领导和工作方

法官僚化的呼声。可是,他那自负的性格和好戏剧化的偏向也促使内部关系尖锐化。

49 斯大林的品格则完全相反。他缺乏观察革命进程的开阔眼界,喜欢把所有不赞成他的人看成是真正的敌人,并不惜采取背离一切社会主义原则的措施来消灭他们。斯大林在背后捣鬼和操纵党的机器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当人类正当地期望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会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因素和准则,从而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时,进步世界只能惊讶地指出,革命蜕变为空前规模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kijavelizam)^①。

这样,在上述这些情况下,主观力量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解决革命遇到的内外矛盾的方式。可以肯定的是,俄国革命在那个时期不可能超越完全由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关系体系中的整个地位所决定的某些阶段。还可以肯定的是,如前所述,只有很薄弱的民主传统和民主思想的、软弱而涣散的半农民的工人阶级,在按自治原则建立新的真正社会主义关系中是不能主动地起引导作用的。也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便应当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被决定的,在这一事态过程中本来可以施加影响来加强社会各级苏维埃体制的作用,本来可以阻止国家和党的官僚的加强以及最终完全掌权和进行管理。这是列宁的设想、主张和预见。由于列宁的逝世,一个思想的取之不尽的主要源泉便消失了,而这个思想本当,哪怕是曲折地,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不致丧失。个别理论家对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可以赋予他们或大或小的意义,但事实是,特别是本世纪证实的事实是,一系列运动的命运和个别国家的历史命运,往往取决于这些人物。一个国家和世界的整个发展水平所处于的某些阶段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但是,对这些历史阶

^① 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的政治理论,他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惜采取罪恶手段。——译者注

段内部的事件以及这些时期社会、文化和人们之间关系的建立,从来不应简单地定义。

所以,俄国革命在列宁去世后处于丝毫不令人羡慕的境地。革命的领导是由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人物组成的。他们在整个革命的问题上有着极不相同的主张,因此他们不能够像列宁在年轻的社会主义政权最困难年代中那样比较和谐地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在这方面革命经历了由于内部不发达和没有经验而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它在历史舞台上孤军作战。德国革命的失败是特别关系重大的情况。德国社会党左派为一次成功的政变提供了可能的基础,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它的右翼已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淹没,而不再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用革命的方法来应对革命形势。它以自己的行动把这一大好形势引向立宪政体和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渠道,从而挽救了资产阶级政权。当时德国社会党队伍中出现的混乱,必然导致一系列派别和派系活动,它们统统不过是使理想脱离现实罢了。这样,以斯大林为主要舵手的俄国革命的孤帆,便在充满暗礁的波涛汹涌的政治大海里开始了自己的航程。

第三章 斯大林主义

我们暂且有条件地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存在需要具备许多主客观历史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条件我认为我已经提到了。仅从对这些历史条件和情况的研究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历史进程的发展是多么特殊,在所有方面有多么不可预见的结果(konsekvencija)。我们不能用宏观和微观规律,也不能像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所简单想象的那样,用对历史辩证法“规律”的简单解释,来说明历史的决定论(determinizam)。往往在了解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情况后,却仍然相当不了解主要历史角色的个人特点,不了解他们对国内情况和国际情况以及该历史时期作了哪些评价,因为在此之前大都缺少系统而彻底的科学分析,却更多地对一种历史“地位”进行合理直观(intuitivan)的观察和“感觉”。每个人物不同地看待这些历史地位,从而使每一个政治运动过去和现在都发生内讧、冲突、派别斗争、分裂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领导人(尤其是那些有丰富历史经验和道德品质的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以最小的震动和最小的力量损失,渡过所有这些正常而必然的内部进程。因为在确定“历史地位”时,任何一个错误举动都会使运动愈加接近失败,而事后又提出的某种历史性解决补救方案,尽管对所造成的失败是极小的安慰,但还

是表明历史进程本身并没有被简单地确定。避免以最坏的办法处理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允许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一切可行方案,换句话说,允许充分的内部民主,即允许批判性的分析、争论和意见交锋。而大多数共产主义运动迄今基本上没有经受住这个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历史考验。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得出:对俄国革命适用的东西,对任何其他重要历史进程,特别是对一种革命事件也都适用,亦即其结局取决于一系列历史情况,取决于许多历史偶然性,一定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同时正如我们说过的,领导人的构成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把俄国革命的发展和它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的暂时终结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所固有的必然发展的企图只会表明:即使撇开思想偏见和片面性不谈,对历史进程的了解是多么差。在评价俄国革命时,某些人不但不懂得把原则的东西同实用主义迫使革命力量背离自己原则立场的东西区别开来,而且还看不到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但对革命本身来说是确实可能发生(*kontingencija*)的许多进程。俄国革命者正确地估计到的欧洲某些最重要国家革命的失败,对俄国革命来说,其偶然性如同俄国遇到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干涉,以及列宁过早去世和出现斯大林这个特殊人物一样。这些都是对俄国革命整个发展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只会使最坏方案获胜的不利客观情况。

鉴于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当时决定俄国这种“历史地位”的所有情况,我们可以比较谨慎地说,这种历史地位也许在20年代中叶就已或多或少地确定了我们必须加以阐明的一个方向。因为20年代中叶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已控制了党和国家的机构。斯大林用熟练的阴谋手段和玩弄利用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的手法,于20年代中叶最终赢得了反对中央内部自己主要政敌的斗争。所以从1927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他周围,在所有主要政治机构中都是他提拔的人,有些人是例外,但他们很快就被消灭掉了。因此到20年代末,斯大林便开

始了自己政策上的转折,而党和国家的这种官僚机构也必然发生这个转折,这是斯大林几乎完全可以料到的。

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大部分是由旧官吏组成的,他们总是本能地支持那些加强这种官僚机构的进程。如果撇开这种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不说,斯大林还由于其他许多原因,包括他能更好地估计形势,估计当时党员的水平和能力,而赢得了同反对派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绝不仅仅是斯大林在党的等级关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而应特别考虑到党队伍中的民主气氛已显著减少,这就便于斯大林从其地位上来影响干部政策,目的是把忠于他的人提拔上来。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即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如罗伊·麦德维杰夫(R. Medvedev)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多半是“务实派”,在理论方面不强,更喜欢简单化,甚至喜欢斯大林的粗暴,而不喜欢有时深奥的理论性争论或过分强调人性,这些是当时斯大林对手所固有的。柯肖尔(S. V. Kosior)、基洛夫(S. M. Kirov)、古比雪夫(V. V. Kujbišev)、奥尔忠尼启则(S. Ordžonikidze)、赫鲁晓夫(N. Hruščov)、加里宁(M. Kalinjin)、伏罗希洛夫(K. Vorošilov)、莫洛托夫(V. M. Molotov)等人在其知识构成上更多地接近斯大林,而不是接近反对派中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L. B. Kamenjev)、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 A. Preobraženski)、拉科夫斯基(H. G. Rakovski)等人。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些人当中的许多人在革命以前和革命前夕的表现,那么斯大林能够成为忠实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的领袖,不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然而,必须立即强调指出,新一代领导人同革命依然有紧密的联系;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对他们来说并不生疏,早在革命前开始争取的目标仍然是他们行动和活动的根本动机。这无疑也是这一代人成为后来斯大林对无限权力的贪婪的牺牲品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54

然而,在清算反对派的年代里,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也能部分说明后来发展进程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要的冲突不是围绕着社会主义思想中某些重大原则问题发生的。整个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基本上

仍在一个共同思想内部进行,同时党和国家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思想(在前一章中我们有机会把它作为欧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份重要遗产加以论述)基本上是推动大家前进的协调者。反对派代表人物提出的诸如要求公开性与批判性、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党和国家机构的日益官僚化、加强工业化和计划性(但仍然是国家计划)等措施和主张,肯定有助于革命本身的更正常的发展。当时他们当中谁也不能想象,革命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当年的共产党人,那些新型材料锻造出来的人,会成为最糟糕的官僚,会在夺权斗争中不仅不惜采取伪造、诽谤和造谣的手段,而且不惜犯最严重的罪行。一个党对发展问题没有运用内部民主的解决办法,在解决社会所有重大问题中实行垄断,取缔一切批评和批判性的公开言论——这样一个党的——国家的官僚结构以及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当时谁都不清楚。但是,连反对派的最重要成员在要求党内生活民主化时,也预感到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革命有可能遇到大得多的困难。

可是斯大林却用激进的办法来对付这一切,这在当时,甚至到了今天,都是很符合一般党员水平的做法,因为他们对经常的理论性争论从来没有太多兴趣,往往不能通过这些争论来观察历史事件。斯大林在这方面是更好的心理学家,更了解党员群众。在反对派的多数著名成员作为强有力的人物一直强调自己持不同于列宁的观点时,斯大林不仅坚定地坚持列宁的立场并公开宣称自己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学生,而且把列宁的不是根本性的东西,次要的、暂时的东西,由众所周知的外部情况决定的东西,也宣布为列宁主义。斯大林性情暴躁,喜欢采取激进的、过激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在那时已帮助他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和消灭了最主要的对手。斯大林出于自己心理上和智能上的特点,喜欢援引列宁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最艰难情况下提出的观点。当时在一些重要范畴中强调的不是人道性、民主性等东西,而是暴力、不妥协、磐石般团结、不讲法制等东西。列宁不止

一次地强调,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重要的不是暴力,而是建立新的民主社会关系,但在困难的历史情况下需要清算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时,他也强调暴力是重要的因素。列宁直到逝世以前,几乎一直按照充分的党内民主和宽容反对派的原则领导着党,认为完全自由的党内争论、思想斗争、不同评价的冲突等是很正常的东西。即使在上述国家和党几乎面临彻底崩溃的情况下,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还要求保护反对派,而斯大林却采取了列宁在最困难情况下采取的,因而是片面和激进的立场、观点和决定。不过斯大林也清楚地意识到,大多数党员将在这方面支持他,因为他们既没有高度的政治、文化和理论修养,也没有足够的民主传统和经验;因为大部分党员是在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最困难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56 在这一切方面使党内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还有斯大林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正如科拉科夫斯基(L. Kolakowski)所看到的那样,产生于斯大林的急躁、粗暴和目空一切的性情,也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抉择的策略。斯大林把自己的派别宣称为唯一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派,而把其他连反对派也不一定具有的所谓反社会主义和反列宁主义思想的一切观点都推到反列宁主义和归根到底反社会主义方面去。起先说成是“左”倾或“右”倾,然后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后来又说成是亲资本主义和富农思想,最后说成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一个党的领导在解决历史性问题时(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除官方的抉择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抉择,不允许讨论其他的可能解决办法,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运动的垮台,或者至少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内部危机。

然而,当时讨论和争论的性质也表明,在那种情况下,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某些重大问题仍然是多么不了解。反对派的意见集中在与进一步发展有关的某些肯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这无疑有助于一种具有十分强烈的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体制的社会主义更

正常、更顺利和更人道地发展,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详细谈到。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早在1924年和1925年提出的、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但基本上全都是晚年斯大林的那些观点和主张会被拿出来讨论。只要我们很好地进行分析,就会看到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问题。那里研究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列宁观察问题的精神。关于列宁主义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提法本身,正如莱利奥·巴索(Lelio Basso)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和列宁的观点格格不入的。这里可以看到一种片面的、理论上狭隘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即把那些针对一定的、很有局限性的特殊情况而提出的历史解决办法当作解决一切历史问题的典范。在斯大林的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在理论上的短处和缺乏在自己的实践中提高一步的能力。他当时不仅把他们自己的情况和解决办法万能化,把俄国的革命道路宣布为所有其他人的榜样,而且把一党制原则宣布为过渡时期唯一的政治解决办法,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某种传动系统,作为社会主义观念中一个官僚国家主义的样板,后来则成为某种更极端的和更畸形的形式。

由于斯大林后来所有的思想几乎都包含在前面的阐述中,因而在那种情况下谁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了。大家都依然围绕着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争论。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反对派都根本没有提出工人自治、工人监督和国家消亡的根本问题,来从实质上同官僚-国家主义思想相对抗。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他在革命过程中为实行工人监督而作的顽强努力,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愈益成为早已模糊的和有点不愉快的梦。

57

不是就社会主义的这些根本问题进行讨论,而是使一部分争论围绕着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问题激烈地展开。这完全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可是斯大林却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赢得新的政治分数。多依彻(I. Deutscher)认为,这一争吵也表明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今后可能采取的方针,特别是在对待世界革命运动态度上可能采取的方针,而革命的未来进程也将取决于此。虽然多依彻的意见

是正确的,但对世界革命的态度更多地取决于解决本国内部社会主义问题的方式。因为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是按社会主义要求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精神的一种较正常的发展,而不是导致政治机构和国家形态强化并使苏维埃国家而非工人阶级居首位的那种发展,那么布尔什维克同世界上其他运动的关系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政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内部状况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的建设。

今天应当从根本上对当时继承下来的、带有斯大林解释的重要特征的“列宁主义”概念予以更正。如果从迄今所有的历史经验出发来评价列宁的革命事业,那么它会向我们表明完全不同的情况。迄今人们大都坚持认为,列宁的东西是俄国特殊的東西,是以在一个落后国家里进行斗争的情况为条件的,它并不构成列宁主义的本质(如果我们想使用这一概念的话)。对评价这样一个非凡人物来说,他的关于职业革命家政党的主张、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或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于国内战争情况的需要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都不是重要的。同样地,后来成为斯大林主义基本规范的东西——夺取政权的方式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党制,对列宁来说也完全不是具有特征的。

列宁的个人品质在于他具有非凡的革命远见,一个革命天才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事业的忠诚,思想上的创造力(originalnost),解决本国特殊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预见(anticipacija)的能力,坚定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和对等级地位的以及由此产生众所周知的形式主义的礼仪持罕见的不在乎态度。列宁的特点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上,但又绝不教条。许多人认为这是他的某种无原则性。其实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物的品质应追根溯源于他的这样一种非凡的能力:他不受以前采取的立场的束缚,而为了革命的利益能作出某种让步和妥协,这是教条主义者(doktrinar)所不明白和不喜欢的,因为据说这种让步和妥协威胁着原则的“纯洁性”。这一切正是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的本质所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迄今归结为列

宁主义的所有那些特征,只不过是一个革命天才在当时俄国所处的具体环境下实践的结果而已。这种具体的革命实践(当然这里我们暂且不提列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他在分析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与苏维埃方面的贡献),以及列宁解决俄国革命复杂道路的方法,只适用于那些同当时俄国处于相似状况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在欧洲再也没有了。列宁本人当时也很明白,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欧洲许多发达国家的问题,尽管这种解决办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和决定性的。因此,如果我们还想坚持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式的概念,那么它就应当包含一个重要特征,即保持列宁这样一个人物具有的历史创造水平!

然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俄国的情况下,解决十分复杂的苏维埃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少地具有列宁主义的性质。斯大林个人及其同事的特点,同列宁的天才、广阔视野、革命预见性、对同志的友情和正确态度相比,是明显低下的。当时开始占上风思想和斯大林解决党内冲突的方法已经带有斯大林主义的明显特征。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解决问题和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越来越不民主和越来越粗暴了。

59

有意思的是,斯大林不得不在这方面走上一条这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不仅使党和一部分人民,而且也使他自已采取了最糟糕的解决办法。虽然在当时处理内部冲突中隐藏着后来犯罪的可能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列宁对待自己战友的态度以及在比十几年后困难得多的情况下党内保持的正确关系,仍记忆犹新。尽管把反对派成员关押或流放到边远地区的做法在大多数党员中引发恐惧,但事实是,广大党员还有很大的活动自由,以及在报刊上写文章和进行合作的自由,甚至可以进行一定的创作。当时不得不经历逐渐习惯于用警察方法和不民主方法处理党内冲突的一定时期,不得不经历集体化时社会内部冲突的一定时期。在集体化过程中,国家和党的官僚与强制手段的影响以及这些进程的罪魁祸首的作用大大增强了。斯大林

本人也不得不经历适应他自己树立的地位的一定时期。这种地位使他逐步掌握全部权力,而这种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也改变着人的本身。在他身上存在着粗野和暴戾态度的心理特点。但是这些特点由于有了一定的环境和他在这一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才得到越来越突出的激烈表现。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斯大林就成为斯大林其人了。尽管树立他的地位的这些过程本身是多么艰难、不人道、粗暴和真正恐怖的(我指的是集体化过程),但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却不是那么轻易地同这种独裁的方法同流合污。斯大林从某些信件中了解到,反对派的许多成员否认他在可能发生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有领导国家的能力。同时,斯大林也看到革命的一代人同他的粗暴方法有很大分歧。喜欢用恶劣的手法解决个人冲突和社会冲突的这样一个人物,抓住当时已建立的、远远背离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和看法的社会经济关系,使用最激进的方法以保证个人的权力,但却为此表白说,这是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错误,是历史性大骗局。在谈到这些事情时,如同谈论人类历史上许多这类事件一样,我们以尽量少的激动、愤懑和激怒的心情说,斯大林使千百万无辜的人遭到牺牲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

到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斯大林的决定性的和占主宰地位的领导下,苏联社会对当时和后来的最优秀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确实是一个谜。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当时在各方面几乎都存在着伟大十月革命的革命理想、初期的社会主义动机与当时发生的一切之间的真正历史连贯性。当时发生的是:由领导整个进程的一批老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党发誓忠于列宁的原则和政治实践;建立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废除新经济政策和农民阶级,从而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本身按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几乎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通过作为世界革命运动中心的共产国际开展活动;大力宣传关于国家和工人阶级政权的革命言论,最后又在30年代后期宣传建成社会主义和开始

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切使一个现实变得模糊,这一现实由于标志着当时不为人知的历史新事物而使人们难以深入它。此外,不仅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第一批缔造者的信心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具体的历史环境——法西斯的直接危险——也使这一信心大大超过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料,特别是当斯大林的统治制度和第三国际对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一切不可理解的举动以表示支持和帮助的时候。

然而,这个在全世界被吹捧为工人阶级伟大胜利的制度,被说成是最自由的社会和最终实现了被压迫群众多世纪以来的理想的制度,却一开始就向马克思主义分析家们表明,这一社会机构有点儿不对头。如果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民已作为阶级被消灭,那么集体农庄化的过程则是用完全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待农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方法来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对待农民的观点不仅依据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某些论点,而且依据如下认识,即不人道的方法必然要对整个社会管理制度起坏作用,这在上述过程中已得到了证实。对居民各阶层使用不人道的、粗暴的、不民主的和警察的方法,其结果必然是加强官僚和警察的权力。这种强化国家集中制机关和完全垄断社会决定与舆论交流手段的过程可能产生的最终后果,以难以置信的进程很快地在苏联专家和老布尔什维克身上表现了出来。

我们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些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客观而深刻的论述毫不相容的反常现象,例如:彻底废除工厂企业管理中的所谓“三位一体”,取消罢工和自由更换劳动岗位的权利,工会国家化,不断扩大生活水平差距(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还大,当然最大的资本家不算),完全束缚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取消任何内部民主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民主,取缔一切自由的公众舆论,垄断舆论交流的一切手段,这样就能够完全控制舆论以利于统治集团等等。这样便在马克思主义面前提出了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任务,

并要求其给予令人满意的历史性回答。因为如果可以把这一切以及
62 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 1948 年情报局事件、1956 年匈牙利事件和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们只举最重要的事件)都说成是并认为
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策的正常结果,甚至看成是实质,那么每个
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放弃作为解决当代历史问题理论根据和
在历史发展现有水平上解放工人阶级和解放人的根据的这样一种主
张。伟大十月革命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最初动力岂不是被引上了
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其下一站没有标明是共产主义的历史轨道吗?!

一、制度的定义

许多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解开历史
的这一新谜已进行了几十年的努力。这恰恰证明了,历史不是沿着
直线完全按人的设想发展的,而是不止一次地发生这样的事:历史的
演员穿上与时代完全不相称的服装。就像常常按外表来评价一个人
一样,在评价各种社会制度时也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不打算说明所有尝试,也不是要说明最主要的尝试,特别是
我们对那些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提出的批评和分析不感兴趣,尽管这
些批评和分析准确地指出一定的现象。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利用历史
上已多次丧失其声誉的一个制度来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为了进行
我们自己的分析,只需要指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建立比剥削与无人
权的资本主义关系确实更前进进一步的社会关系感兴趣的某些最著名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最主要尝试就够了。因为尽管资本主义意味
着人类发展中的进步,但无论它的政治民主已发达到何等程度,它都
没有解决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这个重要问题。我们亲眼看
63 到,资本主义迄今同样孕育着倒退到极权主义的各种形式,它同样会
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对各国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使用最粗
暴的手段。

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一切给予更深刻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预测是很困难的,尽管有着最好的和理论上高超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有些人的情况是,他们自己就是带着无限希望、牺牲精神和欢欣心情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但很难与必要的批评保持距离。另一些人则把这一过程不仅看成是自己希望的实现,而且看成是自己理论思想的实现,看成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正确性的表现,最后看成是往往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给予争取人与人新关系的斗争的一个十分必要的支柱。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这种使人醒悟的过程竟持续了如此之久,以至今天还有许多人仍处于醒悟过程中,同时还产生很大的动摇、怀疑、混乱、失望和真正的个人悲剧。这里指的不仅是对历史上可以指名道姓的某些个人的态度问题,而且也是对整个历史性思想和以这一思想的名义并在其基础上实现的历史性解放实践的态度问题。最深刻地和思想上最明确地阐明了这些社会主义新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经受最艰难、最严峻和最戏剧性的历史检验。

早在列宁时代对某些事件的最初严重怀疑和争论是由荷兰和德国的所谓左翼共产党人引起的。他们比所有批评家都更坚定地从事生产者的自治立场出发,即从明显地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这种立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既不为人们所了解,也未被广泛采纳。早在 20 年代初期,国家和党的官僚化滋长的现象和工人在管理企业与整个苏维埃中某些重要权利的缩小,就使一些人如戈尔特和潘涅库克感到担忧。在对俄国的不发达程度和严重局势有点估计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当时就认为党的官僚化使国家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俄国的革命就越可能失败。由于这种进程不但没有被阻止,反而得到助长,特别是得到斯大林一派的助长,当时的“苏维埃共产党人”的担心,说来很遗憾,基本上是有道理的。老潘涅库克经历了几个时期,直到晚年他还相信自己关于工人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他能够从这些立场出发,对 30

年代中期苏联的情况作出成功的分析,并认定最终确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潘涅库克很清楚,在工人阶级不仅对分配,而且对生产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影响的地方,谈不上社会主义。因此潘涅库克认为,那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官僚成了支配产品即支配剩余劳动的新阶级,而工人阶级则处于雇佣关系,即被奴役地位。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普遍持这种观点。他们是:K. 科尔施(K. Korsch)、P. 马蒂克(P. Mattick)、H. 瓦格纳(H. Wagner)、A. 罗森堡(A. Rosenberg)、亚·博尔迪加、Ch. 贝特尔海姆、T. 克利夫(T. Cliff)等人。许多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50年代同斯大林和情报局冲突的尖锐时期,赞同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这种评价。当关系有所改善时,特别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公开承认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错误的、对南斯拉夫的评价是不准确的以后,南斯拉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仅由于上述原因,而且也由于这一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倾向于接受多少有点畸形的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

认为斯大林时期是一个畸形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观点,普遍存在于尖锐地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但他们不愿承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如此蜕化变质以致丧失社会主义根本特征的可能性。然而,其他许多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讨论中很快就正确地发现,如果否定关于在社会主义初期就应该实现的真诚、人道、公开的新社会关系的思想和构思,那么谈论社会主义,更不用说谈论官僚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就很成问题了。这些意见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它们同时表明,马克思主义没有对我们所遇到的历史新现象广泛地提供应有的答案。“国家社会主义”、“官僚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都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当代事件进行讨论和分析的概念,但是确实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定义,特别是涉及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产生的一系列现象时,尤为如此。几乎谁也

不会否定,在列宁的分析中已最突出地、最诚恳地指出,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落后的条件下,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进程是由国家来保障的话,一定会遇到既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也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某种关系。这方面已有某些历史经验和实际的社会主义进程。但是,当前者转化为后者时,当前者不再存在而让位于后者时,当这种国家干预不再促进社会主义发展而成为目的本身时,这些问题就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应以停滞的观点理解这些进程,而恰恰应该以运动和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些进程。

各国的另外一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却主张抛弃迄今出于各种原因而下的定义,特别保留这个国家以及仍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其他许多国家发展中突出的和明显的东西,那就是国家和党的机构的主导作用,总而言之,就是政治领域的主导作用。我们从20年代初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 Labriole)给俄国发展下定义的尝试,从伯纳姆(J. Burnham)的经济社会的理论和斯托扬诺维奇(S. Stojanović)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以及列菲伏尔关于国家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中,可以找到“国家主义”、“官僚国家主义”、“官僚垄断的国家主义”等定义。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看到了,在当代历史进程中不仅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而且在那些正在摆脱过去的殖民地地位的不发达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权力强化的进程。不管这些说法多么正确,但在评价一个制度时我们毕竟不能满足于这些定义,因为这些定义首先指的是一个政治范围,而这种范围本身不能包括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希法亭(R. Hilferding)所作的尝试也是这样,其中也正确地指出了政治领域的统治和绝对化,以及以极权主义概念为标志的制度,这样就使像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样一些历史现象之间的根本差别消失了。

30年代末,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在分析这些新的历史现象时得出结论说,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情况,整个阶级—国家官僚支配全

部生产资料,而管理方法、占有剩余劳动和生产计划的方式都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他认为这种新制度应当被称为“官僚集体主义”。

在这个战前时期对当时苏联社会作出最透彻分析的,是和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起对俄国当时革命力量的胜利作了最大贡献的人——列昂·托洛茨基。他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新的历史现实对托洛茨基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造成多大理论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托洛茨基要摆脱当时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某些思想又是多么不易,这是不足为奇的。托洛茨基十分正确地发现,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进程——国家消亡和工人阶级与所有劳动者管理生产和社会事务,直到那时候都没有展现,相反,使劳动者重新处于完全附庸和被剥削地位的、加强国家和党的官僚化的进程却展现了。他把领导阶层定义为统治集团,把布尔什维克党定义为官僚政治组织。由此他得出结论,苏联当时实行的制度既不能称作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称作社会主义制度,而可以称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性制度,或者称作前期社会主义制度。

托洛茨基在分析中甚至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苏维埃政府即政治机构对经济的态度,同资本家对独立企业的态度是一样的;国家所有制仅仅改变工人的法律地位,工人和以前一样仍然为工资而劳动。另一方面,并非偶然和不无道理地使托洛茨基感到困惑不解的一个现象是:这一新的官僚阶层,一个新的“帮会”,还缺少足以称之为新阶级的东西,因为生产力不属于这个阶层所有,它在财产关系上没有特殊的权利,国家机关没有继承剥削等。托洛茨基指出,在迄今任何一个制度中官僚阶层都没有达到如此独立和强大的程度。但他又认为,只要官僚阶层还维护国家所有制,那么官僚阶级就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被公认为托洛茨基门徒的 T. 克利夫后来把国家所有制当作保守倾向的形式主义而予以摒弃。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论断中虽有上述这些摇摆和某些矛盾,却认定了苏联的官僚阶层不经过斗争是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的;

国家将走向革命,但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因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会改变。在这方面托洛茨基的分析是不充分的,可以说是受到当时关于国有化、国家所有制和工人国家之间关系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把工人阶级革命前的斗争方式带到新关系中去的做法的影响。这一切迄今已表明是历史的幻想。

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即官僚阶层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如此强大的阵地,以致它不但完全决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还肆无忌惮地往往以完全独断和专制的方式支配自己同胞的生命。在给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下定义时,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分歧。我们已提到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把这一新的社会形态称作新阶级,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有许多权限和阶级特权(*prerogativ*)的帮会,即官僚阶层。总之,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产生了一个预料不到的历史难题,这个难题可以说是从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出来的。任何人都不像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那样热心宣传当代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十月革命;任何人都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热心宣传一个发展,这一发展最后使马克思主义者自己面临着历史的斯芬克斯(*Sfinga*)^①之谜。真正的希腊戏剧在我们眼前演出,只不过以一种更开阔、更严酷的形式演出罢了!

马克思主义者对分析和探讨新历史现象实质所作的巨大努力,正如我们迄今所看到的,都未能摆脱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的某种片面性。他们或者把新制度的特征同现存的历史形态作比较,或者过分死板地看待这一新生事物,或者只注意到制度的某些现象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并以此确定全部社会关系。可是,如果我们想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对这个新的历史现实给予回答,那么我们就应该提出一个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是什么(不管这种关系的维护者是怎么想的)?这种关系是怎样产生的?是

68

^① 斯芬克斯(*Sfinga*),希腊神话中狮身有翼的女怪物。——译者注

否还处于产生的过程或者已经获得比较肯定的形式？

几乎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替这一制度辩护的人都不否认，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被消灭，国家和党的活动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在经济问题上占着主导地位，在这一制度下实行以国家积累、国家分配和国家计划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一些人称这种制度为现实社会主义，另一些人称它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称它为国家资本主义。因此，最好从资本主义的当代现象和进程谈起，以便理解苏联社会在几十年里所经历的变迁。

69 不管我们能否赋予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即后资本主义，或所谓后工业社会以马克思在谈到 19 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所下的某些定义，如雇佣关系、剩余价值生产、为利润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等，但不能闭眼不看那些标志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不认识的许多新事物的进程和现象。在本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进程已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这给自由竞争和市场规律带来了某些新东西，这是希法亭和列宁以及他们之后的许多人所多次指出的。不但如此，而且资本主义由于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没有能力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而解决自己的历史生存问题，越来越不得不使用曾屡遭批判的国家干预手段。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来说，国家政治机构的任何干预都是对它的天然权利的打击，归根到底，都是对所揭示的在他们看来完全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的根本自由的打击，是对个人积极性和私有制的打击。虽然亚当·斯密(A. Smith)的古老史诗今天在一些保守党和反动政党的选举运动中还可以听到(念起来往往像悼词)，但它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和平时期，资本主义不得不更多地尝试国家干预，由此自然会使国家的权力相对独立，甚至导致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并且接受国有化，尤其是在有关部门再也不能独立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从 30 年代以来，不仅在稳定某些生产部门的价格、鼓励和引导信贷、给国家规划中认为是优先的部门提供各种优惠等方面国家的干预越来越大，而且在

资本主义国家里部分地取消了私有资本和私有制。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是众所周知的事,虽然这样的国家工业在任何国家里都还不是占优势的。如果我们排除在我们的分析中不那么令人感兴趣的另一个重要进程,即建立跨国公司的、对当代社会主义方针和政策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除上述现象外,我们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特征是:国家机器在一定的国家计划基础上,按照需要和优先照顾的考虑,通过部分的,即工业的某些部门的国有化,来不断加强其经济干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是:仍然存在着强大的资本主义私有成分,而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卡特尔(Kartel)或垄断,同时存在着或多或少发达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过程中带有相当强烈的国家影响(ingerencija)。

70

如果我们把能够推动这些进程朝各方向发展的许多条件和情况抽象化(我们强调要进行多少抽象些的研究),那么,国有化的进程将继续发展,而国家将最终汲取全部资本。一个完全的、彻底的国有化也可以设想为另外一种进程,即对社会主义而言具有示范性的进程。这样一来,我们就首先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国家所有制,变成一种国家官僚体制,这种体制多少有某些计划,对市场多少有限制,多少有民主管理,并对工人阶级实行管理,可是工人阶级在管理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生产和消费中完全没有份,总而言之,工人阶级仍处于作为资本主义重要特征的雇佣关系之中。尽管一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像希法亭这样优秀的金融资本理论家认为,我们再也不能称这种制度为资本主义,因为国家以自己的计划指导生产,取消市场和价格机制,从而也取消经济规律的作用,因此这种制度既非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权主义。我认为,我们在理论上有权利把它称作极权主义,这是由于一个重要的原因:存在着雇佣关系,存在着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相同的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尽管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除了,但由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仍是资本关系形式或雇佣

关系形式,因此这种已彻底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能在构成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基本雇佣关系被逐渐消除的地方开始产生。

71 这种抽象的研究和某些现实的过程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有机发展的这样一种进程是可能出现的,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中越来越表现出来的其他各种相反的倾向,这种进程的可能性今天就变小了。我首先指的是参与决策、工人监督和自治的倾向,如果社会主义力量成长到足以完成历史任务,那么这些力量就将把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和进程加以重大改造并引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种进程的历史可能性如何,它可能达到的界限何在,今天谁也无法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迈出的每一个步伐,总比消极等待一场总变革要革命得多,因为这样的总变革也可能是完全抽象的。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像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或南斯拉夫革命这样一些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发生的情况,并且只谈这些情况,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些革命中的社会经济关系从一开始就十分复杂。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里进行的,是在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数量很少、民主和革命的传统很薄弱,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阶层却十分发达的社会里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很有组织和很有纪律的、坚定的、拥有干部的党,如果在国内没有造成一定的形势、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或反对现状的情绪,就不可能夺取政权。革命力量在上述所有情况下夺取政权,仅仅是社会改造的一个更深入的革命进程的开端。社会主义力量掌握了政权,但社会就其社会关系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何况在上述许多情况下,即使在单个的国家里,社会经济关系也是各种各样的。大家知道,列宁在20年代初多次谈道,他们的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宗法的关系。列宁甚至认为,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不发达的和无组织的小资产阶级的俄国来说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在战后最初年代,在南

斯拉夫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这里指的就是党,它是引导的政治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主要干部和职位方面,与国家政权是等同的。但是,在完成国有化以后,我国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关系: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关系,这种关系按其内容(不是按其趋向)是同国家资本主义关系接近或相同的;另一种是私有成分,这种成分甚至曾占主导地位,因为它包括了整个农民阶层,即包括了70%的居民。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只是更不发达罢了,所以国有化时间拖得长些,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将是长期的。

72

然而,上述所有情况都是革命力量历史上早期发生的情况,这些革命力量虽然不总是认识到所有情况、形势和危险,但彻底地参与了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政权的确是革命的,它通过采取许多措施力求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阶层。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革命政权不但肩负着同持续了多年的反革命作斗争的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且要通过各种措施,如土地改革、配给食品、规定并监督价格、规定差别不大的工资制度、某种住宅政策等,努力改善广大人民阶层的状况。

但是,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革命力量,尤其是革命先锋队的领导最终要明白,国有化措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掌权、国家计划、国家积累、国家集中支配这一积累,这些都并非社会主义,而只是使社会关系继续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以便克服仍然存在的雇佣关系,仍然存在的工人和他的产品相脱离的现象,即工人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异化。这一点我们在列宁身上看到了榜样,而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这一点特别在同斯大林发生冲突后表现了出来。

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同上述情况的根本不同之处恰恰在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方向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不管过去和现在怎样产生,它总是力求维护和保住现状以利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官僚,而前面说的各种社会情况(konstelacija)在革命力量逐步消除这种关系的

73 力度上是有重大差别的。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国家计划和国家对全部生产过程的管理中都有自己的根基)进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掌控**,只能朝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所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把国家计划变成社会计划,把国家管理全部社会过程变成社会管理全部社会过程。只有确认和实现了一种能使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生产、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收入、自己的扩大再生产的真正管理者的关系,只有建立了向劳动者负责和随时可罢免的代表制度,只有通过国内的这些重要社会进程,上述发展方向才是可能的。而这在不发达国家则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只有实现生产者自治和建立以这些东西为基础的社会,才有可能取消国家资本主义结构和雇佣关系。而有别于机关化、官僚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称得上国家社会主义的,只能是这样一种革命政权和制度,它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掌权时期就意识到国有化,即国家垄断的历史局限性,并立即开始(虽是有限地,却是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进程,这种进程归根到底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和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否定。

所以,不能把国家社会主义范畴说成是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不管实现这种关系的政治力量叫什么),即它不仅以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对积累和分配的垄断为特征,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维护既得的官僚权力而使雇佣关系和经济、政治异化永久化的故步自封和前途无望的社会制度。只有在下述情况下使用这一概念才有道理,即革命力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认识到国家主义垄断及其危险性,因而开始推动一定的机构改革和进程(不管是谁倡导的),这种改革和进程是为了消除上述结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者自治,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建立社会经济关系。换句话74 说,也就是不断地推动国家消亡的进程。

这样一个时期是名副其实的过渡时期和充满矛盾的时期,这一点

在后面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即在列宁时代和南斯拉夫过去的时期都可以看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状况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作用并未完全消失,自治进程也还未彻底实现,还没有完全代替国家干预,国家在这个时期还有某些作用。这些进程还只是处于自己历史存在的童年时期。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社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但人们总是一再提醒说,那个社会仍然存在。各种力量和势力范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有哪些相互依赖,有哪些对抗和矛盾,有哪些缺陷和优势,这种优势归根到底是这种历史情况下可能实现和不仅仅受内部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制约的最大历史可能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其他章节中将有机会加以探讨。

依据主要是较不发达国家迄今的所有经验,这一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基本上可以有两种发展方向:或者社会主义力量(不管其主要动力来自何方)始终不渝地进一步努力加深社会主义进程,以实现作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作为社会的新社会政治结构基础的生产者自治、委员会制度;或者走向废除社会主义关系的雏形和社会主义的萌芽(它们的表现形式是工人监督和工人作决定,由工人管理企业的雏形即自由选举出的各级委员会来作出决定),以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关系,而这种关系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在这个时期里占统治地位和拥有绝对权力。遗憾的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苏联所发生的进程,正是沿着第二种方向发展的。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看到革命的这种倒退的原因,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必多谈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要看到,当时产生的这一制度与在正常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正在发展的某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和特殊性。

75

当然,在存在着我们所列举的许多矛盾的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里,在斯大林的绝对领导下所产生的这一制度,必然有它自己的某些完全独到的特征,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是不能够完全加以概括的。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无疑十分重要的那些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在3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的特征是只

存在两种所有制基本形式：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国家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影响，对集体农庄所有制也享有充分的权力。国家官僚以一定程度干预经济进程的形式不但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整个经济进程都是通过中央的国家计划实行集中积累和统一支配的。就是说，国家官僚通过这个计划支配全部剩余价值，并把它投放到它认为必要的地方去。我们知道，正因为这样，直到现在重工业一直占主导地位，重工业和日用品工业之间的失调依然存在，这就特别使工人阶级和其他没有任何特权的消费者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仍完全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进程，无权分配自己创造的剩余劳动，无权决定扩大再生产和投资，更不用说工人阶级决定连自己都被排除在外的其他社会进程了。工人阶级和自己的剩余劳动完全分离，因而这种剩余劳动不过是剩余价值而已。由某个机关支配工人阶级的产品并按自己的标准和利益使用这些产品，这样的关系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雇佣关系、资本关系罢了。不过这一雇佣关系的一方不是单个的资本家，不是垄断的卡特尔或公司，而是国家机构。正因为这样，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可能性彻底实现了，而国家资本主义连同带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政治力量，在这一进程中倒退并最终蜕化变质了。

76 考虑到我的这一观点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尽管在个别地方或许部分地一致，但是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再次归纳一下自己的观点。

在每一个革命进程中，社会主义力量无论是通过武装道路还是议会道路取得政权，都要首先通过各种国有化措施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这些国有化措施在方法上、激烈程度上和持续时间上都可以是不相同的。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即首先对大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对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和重大的历史行动，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社会经济关系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于领导国家的是既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又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劳动

群众的其他革命措施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因此这个政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我们有权把这整个制度叫作国家社会主义,虽然我们知道还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整个这一社会变革时期和捍卫革命时期是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应当认识到不能用他们正在创立或已经创立的东西代替政权或把社会制度同政权等同起来。他们不但要认识到国有化的历史局限性,而且要认识到,如果只停留在国有化上,就会有巨大的危险性。国有化仍然意味着,工人阶级同自己劳动的产品相分离,同积累、计划和对扩大再生产的管理相分离。因而,尽管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实质上却处于雇佣关系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异化的地位。也就是说,仍然是某人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管理,而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社会。

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突出特点是:革命的力量认清整个形势,并努力尽快消除这一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迄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向我们表明,只有建立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建立工人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在这些原则上逐步对整个社会实行改造,才有可能消除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如果这些进程能够同夺取政权同时发生,那是最理想的了。这在发达国家中肯定会发生。只有当工人阶级不仅在分配中而且在指导整个社会发展的政策中主宰自己劳动的成果,才有可能取消雇佣关系和剩余价值。社会革命——它仅仅是重要的社会革命——深化的整个这一时期,是国家社会主义形态和机构同自治形态和机构互相吸收、相互促进,甚至对抗的时期。只有当以自治方式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在指导整个国家发展上而且对社会的政治组织残余和在许多职能上已消亡的国家的残余有着主导的作用时,自治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才能战胜国家社会主义关系。

如果社会停滞在初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上,那么官僚—国家主义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巩固,并且脱离劳动群众,甚至导致官僚—国家主义的反革命,如同斯大林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那样。这样,社会主义

的特征就丧失了,关系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变成官僚—国家主义的,而且必然起保守甚至反动的作用。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话和评述可能说得太重了。但实际情况却更严重。一个政权既没有停留在初期的革命进程上也没有发展这一进程,而是彻底废除和消灭革命开始时实行的直接民主的一切形式和工人委员会的一切形式,对于这样一个政权,如果我们在思想上不是盲从而仍然坚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切标准的话,还能够作出另一种解释吗?更有甚者,这一政权不但谴责任何自由的观点和不同意见,而且伪造证据,有时甚至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便用杀害自己人民的最优秀儿女的手段进行最残暴的惩处。这一政权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但伪造案情,而且伪造自己的全部历史。官僚—国家主义向我们展现了曾经是社会主义力量、参加过革命甚至起过重要的作用而后组成政权的力量。这些力量利用十月革命的伟大传统,当然要坚持表明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力量,甚至是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力量。他们不会简单地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遗产,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完全孤立。可是他们因此而不断地使这一伟大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威信扫地。在这个时期,充满着上面所说的残杀事件,建立了比沙皇集中营还坏的恐怖集中营。由于把党的政策和利益同国家的政策和利益混为一谈,这样的威信扫地必然是这一政权的结果。1948 年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攻击,1956 年对匈牙利的干涉和 1968 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我们只举一些最严重的事件——并非“无序”或偶然,而是未被初期非斯大林化的努力清除掉的这一政策和权力的逻辑结果。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及其帮派以粗暴的国有化和集体农庄化政策向社会主义迈出了最后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通过取缔大部分而最后是全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的。这些机构既然是从国家社会主义中派生出的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官

僚—国家主义,那就同样会演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如同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那样。这就要求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力量看到他们那种使理论神秘化和使理论脱离其所生活的实际的现象,并且有力量摆脱过去的东西,如同赫鲁晓夫所开始做的那样,虽然是部分地和局部地进行,但却是大胆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和国家消亡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种形式和内容,是可以使这些力量从历史死胡同中走出来的唯一的历史环节。

虽然我们对标志着斯大林制度的许多特点还未作出完整的分析,我们却有必要现在就阐述一些人的批判性观点,他们对这一制度持严厉批判的态度,否认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义特征,但却认为不能给它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而要寻找某种他们认为恰当的定义。我们已经看到,希法亭和里齐就是这样做的,而在新时期 A. 卡洛(A. Carlo)也这样做,他在给这一制度下定义时同意——不过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同意——里齐使用的“官僚主义集体主义”一词,认为它应反映中央政治官僚的集体所有制这一实际。他们的分析和论断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即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商品、市场、利润、创造剩余价值这些范畴,而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计划生产,就是说,在苏联经济中不存在商品、市场和剩余价值范畴,或者至少不处于占统治的地位。工人提供剩余劳动,但不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因为这些范畴是不可分割地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卡洛承认,尽管可以指出这个社会也有与社会主义相似的某些东西(使用价值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交换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但仍不能给这个社会下社会主义的定义,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权力之上,建立在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占有剩余劳动之上,就是说,工人阶级同自己的生产资料是分离的。

79

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已充分表明,在资本主义作为制度的垄断时期,存在着市场受到极大限制、通过垄断机构形成价格,以及垄断机构在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市场的限制可大可小,价值规律的

限制也是如此。这只不过说明,剩余价值还存在着,标志着资本主义这一整个社会经济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经济关系还没有被消灭。对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任何限制都没有使雇佣关系——经济异化——在这一制度下被消除。这就是说,无论是剥削还是剩余价值都没有被消除。因为剩余价值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范畴和阶级范畴,它不仅表明存在着一个不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阶级,而且表明正因为这样这个劳动力又是商品,而作为商品的这一劳动力的剩余劳动,只不过是而且不能不是剩余价值而已。

在劳动力是商品的地方,必然存在剩余价值,而在存在着雇佣关系、工人阶级不支配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一产品同工人阶级分离的地方,劳动力则必然是商品。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一剩余价值怎样同工人阶级分离,仅仅是通过市场机制,或者还使用官僚—国家主义的方法,从历史上说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只要工人阶级不支配自己的劳动、自己劳动的产品、扩大再生产和国家的全部经济进程,工人阶级就处于雇佣关系中,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就具有剩余价值的性质。因为剩余价值是表明雇佣关系的范畴,就是剥削关系。因此,剩余价值是这样一个范畴,它不仅表明存在着生产剩余价值的阶级,而且还表明存在着占有这一剩余价值的阶级或其他某些社会形态。因此,剩余价值是社会经济异化的范畴。它同时还表明其劳动力在这种关系中作为商品存在的劳动者自己创造的现实生存。

进而,构成这一斯大林主义制度的特征,但并非所有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都固有的东西,在于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历史起源。这一制度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有机发展而产生的,而是由于第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演变、蜕化而形成的,不管这一革命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斯大林主义不但继承了革命的全部遗产(我们将有机会看到它有着什么样的伪装形式),而且摆出一副有伦理道德的表情,特别强调这份遗产,就像贼声嘶力竭地叫喊抓住贼一样。正因为这样,由于革命时期的许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取决于当时的艰苦

环境、内部弱点和不发达状况——斯大林主义不仅为新制度,而且为整个共产主义做了大好事。这些“好事”之一,就是最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只存在一个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司空见惯的神话),还有就是坚持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党内反对派的决定,这在我们前面详细谈到的那个时期里曾经发生过。斯大林主义的特点不仅是禁止党内一切反对派,而且禁止一切民主制,它的特点还在于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它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变成完全不民主的集中制,最后变成警察集中制。众所周知,早在30年代,没有一个党的决定是在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之前与在这些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和争论基础上作出的,而是靠党的高层独断作出的。大家还知道,所有那些以任何方式表示不赞成当时各种政策措施的人,甚至许多对那些措施表示赞成的人,都不但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肉体上被消灭了。列宁的党本身是一定历史情况特别是落后俄国的结果,但它培育了党内的民主和正确的关系。可是这个党在斯大林主义条件下却变成了斯大林主义党,而它却向全世界,特别是通过第三国际机构向共产主义运动表明它是真正的列宁的党。

在一党制历史地最适宜和最有效的情况下,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关于这个问题还会谈到,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党是社会进程的指导力量,是对发扬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对发展和加强有助于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和雇佣关系的那种社会经济关系消亡负有最大责任的力量。但是如果这个党没有通过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关系和与此有关问题进行自由的内部讨论、争论、议论和公众生活而创造民主气氛,它最终不仅不能成为这些进程的先导,而且必然由于不民主的制度而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成为要对官僚—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负罪责的党。这个党就从革命党变成官僚阶层和其他特权阶层的党,而不是本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党。

斯大林派为了能够掌权,不顾许多派别和阶层及布尔什维克内外

82 人士的反对,压制和取缔民主,实行党和国家的垄断与专制,这必然一步步地取消公众生活的一切民主形式和公民的所有基本自由,而这些民主形式和自由是迄今历史上进步力量进行斗争的巨大历史性成果。首先工人阶级本身具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赢得的公民权:罢工权、调换劳动岗位权、自由组织工会权、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权利、工人自己自由出版权,这里不必重提列宁时期就已开始实现的重要的社会主义权利和自由。我们已经说过,在30年代工人监督和自治的最后剩余部分都被取消了,工厂委员会中自由决定和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也被取消了。官僚-国家主义反革命势力活跃起来,只有它能对30年代的恐怖事件给出答案,只有它能对近代史中发生的一切给出答案。不能用什么个人崇拜的说法来为杀害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作辩解——因为有人想以此辩解——也不能用任何缺陷和没有遵守社会主义法制作辩解。这种野蛮行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容。

这一制度的特点还在于,党-国家的垄断变成全面的垄断,其影响范围不限于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的领域,而且包括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特别是文化和科学领域。他们不但认为他们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最高裁决者,而且把这个权利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只有基础自然科学没有遭殃。因此,我们不但看到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实行裁决,他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可笑的文章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而且看到他干预和裁决扩展到历史学、语言学 and 经济学等方面。在其他学科方面,苏联官僚阶层以自己的“革命”激情宣告全部现代资产阶级文化都是颓废的和反动的。按照这一药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在生物学方面的发现、弗洛伊德在心理学方面的创见,都不会有别的下场。

同样地,艺术领域也被这种官僚主义的狂热所席卷,其结果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这样,斯大林的政治官僚阶层本身不是来自有丰厚

文化传统的高级知识界,因而无力哪怕最低限度地对文化艺术创作的思想及其可能的方向和规律作出评价。迄今在这方面的一切国家主义垄断者,以及法西斯垄断者都认为,艺术以及国内一切东西都必须直接为他们服务。艺术享受中的亲切感和主观性被冷酷的巨著和官僚主义的新古典主义(neoklasicizam)所扼杀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必然会有这样的艺术。给一个不人道的历史现实涂上浪漫主义色彩并把它当作新哥特建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距离真正的和真实的艺术欣赏很远,而斯大林主义却不但以此造福于本国,而且认为这是最高级的出口商品,阵营中各国世世代代的人都应对它不胜感激。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施行政治领域的恐怖,即如果没有政治警察,就不可能在这样严格限制的社会自由形式下管理和维持 20 世纪的一个社会,特别是感受着十月革命罗曼蒂克的苏联社会。当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状况时,当社会缺乏必要的民主气氛来解决自己的内部矛盾时,当所有新闻工具都被占统治地位的党的上层所垄断时,当不可能树立更自由的公众舆论时,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就是十分可能的和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政治极权主义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和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下达到如此相似的程度,以致使许多人鉴于在人际关系上十分相似的和相同的悲惨结局,而得出关于两者是同样制度的结论。

83

虽然我们从迄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斯大林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这种进程是在有了一个初步的社会主义动机之后产生的,但是遗憾的是,从上面谈到的现象中可以看到,两种制度几乎都导致了同样的悲惨结局。这只不过表明,在斯大林的手下,在我们已详细谈到的往往是预见不到和不必要的各种情况基础上,整个发展同样有着一个预见不到的方向和结局,致使革命陷入具有一系列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中。关于这种社会关系前面也谈了不少。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个人崇拜,不仅是可能发生的现象,而且几乎是必然发生的现象。这种倒退发展的主导者,尤其是如果他受到某种心

理特点的影响(不看到这些特点,30年代所犯的这些罪行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就必然高居他人之上,以使自己的专制独裁能够不受人责难而为人所服帖地遵从。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再有任何内部的民主争论,而只有十足的压制。这种压制造成了如此可怕的关系,连最亲近的同事也不敢问一问:为什么他的某些过去的同事被投入监狱?为什么自己的配偶、兄弟或儿子被投入监狱?加里宁、莫洛托夫、米高扬(A. Mikojan)、奥尔忠尼启则或库西宁(O. Kuusinen)就有过这种遭遇。因此,个人崇拜并非可以轻易地用来解释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的魔杖,然而个人崇拜本身又是对所创造的一切东西产生反作用的后果。个人崇拜只是一座冰山的一角,冰山的庞大底座是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

我们从上面这些可以看到,把这一制度宣布为社会主义,甚至宣布为共产主义,是最大的历史错误,是肤浅的和没道理的。今天每一个保守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可以根据这一制度所发生的一切和背离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制定的行为关系准则的东西,对共产主义轻率地加以指责并败坏其声誉。诚然,资产阶级社会是准备在其他方面照旧那样干的。而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新人道主义的理想,今天我们从许多历史进程中已得到证明,共产主义理想是能够实现的,而且正在实现中。正是为了这种理想,必须彻底剖析极权主义的、不民主的、官僚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出现,即使以上面说的例子出现,也由于它具有自身的一切特征而只能有一个名称——斯大林主义。

二、围绕党的争论

党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特别迫切的问题,是由于两个历史事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民主主义的破产和斯大林集团的胜利,以及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和列宁党的解释。由于当

今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没有一定的组织是不可想象的,由于这些政治组织和政党在解决一定的社会危机和动乱中曾经有过十分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党的问题不仅成为争论的中心,而且成为各运动的活动中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社会民主主义破产和俄国布尔什维克获胜后发生的分裂,使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即胜利的党应当成为每个共产主义组织的榜样。虽然这种思想对于老练的辩证法大师列宁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格格不入的,但列宁的后继者以斯大林所固有的品质和心态概括和总结了自己的历史实践,很快迈出了这一决定性步伐。斯大林早在1925年自己上升的初期,就提出了关于磐石般团结的列宁主义政党的理论。他认为,列宁主义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而这样类型的党对斯大林来说,在那个时期就已成为每一个革命党的榜样。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就这样诞生了,虽然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领导下的“列宁主义”都不了解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包罗万象的和普遍适用的关于党的理论。

85

如果我们撇开许多社会党派别特别是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不说,因为他们从索雷尔(G. Sorel)、拉葛德尔(H. Lagardelle)、米歇尔斯,到吕勒、缪萨姆(E. Mühsam)等都坚决反对政党,认为政党必然要导致官僚化和背叛工人利益,那么,近来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真正意义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当中许多人,我们只提一下鲁贝尔,他十分尖锐地指责列宁是什么现代的雅各宾党人、布朗基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从广泛得多的历史意义上把党理解为仅是工人阶级的有机运动,任何从外部“输入觉悟”都是同它格格不入的。在他们看来,列宁继承了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的遗产。

然而,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关于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组织、有必要建立专门的革命政党的思想,而是强调,共产党人只是领导工人运动的最有觉悟的部分,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的那样。这样的说法从历史观点看是不正确的。在马克思下了最多功夫的共产国际章程的补充条款中第七条特别强调,无产阶

86 级为了进行历史性的斗争,必须建立自己专门的政治组织,而马克思帮助当时的某些社会民主党制定它们的纲领,当时在德国和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后来恩格斯经常参与、关注并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新的爱尔福特纲领提出意见。这一切表明,他们两人都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政治组织,无产阶级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斗争。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提出党的理论,虽然大家知道他们是怎样考虑党在欧洲发达国家中发挥作用的问题的。他们未能提出党的理论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他们是非常坚强的辩证法大师,不想陷入形而上学。他们作为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不但明白,政治机构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历史现实、每一单个国家都是既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传统和各阶层的特有心理,以及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构成的一个十分复杂的总和,都是为了要坚持政治组织的单一形态。

但是他们针对当时发展的形势十分肯定地认为,当时的政党应当成为一个新民主精神的体现者。从恩格斯给倍倍尔(A. Bebel)或特利尔(G. Trier)的书信中我们看到,恩格斯是多么坚持党内民主制。虽然他承认,党在地下工作或直接准备革命行动的一定困难情况下可以要求服从,但他明确指出,在党处于和平时时期时,批评是党的生活要素,党队伍中的争论是党顺利发展的前提。他清楚地知道,在党内总要有温和派和激进派;对于要求检查《新时代》的呼声,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件中讽刺地写道:这样一来,在废除了反社会党人的俾斯麦法令后,就必须实行社会党管理机构的新法令了。大家知道,恩格斯甚至认为党的理论机关应当对党的领导有相对独立性,以便能够摆脱日常的政治实用主义和这种思想方法与这种利益的影响。

87 同样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对党组织问题的这种观点的基础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原则特别是在我们时代之所以引起这么多议论和理论探索,就是因为人们经常把这一原则多多少少同斯大林의 实践和理论相提并论,这起码也是理论上的无稽之谈(nonsense)。斯大林关

于党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有限度的集中制的民主思想,而在实践中仍然是司空见惯的集中制的和警察专制的统治。

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几乎是每一个或多或少尊重自己党员意志、愿以某种方式开展活动的党的组织原则。因此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都是按这一原则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一原则在历史上是很不相同、有伸缩性,或活跃或停滞的。在当今“东方集团的马克思主义”中人们经常极其泛泛地谈论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正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制度中出现的情况,他们不愿意完全抛弃官僚化的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不愿意强调民主制的各种可能性和形式,而这些可能性和形式今天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顺利发展有着很大的意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提供任何药方,因为这个问题取决于许多历史情况和传统。但是如果说这种民主制起码在我们欧洲情况下不仅意味着内部批评、讨论甚至争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意味着规律性,那么同样地,各种派别的存在、代表大会前对基本问题的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但有权继续维护自己的意见等,则是基本的历史经验之一。集中制是很容易制定和实行的,但在民主制问题上,在当今形势下可以看出一个革命组织的活力和历史前瞻性。

从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与组织工作的例子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组织政党的问题是历史性问题。列宁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为每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提供公式和理论,如同迄今斯大林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列宁无疑是本世纪革命实践中最伟大的辩证法大师之一,他从来不考虑对理论的这种错误做法。有趣的是,今天经常有人把列宁同马克思对立起来,以表明列宁在解决党的问题时不是步马克思的后尘。这里他们只忘记了一件小事,即我们已经强调的,马克思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党的理论,也不可能提出。列宁的伟大之处恰恰

命打开了。在那个时期唯有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看待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唯有列宁实现了当时工人阶级和社会党人的期盼。因此,他根据俄国情况提出的关于党的思想,无疑是以革命方式处理当时局势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凭这些就可以责备列宁并企图把他同马克思对立起来的话,那至少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评论马克思主义的伟人,但在这个问题上,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革命的策略问题上,列宁甚至超越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一直处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提出来的阶段,而列宁则完全处于把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的历史时期。尽管在马克思晚年时建立了一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但马克思不是这些党的创始人或领袖,而且我们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党的呆板日常活动不是那么特别兴奋,在70年代这个时期他已没有足够精力。

列宁虽是一位非凡的理论家,但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事业,这成为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党,由于它被迫处于地下状态,党内斗争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可能性是很不充分的,必然具有只符合这种情况和类似情况的某些特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它不可能是群众党而只能是中央机关拥有强大特权的干部党,围绕着某些策略和战略问题的党内广泛讨论不能公开进行。党摆脱了地下状态后的历史最好地表明,列宁在这个党里是多么尊重个人的自主权和自由。公开的、自由的和尖锐的讨论、议论和争论是作出每一个重要决定的前提,而列宁本人,大家知道,经常处于少数派或者向多数派坚持自己的建议和观点。列宁党的内部民主制如此发达,以致直到今天没有一个欧洲共产党在内部自由、坦率性和批评性方面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当我们考虑到这是相隔半个世纪的时间,列宁的思想及其个人的伟大之处就更加明显了。

迄今进行的重大理论争论和理论批评的另一个问题,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从外部灌输思想意识”的问题。虽然这个提法本身并不恰当,但我们还是借用它。这些批评企图驳斥列宁的观点和实践,如果我们

任其自流的话,会使工人运动更多地朝经济主义方向而不是朝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方向发展。这一革命思想特别是由党的领导层和作为运动的理论家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内少数有觉悟的人带来的。按照批评家的意见,这一思想是同马克思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因为马克思是从历史事件的全局和革命觉悟本身产生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这一角度来理解工人运动的发展的。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而党在这一思想中无疑只是为这一发展服务的。一些人常常援引罗莎·卢森堡的话,她在同列宁的辩论中认为,群众的斗争经验哪怕是消极的,也比一个领导的任何正确看法和认识都有价值得多。

这一争论今天备受某种烦琐哲学之害。就是说,假如硬加在马克思身上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那么马克思就不会是一直指导工人运动或其他运动的专门的政党的捍卫者,历史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正如我们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其次,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这样的解释会导致一种用更加严密的组织来培育历史意识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同样不是马克思所固有的。意识、历史意识不但是一种社会经济状况及其矛盾的直接反映,而且这种状况产生的途径是非常复杂的。同时,属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但不一定属于同一阶层的个别人的意识,在形成这种阶级的、群众的和社会的意识方面可能是非常具有决定性的。迄今这一进程起码是这样进行的:这些情况、这些不同的意识彼此不能分开,就好像一个套着一个。每一个党也都是一个历史整体的一部分,只能从考虑这一社会全局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党的成败。如果某个党的观点和主张在某些既定集团中没有适当的反应,而这些阶层或集团的机构应当是能接受某些观点的,那么意识灌输则仍然是纯粹的历史幻想。由此可见,这个“外来的东西”完全是相对的。真正外来的东西对那些运用外来东西的人依然是格格不入的,而历史实践已不止一次向我们表明,某些要求仍然是真正的外来东西。从各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努力到共产主义者的努力皆是如此。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只是由于没有看到某些阶级或某些阶级的各部分的心理、地位和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因此旧的公式往往没有得到反响(rezonacija)。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主要阶级的先锋组织、政治组织依然是历史的现实,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说,仍然是历史的必然性,尽管我们都知道,每个政治组织都还有甚至完全不能避免的消极面。不能让迄今像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变革放任自流,也不能让组织的活动停留在旧制度范围内。我们亲眼看到,建立新关系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不愿走进死胡同,就不能用任何自发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用这种方式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使整个先锋队至今都被捆绑在这个重大任务上。在革命前的每个时期里,人们很容易想象这个令人向往的社会理想。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领导基本上是完全信任的,并想象一旦领导在领导新国家时看到这一点,问题就解决了。而领导想象的主要是:只要那些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并愿为社会主义目标而牺牲的人统治国家,社会主义就差不多实现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幻想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因此,首先团结在某些共产党或社会党周围的当代先锋力量全力以赴地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并从斯大林主义和为社会主义而作的其他尝试和努力的迄今历史经验中得出一切合理的结论,是利害相关和意义重大的事。

91 某些理论家有时习以为常地把阶级意识偶像化,把政治官僚所特有的政党组织偶像化,这从历史观点来看是毫无道理的。不管哪一方可能作出多大的历史性努力,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历史性低潮和失败。工人运动的革命浪潮把工人委员会推上历史战场,但这还远远不能使一个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新社会如何行使职能的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一个革命政党夺取了政权,但离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进程还很遥远。如果我们对此补充说,我们仍处在商品生产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水平,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另一范畴,那么我们会明白,建立新的

人与人的关系是多么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这艘新的、脆弱的汽艇不得不穿过资产阶级关系或结构所设置的暗礁和险滩。因此,只要我们现实地研究迄今的经验,就根本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一个革命运动会不会取消党的领导,因为党现在这样存在着,也许超过对它的需要。问题在于一个革命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结构,它应怎样发挥作用,以便在以后阶段里避免最严重的历史性弊病(promašaj),保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进程,使社会主义的结构不至于被官僚 - 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 - 资本主义的机构所代替。

被斯大林主义完全搞糊涂了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斯大林主义在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时,把关于只有一个革命的共产党的可能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需要一个党的论点强加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按照这一思想,工人阶级只有一个统一的历史目标和利益,因而不能容忍两个党或多党,否则会使实现他们的统一的历史利益成问题或使他们的队伍分裂,从而助长其他社会力量的反革命活动。有趣的是,在列宁逝世后的反对派同斯大林派的激烈斗争中,托洛茨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即不愿看到党分裂,其论据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基本上一样。

然而,在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里,在欧洲情况下属于不发达国家(俄国、南斯拉夫)里,实行一党制的原因则完全不同。多数共产党人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历史情况,说明自己行动的某些必要性,这些行动又制约了与革命前宣布的目标相违背的某些措施。因此,把对以前宣布的自由加以限制,把这些历史缺陷说成是历史发展中的革命美德和最高水平,是毫无道理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这是把一场革命引到历史深渊边缘的最好途径,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俄国就发生了这个情况。

这种行为有更深刻的历史根源。部分地可以用理论遗产和政治遗产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最发达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将

在很短时间里占居民的多数,工人阶级掌权后将建立真正的民主,即多数对少数的权力。如果这样来考察欧洲的社会进程,那么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然处于少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的意识中就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资产阶级在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如果我们只用古典政治方式来解释民主的话,那么我们应立即指出,这也是十分令人不满意的。

我们看到,欧洲的历史走过的道路是有些不同的,十月革命时期和后来时期南斯拉夫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和多数社会主义者在本世纪初所期望的不同。在俄国,以布尔什维克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其占人口的比例不超过10%,他们面对的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好感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层。南斯拉夫的情况要好些,尽管武装革命胜利后(1945年)南斯拉夫的农民占人口的75%。在这种情况下宣布实行多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意味着在上述情况下把刀子架在革命脖子上。

93 政党总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组织,尽管在每个党里都有其他阶级或阶层的许多成员参加。但是一个党所依靠的、构成该党骨干的基本社会力量总是某一个阶级或某个阶级的某个部分。在上述情况下,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欧洲的真正社会革命的唯一情况下[包括阿尔巴尼亚,这里我们不专门讨论它,因为它只是一个独特的斯大林主义“小画像”(minijatura)^①],各国共产党都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基础并得到它的支持。这当然不是说,在某些方面这些共产党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劳动阶层的支持。这些方面在不同情况下都是为人们所了解的。我们也知道,这些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之一和所作的努力,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争取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多数,把他们作为稳定秩序的同盟军。

^① minijatura(意大利语),中世纪抄本小画像。——译者注

然而,在发生一定的危机、困难或错误的每一时期——在这样的一些不发达国家里,由于革命后面临一系列困难和在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缺乏经验,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都可以看到,阶级的基础是狭窄的,在这些时期里这些制度的软弱性是十分明显的。也称为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党的存在,会把居民的主要部分都吸引过去。当时仍然是革命的、居领导地位的主要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捍卫革命的主要保障,不得不把领导地位让给在广大人民阶层中有社会基础的党,而这个广大人民阶层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理想,他们的向往和追求主要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私有者眼前利益的制约。任何一个革命的阶级和政党,在它们用武装的暴力革命把统治阶级从政治宝座上推翻的情况下,迄今都不会,今后也不会甘心于就这样离开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今天工人阶级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在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按其逻辑来说,上述情况是可能发生和将会发生的,因为一些政党通过议会机制上台和下台,在那里,取消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进程是从这个社会深处开始发生的。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谈到。

因此,在迄今不发达的国家里存在着一党制——我们暂且不谈斯大林主义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的,因而处于不断危机中的某些发达国家——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任何本质,也不是共产党的优点或缺点,而是资产阶级迄今在没有出路时也加以利用的最通常的历史必然性。难道资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会允许代表旧的封建关系的党或者有多数工人做后盾的党享有活动自由吗?难道资产阶级在它的社会经济的统治受到内部社会进程的威胁时,迄今没有使用一党专政或军事专政吗?在欧洲实行法西斯统治是不久以前的事,更不用说在其他国家——从巴西和泰国到刚果和智利——不断发生的反革命政变。

94

在革命进程中限制政治自由的必然性曾经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我们看到,它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革命进程的存在。但同时它也包含着许多危险性和消极的东西。假如没有清楚地看到这

些危险性和消极的东西,就像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那样,那么它们就会妨碍这一革命迈出的决定性的历史步伐,就会阻碍这一革命,使它倒退到革命初期已被消除的那种结构和社会经济关系上去。

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经验使我们可以看到唯一能够阻止复辟的是哪些进程,这里我们且不谈对人类在自身解放中已取得的最基本人权和个性施加的暴力和破坏。第一个措施是不断地保证和扩大内部民主。在其他党里没有合法反对派的这种社会制度都必须有内外通气管道,使得在一个组织里长期积存的全部政治气体排放出来。内部民主关系即自由、宪法绝对保证的争论和批评的自由、允许组织里的成员处于少数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到底、当有这种行为时保证不作任何人事处置、有向公众发表自己观点并付诸讨论的自由,特别是在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前夕提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时——这一切措施都应严格保留,以弥补缺乏来自其他一些政治组织的有组织批评的不足。

恩格斯曾写道,批评是一个工人党的生命要素,它不能仅限于对工人党的政敌,而且对工人党自身更重要。社会主义的讨论,即关于革命的每一步骤的不断争论——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因而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和全民的讨论,都是一个健康的、顺利的和人道的革命进程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希望人民成为真正的自治者的话。当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失误,但不需要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在官僚化关系中这些力量对这些失误负有责任)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来压制自己队伍中出现的不满情绪。如果认识到并相信失误是共同造成的,那么就更能理解和原谅它们。

在没有这种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的情况下——所有无私地参与一个社会主义进程的人都有批评权——党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依赖一小批领导者,不但愈加垄断政治决策权,而且愈加垄断社会生活所有其他领域中的裁决权;党建立了不好的选拔干部制度,这种制度加剧了上述进程,而使经济和政治异化的形态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

重要领域中确立并越来越加强。总而言之,斯大林主义的党就是由于具有这样的结构,以致从一个有很宽思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十分发达的内部民主制的列宁主义党,逐渐变成了一个没有能力使社会主义进程继续发展和加深的党。

然而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唯一的方面。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和任务,我们可以补充说,每个彻底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作用和任务,不是建立自己的党的统治并使之永久化。正如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建立国家主义关系即实质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交替掌权和对群众进行管理。重要的、自身是生气勃勃的、运动的目标,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不仅有个人发展的同样机会,而且每个人都有可能尽量直接地管理自己的全部劳动过程和社会过程。在逐步实现自治关系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中——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最终都将是自己人类历史存在的一部分和生产者——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社会管理并消除对人的政治管理的思想。显然,将被有不同的活动和目标的其他某些社会组织所代替的这样的政党的历史界限就在于此。

96

这些进程是当代最深刻的民主进程。关于这些进程在本书中还有很多机会谈到。如果共产党或社会党不是从自己开始掌权之时就推动这种民主进程,那么当代的整个民主制度就会停留在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有限范围之内。在迄今的历史时期中对这种民主不应低估。所有这些党在这些进程中(这些党都能够把握这些进程)都有其通往正确历史方向的重要历史背景。历史的交叉口是各式各样的,但只有这个路口上写着:通向共产主义之路。

既然这些进程都是深刻而重要的社会经济的民主进程,都是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基本目标,那么自己推动了这种进程的党当然不能让自己的结构和职能在民主性方面落后于这些进程。本身不民主的党不能成为这种深刻民主发展路线的主角。由此可能产生的冲突

要比政治领域内的任何冲突深刻得多和关键得多。

97 由此可见,在我眼前展现的是迄今历史实践中和主要是欧洲条件下的不发达状况。如果在有着强大工人运动和伟大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在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期就实现了高度发达水平和高度阶级觉悟,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就有管理经验而现在又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某些经验的国家里,这些进程将会无痛苦地、更民主地展开,不会发生过去发生的那种惶惑不安,这一点我就不想特别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作用肯定也会不一样,而政治领域的统治从一开始也会弱得多。无疑地,在夺取政权仅仅是社会主义进程开始的地方,和在某些进程已经发生的地方,情况应当是不同的。

我们看到,斯大林及其帮派并没有看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20年代末,特别是30年代初,党内民主的最后余留部分都消失了。不仅在党的队伍里取缔了任何严肃的、公开的争论,不仅党完全屈从于中央的指示,而且党员都遭受斯大林的警察恐怖和专制迫害。操在斯大林手中的这个党不但没有使表现为工人监督和工人自治形式的、已开始了的社会主义进程延续下去,而且还干脆把最后一点社会主义观念都扔进历史复辟的大货车。这样的党就丧失了列宁时期那些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革命的共产党所具有的特征的一切因素,尽管在列宁时期也有过失误和无法进行重大变革的困难形势。列宁的党虽然当时没有成为各方面的榜样,却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吸引人的政党。相反,在斯大林的党干了这么多丑事后,还自称为共产党,那至少是和历史开了个玩笑。共产主义是极为崇高的思想,共产党的实践远比斯大林主义者能够想象的、反共的资产阶级敌人能够承认的人道得多。今天对资产阶级辩护士来说,宣布斯大林主义党为共产党,宣布斯大林主义制度为共产主义,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那样就可以表明他们那套思想和实践有优越性。

今天进步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彻底打破这个历史神话,它就像历史上的一切神话一样神气活现,束缚

着进步力量。打破这个历史神话不仅是为了某些抽象的历史真理,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历史未来。

在上述全部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感到伤脑筋的是:如何给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它实质上代表的各阶层下定义。只要我们看一看工人阶级仍处在雇佣关系中,没有可能管理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生产过程,就会完全明白,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党不是处在非统治地位的阶层和阶级的党。这个党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是官僚化的党,这个党在这个制度下按其实际权力和决定权已达到了顶峰。

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从潘涅库克、吕勒、托洛茨基、里齐到当今一辈杰出人物,几十年来在评价这一官僚阶层时,偏重于评价它是阶级还是集团。我认为,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下,在力图给这一制度下定义时我们不应该盯住呆板的既定范畴,因为我们能够指出,这是一个有着许多特点的社会,这些特点在它的今后发展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未能概括斯大林主义的特征,如同国家资本主义不能阐明阶级概念一样。如果一个阶级的成员在自己的生存中是如此脆弱,以致自己的生命都取决于一位专制独裁书记(我指的是全体享有特权的官僚和专家治国论者)的恩赐,那算得是什么阶级?我们同样看到,上层本身也没有比较明显的稳定性,而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以致在观点上、政治态度上和对内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这些都是这个统治机构的特征。这个统治机构不是仅仅维护自己的社会特权,因为它不同于统治阶级的是,这些特权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因而也是有限得多的。这些阶层还有一个欲望,那就是实现一个完全革命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自己的全部生存都献给世界革命运动的愿望和潮流,这对这一领导阶层的思想和行为不能没有任何反响和后果。天天向苏联人灌输《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国家与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其他许多积极的和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不引起内部反响和早已存在的企求,不

当然,苏联的整个官僚阶层就其社会地位和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职能而言,是充当着统治阶级的角色的。就是这个阶层同阶级(这里指统治阶级)的概念唯一相近或类似之处,而且相似的程度还不小。这个阶级在生产体制中有一定的地位,同时支配着全部剩余价值。这些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和特权!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这里说的不是历史上具有固定含义的阶级,因此同这些阶层的前途和命运相关的解决办法和发展过程是绝不能用简单线条来描绘的。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由于他们迄今还竭力保持的这种世界地位和作用,他们是有可能在解决内部问题中努力改变方针,以使整个制度接近社会主义原则的,而一旦他们完全失去这一作用,对他们和其他一些人也许是灾难。不应忘记,这样的制度是在社会主义最偏僻的院落里建立的,并且从未进行过导致某种即使不是社会主义的进步方向的其他任何社会经济改革。统治阶层或者不得不按照他们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方向(不管是什么形式)解决内外矛盾,或者不得不最终抛弃马克思主义,并向整个革命的和进步的世界宣布,他们是统治的和剥削的阶级,他们不打算不经过斗争就让位。

我认为,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由于十分庞杂的关系和结构,也由于不了解能够促使这种或那种可能性实现的许多未来历史现象,今天对于斯大林主义的结局究竟如何一点儿也说不准。正如托洛茨基和许多托洛茨基分子认为的那样,我认为由于多种原因,根本不能期望工人阶级起来革命。首先,现行的制度在近几十年里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没有起来革命,所以苏联的工人阶级也不会这样做。另一方面,苏联工人阶级甚至没有组织自由工会的任何可能性,更不用说组织自己的政治组织的可能性,而这是进行成功的革命的重要前提之一。如果社会越来越民主化,而这是很可能的,那么无论是工人阶级或是其他进步集团都不会被迫进行古典的革命。

并非那么不可信的实际可能性是:僵化的、不民主的官僚机构在

与同样性质的军事机构勾结下也许会更长期地存在,在同世界上进步运动发生各种可能的冲突下最终作为统治的阶级巩固下来,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前所未有的状况,从而打破当代一切统治力量的平衡。

同样地,正如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在统治阶层内部最终找到一种力量,它不会轻易克服明显的矛盾,如言行的不一和理论脱离实际,因为实际情况必然孕育着一系列内部缺陷、危机局势、生产落后和知识界的不满情绪等。在这种制度下政治领域迄今一直完全占统治地位,所有动力都是来自,今后长时期内仍将来自这一领域。例如在南斯拉夫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进程也曾经来自这一政治领域。而在苏联,赫鲁晓夫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迈出了有意义的第一步,它必将有机会继续下去,或者起码是历史上合乎逻辑地继续下去。同样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发达条件下,杜布切克(A. Dubček)及其思想同路人成功地开始了内部民主化的进程,这是进一步非中央集权化的重要前提,在捷克人民和斯洛伐克人民的意识中永远不会磨灭,他们每当想到1968年对他们的政治暴行时总会感到心里发抖。

只有了解斯大林主义体制下政治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才能够正确地想象所发生的进程而不至于陷入历史浪漫主义。鉴于斯大林主义世界(这个词本身变得越来越令人厌恶)面对的不仅是有越来越发达的基本公民自由的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而且面对的还有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从资产阶级世界中历史地建立的自由出发,不断地同在斯大林主义或官僚-国家社会主义权力制度(自称为现实社会主义)下不尊重这些自由的做法进行斗争。上述积极进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进步人类的极大希望。

三、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对任何理论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不能不对产生这一现

象的历史全局进行分析。既然应从历史全局来研究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从方法论上说这起码是最正确的做法——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但很少有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点——那就应该在研究历史上每一个重要思想和意识形态时坚持根本的原则。之所以比较难于坚持这一点,往往是因为一些传统习惯,即只提出某些理论现象,而没有指出其历史根源、根基和决定性因素,为此需要克服这种传统的片面性,抓住并深入了解人类历史实践的其他方面。

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合著中最成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书中写道,意识无非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бытие)^①,而存在就是人们自己的实际历史生活本身。在人的实际历史行动和关于这一行动的思想之间当然不仅存在紧密的联系,而且存在着不间断的联系。二者缺一是不可想象的。一定历史行动的所有代表人物,不管是直接参与者还是思想家,都认为这是自己的历史行动,并努力为它辩护。同样不可思议的情况是:某人把自己的历史活动和自己的历史斗争建立在违背和否定该历史参与本身的理论提法和思想之上,今天这一斗争至少是伴随着对个人、集团和整个阶级施行暴力。如果有人以某种思想和人物,即一定历史思想的创始人的名义实行这种历史参与,那么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就会为这种思想找到符合新的历史情况,总而言之符合作为该思想组成部分的新历史现状的解释并加以改变。

基督教的全部历史基本上就是对新的历史结构的适应,而那些力图坚持最初原则的人往往坏在自己的“思想同路人”手里,因为后者很懂得使自己的说法和做法同新的历史条件和利益相适应。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所有重大理论体系的拥护者也有这样的历史遭遇。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黑格尔的解释本来不存在那么大的差别,只是某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译者注

些解释者在自己的思想深度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其实这首先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而不是个人的原因,这不仅是理解的,而且是有必要的。上世纪40年代激进的社会力量代表强调黑格尔著作中完全不同的、批判的东西,而有别于不反对现存一切的力量,更不用说不同于后来资产阶级哲学教授们对黑格尔思想的“复兴”(renesans)了。他们由于其特权社会地位,不能像马克思和其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内容,而只能强调其逻辑推理(dedukcija)的伟大和自成体系以及美学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作为历史上最卓越的思想,当然也无法避免同样的或相似的命运。这一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进步的革命力量在试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来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或资本主义前期世界时,遇到的情况不但是不相同的,而且有时是完全相反的。此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依据的各个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不单是从每个国家的不同历史传统、经验、社会经济关系和结构出发,而且由于自己处于特定的情况下不得不依照这些情况使自己多少发生变化。列宁从一个在欧洲条件下是落后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来考虑自己的历史实践,在这个制度下存在着反动的封建专制并带着刚走上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困难、激烈矛盾和无人道行为,而这时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已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适应于发达得多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不但有合法的组织,而且有自己的学校、报刊和议员等。在后一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和革命的锋芒变得越来越钝了,当一场革命形势席卷了他们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必然要发生急剧变化,并作出能够为这种失败和一个历史机会主义作辩护的解释。当时修正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此——从伯恩斯坦(E. Bernstein)抛弃辩证法,到考茨基提出民主思想和用改良主义政策代替革命政策。革命政策当然不会抛弃改革。如同迄今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改良主义政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如何不应绝对化的实践绝对化了,尤其在充满矛

盾、紧张、前景不明的时候。这样的改良主义实践必然从理论上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范畴诸如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等作任意的解释。那些想给这一切提供更广泛哲学理念的人自然不得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最富批判性的部分——他们独特的唯物辩证法面前退却。从伯恩施坦、沃尔特曼(L. Woltmann)、施米特(C. Schmidt)到后来的考茨基、希法亭、鲍威尔(O. Bauer)或阿德勒(M. Adler)等主要人物的思想史,只有从一个转向改良主义立场的政治运动的全貌来观察才能理解,而这个运动是在欧洲一度发达的情况下,由于改良主义者一时的绝对化而迅速产生,并以他们自己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为基础而在历史上完全确立起来的。此后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另一方面有一个党成功地用革命的方法解决所出现的革命形势时。

104 在斯大林时期发生了类似进程,只不过还有一个差别,即主要的思想家恰巧也是主要的政治家,其文化和哲学观点与他们向自己提出的目标根本不相符。我们在前面已说明,斯大林自己是怎样逐渐变成斯大林其人的。由于他不仅掌权,而且把政治上层一切重大决定和处理事务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这就不难想到,他可以成为不仅是政治领域而且是一切重要理论领域的裁决者。这是具备欧洲文化视野的天才的列宁未曾想到的。与此相反,斯大林在其权力达到顶峰时却想到他可以在文化的所有重要领域实行裁决。可是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复杂道路对斯大林来说都是陌生的,他没有任何感觉与必要的经验或素养,能使他理解什么是艺术创作或科学创作与哲学创作。虽然我们今天懂得,这种做法不但是幼稚的,而且是某种庸俗的表现,但不管怎样,这种行为却成了共产党官僚的范例。他们手中握有新闻手段,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各媒体,把自己肤浅而粗劣的实用主义思想强加给整个文化创作领域。政治书记们负责抓这些问题,从日丹诺夫(A. A. Ždanov)直到其下级,都对如何写哲学史、如何创作艺术或音乐作品,作出了“鉴赏家的”评价。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行为

和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欧洲的最优秀的传统,这种传统根本反对任何对文化艺术创作的检查或指挥。

然而,这一切现象当中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在建设他那个具有彻底国家资本主义一切重要特征的、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其他生活领域拥有无限权力的、国家和党所垄断的制度时,作为社会主义动机和方向的最先继承者,认为应该给自己的事业提供适当的理论阐述和理论依据。我们已经阐述了这一制度的产生过程,所以不必回过头来再谈这个问题。合乎逻辑的是,斯大林必须为他所建立的制度创立意识形态。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的制度中有一部分同工人运动中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国家所有制和国家计划生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解决办法的某些观点是一致的。这些思想在俄国和苏联群众中是很普遍的,因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把国家和领袖偶像化的落后阶级意识的表现。这个国家既是从一个光辉革命中诞生的,又有着列宁时期就存在的这样一支革命队伍,就很难立即看出,这个国家已蜕变为对自己群众的专政,而丧失了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特征。一个实行官僚管理和操纵的主角和大师,一个比自己的对手更善于利用一切政治夺权斗争方法(这些方法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看来,都应送进旧物博物馆)的人物,是比较难于看到并承认这一点的。这样就产生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按照这一思想缔造了一个没有更大内部矛盾的闭关自守的制度,一个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后者经过一定时期也必然变成国家所有制)的制度,一个国家计划和国家仲裁的制度。在这样一个新的、完整的利维坦(Levijatan)^①政体下,不但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劳动过程和自己的命运作出决定,而且每一个人都被归结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并受到国家制度的任意支配。这样一个利维坦政体成了多少人为之献出自己力量和生命的社会主义社

105

^① Levijatan(Leviathan),《圣经》中所说的海中怪兽,著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于1651年发表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一书用利维坦指谓强势的国家,因此现在一般用利维坦意指有庞大官僚机构的极权主义国家。——译者注

会的伟大思想的同义词。

如果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回忆一下恩格斯怎样再三告诫自己的德国同志们说,党的纲领应该明确地同所谓由国家代替私有者把对劳动者的经济奴役和政治奴役权集中于一人之手的国家社会主义划清界限,那么我们会看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按另一条路线发展的,而同马克思的思想无关。

斯大林把这样的国家宣布为工人的国家,把集中全部权力于国家手中的思想宣布为实现了被奴役人类的希望和愿望的社会主义,于是斯大林使用自己典型的苍白乏力的意识形态赋予这个国家以另一些标签和特征,而这些标签和特征也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斯大林未能想到他的这一伟大事业必将灭亡!似乎它不但是社会主义和苏联新社会关系的保障,而且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胜利的保障!由于只相信他绝对统治的国家和党的机制,他在思想上未能迈出自己实践的一步。他不能想象,工人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进一步解放进程不是仅仅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把全部权力转移到政治领域来实现的,因为在这一结构中权力还是脱离生产者的。斯大林不能想象,在国家官僚关系下,他和他的官僚阶层变成了新剥削者,而且比他以前的任何阶级或任何个人都拥有更大的权力。尽管他当时高居自己的统治地位,但他还是缺少精密的马克思主义量具来深入分析在他的专政下形成的社会实际。因为如果使用这种方法论的工具,很快就会作出批评性的结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解放,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自己逐渐成为自己劳动过程和社会关系的管理者的地方才能实现,而恩格斯和列宁宣布国家消亡,则是这一新历史进程的重要的另一面。由于实现了把国家变成包罗万象的东西的这一完全反其道而行的社会进程和制度,斯大林必然会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强化国家而不应使之消亡。这一种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没有关联,而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但它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理论思想及其思想家那里却仍然吃得开,这些思想家活

动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和要求之间的边缘地带。

一个谬误产生另一个谬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确实是必然的。那些维护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论点相违背的制度的思想家,必然要陷入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之中,但他们却在无数没有创造性的刊物和政治文件中冠冕堂皇地、不厌其烦地和形式主义地重复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理想如果是完美的,它就不应该有内部矛盾。斯大林不承认在生产关系中的辩证矛盾,他宣布他所领导的社会,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之间达到了内部和谐。这又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它产生于这样一种思想意识,即认为可以由国家—党的中心按计划指导社会发展,以避免基本社会因素发展之间发生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这种对基本社会关系作非辩证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必然要在对该社会发展作解释时产生更加非马克思主义的后果。斯大林思想的代表人物日丹诺夫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矛盾的统一和斗争,所以不得不从他们建成的和谐社会主义中寻找这个辩证的矛盾。因而斯大林在40年代就有了重大的理论发现,当时他在哲学战线的争论中,在编写哲学史方面教训了亚历山大洛夫(G. F. Aleksandrov)等人,宣布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新社会的新动力,为新的辩证规律,就好像历史上从未有过批评和争论,就好像在迄今许多历史时期中这种批评、思想斗争远不如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那样得到开展和对社会进程那么有决定意义。这种批评是专供党和国家上层用的、由它来规定度量的。此外,斯大林主义的这种庸俗之谈也完全违背对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和辩证法看作自己社会发展的基础。

107

我们应该把这种理论思想称为斯大林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尽管它企望,甚至有信心使这一理论思想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表现。这种理论思想的产生可以作为例子,来进一步表明马

108 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即意识是社会存在,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是历史社会总体的部分而不是表现,并且是其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总是考虑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今天,某种社会制度或社会进程的任何一个代表人物,在他所代表或置身其中的历史力量面前表明自己的打算时,都不能回避为自己历史事业表白和辩护的必要性。斯大林走到了如此地步,以致彻底消灭了列宁时期产生的实际社会主义进程的一切重要东西,粗暴地取消了工人监督和自治的一切形式,取消了作为新历史关系中重要因素的社会主义直接民主形式,这时他就不得不以自己的国家—官僚主义精神,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政治领域专政。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所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工人阶级的直接权力,它有两个基本任务,即保障这一权力以防范反革命的一切企图和通过实现生产者自治建立广泛而深刻的民主,而这只能意味着政权必须消亡。斯大林却把自己的社会行动搬进理论领域,把无产阶级专政描绘成和他的实践一样,并把它神秘化。这一切直到今天在这种制度下一直未变,其表现为:只要是由称为共产党的党管理,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被宣布为工人国家。我们在分析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问题时已经看到,这根本就不应该成为真理。这个党可以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完全排斥于政权和社会管理之外,而成为官僚化的党,并利用专政来压制一切来自工人队伍或来自以马克思主义精神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抗、期望或企求。特别是在今天,在总结了所有经验之后,我们可以说,按斯大林的想法,专政这个概念就成了对不管以什么方式反对他的观点的所有社会阶层和个人实行恐怖统治的口实。专政的概念曾经是一个挡箭牌,在它的后面隐藏着东方式的司空见惯的专制独裁。今天斯大林主义恐怖以及各种法西斯恐怖,已使原本的、含义深刻得多的专政概念与恐怖和不民主的概念等同起来。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斯大林主义思想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贴上了“工人”标签的国家和党的专政。斯大林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越来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越来越扩大工人管理自己的生产进程和政治领域本身的权利,越来越扩大其他公民的自由和实现作为整个共同体自由发展的前提的个人自由发展。斯大林不顾真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些根本目标,在他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被归结为独裁和建立政治领域的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畸形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风尚,如同在当代其他政治权力绝对化的,比如法西斯主义的政权下所产生的那样。

109

所以,按斯大林解释的社会主义思想,获得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定义。如果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应把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解为这样一个过渡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在发展基于对生产过程、积累、分配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共产主义新形式与力图逐渐消灭这些新形式的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和紧张关系。可是斯大林不是这样理解,而是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基础上和党的领导下,确切地说是在党的上层领导下,把自己的实践提到政治领域的原则高度而实行绝对统治,并宣称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这样一来,迄今仍是重要政治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做法只会被保留下来,而不会被淘汰。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关系、阶级和阶层的差距,乃至工人阶级的雇佣关系,都没有因此而被消除或者处于被消除的过程,反而仍然被保存了下来。因此,斯大林按其行事和统治方式来说,仍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时代。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里,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道德,在权力斗争中允许使用一切手段,从马基雅维利给意大利公爵的书信和俄国沙皇的行为,到现代对整个民族实行恐怖的种族灭绝。如果说有人因此颂扬他,那只有为整个资产阶级时代辩护的历史学家才会这样做。

斯大林的不断膨胀的理论野心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建立一个全面垄断制度的同时,必然一步步地把其他一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

囊括到其统一的制度中,因为任何其他领域,特别是哲学和理论领域,都会很容易给这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制度带来麻烦。在干预当时机械论者和德波林派(deborinac)之间的理论争论的同时,斯大林开始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致命的新做法。当党组织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时——当然这也是党的相关方面——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变成了对所有其他问题的裁决者。所以,早在30年代初党中央就通过了关于创办《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并指示哲学家应该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把德波林派定性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并以此对哲学争论作出政治评价和鉴定,而这一哲学争论既不应被说成这个样子,也同这种评价没有任何关联。从那时起直至今日,他们一直无休止地、不厌其烦地和轻率地给人们乱扣帽子。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努力和成果,只要有不同于至今还一直被当作衡量马克思主义的准绳的苏联官方的看法,就要被宣布为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左的或右的修正主义等等。然而这只能说明苏联官方哲学没有能力同那些过去和现在都向世界表述自己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其他思想家进行专业的和创造性的对话。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理论辩护士炮制了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文章,正如萨特正确地指出的,他们都不敢超出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规定的界限。我们不会忘记这是以非马克思主义态度探讨理论发展的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说,这甚至是同这种理论发展中健康的资产阶级思想背道而驰的。

当斯大林消灭理论上的对手并在审讯过程中用行政手段和警察方法来消灭其中某些人时,他还认为必须从哲学上为自己的历史事业奠定基础。我们已经说过,斯大林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文化和哲学修养。但是他的党内官僚和哲学官僚把他宣布为第四位经典作家,自然而然他也就留下了一批经典理论著作。他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被编入《联共(布)党史》,成为该书的第四章,并

且作为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科书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推荐。这篇论著已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我本人的多次批判,这里不想细谈和重复已说过的许多东西。但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出发,对这篇论著的全部思想批判性地谈谈。我们在本书最后几章还有机会谈到。

我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一个被看作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来说,最根本的一点,是对自己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情况不要丧失批判的态度,不要丧失揭示辩证矛盾的思想,而必须从使人进一步摆脱妨碍其克服重要政治经济形式的任何机构与存在相脱离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这种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坦率的、批判的思想,也是反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实质。斯大林从根本上说不是辩证的思想家,而是形式逻辑的和理智健全的(zdravorazumski)思想家;而在理论方面,特别是哲学方面所谓理智健全的思想家总是坏参谋。对于整个文化创作领域也可以这么说。在有些人看来合胃口或明确的东西离艺术真理很远,而在有些人看来不明确和不可理解的东西离谬误也很远。这基本上就是理智健全的准绳,今天官僚主义批评家把它当作基本的准绳,但却是错误的准绳。整个现代派艺术不是因此而被宣布为颓废的吗?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了。

同样,一个所谓理智健全的推理也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真理、唯物辩证法真理的。这种推理的流程如下: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国有化;党的权力就是工人阶级的权力;这种制度下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支配积累与扩大再生产也就是社会主义;既然是社会主义,那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也就获得了解放;因此不存在任何政治异化或经济异化,即任何雇佣关系,不存在统治工人阶级的权力和任何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神秘化;最后理智健全者就可以在30年代末在宪法中宣告,在那里已建立了当代最自由的社会。可是就是那个时候,苏联最优秀的共产党人在斯大林官僚的屠刀下掉了脑袋。假如有人伸出大拇指夸它是共产主义,那么以下

事实便最好地驳斥了他：这一制度首先消灭的是最优秀、最聪明和最有文化的共产党人。

112 这种理智健全的、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同深刻的辩证方法毫不相干，连唯心的黑格尔辩证方法都与之无关，更不用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工具是细致的、富有批判性的，也可以说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因为它是反意识形态化的。斯大林的理智健全的野心是，提出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应是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它应使党和知识界、国家官僚和技术官僚的新干部稳固地掌握那些为他们的历史实践和历史事业牢牢奠定基础的哲学体系和方法。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必要从思想上为自己的实践辩护并为它奠定基础。这一实践不但必须有理论基础，而且还要有哲学的，几乎是装饰门面的需要。斯大林阐述的辩证法体系是这样一种客观规律体系，在这一体系内必须把自己的历史置于其中。正因为这样，他必然要抛弃那些触痛他并给他造成麻烦的重要辩证法范畴。斯大林由于缺乏一种坦率的和批判的辩证法思想，首先是缺乏并非简单地反映一般辩证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因此把早在黑格尔时代和恩格斯时代就已知晓的一些规律和条条绝对化。他根本没有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能这样简单地归纳为几条。否定、概括、可能性、实践、未来、异化、人道等范畴在这一体系中没有地位。之所以没有地位，是因为如果运用其方法，就会暴露斯大林制度下的内部矛盾和克服这些矛盾的必要性。彻底地提出唯物辩证法，必然会提出一些进步的因素，即共产主义的萌芽，这就是辩证地否定已建立的社会关系、政治领域统治和异化的某些新形式。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不是自生的，而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正因为它应该发展新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是对这个第一阶段之否定，而且是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之否定。对第一阶段的这种辩证的

否定,不可能是以其职能仍属于旧的政治传统的范围,诸如国家、党等为依据的。这是斯大林主义从光辉的革命开始以来遗留下的唯一的東西。彻底运用上述马克思主义范畴,首先是自由的和批判的方法论,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新建立的社会关系的重大缺陷,从而震撼这个被夸耀为已建成社会主义的整个大厦。

113

斯大林非辩证地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割开来,这一点早已受到批判,甚至在阵营内部也受到纠正。但这一点之所以产生深远的后果,就在于它同有关哲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相脱离。在处理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时,斯大林由于自己的哲学素养、自己的地位和欲望,无法理解马克思在他的《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作的具有重大意义转变的深刻意义。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实践从思想上根本地克服了长期以来的这种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是哲学界经常关心的问题,而卢卡奇在他的早期论著中特别明确地指出,这种两重性来源于社会存在的两重性,这种观点也是反教条和反意识形态化的。斯大林在其占统治的政治地位上必须有“可靠的”温度表。斯大林一手培植起来的制度及其变革的真正主体,必然坚信,他的实践和他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之前的理论,甚至是古希腊的认识论,它是一种最典型地表达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的重新分离,以及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重新分离的观点。因此,斯大林和党似乎总是掌握着绝对真理,因为他们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总是反映真实的历史规律,然后对所出现的问题提出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在这一思想进程中,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从理论上考虑并描绘了自己的历史实践,反之,他们又按当时形成的思想来描绘同一个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致,但不是因为理论和实践都是正确的,所以两者是一致的,而是因为任何其他实践、任何其他理论都被禁锢了。通过自由的、批判性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及对整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很快地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进程,它只不过是考虑和描绘一个颠倒了的、违背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并为

它辩护。哲学的反映论太简洁,不足以说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全部。

114 大家知道,列宁在同经验批判论者的争论中非常坚决地维护反映论。原因之一肯定是:他首先大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面,另一个原因是他本人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的深刻意义,这是当时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然而,列宁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共产主义者行为的普遍准则,而是坦率地、批判性地进行各种探讨。他不像斯大林那样在理论的辩证发展范围中宣布四条辩证法,并反映在他后来的所有著作和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中,而是在自己的笔记中力求列举辩证法的所有因素——他列举了十五条^①——以便更有能力去分析诸如当代历史关系、冲突、力量的对比和制度的各种变迁等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

假如有人认为应该把斯大林的哲学思想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不能否认斯大林本人相信这一点,从内容上看也可以找到很多东西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摘引来的,那就必须再次强调我们曾力求简要地指出的东西,即斯大林缺乏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精神。斯大林不但缺乏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不可缺少的某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而且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是否有人愿意把它叫作修正主义,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不喜欢使用这种陈词滥调的和十分糟糕的说法。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是斯大林设计的和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已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坦率的、批判性的和非教条的。它之所以是革命的,因为它是批判性的,它正如马克思早就说过的那样,在一切现存制度中揭示其灭亡的征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范畴是丰富多彩的,它们总是力求把历史看成发展的整体因而具有认识

^①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概括辩证法的要素时先是列举了十六条,后又在第八条上打了一个叉,因此弗兰尼茨基认为列宁提炼了十五条辩证法的要素。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1页。——译者注

上的系统性,这些对斯大林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马克思主义比斯大林的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床^①长出很多,因而斯大林不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脚而且把它的一部分头切掉了!

^① 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床,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洛克路斯忒斯为旅客设置的床,如身长于床,削其足,如身短于床,则强拉其身。——译者注

第四章 社会主义

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问题比斯大林的官僚主义理解和想象要复杂得多和微妙得多。我们可以说,从令人神往的十月革命直至今日,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争论不断地吸引着进步思想家和进步阶层的思想。在下面就某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时将谈到这场争论。这些重大问题之一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包括两个不同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和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革命的武装阶段结束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一百多年来在欧洲社会主义论坛上关于这个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提法,并未包括整个命题。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围绕夺取政权问题(革命这个概念也往往被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曾发生很大的争论,而由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情况起了很大变化,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新的难题。在其他问题上应该说也是这种情况,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给一部分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走出这些争论是

很不容易的,而在这场争论中历史无疑还将遇到许多戏剧性的场面。

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指出在所有这些讨论中的某些分歧,这些分歧虽不常发生,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深知创始人理论原著的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固有的分歧。关于革命的哲学 - 历史学思想体现出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的实质,但这一思想和实现或推动这样一个历史变革的方式和道路是有所不同的。革命首先是根本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关系能够解决旧政权制度和社会关系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而不管这个革命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不管它是激烈的、暴力的和武装的,还是渐进的、通过和平的议会方式或以其他某种方式实现的。

11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面临着解决被奴役人类的长远梦想问题,即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彻底变革、对资产阶级世界和阶级社会的整个时代的否定,以及建立没有各种政治的、官僚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历史代理人的新人道社会。这里不必特别强调指出,他们的这一思想不仅仅来源于抽象的理论思维,而且首先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世界矛盾的分析,来源于探讨无产阶级对这个社会的实质性的阶级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工人阶级的解放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实现作为新人道基础的新社会关系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细谈。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掌握了实行这一历史变革,实现这一划时代历史性创举的方法,即把迄今剥削、压迫、不平等、暴力、无望的社会关系即人的全面异化的社会关系改变成消除这些结构和建立其基本方向是消灭阶级和上述一切现象的新关系的方法,才依据对当时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暴力的变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还了解到,他们并不是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暴力措施、武装手段或其他手段的狂热鼓吹者。可是,上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现实、工人阶级极其困难的状况、资产阶级的不妥协性、工人阶级进一步贫困化的趋向、不断发生的周期性危机、工人阶级为争取改善起码的生活和劳动

117 条件而斗争的十分艰苦的条件等,这一切使他们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暴力是新制度的产婆。不过他们懂得要声明一点:不能把这一观点绝对化。在后期恩格斯关于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德国无产阶级开展斗争的可能性的评价中,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暴力变革必要性的思想比起其他思想占更主导的地位和强烈得多。

由于同样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当时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很不利和很不民主的条件,列宁更加强调暴力变革的这一因素,这对当时的东欧情况来说是摆脱旧制度时代错误的唯一出路。如果我们看到20世纪初的俄国,特别是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局势,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许多欧洲国家的革命动荡,那么对于列宁最强调革命是暴力变革的观点,不是不可理解的。在当时阶级分化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胜利高潮之后,社会主义力量用其他手段和方式去争取胜利,看来是基本上不现实的和抽象的。

然而,创立关于革命是暴力的武装变革的理论,抛弃关于有可能用其他方法实现革命的任何其他思想并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正是斯大林主义者之所为。一个社会力量变成越来越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力量,它就越感到有必要用革命辞藻来美化自己。如果我们对前面提到的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特点作如下补充,即为了提高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威望,为了在自己队伍中进行宣传,也由于缺乏对辩证思维方法的实质的更深刻了解,他们把自己的实践和经验绝对化了,那么我们就能把斯大林主义关于在革命问题上除暴力外摒弃任何其他手段的理论观点搞清楚了。

118 本世纪头20年的欧洲经验,使得比斯大林高明的其他布尔什维克理论家按以下公式理解革命进程:从意识形态革命到政治革命即夺取政权,再到经济和社会变革,最后到技术和文化变革。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接受在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和改造的思想和提法,以及在这种结构内部资本主义本身也将起变化并经历着使资本主

义也接近某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内部变化的想法。历史否定了这种思想,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尽管有许多变化,却表现得比所想象的更有生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即革命导致了上述这些成功的阶段的实现,并且成为新政权和新社会制度的特征。

在本书的其他地方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些新情况。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把关于暴力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思想绝对化成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开始,只有斯大林一伙人才干得出来。俄国布尔什维克经常总结他们的经验,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认真地对待这些重大问题。斯大林以其非辩证的手法,在这个问题上使马克思主义神秘化,这对欧洲和世界的革命进程都产生了严重后果。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把苏联经验当作唯一成功的革命经验向其他共产主义运动实行意识形态灌输,从而使欧洲共产主义力量在一个时期里,无法沿着适合自己特殊情况的其他革命进程发展。

鉴于这些问题还没有退出理论争论和党内争论的论坛,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关于只有一条革命必经之路的思想是完全不符合辩证法的。斯大林在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篇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到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而这是对待现实和我们的思维的彻底辩证态度之一。斯大林不懂得如下思考和认识:一般规律或趋向不是抽象地、以单纯的形式,而没有同其他一系列专门的规律和特殊的情况发生关联和统一而出现和实现的;不能把个别情况和个别经验笼统地看作普遍规律或一般发展的东西,更不能形式主义地把它们宣布为一般的、合法的和普遍适用的,如同斯大林在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中所做的那样。尽管他对权力感兴趣,尽管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有地位和怀有野心,但一个高明的辩证法大师不能在理论方面降落到如此之低的水平,尤其是在论及历史的时候。历史是各种关系,民族影响和国际影响,人们的打算、利益和愿望交织的总和。在这各种事物的交织中,一定的社会规律只有在人有一定的看法和行动决心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而这些看法不一定总是最恰当地反映该历史情况的最大可能

性。只要我们举出各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在德国法西斯发动进攻前夕所作的评价和政策或斯大林在 30 年代对苏联所作的评价和实践这两个戏剧性历史错误的明显事例,就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上述这一点。

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统一的原有的辩证观点——我可以这样说,它在斯大林著作中根本未被提到——在历史方面有着更具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不但每一个历史时代是由某些一般的发展规律和趋向所决定的,例如我们的时代是由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所决定的,不但这个一般情况内部存在着许多特殊情况——一些国家由于有相似的结构和发展程度等而有着过渡到新社会结构的共同准则和斗争方法——而且历史进程的个别问题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但因为每个国家在社会关系结构、发达程度、历史传统、心理等方面有自己的某些突出特点和特征,这些特点和特征以不重复的方式决定着这些单个国家发展中的许多东西,而且因为历史中的个别现象包含着每个人物、人物的个性、不同人物之间不可能雷同的相称之处。这些不同的人以各自更深刻的见解、高超的分析和预测,更加清楚地观察一定时代或一定历史时期的可能性。既然这里指的不仅是思想上和理论上的能力,而且是作为人获得社会成功的前提的人的全部性格,所以我想,以为历史的每一斯芬克斯之谜都会及时找到俄狄浦斯^①,那至少是不可信的说法。确实,伟大而决定性的历史时代基本上会遇到合适的人物。但同样也有相反的情况:它至少会给历史哲学留下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的余地。

苏联的另一些理论家在斯大林的图式(shematizam)的影响下,力图借助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为了适应上述关于急剧地、迅速地,即用暴力武装(这种形式曾经是革命的同义词)推翻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思想,苏联理论家竭尽全力地证明这一

^① 俄狄浦斯(Oidipous),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能解明人生复杂难题的聪明人。——译者注

一切都是完全符合辩证法的。为此他们需要一个思想,即每一个物体都是由一个唯一的质和苏联人所固有的一系列其他特征决定的。由于质只能是在发生了许多小的量变之后发生突然而迅速的变化,因此有人认为找到了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定的质只有通过这样急剧革命的变化才能加以改变和消灭的辩证法依据。

然而,自然界和历史中的许多现象以及具有典型的长期过渡性质的许多进程是与此相反的,所以还应把革命变化本身看作是一系列小的急剧革命变化的长期过程。在考察和分析迄今每一个武装的社会主义革命时,可以看到:在实现了暴力的武装变革以后,并没有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许多结构仍处于保留旧关系的形式(如私有制的农民、商人和许多私人业主)中,直到今天也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根本任务,即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并不是由于夺取了政权而自动建立。

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和心理是由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百余年来锤炼出来的,而这个意识形态支配着思想活动的一切基本手段,从报刊、学校到各种教会,它们总是适应新产生的形势(虽有些变化,但基本上如此),是国民心理的重要支柱。对革命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的分析、对消除资产阶级结构和心理存在的问题及作出的努力所进行的分析向我们表明,夺取政权后革命势力面临的困难和任务要比夺取政权本身更艰巨、更复杂,为此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总之,这一切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仅仅是废除旧制度和用武装和暴力推翻旧政权,不是仅用新的旗号和新的社会主体来重建政治社会,或者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形态搬到新的形态中,即政治力量、政党和国家等权力形态中。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是改变劳动者,首先是作为主要生产者阶级的工人阶级长期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从历史客体变成历史主体,从被压迫、被剥削和低下阶层变成真正统治的阶层,并将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不仅仅是国有化来决定并指导自己历史生存的条件和内容。由于迄今的政治革命实际上先于其他一切革命

进程,因此上述使命从来没有因这一政治革命行动而立即产生,但作为整个历史时代的任务留存了下来。

关于一个质的思想无论如何不可能对历史上迄今发生的一切给予答案和作出说明。不但不能给予答案,而且掩盖了历史事件或使其神秘化。假如每一个社会都只是由其一个质来决定的,而这个质的变化当然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而只能是急剧革命的,那么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似乎通过这种唯一的历史革命行动就基本上解决了。由于十月革命后的状况、影响和原因,在苏联建立了一个政党的权力,这个党在那个时期之前确实是革命的共产党,因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许多俄国布尔什维克便根据对辩证法原则的上述解释,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是由这样一种情况决定的,即认为社会主义主要关心的事情仅仅是进一步加强由这个党和党治理下的国家所体现的政权。甚至后来剥夺了农民作为阶级的权利,其主要目的是使农民完全从属于国家计划,并依附于这个万能的政治领域。

122 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命运,同时也是这样理解的这一辩证思想的命运。从历史和理论角度看,两者都是太短暂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并没有通过历史性的十月革命的上述革命行动而实现,对辩证法规律的这种理解和解释也没有体现出历史发展趋向的真正辩证法。越来越深刻的分析使我们懂得,应当把作为历史“对象”的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社会结构理解为多质和多价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质决定另一些更深刻更重要的质,因而以往的每一个历史发展不但可以理解为一系列渐进的、逐步的变化,而且可以理解为一系列急剧的革命变化,而不管这些变化是以什么手段和方式进行的。一个社会的重要定义,它的质的确定性、质的特征同其他社会有许多共同点——由此我们的谈论可以回溯到远古时代的阶级社会、政治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历史时代——而仅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固有的其他个别特征,则是在以前的渐进的变化之后才发生急剧革命的改变。可是依然存在着一个问题:一定社会的哪些质在这些革命进程中发生变化,

而哪些没有发生变化。在欧洲国家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为一定社会的质,基本上是在封建的社会经济关系卵翼下建立起来的,而政权的质(消除这个质是大部分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只不过是这些社会更深刻的质变化进程的结局。因此,这类制度中的政治革命有时也以历史性的妥协而告终,是不足为奇的。

每一个社会都是多价的结构,任何革命进程都不会一下子改变社会的全部旧结构或一切旧的质(如果我们称之为质的话)。在欧洲,也可以说在世界上,迄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以革命夺取政权开始的,接着进行不同程度的国有化、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剥夺主要是大资产阶级的权力。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今后的社会主义进程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先决条件。但在社会的个别结构中有其基础的其他许多质,仍旧被保存了下来并构成了进步力量今后要完成的革命任务。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农民基本上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的。在商业和工业中往往还存在着小资本主义的结构。同时消除以国家和其他政治机构(党等)作为中介形式的政治社会和政治结构,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尽管这些新形式是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具有革命的性质。但是,如果把这些新形式看成贯穿于社会主义进程的始与终,那么这种革命性质很快就会消失。关于这一点后面还会细谈。必须在这里指出,仅仅确立新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政治社会革命的这一水平,仍然停留在我们称之为政治时期或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阶段范围内。在这个范围里,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是带有自己政治结构的阶级,在那里伴随经济异化的总是明显的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是:彻底超越政治社会的这个时代。

123

我们看到,革命作为对旧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更急剧、更迅速的改变,可以通过革命斗争的各种方式和各种方法,以各种阶段来进行。正如我们看到的,迄今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以政治革命开始的,因为都是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进行的,那里有着尖锐的内部矛盾,工人阶

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困苦状况,有着由于战争或抵抗入侵者的斗争造成的特殊历史条件。社会主义进一步变革的全部含义和历史任务摆到了革命力量的面前,成为他们的重大使命。然而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迄今在各国情况下各不相同的这一类型的革命变革(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等),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来说,是不会发生的、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或必定可行的。在这些国家中已开始了一种进程,这种进程标志着以前都是在革命夺取政权之后才发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不同程度的国有化、社会党或共产党掌握市政管理权、参与决策的各种形式,特别是在国有化工业企业中参与决策,等等。

124 从以上这些情况我们看到,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关于革命仅仅是武装和暴力摧毁旧政权的见解不但是不合乎辩证法的,而且提出如下问题也不是合乎辩证法的:要么就是这样理解的革命,要么就是消灭旧制度的和平演变过程。废除旧社会关系的任何历史进程即使不通过武装革命,也必须包含一系列内部的革命变革,而旧政权和旧关系的维护者总是要反抗的。同样,即使革命是以武装暴力阶段开始的,它也还要经历许多革命进程,才能废除旧的社会关系和建立社会主义关系,或者说得确切些,建立共产主义关系。

如果我们说的是在各社会党或共产党内一直拥有自己的政治先锋队的当今革命力量,那么它们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并用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就不应把自己的全部历史义务仅仅归结为单一的历史行动:或者进行武装革命,或者进行社会改造渐进过程的革命。历史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见的。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发动革命,是早已闻名的革命浪漫主义,各种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就常常这样做,共产党人也会这样做。可是,不利用革命形势去推动历史进程,那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没有利用革命形势的一个例子是1918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的事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党内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势力的影响下,认为革命只能停留在

抽象的改革上,所以直至今日仍受这种改良主义的束缚。这里必须稍微提一下辩证法(它主要是,起码在现代是德国的产物),并必须看到,任何改革,即一定结构和关系的任何逐渐的演变,在质的飞跃即这一结构变成新结构的革命变革方面应该有一定的界限。我们刚才说了,在历史发展中这种形势不能总是仅仅用投票、协议等民主手段来解决,而且还要用强制、镇压反抗的不民主手段,以对付务必要清除的不可避免的痉挛和社会动乱与紧张局势,假如我们认真地考虑根本社会变革的必要性,而不停留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结构内,而要消除这些结构的话。

125

可是究竟什么是革命形势,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作出评估的。尤其是在一个革命行动中有多少现实机会,是难以估计的,尽管早就很清楚,这一行动的数据是任何时候都无法估计的。但有一条规则仍然有效:许多东西要在行动中才能看清和作出评估,因为许多外来因素从来都是无法完全预见的。列宁所指的革命形势是统治阶级再也不能按老办法统治下去,而被压迫阶级再也不愿在旧制度下继续生活下去。列宁的这一定义肯定是普遍可以接受的。在欧洲,这种形势过去基本上都是在战争和战后状况下产生的,而在其他国家,则是由于专制和殖民奴役制度而产生的。在共产党官僚领导的东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形势是新的形势,因为在人民或者党内出现了一些力量,它们关心的是用真正社会主义的途径消除现存制度。可是,像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有可能揭开这些国家历史新篇章的美好愿望,一开始就被东欧集团的干涉窒息了。

作为革命力量主要任务的“夺取政权”的道路,过去和将来都是各种各样的,而基本的政治先锋力量甚至不一定必然是什么政党,即共产党或社会党。古巴的例子就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迄今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有革命的组织存在。今天欧洲在这方面发生的事态如果没有进步的、有组织的力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欧洲的群众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以致能够通过独自的行

126 动,或仅仅是自发的群众暴动,来推翻旧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关系,而用不着政治机构和国家机关介入。这当然是很好的理想和愿望,但是就是经历过许多政治斗争的欧洲人也还难以做到。这也是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潮,乃至其各种派系和新左派等在实践中失败和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他们正确批评和担心的事情是:政治形态很容易和几乎必然官僚化,而某些寡头政治原则会在政治形态中占统治地位,并很容易变成政权中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因素,从而实行一种令人不快的重大历史更替(supstitucija),结果是抛弃一切组织形式,遭到历史性失败。后面我们还会具体地看到,在革命的武装阶段结束后,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以及国家的问题也是这种情况。同样有道理的担心是:国家机构有可能变成凌驾于社会和工人阶级之上的机构,这一点不但在以往许多事件中发生过,而且正像我们看到的,有过激烈的、悲剧的形式。同样地,如果放弃年轻革命制度的任何国家形式,就等于把这一制度交给时刻妄想复辟旧制度的反动势力任意处置。在革命的这些关键问题上,直至今天还存在着难题。如果说无政府主义集团由于摒弃任何政治组织形式而未能走出历史死胡同,那么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由于它们过分突出自己,由于摒弃对这些问题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看法,以及把党、国家和领袖偶像化,也同样会陷入死胡同。这样就会使群众在政治上消极起来,不能发挥他们的极大热情,使社会主义实际进程前景渺茫。

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着有关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个问题,即革命的武装阶段结束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建设问题;迄今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已有先例,但这些形式不能都适用于未来所有情况,特别是不能适用于发达国家。可是在那些其许多结构进程和变革曾在旧社会卵翼下和多种政治形态中进行的发达国家里也能适用的东西,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今天至少形式上已接受了一条原则:由于各国情况的特殊性,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暂且用此提法)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进程还取决于许多历史情况,诸如革

命前社会的发达程度,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国际局势,特别是当今世界处于集团体系和有不结盟体系的国际局势,以及工人阶级和先进分子的经验等。今天同样很明确的是:在许多国家里,这些进程将同多党制、广泛的政治和文化民主一道展开,即在存在着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某种形式下展开。但是这些政治形式不管是否起进步的作用,仍然是中介的机构、强制的机构,即人的异化形态。因此,当我们谈到社会主义力量 and 社会主义目标时,是否有人把社会主义建设即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解为进一步加强政治社会的这些遗留形式(而这种形式在废除私有制体制时会以更糟糕的利维坦政体的形式强加给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还是把这条道路理解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劳动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总而言之,一个在当代历史争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根本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含义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127

二、社会主义的含义

(一) 基本的历史趋向

社会主义革命的迄今经验向我们最好地表明,对社会主义变革的含义持明确的理论观点有多么重要的意义。革命力量虽然面临着主要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及其阶级政治体制,但当它们剥夺了资产阶级后,看到领导新政权的是一直引导它们经历政治斗争的艰难险阻的自己的党和领袖时,就基本上满意了。尽管所有伟大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都十分懂得,不应当停止在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上。尽管新的政治结构开始时是革命的,但斯大林主义却把真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思想扔进了历史垃圾堆,而且在这种神秘化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中,又提出了新的阶段论。对此在后面还要详谈。

128

必须立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变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它之前的任何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历史地局限于仅仅消除它以前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按其历史意向,不仅肩负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和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务**,而且它也是废除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或政治社会的整个时期的开始。我们只能简要地给这一时期赋予以下特征:这些社会由于有众人皆知的阶级剥削现象,因而具有阶级性质,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关系、人格的堕落、利己主义,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剥夺他人劳动;人的生存赖以确立的**劳动**,成为纯粹维持生命的手段;以及把政治领域分离出来,使它们各自支配其他社会集团和主体;同时这些政治社会具有或多或少的极权性质,因而单纯追求一般的质量和数量的增长,以及支配大自然和人的欲望;最后是人对人、阶级对阶级、民族对民族的权力,形成典型的人格二重性的现象。所以这里说的是一个数世纪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形态以及思想异化形式不断更替。

当然,不是所有异化形式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都有同样的意义。迄今历史只能通过异化形式而不能通过别的形式发展。在一个时期里,在革命斗争和革命改造时期,新的异化形式,如资产阶级政权、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历史上曾经是进步的。这一点马克思早已指出过。但是正是这些异化的结构,在进一步发展中必然造成使人无法忍受的状况,造成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在这些形态中未能在不对某些人,首先是工人阶级或不发达民族和人民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求得解决。因此当我们在本书中进一步谈到异化时,必须考虑到对每个现象的这一历史性态度,不要仅仅因为指出这一现象按其结构是异化的,就放弃这种态度。社会主义也是以一定的异化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些形式也是异化的,但绝不因此减少其革命性。对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有这时才开始触及真正的问题和提出历史性的问题:是停留在这些形式上呢,还是接受这样的认识,即这些形式

既然仍是异化的,则其本身包含着蜕化和变态的巨大危险,因而不能停留在这些形式上。

正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历史特点,所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历史含义及其重要的历史使命是:从消除已持续数百年的整个历史时期开始(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阶级-政治时期,以下简称政治时期,目的是为了表达简便,但也为了突出在发展现阶段上政界人物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不应强调和偏袒那些标志着旧政治社会形态的连贯性的社会形式,而应创立和发展那些既对旧形式持历史性否定而又展示新历史前景的形态。

由于这一切原因,首先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神秘化,有关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混乱现象。一旦马克思主义被意识形态化,并使其实践的有限阶段理论上绝对化,它就不再是批判的思想武器,不再是理解全部近代史及其斗争的批判性的理论思想。只要坚持马克思或列宁的特征,事情就更加清楚了,因为有这些特征,观察这些问题的广阔的历史视野便展现出来了。虽然十月革命以前还缺乏能披露许多不一定会预见到的形式和趋向的具体历史实践,但在马克思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就已指出了问题的实质。由于理解了整个这一革命时期,即不仅是武装革命时期,还包括革命改造时期以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马克思十分明确地并以其所固有的深刻性指出,这个第一阶段还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而是从旧形态中产生的,必然带有后者的痕迹,因此这一阶段的政治形式仍然是必需的;这一过渡时期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其法制在实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在马克思看来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说它还不能从根本上反映仍然是旧形态残余的所有这些形式的特征,而反映包含共产主义萌芽的某些东西,尽管开始时其还不会占主导地位。革命力量应当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在萌芽中就有人与人关系的整个历史复兴的东西,什么是在他们的革命行动中必然逐步让位给共产主义

130

使者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政治形式多么重要,特别是在某些社会不发达的状况下,不管这些社会不发达的状况是多么突出和明显,这些革命力量都可能再生最严重的异化现象,并且如我们已看到的,窒息新生事物——共产主义的幼芽。这些政治形式本身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可是如果革命力量把它们仅仅看作是目的,那么这些形式和提出并建设这些形式的人们就不再是革命的了。

在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共产主义的这个第一阶段被称为社会主义。这里我们不去深入地谈这一变革的全部历史及其原因。社会主义一词从各方面说都很合适,特别是当代世界已很习惯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可是社会主义一词毕竟不像马克思的概念——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那样精确和明确,而由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情况,社会主义一词过去和现在都会模糊这个问题的实质。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使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概念时,都明确指出,在这一阶段上某些形式和进程就应该有共产主义的,又与旧形式相矛盾的某种东西,并且预示着发达的共产主义关系的到来。而在后来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的复辟过程中,则把一个阶段同另一个阶段,即把社会主义阶段同共产主义阶段截然分割开来。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果说在斯大林及其辩护士的手下,共产主义的重要萌芽——作为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苏维埃完全消失了,而其余东西都是政治形态(国家和党),这些形态不但是占统治地位的,而且是绝对的、无所不包的,那么这一进程的代表人物们缔造反映这一被歪曲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几乎是必然的。这一点我们在本书论述斯大林主义的章节中可以看到。这个新政权解除了旧资产阶级的政权,并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国家计划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现实。这一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被简单地和社会主义相提并论,当然仍有某些特殊情况,我们在本书后面会谈到的。因而,围绕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混乱是很严重的。当时产生了理论上的烦琐哲学:说什么这是过渡时期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在出现全民国家、产生发达的社会主义时,

是否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将持续到何时;说什么当恩格斯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必须消亡时,好像就恩格斯一个人说过,而马克思、列宁和所有伟大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说过似的,当马克思主义处于要为无法辩护的东西作辩护的情况下,也意识形态化并无再生能力时,恩格斯是否是正确的。

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工人阶级从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劳动人民从经济和政治异化中解脱出来的过程应立即开始的时期。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全部思想中可以以铁的逻辑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一发展中着重点不能是脱离工人阶级的政治形式,也不能是工人阶级部分参加的政治形式,因为即使在革命时期,这些形式也仍然是人的生存的异化形态。政治形式仍然是旧的社会历史结构的残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这些形式最终要被扔进历史垃圾车,而不是把它们神秘化。这些形式应立即开始消亡。

在分析斯大林主义时我们有机会看到,关于把所有制当作国家所有制发展起来,国家和党的机构支配全部积累和掌控国家计划并进行扩大再生产,劳动人民只能形式上表示同意而不能作任何改动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说,仍未脱离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由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来管理的。斯大林主义时期最清楚地表明,在一个开始是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这些政治机构的占优势和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会导致什么样的谬误和偏差。在这个时期里我们还看到,在共产党和这种政治制度里的不民主关系会使个人,首先是统治者发生什么样的畸形。

所有这些政治形态和结构都不能成为未来的使者,不能成为使这一发展阶段发育成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和第一阶段的萌芽,这对每一个有批判眼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能是固守旧东西,即表现阶级矛盾和阶级利益及对人们实行统治的东西,同时又不能是漫无边际的社会。共产主义只能是这

132

样一种新结构,它以自己的发展否定那些旧的政治形态,而在新结构中发展一种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一种谅解和团结的新关系,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这种结构只能是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样一来事情就很明白了:把对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的全部管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联合体即各级委员会(saveti),不仅通过自己的发展,而且通过它们的垂直的建设,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和决定性机构。

我们看到,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从使我们得出最终结论的迄今全部丰富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绝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谐的社会——斯大林主义把这种和谐理解为国家和党的全权和指挥一切以及劳动阶层的唯命是从,可是这才是真正的矛盾——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呈曲线而不总是呈直线发展的,也不是没有停滞和危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形式一定要发展,对人们实行权力和统治的旧政治结构和其他结构一定要消亡。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建成的社会主义”,但却根本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而是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在这第二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它总是在不断建设和完善,直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最终获胜,不再有阶级以及完成了自己历史作用的国家、党和其他阶级机关已经消亡。

133 这种矛盾的进程是非常微妙而复杂的,从来不能预先作出最终的规定。以为这一进程能够直线地、按事先拟定的准确无误的公式发展,特别是在客观上处于困难历史情况下的不发达的社会里发展,那是浪漫主义的想法。可是发达的社会尽管有迄今的重要的正反面经验,仍将遇到许多严重困难,因为革命力量在评价该时期现实的,尤其是最大的可能性方面,特别是在评价政治机构消亡的速度方面总有不少差异,因为这些机构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它们积累的管理经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从船甲板上扔进海里。

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这一主张在

发展共产主义的一个时期里,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里,被当作某种历史的荒谬和反共主义而被无辜地消灭了。如果我们撇开那些不是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无非是最有利于反动势力加强镇压的恐怖现象不说,那么蒲鲁东(J. Proudhon)、巴枯宁(M. Bakunin)、克鲁泡特金(P. Kropotkin)、马拉特斯塔(E. Malatesta)、桑蒂兰(D. A. de Santillan)、缪萨姆(我们只提到一些主要的)等人只不过对党以至国家的所有政治组织形式抱很大的、几乎是固有的不信任罢了。马克思主义要求在革命过程中组织工人阶级和建立工人国家以保卫革命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要求相反,他们看到这些机构的异化性质和这些机构有独立并变成凌驾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之上的新势力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是必然性),而放弃了关于这些机构有必要存在的任何想法。他们成了任何政治组织和国家的激烈反对者,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组织和国家束缚个性自由,违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根基。

可以肯定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对组织的反感而在无产阶级的某些行动中做了有害革命运动的事。摆正事情的位置,是历史的问题。共产党人总不能呆头呆脑地站在历史舞台上。但在这种理论探讨中,我们不应当看不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非常接近的,是从对政治和阶级的结构这一凌驾于劳动者和个人之上的权力的同样分析中得出的。虽然他们在消灭资产阶级结构的斗争中历史地注定要摒弃一切政治组织,但他们对自由问题、对缺乏个性自由发展问题的敏感,以及他们对不民主的政治结构在革命后会变成否定个性和个性自由的极权主义的担心,比起许多共产党人和他们对整个运动的看法都更有道理和更现实。

134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由于国家变成一个利维坦政体,工人委员会和基于工人委员会的公社问题成了禁区。当代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建立委员会和自治,作为未来唯一的历史替代实行镇压的政治形式,并为其实现而斗争。在迄今多数情况下共产主义者都是“国

家缔造者”，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因为国家和政治扼杀革命的要求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萌芽及其成长。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自己的历史先验论和过高估计个人与集团的作用而无法向世界表明在推广自己思想中取得的具体成果。结果他们只是进行无休止的争论（kontestacija），用人的自由和更人道的未来的宏图来与现实的、进步的工人运动和其他运动相对抗。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这两种思想都不同，尽管和这两者在一定的界限内有某些共同的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现实地考察历史进程时都不认为，工人阶级可以不经过斗争和没有自己的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场合都有各种结构和内部关系性质的组织而获得解放。同时他们还正确地指出，至今的情况也已表明，被剥夺了权力的阶级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废除和解散国家及其权力手段而解除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武装，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要这些力量去自杀也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这些历史上传统的政治形态绝对化，也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務。他们明确地警告专制和官僚化的危险，并认为，唯有国家消亡的论点和通过自由生产者联合的各种形式建立新社会经济关系的论点，能够保障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顺利发展，能够保障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进步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社会自由、解放和新民主。

因此，从旧的异化形态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人的自由和发达的新民主问题，总之，废除政治社会的问题，是愿意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任何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关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政治力量和结构的探讨，在这些问题中占有重要位置。

（二）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集许多历史情况（其中一些情况在前几章中我们

看到了,有些则将在后面几章中谈到)之大成十分明确地研究了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经历了许多变迁。现在我们只简要地提一下,即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国家的现象同社会阶级现象联系起来,从而认为国家是卓越的历史范畴和暂时性范畴。从国家在历史过程中有过的所有各种职能和全社会的职能中,马克思主义首先并正确地强调了国家的政治职能,即保证阶级统治的职能。国家及其所有政治机制和工具,包括军队、警察和法院等,在政治阶级社会的历史中首先有一项任务,即保证某一阶级的霸权和专政。这里问题不在于这样做是以什么形式,是粗暴的还是可忍受的形式,是露骨的专制还是民主形式。每一个阶级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中都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政治手段来保障权力,所以每一个阶级的统治实际上都是专政,尽管这一概念今天已获得其他特征和特殊的语义哲学色彩。每一个阶级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还利用了其他许多社会机构如教育、文化、宗教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霸权和专政表现在:每一个阶级在自己的阶级利益受到威胁时,总是准备使用最激烈的手段;每当情况对一个阶级有利或者当它不得不在历史上新的和强大的阶级力量面前退却时,它就搞缓和或进行妥协。

136

国家作为阶级和政治的组织在历史上曾有过其他许多职能,如组织职能和人道职能等。因此常常造成一种表面现象而每一个统治阶级又都设法加深这样的表面现象,即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机构,是客观的和超阶级的机构。这样从术语上逐渐开始把国家概念理解为整个社会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相反,以自己的一针见血的分析表明,这种见解也是意识形态化的,是每个阶级想表明自己是全社会的代表和整个社会利益的保护者而作的长期努力的结果。

然而,国家基本上仍然是“抽象的共同体”,政治领域仍然保留着

并带有在迄今各历史阶段上的所有客观需要,这个政治领域与不占统治地位的其他社会阶层和阶级是相分离的,是压迫和强制的领域,是使人能力异化最集中的机构。这种政治领域及其所有国家机构、官僚阶层和官僚精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直到晚年的全部理论著作中一直受到批判。他们后来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家的问题上找到了恰当的解决方案,但他们对这个使人异化的政治领域仍抱批判和厌恶的态度,这从他们在《莱茵报》、《德法年鉴》合作时期直到最后的书信和著作中都可以找到。

137 必须再强调一下,在把政治领域作为人的异化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进行研究时,我们也不想仅仅抽象地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具体的历史分析向我们表明,迄今人的历史只能通过各种异化的形式来发展,这就是说,这些形式和结构中有许多既是历史必要的,也是历史进步的。哲学的—历史学的以及理论的分析必须弄清这些现象,并指明鉴别这种类型的人的异化中哪些是历史上进步的形式和哪些是保守倒退的形式的更可靠的标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社会组织以及国家和阶级统治促进了整个共同体更全面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其摆脱某种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强制形式,因为这些形式束缚人在历史生存各领域中或只在某些领域中的能力,妨碍人的多能性及其知识、情感和道德的发扬。所以,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社会经济关系的这些形态及其政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是异化的形态),无疑是历史新现象和解决积累起来的历史矛盾的办法。

由此可见,各种异化的社会形式只要能促进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只要能为各阶级和阶层特别是统治阶级开辟满足历史上形成和产生的物质的和其他的利益和需要的前景,只要不成为社会的这种整体发展的障碍,那就是在历史上人们可以忍受的和“不刺眼的”社会形式。只有到这个时候,才有人意识到经济、政治或思想异化的一定形式的这种历史局限性,并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或它的某些特别无法容忍的结构。异化不是仅仅由于这些意识和创造行动而产生的,它是历

史上已存在的,但不会立即和永远成为普遍的和明显的社会进程。个别人的意识和群众的意识之间的差别也就在于此,因为出众的个别人物或集团的意识在对待人的异化的一定形式、由此产生的滥用职权和社会不公平行为上持批判的、鲜明批判的态度方面,迄今一直是走在群众觉悟的前面。在群众对这些矛盾和历史局限的觉悟尚未成熟的时候就投入反对现存社会力量和异化形式的历史性斗争,这是许多人物和社会集团造成社会悲剧的原因所在。这些人物和集团基本上没有得到他们所争取的社会力量的拥护,他们那种可以理解的、表现突出的历史先锋主义在群众觉悟中还没有得到必要的历史性反响,因为群众觉悟还应有所提高,才会投入必要的历史行动。

这种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觉悟在工人阶级和劳动阶层中慢慢地和逐步地提高。每一场阶级搏斗,胜利或失败,每一个有助于说明历史状况和前景的新理论,都是构成这一新的觉悟的因素,没有这种觉悟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主义斗争和变革。起初,工人们只是认为使他们处于无法忍受地位的是那个制度而对它进行本能的造反,后来通过一系列革命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组织,通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主义起源(provenijencija)的其他著作,通过失败和成功以及使劳动阶层受害最大的战争灾难,关于社会主义变革的意义的认识提高了,并且不断提高。先锋队组织和个人的作用在这方面总是具有头等意义的,但这绝不能代替具体历史斗争的经验。先锋队本身在这些过程中首先通过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对于在生活中或历史上犯的错误不必特别敏感。在有人固执地,不是批判地而又顽固地坚持错误并阻挠每一个富有批评性的谈话、每一个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和讨论问题的情况下,需要有批评,而且需要有最尖锐的批评。

因此,历史进步力量的觉悟和成熟的重要过程之一,过去和现在都是充分提高认识,而社会主义变革的基本含义也就在于此。整个革命纲领的这一组成部分曾经是非常通俗而明确的。这基本上关系到剥夺资产阶级和废除私有制,因为在当代世界里这种所有制会不断再

产生雇佣关系,产生不合理的分配,以及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人格的堕落与各种粗暴践踏和不人道的关系。但是革命纲领的另一部分对大部分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力量及其先锋组织来说,仍然几乎是天书,是非常泛泛和经院哲学的说教。如果我们只讲共产主义运动和作为这一运动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在近 50 年来的欧洲历史上,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不足之处及其历史责任就在于:尤其是在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义后期结构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思想被斯大林主义思想所代替。如同我在前几章中提到的,事情并没有沿着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优良传统的路子走,而是目光短浅地、不加批判地、用肤浅的意识形态化的办法把自己有限的实践绝对化了,并且虽然着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考虑到社会主义时期异化结构的那些方面,却没有把它们加以绝对化,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结构会导向何方。

因此,他们几十年来培植了并且今天还在培植着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崇拜意识和崇拜态度,没有勇气明确地和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些社会机构的矛盾性质和由此产生的现实危险。政治领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仍然是异化的领域,尽管在当前情况下和在一定时间里还起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于今后一定时期内以什么形式和怎样的过程起作用,还有待观察。但是政治领域本身不会有这种作用,而是保持原样,并加强自己的结构和权力地位。在这种强化和独立化过程中,这一结构的异化方面却日益表现出来,从而日益从保障社会主义进程的手段变成统治工人阶级本身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手段。用不着再举出比斯大林主义更好的证明了!

特别是在革命变革以后和对社会进行逐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人阶级和劳动阶层无疑需要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资产阶级国家的重要性在于这个国家代表资产阶级的霸权,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代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霸权,而不应是寡头的和官僚化的领域,这个领域在实行统治中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不允许公开讨论

真实发生的情况,以及工人阶级能否真正成为统治阶级。

但是,即使在真正工人统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任务也不是通过使这一政治领域强化,更加独立化和把越来越大的社会权力集中于国家手中的办法,使国家变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全面垄断者。因为在这个情况下:真正的工人政权也会官僚化、发生畸形并变成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力量。作为政治领域,它应促使所有这些异化领域消失,以及自身消失。社会主义的含义不是加强某些权力异化领域,而是使劳动人民能够日益成为自己命运和自己历史生活的主人。这就是说,联合的生产者支配自己的社会再生产、自己的生产和生产计划、自己的文化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从而逐步地为国家和其他政治机构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作好准备。只有社会基础中的这些自治进程能废除雇佣关系,并产生代表管理国家,而代表则直接对自己的基层负责,因此唯有这些自治进程能够不但导致实现所有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基本理想,而且导致当代历史基本问题的解决。

140

社会主义的这一全部进程要繁杂得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仅存在着国家、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而且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也不会仅仅在这些关系和范围内产生,不会在这些关系和范围内得到解决。但到目前为止,更明确地规定这些进程的标准无疑是最重要的。

在这方面不应忽视这样一些重要的组织,如工会、青年组织、文化和学术部门,它们无论如何不能仅仅成为按斯大林主义理解的执政党或各党的传送带。因此,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民主的问题,即以民主方式反映劳动阶层,首先是作为主要历史阶级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期盼和要求(指的是废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的可能性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

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情况一直是这样,事情基本上都是发生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在那里民主的传统很缺乏,斗争的民主经验以及劳动阶层关于自己的公民权和历史性权利的觉悟也很低,工人阶级

通过自己的行业组织采取自发的和有组织的行动很薄弱。在俄国和南斯拉夫的情况下(现在我们仅就欧洲的经验而言),党即政治组织曾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主要动员者和带头人。虽然在每一个党即政治领域里总是存在着等级关系,它在制定和执行该党的政策时进行着或大或小的内部斗争,但在掌权期间这些因素就变得特别敏感和具有决定性了。党的领导机构由于革命后处于领导全国的地位和拥有无限的政治权力(指的是一党制),很容易在各社会领域同国家机器和机构融合在一起。党的根本方针不是帮助工人阶级和劳动阶层实现该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即加强一切形式的直接民主、管理自己的全部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党日益成为政治领域的异化部分,从工人阶级的党日益变成政治官僚和其他官僚的党。这样起码在这个时期里党偏离了自己的重要历史使命。

正如我们在斯大林主义那里看到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后,政治领域的绝对化没有导致对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来说是根本的东西,即没有导致社会经济关系的真正变化。虽然有执政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不掌握生产、扩大再生产和分配过程,从而也不能对整个社会的管理机制发生重大的影响。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仍处在雇佣关系中,而社会经济关系仍处于旧的政治社会的范围内,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情况再变化也不过是:国家取代单个的资本家及其垄断集团,成了生产资料的实际所有者,从而主宰全部积累、投资方向、生产和分配的规划。同时,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的利益肯定不会受到忽视或侵犯。劳动阶层的从属性不但未消除,而且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的某些情况下更加强了。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未能从思想上彻底批判地阐明他们发展的斯大林主义时期,并揭示他们今天还常遇到的所有矛盾的真正原因和根源。根本的矛盾恰恰在于其社会经济关系使得旧的雇佣关系和政治社会再生,这就必然要反映在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同这样的生产

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只要政治领域(即使是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领域)还一直坚持这种关系,甚至把这种关系称为已建成的社会主义,它就必然要反对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主义力量的所有基本要求,并强制性限制生活的民主形式;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活动,首先是不完全受政治官僚控制的自由工会的活动;禁止不管以什么方式对现存制度提出疑问的、在精神生活中更自由化的思想的任何表现。只要看看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国家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就能理解劳动人民在发达世界中通过斗争取得的一切民主自由怎样被粗暴践踏,就能理解斯大林怎样罪恶地清算最优秀的社会主义力量,怎样极其残暴地对待社会各阶层。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使社会关系遭到歪曲却自称是保卫社会主义的骇人听闻的行径,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发展中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必须立即指出(关于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今天的欧洲进步力量如果以为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力量在议会中的胜利和生产资料国有化来解决进步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面临的根本任务,那又是幻想。国有化、多党制民主、自由工会、自由的思想斗争、成功地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等等,无疑是当代历史发展中向前迈出的重大步伐。但社会依然没有迈出政治社会的界限,制度实质上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因此,国家和整个政治领域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初期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问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一个阶级以整个阶级实行统治,从来都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谈到一个阶级的统治,那么每个阶级至今都有掌握其权力的方式,并在需要时强迫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社会主义时期这成为关键的问题之一。也就是怎样才能建立这样的力量对比以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掌握真正的权力,并加以控制,使其对自己的政权即自己的国家行使职能发生重大的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的迄今经验无可辩驳地表明,每当工人阶级手中没有经济实力,而被一个脱离生产者的政治领域所掌握时,尽管它是人民自己选出的——所有

选举特别在当今实行镇压的政治社会中都是受操纵的——监督和影响便越来越徒具形式,而最后化为乌有。这样我们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要求和思想:社会主义不应被理解为政治领域的统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有真正的自治进程,以使社会主义成其为社会主义。这些进程表明,国家权力和政治领域更多的是由各种委员会,首先是工人委员会基层的代表组成,而这些代表则对选举他们的基层负全责。这个基层不但有权以最民主的方式选举,而且手中还握有经济实力;这个基层管理自己的生产进程,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起委员会并决定和规划整个社会生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才不是古典意义的国家,而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是向全民国家转变,而是向处于消亡的国家转变。多数人的越来越大的权力、所有劳动阶层管理自己的劳动进程和社会进程的越来越大的可能性,使得任何政治权力逐渐成为多余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将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于劳动日的缩短和全体居民只花一部分劳动时间参加生产,社会便会日益失去其阶级特征。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观察使我们看到,正如我们在前面曾强调过的那样,社会主义是十分矛盾的进程。所以,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不能与政治领域、国家,首先是党的垄断和绝对权力混为一谈。在那些对于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强化培育共产主义萌芽抱有历史愿望的力量中间,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矛盾,因为正如我们援引的马克思的话,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低级阶段,而这些力量存在于这一过程中,存在于社会各领域中,即不仅存在于工人阶级中,而且存在于知识界、政治领域中,存在于关心维护政治统治或其思想水平还未超脱历史性时代错误的力量之中。

144 因此,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之所以长,是由于起步不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直接民主和自治的各种形式和机构不断加强,同时国家和整个政治领域也在消亡。对这一进程来说,历史的经验还很不够,但其中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南斯拉夫的经验是最

丰富的。这一进程肯定不能直线地发展而没有危机和倒退,没有各种力量在这一进程中的冲突,尤其是在不仅有帝国主义野心,而且有集团政策和对当代许多历史进程产生很大影响的力量的历史情况下更会如此。如果我们指出保留现存的和古典的军事形态的必要性,即这些军事形态在这些进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同时首先是政治权力的体现,那就会看到,这些进程是多么艰难和复杂。

在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中已经牢牢地确立了一条乍一看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论据。鉴于仍然存在着民族的、资本主义的对抗等,特别是存在着集团的对抗,显然有必要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这已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论点的论据。然而,我们从迄今所谈到的这些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无疑地,假如说指的是集中所有经济、政治和管理权力的政治领域,假如这个政治领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者并维持和顽固地保卫自己的官僚国家主义的社会地位,那么加强武装力量和防御能力也可以意味着加强国家。但这同样可以是“消亡中的国家”的加强,即加强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中的共产主义共同体和自治者共同体,假如它们成为管理国家的日益重要的因素,假如它们在各种重要职能上日益代替国家的话。

遗憾的是,人类的这种构成使得人们不能否定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和存在,而这种武装力量特别对不发达国家来说一直是个大负担,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便不得不成为一个防卫体系。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发生着消除长期来的社会分工的过程,发生着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即压迫和异化的过程,所以保卫这一历史新成果的问题不能仅仅留给某些专门的形态去解决。因此,武装人民的论点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尊严。这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有没有真正社会经济关系的标志之一。在劳动者成为进一步历史进程的基本主

145

主义。在仅仅是推翻一种政治机构并用另一种机构来代替的地方,拿破仑主义的和政变的策略总会成功。但是在武装的人民或劳动者用总罢工或类似行动对此实行抵抗的地方,这种成功的前景等于零。

我们看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我们不能把国有化、一般社会化和政治领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统治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这是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在战胜资本主义中能够采取的、从国有化来说不得不采取的、非常重要的起步。但是,如果我们在整个历史时期里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那就必须容忍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仍然处于旧的政治社会,即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如果在国家中掌舵的是社会主义力量、各社会党或共产党,要是它们希望把社会主义大车从旧关系的泥沼里拉出来的话,它们就应当具有这个历史觉悟。

可是,只要这些力量没有彻底清算所有这些斯大林遗产,就必然会把问题神秘化,并从马克思主义中炮制出最糟糕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复制他们实践的理论成果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相差不远。这样在新时期终于炮制出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完全不是马克思或列宁的主张,而是斯大林的主张。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同全盘国有化、同国家和党即涉及国内所有重要进程的政治领域的权力绝对化(对此已谈过,无须重复),把又称之为人民所有的国有制和把受国家调节的合作制都叫作社会主义所有制。整个发展的中央计划是国家性质的,而国家(当然完全在党的影响下)掌握着一切资源、积累和重要的分配。如同他们自己说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铸造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因而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

在还存在着私人资本、自由农民等残余而国家和党的绝对优势还不存在的整个时期,按这个思想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这个时期还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按照这个理论,早在 30 年代中期在苏联就已开始了社会主义时期,而

在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则在 60 年代就已开始。只有在完全消灭了私有制的所有残余、全部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后,社会主义时期才会出现。只有从这时起社会主义才扎下了根,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为发达的和成熟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这些国家中有些已达到了),首先取决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技术进步、科技革命一切成果的利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逐步过渡到全民国家,这些都在宪法中法典化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里事情被完全颠倒了。他们把这样一个存在着对当代社会中人的能力异化的最强大领域即社会政治领域的全面统治的社会,把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完全无权支配自己的劳动和计划、管理自己的生产进程和自己的历史生活,甚至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自由工人组织和其他组织为这些目标而自由地斗争的政治社会新典型,宣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甚至宣布为社会主义的高级的成熟的和发达的阶段。所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看到,不应把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异化制度宣布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不能在自己的初期阶段一下子解决各种异化状态和关系。但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究竟是有意识地使这种关系深化和固定化呢,还是力求不用辞藻和马克思主义化的思想,而用实际行动来克服它们呢?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还会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历史性的奇谈怪论。迄今这种奇谈怪论不是公开地表现出来,但反映在东欧思想家著作的字里行间,反映在他们的“信念”中。这就是:像南斯拉夫这样一个还有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国家,在那里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没有完全被消灭,但共产主义进程即自治进程业已开始,还谈不上社会主义,而是仅仅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标准就这样被颠倒过来了,而弄清问题的实质和国际关系中真正历史事件的实质是再必要不过了。

通过迄今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和政治领域这个重大问题作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

家和党的极权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思想是在斯大林专制和恐怖的错综复杂时期里产生的。今天用这种关系的温和和民主的形式无法废除在那种情况下存在的实际关系,即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因此,过渡时期不可能是还存在政治领域全面统治的时期,而是这样的领域,即国家和党及其所有政治权力机构在消亡、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萌芽在壮大(尽管是处于不发达的雏形)的时期。因此,国家不可能过渡到全民国家,因为全体人民不能自己压迫自己,对自己施加政治迫害。国家作为政权制度在逐渐消亡,它是随着自治进程的发展和重大社会分工的消失而等速度消亡的。社会主义是个实际而矛盾的过渡时期,用来判断它的更高的发达阶段的标准不可能是任何物质的、技术的和科技的指标,因为那是衡量当代任何社会是否发达的指标,而不是衡量自治关系发展的程度,直接生产者和劳动者掌握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管理的程度,消灭阶级社会以及政治社会的程度的指标。当我们谈到如此珍贵的规律时——东欧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同自己的进程混为一谈——我们首先必须指出,历史规律绝不是任何自动发生的东西,而是解决重大历史矛盾的历史创造。今天这首先是阶级、政治社会的矛盾,是当今劳动人民的历史可能性和任何制度的政治镇压机构之间的矛盾。这种机构使人们不能把历史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人们不能消除那种束缚劳动者充分发扬人的干劲的经济和政治异化关系的各种形式。因此,“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问题、“委员会”的问题、“自治”的问题应该提到真正历史议程上来!

(三) 自治的历史渊源和含义

从当今进行的某些争论来看,特别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对自治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批评来看,似乎当代社会主义世界只是现在才遇到这个令人鼓舞的思想。然而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有对社会主义思

想史、对不断产生这种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大理论原理相当的不了解。

如果我们不想详细追溯自治管理形式的出现经过(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分析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公社),那么可以认为自治是在19世纪初作为一个理论思想同欧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使者一道出现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罗·欧文(R. Owen)早就有这个思想,特别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如蒲鲁东和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佩洛提埃(F. Pelloutier)、索雷尔到A. 拉布里奥拉、马拉特斯塔、缪萨姆、桑蒂兰等人的整个后一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等流派也有这个思想。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思想是基于对政治领域,首先对国家的尖锐批判之上,因为他们把国家看成是对人的自由的主要危险;是基于为使人的个性和自由历史创造得以充分表现和兴旺而对革命后应立即废除的那些机构持批判态度之上。在他们看来,取代不自由的和异化的政治社会的是公社制度,这一制度的基础是直接民主、劳动者直接管理自己的劳动进程,总之,在于委员会和自治的各种形式之中。

149

在这同一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同样的思想和历史解决方案。他们从对政治领域和政治异化的分析中产生了废除国家的思想,虽然他们在这个早期阶段对于消灭这一官僚阶层、这个“抽象共同体”的道路和形式还不明确,但对这些一直抱反对态度。我们已经看出,他们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他们并不认为有可能和有必要简单地废除国家,因为在这些革命搏斗中国家仍然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用以保卫革命的重要政治力量。但是我们还看到,这个国家如巴黎公社已是另一种类型的国家,这样结构的国家是必然要消亡的。在他们看来,生产和社会中的自治关系不仅是这个新的民主政权的基础,而且也是国家消亡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逐步得出这些结论的。这时候他很干脆地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完善了他对资本的深刻批判分析,

揭开了作为当代社会其他异化形式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如果剩余价值的创造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即工人阶级的附庸和雇佣关系的秘密,那么对马克思来说合乎逻辑的结论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和基本任务是废除这一资本关系,废除产品与生产者本身的相脱离,废除和产生这种脱离的任何机构,总之,废除剩余价值的创造。虽然早在1843年末,特别是在马克思著的《巴黎手稿》中,我们就能够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决这个问题中所作的努力,但这一思想及其解决办法是在60年代形成的,而到了70年代才定型。因此马克思在1866年为第一国际撰写的关于合作运动的文章中出现了自由的和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思想,后来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后,在马克思关于公社的著作中以及恩格斯同杜林的辩论中,这些思想获得了更明确、更成熟的形式。

150 当代世界的这个基本问题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有着更深刻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把历史解释为人的行动。人在改造自然界和自己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改造他自身。人是实践的高级实体,他不断地在自己的历史创造中得以实现,而意识、人的觉悟和人的历史实践的发展则是统一的进程。因此,我们可以笼统地说,人的历史实践的水平是改造自然界和人的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水平,也是人对自己和世界认识的水平。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是不可以割断的,使人们无法预测未来的历史创造是绝对没有的,但是这种历史创造是在既定的历史情况和个人情况基础上进行的。

然而,人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不得不建立这样一些社会存在领域,如阶级、集团、国家等,这些领域在人类向历史生存的高级形式发展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意味着管理领域和劳动领域的分离、生产领域和占有领域的分离,而人在生产和意识形态中的实现也有重大的异化。这些领域的分离使得有可能对人进行剥削、奴役、施暴和使之无权。这些领域的分离的后果是模糊真实情况,使关系不清楚,造成了至今还束缚人的各种神秘化。处于掌权社会地位的势力握有

一切手段来保持这种神秘化,使人相信阶级分化是神圣和永恒的。

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经济异化——它只反映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和从属性——在政治和思想异化的各种形式中必然有自己的强大的一面。在欧洲土地上延续了近三千年的阶级政治社会的这一整个历史时期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劳动阶层和阶级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历史生活、自己的共同体和自己的未来。无论是奴隶制的、封建制的或是资本主义的少数统治者都是强行支配生产者的劳动或剩余价值,作出有利于自己和造福于自己的决定,并按自己的尺寸缝制历史衣裳。实现“委员会制度”、“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或“自治”的思想¹⁵¹和要求,是当今世界及其最有觉悟和最革命的力量¹⁵¹的革命要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既是当今这个发达世界的主要基础——不是唯一的基础——因而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一思想是在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过程中出现的。百年来委员会的思想席卷着这个大部分仍长满荆棘的古老大陆。在这条道路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迄今的历史性胜利从来都不是在没有重大历史失败下取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总是更多地从这些失败中学习,而不是从自己的胜利中学习。所以,自治的思想就是当今的劳动者,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如下要求:消除管理领域和劳动领域、劳动和资本、统治者和平民、创造剩余价值和支配剩余价值的人(不管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之间的分离状态。这就要求人的历史实践不要分成两个彼此矛盾和敌对的领域,不管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或是国有制基础上。所以,自治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和目的,即人的历史行动首先是人的社会产品不要与人分离,而劳动者自己既要掌握自己的生产又要支配自己的产品,并同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分离状态神秘化决裂。虽然我们不否认启发的重要性,但任何教育都不能彻底解决历史觉悟的不足和缺陷,而只能由人类历史实践中的变革来解决。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探讨历史和当代人类斗争的结果。因此,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很清楚,人只有通过自己历史实践的革命

化,只有通过废除制造这种神秘化的实际社会经济关系,才能充分认识自己是历史的缔造者(demijurg)^①,认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152 由于这一切原因,自治的思想便向私有制或国有制的所有机构和所有形式历史地宣战,因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阻碍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去消除其历史生存中的这种分离,即劳动领域和管理领域的分离;去废除任何形式和任何来源的政治社会,总之消除自己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异化。

资产阶级以私有制自由、法律平等和同等的伟大进步思想,后来又以政治机构多元化、新闻和思想自由的伟大思想——这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功劳——投入历史性的斗争,而不管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各个时期这一切是怎样进行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象征,它们使资产阶级分子达到历史的高峰,也走向悲惨的急剧没落。社会主义人的象征是:委员会、自治、直接民主的思想,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可能复制同样或更糟的资本关系的占统治的政治领域的思想,是自由地支配其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思想,这必然也包括探讨、思考和争论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特征是私有制或国有制和间接民主,以及多党制或一党制,而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的历史性的特征则是自治关系与直接民主的加强和政治领域、代议制与国家官僚的消亡。

自治的思想和实践的含义是: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他限制并废除所有那些历史地篡夺权利以使自己成为劳动者的监护人和牧师的领域,从而让劳动者一劳永逸地在历史上成为成年人。这种社会主义自治当然再也不能建立在不发达的生产力之上,而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的、集团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所有的原则之上。同时,这种社会性正是表现在劳动领域和管理领域之间的不可分或表现在劳动领域

^① demijurg(希腊语),在柏拉图哲学中意为造物者。——译者注

被管理领域所统治。自治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个萌芽是未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还不发达的形式。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有权被称为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低级阶段。

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正是以这些思想为标志的。这是伟大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谈到的那样,虽然由于当时俄国不发达的特殊情况以及其他受局限的情况,曾经更多地强调苏维埃是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的和人民的新政权,是劳动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但是这一革命创举的代表人物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基层本身的直接民主,这一切就不可能做到。建立工厂企业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对生产实行监督,以及后来管理生产的尝试,都是变革的主要标志,这个变革的任务不是建立一个脱离劳动者的新的政治国家,而是建立一个作为直接表达他们意志的工具的国家,或如列宁所说的“半国家”,即建立一个其基本职能应立即消亡的国家。 153

工厂委员会或工人苏维埃,如同其他国家德国或意大利所称呼的那样,应成为无产阶级新民主的基础。假如劳动者不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发挥作用、劳动者摆脱他的从属和受剥削的地位,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假如劳动者不是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和体现者,他就不能成为国家政权的主体。在生产中建立委员会的思想,成了这一革命时代的主要特征,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向新历史时代的基本突破。

因此,不仅列宁、布哈林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当时预见到国家消亡和在企业、农村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直接民主的加强,而且这一思想也是被革命浪潮席卷的其他欧洲国家中的激进社会主义力量主要关注的思想。在德国革命活动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权力究竟应当属于须经传统议会途径选出的国民议会呢,还是属于有自己的最高组织形式——共和国最高委员会的工人委员会呢?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K. Liebknecht)、弗·梅林(F. Mehring)、利·约吉希

154 斯(L. Jogiches)等斯巴达克团员同他们的荷兰同志们潘涅库克和戈尔特等都是这一新型民主的维护者,都主张取消旧的代议制和实行其基础为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的直接民主。从罗·卢森堡写的关于斯巴达克团员想干什么的通告中清楚地看到,问题不仅在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新政权即工人国家和工人民主,就是说提上议程的不仅有政治问题,而且还有重大的社会问题,由工人自己、他们的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都没有提上日程。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某些成员,特别是恩·多伊米希也有类似的思想。革命不仅使工人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而且使成立车间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以及具有同名的工人报刊都浮出水面。

意大利的情况也相似。在葛兰西写的关于工厂委员会问题及其历史前景和意义的文章中,对所有这些情况都有明确的看法。这些国家里当时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谁也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结局会是建立一个利维坦政体,把苏维埃(委员会)变成一般的议会机构,尤其是一党制和很有限的政治民主,使工人阶级又从属于由政治领域直接委任并向它负责的工厂行政机构和管理机构,使自治在社会的基层单位及其上层建筑中消失,总之,社会共同体重新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和矛盾的面——管理领域和劳动领域。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在这个时期里,不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但建立了工与兵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而且对这些组织从基层机构到最上层作了设计。一种主张是:政治的和社会的一切权力应来自基层,即通过选举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和共和国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再由这些委员会选出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来行使其在国内的一切基本政治和经济权力,但这些委员会是有时限的,而且每个代表都是可撤换的。另一种主张是:只保留这两个,即最高工人委员会首先是经济委员会,使其在管理经济方面拥有一切重大权限和管理其他社会事务的国民议会。所有重要的法律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都
155 应由这两个机构批准,力求避免和防止政治主宰经济。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当时德国的工人出版物和各种报刊,以及社会主义新民主的主要拥护者的讨论,那么他们对这些应成为新的社会历史复兴基础的历史进程的认识之明确透彻,理论水平之高和预见力之强,直到今天都使我们感到钦佩。

然而,所有这些复杂的、新的革命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要想一下子改变广大劳动阶层及其政治首领的习惯、想法、文化素质低和没有经验等情况是不可能的。对国家、议会制、领袖和整个政治领域的崇拜态度也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这条道路上的失败和痛苦教训,过去和现在都是未来历史斗争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之一。

只要我们不停留在这一历史总体的许多问题上,而集中到问题的实质上,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所有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主义进程中,问题的核心是自治和政治领域的关系问题。因此,由于已提到的原因,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时期更多地强调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国家问题,即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有发言权的广泛民主问题。由于上述情况和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无力,即它还无法完全把生产领导起来,列宁归根到底还是更多地依靠了更有组织和更有觉悟的力量,首先是党。战时共产主义和党自身的军事化使革命的大车越来越走下坡路,列宁在临终前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没有能够实现的东西,即明确地区分自治机构和必然由此产生的政权并协调它们的发展,他的继承者特别是斯大林更难以做到,因为斯大林只有处在政治领域中和控制政治领域时,才感到自在。因此,革命的蜕变就继续发生了,而“忘记”了自治的整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三国际的后期由于忙于其他事务而消失了,就好像从未存在过似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思想长期来受到如此排斥,以致南斯拉夫在1950年以后重新恢复这一思想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决心遭到了疯狂的攻击,被说成是“民族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国家主义的官僚阶层由于在不断强化中,因此不可能有别的想法。由

于同样的或相似的原因,今天欧洲共产主义的处境基本上也是这样。

我认为,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但是根本的,而且是最棘手的,因为对于发展的基本路线问题不仅研究起来是复杂的,而且整个具体实践和实施也是十分复杂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将略为多谈些。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成处方,因为这属于使每个历史进程具有丰富特征的特殊情况和个别情况的范畴。这些困难仍然潜伏于发达帝国主义的强大世界中,在很大程度上对上述进程产生影响并阻碍之。

在这里我们只强调指出总的指导思想和“普遍规律”。在我们看来,没有这种“普遍规律”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就不能实现新的历史人道主义。整个划时代革命的实质是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新文明。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不能仅仅是永久保留阶级的政治社会异化关系的旧形式——虽然它以新形态出现——因此,党、国家、警察和军队等不是标志一个新世界的新理想的历史性结构和组织,尽管在当前情况下对于保障新产生的历史性结构是多么必要和多么重要。这种历史的新事物早在自己不发达的雏形中就包含着未来的、发达的和人道的人与人关系的丰富内容。这种历史新事物就是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各种形式,工人委员会和自治的各种形式。只有当劳动者开始把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关系、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劳动者才为自己成为自己历史生活的主人、成为人的本身共同体的主人而奠定基础——但仅仅是基础。每个社会的根本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只有在社会的这一现实的、日常的、生产和劳动的基础上,在整个人类生活的基础上,才能求得解决。从这些基本的生产关系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生存的这个领域里可以解开每个社会共同体之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是支配自己劳动力的人和支配该劳动力的产品并任意购买其产品的人之间的资本关系和雇佣关系。如果这种资本关系从私有的或垄断的资本家转移到作为集体

所有者的国家,那么关系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而劳动阶层的地位甚至还会恶化。在以上分析中我们已看到这一点。现在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这种转移中不管怎样都看不清社会经济关系中、社会的生产基础中的更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预示着将展现在千百万人眼前的历史新生事物。

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社会委员会、各种形式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以及自治的各种形式——这些都是同义语——才是废除资本关系即剥削和异化的不平等关系的形式,因为只有在这些自己的社会结构和形式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开始管理自己的劳动和自己劳动的成果。整个这一发展的目的,是要把这一进程进行到底,要使这个包括整个生产和社会劳动的领域不仅成为支配社会产品和发展工业与整个社会规划的基础,而且应成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仍不可缺少的政治形态的基础。

这两种机构,即生产机构和政治机构,其每一种机构都有自己的权限,但也受社会监督和罢免,这些机构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建立,而只能用直接选派社会基层的代表到所有其他机构的办法,即通过代表制来建立。只有实行这种制度才能保证劳动领域主要代表的阶级享有主导地位,并避免政治操纵和克服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寄生性。我们愿再次强调指出,资产阶级代议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曾经起过,并在某种情况下仍起着重要的进步作用。但是这样的代议制——不管是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制度还是以共产党为首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制度——仍然是必将被社会主义逐渐消灭的政治社会进行选举和统治的手段。

158

对社会的全部管理,即支配积累、扩大再生产以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规划,应当从最基层,即从直接生产者和其他劳动者所从事劳动的地方和组织开始。他们通过其公社中的代表解决本公社的共同问题,并通过其一定生产部门的代表解决从该生产部门到社会组织最上层的一切问题。社会生产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划,不应是由服从于

各种局部利益的国家官僚阶层随意签署的国家计划。这种规划应由社会基层提出来,在各个部门的最高委员会上形成其最终形式,并成为全国各最高委员会所采纳的共同计划的一部分。

根据同样的代表制原则,还要建立起从基层到上层的政治管理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各院是联合在一个议会里还是不合在一起以及议会中都有哪些院等,这只是每个国家发展的特殊性问题。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这样理解的真正的新社会主义民主——无论是一党制或多党制民主——就不再是古典意义的国家。虽然它还保留自己的某些属性,不再是脱离劳动领域的机构,因为这个机构是由劳动领域的代表组成的。这个机构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占多数的地方越来越成为就共同事务进行协商的场所,越来越成为管理事务而不是管理人的场所。无须特别强调指出,一定的行政机构、各种机关和委员会等并不构成政治领域的实质,而仅仅是它的重要工具。这些发达的和不可缺少的工具不但可以而且应当保留在管理社会的新形态中,采取什么具体形式则是另外的问题。在前面我们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把一切政权,包括所有资产阶级政权都理解为专政——或者更通俗点说,我们谈到了工人的或社会主义的民主和国家,现在可以更精确地阐明这一新政权的实质,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导权的实质以及作为伟大历史前景的基础的新自治社会经济关系的政治表现的实质。随着这些新的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加强和日益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劳动分工也在加强,而反对这些新的历史转折和变革的社会残余则在消失,作为其相应的政治表现的国家则在不断地削弱。这是国家消亡的奥秘所在,也是新的自治形式及其政治表现之间关系的奥秘所在。

从前面所说的可以清楚地看到,“委员会”和自治的思想乃是关于社会关系,即关于开始废除历史上劳动大分工的新社会的完整的新思想。因此,不能把这个思想仅归结于基层组织,即社会基层单位的管理组织,而且应当把它贯彻到社会的上层组织中去。在社会主义的过

渡时期,与这些新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着权力和管理的政治形式及其一切工具。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中,这些政治形式不能是基础,且恰恰相反,人们之间关系的这些新的自治形式则是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政治权力逐渐失去其职能,而这些新形式则日益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通过自己的委员会制度和自治关系,解决所有最重大的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问题,因而对所有这些事务的管理不再是政治领域的事,因为它缩小到仅仅保障这些进程。但当整个这一进程发展到取消阶级分工时,当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社会生存的主要领域履行一些重要的社会职能时,政治领域也就最终成为多余的了。废除当前这种带有盲目消费精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高质量的生产 and 大大缩短劳动时间,都是实现上述思想的一些重要前提。

这里我们有意地不在上述基础上描绘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组织概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和德国已有这种样板。今天在这方面最丰富的经验是南斯拉夫的经验,但是这一经验和任何其他经验一样,不能成为任何国家必须仿效的范例。理由很简单,因为在所有这些进程中总是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它们不同的传统和发展水平,以及每个进程借以开展的客观历史情况。因此无法对这些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对基于委员会制度和自治制度的社会的建设描绘出清晰的概貌,而只能提供总的想法和基本历史思想。所有其他东西都应让每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和最有觉悟的力量去创造,因为他们直到今天都有很不相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历史经验、不同的发展水平和阶级觉悟程度。

160

根据迄今的经验我们还可以说,在有着不发达的社会结构,即社会结构仍然不完备,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人数较少的情况下,政治组织对这些进程的形成有大得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进程的倡议可以由这些先锋政治组织提出,例如在南斯拉夫的发展中就有过这种情况,因而整个这一进程不是从基层本身开始的,而是“自上

而下”的,这就使得这一进程复杂化,而且往往使其不明朗。

今天在欧洲的发达地区存在着一切先决条件使这些进程不但获得群众基础,而且在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阶段就解决许多问题并作好准备。已出现的各种参与形式是这些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先兆。当然,共同作出决定、共同管理等还不等于自治。需要的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要走过一条使自己成熟的道路,并摆脱共产主义运动从第三国际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国家主义旧思想。今天,在有了这么多经验以后,社会主义力量还只抓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和对主要生产资料逐步国有化,这简直是很可悲的。在这种情况下只会继续保留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当然是以民主得多的形式,可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却仍没有达到。在后面关键的一章里我们有机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们就可以说,同直接向资本冲击的过去情况比较,在今天的社会斗争中,党和工会的作用肯定有变化,办法肯定不同。必须立即指出,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至今还没有为这些进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好准备。工人阶级的觉悟仍然过多地受政治公式,对领袖和政党的崇拜的影响,而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解放的实际道路很少作明确的探讨。

我们已经提到,这里说的只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总路线,或者说“普遍规律”。如果想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达到既定目标的话,在作这样的考察时,应当透彻地研究每一条道路所富有的各种各样的特殊性和个别现象。但当我们进行考察时,重要的是研究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的含义,这个历史进程不是基于自身基础,而是产生自资产阶级制度,不仅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而且有政治社会的许多特征。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社会主义的实质不能是这些历史阶级特征的加强,不能是国家、政治领域、代议制民主的加强,不能是政治领域和劳动领域的分离,而是这些东西的消亡。与这一进程同时存在的另一面,是自治关系各种形式的加强,也就是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加强,是政治领域的消亡,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和下述关系的

实现：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直接管理者，成为通过自己的代表管理自己的整个共同体生活和发展的直接管理者。

因此，关于“建成的社会主义”的论点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份遗产罢了。社会主义任何时候也不会被彻底建成，因为它是在不断地建设和改造中，即改造那些社会主义从旧的社会政治形态那里继承下来的旧关系和旧结构，建设已成为未来共产主义关系萌芽的新的社会关系。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国家和政治垄断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不但从经济领域，而且从整个社会领域来看都不是社会主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一旦在自治基础上完全建立，这些关系一旦在历史上彻底获胜，那我们就不会再有社会主义，而是新的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是表现极其丰富的一个制度，尽管它的产生和内部发展有各种不同的道路。之所以说是一个制度，是由于它应当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是仍有许多矛盾的社会，这个社会抛弃自己的阶级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历史外壳——私有制、国家和政党等，并加强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一切形式，加强人管理自己劳动、自己历史行动和自己共同体的权利。这种历史创造的形式和道路将是极不相同和不可预见的。

（四）南斯拉夫的经验

世界上对于南斯拉夫及其社会主义发展有着很不相同的看法。有的感到钦佩，但时常不加批判地研究问题，有的抱有某种怀疑态度和失望，也有的认为自治的初步思想完全失败并且被放弃了。同样地，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或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方面则不止一次地把南斯拉夫的发展说成是恢复和复辟资本主义关系，或者至少是修正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

鉴于南斯拉夫是较不发达的国家，它不属于在大国竞争和争夺中

成为某种重要筹码的国家,所以本书在谈到南斯拉夫时不想把自治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对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至今所作的、在历史实践中基本上是孤军奋战而作出的这种努力不应置若罔闻。

对历史作出每一种估计和评价都是十分复杂的任务,而这一点在南斯拉夫情况下表现得尤为突出。每一位作者都是无意识地从一定范畴的体系出发的,都是从他在自己环境下取得的直接经验出发的,都是从他所生活的和最了解的国家中的一定历史结构和关系出发的。至于说到南斯拉夫现象,事情还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对于当今西欧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很难深入了解一个国家的¹⁶³情况和关系,而这个国家由于自己所在的地域长期落后,而大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却是最先进的。虽然我们在本章中只着重谈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验的重要方面,但仍然有必要列举一些材料,以便理解南斯拉夫的许多特殊性以及无法回避的必然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南斯拉夫属于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南斯拉夫人口中农民约占75%,而且是特别落后的农民,在南斯拉夫的某些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超过90%。工人阶级曾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但在人数上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斯拉夫基本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且很不发达;在许多工业部门,外国资本占统治地位,所以南斯拉夫曾处于明显的半殖民地地位。这个情况以及后面我们要谈的一些情况可以说明,战后时期的许多事情无疑地曾经是,今天仍然是妨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更迅速和更民主发展的主要困难。

在指出这个重要情况时还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获胜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占据了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它不但不承认其他民族,而且对其他民族实行非常歧视的民族不平等政策。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在争夺以民族资产阶级

为主的资产阶级特权和利益的斗争中,都以突出其本民族作为掩盖真正政治游戏和利益的挡箭牌。它们经常挑起民族仇恨和冲突,这也给后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争取民族团结、平等和独立的努力和斗争造成困难。

鉴于这种情况,南斯拉夫的民主传统无论是在资产阶级方面还是在工人运动方面都很薄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造成这种状况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那就是不管是哪个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对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出强烈和粗暴的反应,这样就迫使共产党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并在资产阶级恐怖下每天失去许多最优秀的积极分子。地下工作无论是在开展大规模活动的可能性上,还是在工作的民主形式方面都是受局限的,所以列宁关于干部党的思想在许多方面符合当时南斯拉夫的情况。这种情况当然是特殊的,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一方面欧洲法西斯主义抬头并猖獗,另一方面存在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全世界的指挥部——共产国际。可是在30年代战前形势下,共产国际受斯大林官僚—国家主义派系的严密控制,这个派系把自己的主张和斗争策略强加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点我们从迄今的分析中看到了,它给整个工人运动也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后果。这些主张实质上是国家主义的和不民主的,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当他们在武装革命胜利后处于把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情况下。如果想评价和了解南斯拉夫的历史发展,某种意识结构中的这一情况是无法回避的。

164

然而,尽管有上述局限性和客观困难,仍必须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是革命的党,它决心为工人阶级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作出最大的牺牲。虽然有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某些狭隘的视野,但上述这一点却在一定的和特殊的历史情况下把这个小小的革命队伍推上历史前台。如果我们谈到南斯拉夫经验的国际意义,那么它首先强劲地反映在作为社会主义实质的自治思想中。但是为了了解这一思想

的起伏,至少还要指出两点情况,这两点情况都超出了国家范围,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同时也是了解基本问题不可少的一些进程。

165 第一点情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占领下开始的社会革命的特殊性。反占领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率领人民群众为解放祖国而斗争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曾经处于地下的党成了谱写南斯拉夫真正史诗的主要组织者,它不仅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而且在必然导致南斯拉夫社会结构重大改革的一定社会改造的斗争中,赢得了城乡大多数劳动阶层的支持。由于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的人民解放战争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阶级力量的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力量,因而社会革命武装阶段和人民解放斗争是同步进行的。不仅在全国革命力量领导下建立了新的大规模的军队,而且地方上的权力机构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以共产党人为主要突击力量的共产党和人民阵线博得了群众的极大同情。

因此,当我们谈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道路时,南斯拉夫的情况是一个有教益的范例。我们知道,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企图把同样的趋向、同样的发展、同样的主张和同样的斗争方式强加给各共产主义运动,这就必然造成直至今天的一系列失败或挫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灵活性和勇气在这些过程中使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霸权主义遇到难题。当战争结束后苏联官僚阶层不肯承认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时,苏联官僚阶层对此立即十分明白了。“人民民主”一词必须显示出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和苏联的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因为后者不但想在进一步发展中占上风,而且想成为唯一的路标。可是我们从南斯拉夫的情况中看到了一个进行历史性创造的明显例子,它把人民解放斗争同社会革命结合了起来。这一社会革命由于其社会主义的进程而成了历史上的新事物,并使全世界的进步力量都记住:对革命和革命改造不可能也不应当持僵硬的、一成不变的观点。

只要战争条件许可,就应当在解放和革命时期使广泛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关系得到开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没有

群众的大风大浪就摧毁得了等级关系的屏障。各社会阶层之间、领导和人民之间的距离虽不是完全没有,但毕竟比后来建立国家后要小得多。迄今国家如果不存在等级制的和官僚主义的结构和关系,是不可思议的。俄国革命中如此强烈地感觉到的人民和领导之间的接近气氛,既是南斯拉夫革命,也是所有社会革命的特点。当普通战士和最高领导经常同住一屋或同样处在敌人的炮火下的时候,怎么会没有这种气氛呢。

166

但是,这一过程中民主关系的更重要形式,是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非解放区成立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新机构,即人民解放委员会。它的成立同时也是给予人民军有组织的重要支持和帮助。这些新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很像俄国的苏维埃,并在许多方面几乎是一样的——乃是民主政权的这样一种形式,它可以作为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政权的真正基础,作为劳动人民在其中直接参与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国家的真正基础。我们看到,这些民主形式后来大大地缩小了,但它们仍是重要的经验,可以在这些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民主形式。

由于全国彻底解放,特别是在战争结束时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势力让步,以及由于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共产党从战前小小的地下组织变成了全国的领导力量,它不但建立了国家机器,而且在国家的所有主要机关中起决定性作用并由它说了算。我们都知道,要是没有这些国家机关,这个阶级机器是无法运转的。在四年革命进程中和革命进程刚一结束的时候,发生了马克思和所有主要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情况,即革命必须摧毁旧国家,使新政权能以新的方式行使其职能,而这种新的方式应能保证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这一政权本身从历史舞台上最终消失。问题仅仅在于这一进程在南斯拉夫的情况下是以十分特殊的和前所未有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式展开的。南斯拉夫这一经验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

革命的武装阶段刚一结束时,有两个情况几乎是“自然”不可避免的:必须彻底剥夺主要是同占领者合作的资产阶级,同时必须反对并

167

粉碎那些以武装反抗形式在南斯拉夫持续几年的反革命活动。工业、银行和商业的国有化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社会革命和至今基本上只在政治领域开展的更深刻历史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再加上土地改革和规定拥有土地最高限额为十公顷,那么我们可以说,战后的最初年代就发生了把旧资产阶级赶下历史舞台的变化。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旧资产阶级当时是无害的。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来发展的东西,不仅是革命力量当时取得的经验和所作的宣言,而且还有我们已经指出的东西,即在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上没有弄清的问题和十分明显地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式解释。官僚—国家主义思想仍然使社会经济关系停留在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水平上,它对理解党的作用、党内民主、工会作用和文化等方面还产生一系列其他后果。这种官僚—国家社会主义不但被所有共产党普遍接受为模式,而且成了衡量一切的主要准绳。因此,如果我们始终注意到前面几章中所作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在战后的最初年代里,南斯拉夫建立了由革命的共产主义力量实行政治领导的,但其社会经济关系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制度。由于农民仍然是占多数的阶层,因此当时在南斯拉夫普遍存在着落后的、宗法式的农业自然经济;存在着大量的小商品生产,正像列宁说的,它每日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存在着私有制生产的其他各种形式,特别是在流通领域中;存在着随国有化力度加大而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着社会主义力量等占支配地位的政权本身,即共产党仍然依靠得到人民大力支持的广泛人民阵线。

168 由于这些政治力量仍然革命情绪高昂,还没有失去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因此我们当时处于我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状况,意思就是生产的主要部门中的社会经济关系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因而还孕育着威胁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各种矛盾和各种危险。

但是,这种政治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南斯拉夫的情况和那些从苏联军队手中获得自身“解放”的国家

完全不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是人民起义、抗击占领者、解放斗争以及革命的主要组织者。这些力量的组织者的觉悟也完全不同于那些从共产国际会议厅送到新政权宝座上的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者和领导人的觉悟。在我们的条件下,不仅成千上万的年轻干部在无法想象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而且南斯拉夫的先锋队也获得了很大的自信心、坚定信念和觉悟,即认识到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并有了以往和共产国际截然不同的自己的评估,能在既定环境下实现历史的最伟大事业。这些力量真正关心把革命改造进行到底,而不是维持现状和保护既得政治地位。革命的创造性、忘我精神和牺牲精神以及坚持伟大思想的决心,是这一代革命者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切,1948年斯大林要搞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企图破灭了。

因此,如果看不到这一抵抗的更深刻的背景和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基础,那么无论是那些想把问题仅仅归结为民族问题即捍卫民族独立的人也好,或者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卡斯托里亚德斯(C. Castoriades),把这一事件看成仅仅是两个官僚阶层在争夺自己的官僚地位斗争中的冲突也好,他们对这一历史冲突的任何解释都必然是错误的。这是一场对各国共产党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非社会主义的做法和想法的抵制。而这种关系一直被当作是正常的和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时候之前,谁也没有认真地提出如何解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问题,而且对苏联的态度如果不是唯一的,起码也是决定性的标准。我们说出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字,就包含了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党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同时还把平等提到了首位。这一抵制也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同道路的新思想,这一切就向斯大林主义对当代社会主义进程的看法和解释严肃地提出质疑。 169

所以,这一历史性冲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非常深远的和严重的后果。假如这仅仅是个民族问题或者是两个官僚阶层的冲突,那么今天社会主义的实践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是,面临历史新实

验的南斯拉夫革命力量当时认为这种实验是来源于社会主义本身,他们既然不愿投降,就不但要揭示这一冲突的根源,而且要提出解决办法。解决办法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而这些思想却被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抛弃,或者按照已付诸实践的官僚-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加以解释。不但业已断定,国有化和官僚-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仍不能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成为在资产阶级抵抗被粉碎后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而且经过数十年后,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思想、工人委员会和自治的思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合法性。这一次不同的地方在于:接受并提出这一思想作为自己的纲领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里在野的革命力量,而是掌权的革命力量。1950年人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法令,这无疑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因此,根据本书至此所说和所指出的一切,我们可以并不夸张地断言,这两年,即1948年和1950年,是当代共产主义发展的转折点。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本书中,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个进一步发展中的所有细节,以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在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努力,而是整个进程的主要经验和实质。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过去的传统,还由于南共曾是共产国际的一员,因此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几乎就像某种历史的斯芬克斯一样挡住去路。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冲突后的头几年是极其困难的,不仅是由于苏联和受苏联控制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封锁——南斯拉夫的经济合作原来是面向这些国家的,而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很不发达的——而且遇到下一步怎么办的根本问题! 打开社会主义之锁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历史钥匙?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理论依据还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列宁的著作,当然还有当时积累的经验。很快地人们就认识到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矛盾并考虑到这一时期的阶级力量,认识到危险来自自己的政治领域、国家、党和官僚阶层,特别是像在苏联那样存在一党制的情况下,一个党可以轻易地在各主要决策领域获得垄断,从而剥夺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艰难困苦,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思想和观点才得到了新的论述和强调。在他们的著作中一切可以解释为有利于政治领域的东西都被摆到第二位,而实际上构成他们的人道主义和解放的重要见解,即能消除和克服政治领域的东西,则浮出水面来了。工人委员会的思想、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思想和自治的思想,是解开这个历史新谜的答案。

在那个时期的最重要文件中,即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南共联盟纲领》中,这些认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得到了最高的表现。为了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可以把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指导思想的基本成果归纳为以下几点:社会主义作为过渡时期,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不应把重点放在加强政治领域、国家和党上,而应放在加强劳动者的自治上;劳动者应逐步掌握自己的劳动、经营和生活的一切条件,而无须任何政治的或其他异化的中介人;必须取代无政府生产的计划工作,不应脱离生产者,而应当成为他们自己的事,也就是说,国家计划应让位于自治计划;这一发展的结果不应是斯大林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加强,而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国家的消亡;这些进程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形式展开,而一党制绝不是社会主义必然的政治形式;在任何情况下,最有觉悟的政治力量都不能垄断决策权,而应当率领劳动人民去争取他们的历史权利,齐心协力地解决社会主义问题;党在人类精神创作的各领域中、在科学和文化中,不应成为裁决者,因为任何创作都不能用规章和法令来规定;科学和艺术的自由是科学和艺术生存的决定性条件,而共产主义者的职责是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与人道的内容而斗争;在对外政策方面,坚决反对集团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合乎逻辑地使人类长期来一切最大的努力遭破坏,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核时代;宣传积极和平共处这个意义深远的原则,这个原则对于解决当代国际问题比任何其他原则都更为人道和现实。从上述我们所提及的主要内

容中,我们看到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许多矛盾的途径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

必须指出,所有这些努力对于当时不管以什么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多数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因此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最终也应该有完全不同于斯大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标准。南斯拉夫理论家的出发点不是一个完结的制度,而是完全开放的制度,也就是说,它是以人的创造和实践为基础的以历史为出发点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些真正的理论研究中一开始就占中心地位的是实践问题,而不是反映论。同样地,在自治问题上,在使劳动,更确切地说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从依附和被剥夺的各种旧形式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上,马克思关于异化、自由、否定和人道主义等理论成为大部分南斯拉夫哲学家和理论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斯大林化的本体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相反,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和哲学思想是坦率的、批判的、辩证的和人道的思想。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弄得那么清楚和明确的。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许多思想而斗争,因为在实践中也有过许多弯路和出现过畸形。只要不固守偏差和谬误,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进程所处的环境是非常艰难和复杂的。由于国家不发达,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在十分困难的国际条件下做了许多完全不是社会主义任务的事,而是资产阶级时期没有做的事。南斯拉夫和俄国一样,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着工业化的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人数还很少,而小资产阶级分子和阶层还很强大,自治对他们来说无论如何不是某种直接的历史目标。

因此从历史角度看,从 50 年代以自治为标志的南斯拉夫的发展可以同当年处于蒸汽机水平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较。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这个时期,其工业发展水平不仅还处于襁褓之中,而且还背着许多时代错误的旧结构的包袱。这与南斯拉夫的自治进程所处的情况是相似的。因此,如果有人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角度、从高

度自动化和组织的角度看待和评价自治进程,那么他将丝毫体会不到农村大车轮子和机器齿轮发出的吵闹的咯咯声。

此外,正如我们从前面的分析(这些分析当然对南斯拉夫的情况也适用)中看到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作为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国家社会主义关系的性质,因为先锋力量已意识到这种局限性,从而开拓了重要的共产主义的自治进程;这些进程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对私有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否定。

所以,制度是矛盾的,在社会各阶层存在着新与旧的势力。然而,由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由于各社会阶层的差距仍然很明显,由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主体力量没有决心实行和实现这一自治思想,因此我们认为自发性会使关系固定在官僚 - 国家主义关系和专家治国主义关系,实质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这些至少在心理上是容易接受得多,所以先锋力量应该进行更多的历史性斗争去扩大这些新的历史范围。无疑存在着很多机会来使这些趋向得以实现,因为社会上最进步和最积极的分子对此关心,因为自治的顺利发展在各方面都应更多地满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广泛利益,而不是有利于官僚 - 国家主义的和专家治国主义的关系。今天每一个现代化社会都能保证物质繁荣,因此自由的问题日益成为首要问题。

173

为了理解我们南斯拉夫经验的正反面,必须不但看到迄今我们简要介绍的一切,而且还要看到,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力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进程方面,特别在自治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很少的,几乎是完全没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传统和最高裁决在这一全过程中依然是十分强的。小资产阶级结构和阶层及其官僚主义或专家治国主义心理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因此摸索和寻求自治发展的形式的全过程表现为“自上而下”,即来自政治上层,然后来自全党,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社会生活各领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

工作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仍然处于这样的状况：权力和决策的集中制仍十分强大，政治机构几乎完全垄断公众舆论、新闻工具和决策。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政治领域甚至在揭示这一革命进程的下一阶段时，也未能把围绕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所出现的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争论摆出来，并通过民主方式和做思想工作加以解决，而是对不同的思想非常神经质地，有时用行政手段作出反应，尤其是当有些思想从自治立场出发时更是如此。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历史情况下，这样的做法表明自己不符合基本要求，因为它束缚创造性的对话，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求得最好的解决办法，这种对话是必需的。一个不发达的小国所处的恶劣国际环境无疑对上述反应是有影响的。首先是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不断施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压力，此外还有支配世界市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压力。我们国家不得不在没有这些国家的发达工人运动的任何帮助下打入世界市场。

自治的全部进程迄今是十分困难复杂的进程。在发达世界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开放性的影响下，一个落后国家广大阶层的物质利益高于正在诞生的、需要作出许多牺牲和痛苦来实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60年代初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以致整个生活的粗放发展必须让位于集约发展，才能使这个较小的经济体在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站住脚。农村里蕴藏的大量劳动力不能一下子流入工业并在其中就业，因为工业的增长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是有限度的，于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后备军同来自城市的，把个人的发展寄托于集体努力的许多人，都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寻求临时解决满足其经济愿望的办法。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矛盾现象，它引起了许多争论和有道理的批评，但也产生了不理解。南斯拉夫向世界开放是一个大胆的，有着根本原则性的步骤，虽然初期更多是实用主义的步骤，这一点是显然的。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很容易蜕化变质。但同时很明显的是，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从肩上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

从前面所说的可以设想并看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长期发展是以二元论为标志的,而二元论必然产生许多不良后果。长期来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的积累、国家的集中计划和由政治来决定发展自治关系的一切重要因素,因而使这种自治关系一直停留在社会基层,而在支配收入和剩余劳动方面却很少参与。南斯拉夫的经验再次表明:政治领域的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会加强政权中的官僚主义因素,而后者又很容易同生产中的官僚主义和专家治国主义势力,实质上也就是同生产中的反自治势力取得一致并勾结起来;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 175 这种情况会产生一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趋向和现象;对经济进程的过多行政插手,必然造成分配中的不公平,造成社会主义条件下谁也无法辩解的收入差距趋势和工人阶级不满的倾向;工人阶级由于还没有掌握自治进程,因此就采用其他一切可能的手段,例如罢工,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则持激进的立场,在民主还不发达的条件下必然导致不平等的冲突。

主导的政治力量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冲突,同时也为了今后更顺利地达到已宣布的自治目标,首先不得不开始推行分散管理的进程,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首先在积累方面,并且消除国家在文化、教育和其他领域的强大影响。自治进程在这些领域中从各个方面表明,国家消亡的论点是历史上唯一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论点。然而,南斯拉夫的经验还表明,在这种进程中可能产生令人很不愿看到的现象,尤其是如果没有精辟而完整的自治思想,如果这一思想仍然主要依赖于政治领域的认识和评价的话,因为这个政治领域由于自己在整个制度中所处的地位而必然有局限性。这样一来,取代国家垄断的必然是以银行和商业企业形式突然冒出的金融资本垄断,而后者曾有一个时期是以资本关系的肆无忌惮的体现者行事的。

促成这一点的还有商品货币关系和与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相抵触的更自由的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冒险的步子,因为当时不可能完全看清积极和消极的后果。走这一步的动机,

无疑不是像那些宣布南斯拉夫彻底走上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站不太稳,对某些事件的评价是多么肤浅,仅仅依据某些情况,而没有对事物作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176 在这个问题上南斯拉夫的发展也为社会主义力量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所处的情况下,鉴于整个发展水平和其他情况,特别是外部情况,如果用死板的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来进一步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那只会加强国家官僚机构,阻碍生产力的更大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收入分配中使用不恰当的行政标准。而市场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却能够为分配提供更恰当的标准,从而使工人集体处于更适应劳动生产率水平和集体向社会积累提供全部贡献的某种关系上。

但是情况表明,这些关系有其顽强地表现出来的另一面,尽管人们有时强调商品货币关系——我们则把这种关系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或“社会主义中的市场”——但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关系有一个同社会主义观点不相容的逻辑;这种关系在自己的自由活动中必然再生出资本关系,从而有可能导致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并助长技术管理人员的投机行为,以及某些企业或生产部门的垄断地位和集团占有行为等,这些都以各种形式延续至今。由于自治关系和自治组织仍处于襁褓中,没有别的办法,而只能让政治领域来干预和煞住那些歪风邪气。因此在确定某些涉及社会准则的最主要的价格以及其他方面(如房租)时,仍然采取行政措施。

仅从上述这些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6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没有更清楚地看到克服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上述所有矛盾的出路和结果。如果撇开对困难的外部环境的分析,那么我认为有两点是我们的主要问题:经济和文化仍然相当落后——就欧洲情况而言——和整个社会结构的两重性。就是说,一方面在基层已长期存在着自治进程,但这种进程由于经济基础差和对发展的重要

进程影响弱而有丧失威信的危险；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对社会生活主要进程有着很大影响和实行垄断的强大的政治社会。这些年代里的一些事件，如许多工人罢工、大学生动乱和民族主义猖獗等清楚地表明，如果想实现既定的方针，就再也不能用老办法实行管理和解决社会的迫切问题。

177

由于对旧宪法提出所谓工人修正案以便于70年代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重要决议，由于通过了新宪法和联合劳动法，便出现了这些必要的变化。这些文献中的重要思想是：建立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作为整个社会在社会主义部门中的基础，实现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如下基本权利：支配自己的全部收入或对收入的分配进行监督，通过实行从基层到上层的政治联合的代表制原则彻底消除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时代错误残余。在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被宣布为联合劳动中各平等部分的一切领域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的那些顽固不化的老观点也被清除了。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按照始终如一的自治思想，工人阶级就应当有权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自己劳动的产品、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只要一个阶级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物质力量，就谈不上这个阶级的统治地位。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前提和可能性，以使工人阶级不但支配自己的收入，而且还对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重要领域中全部其他管理工作也实行监督。

然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不创造物质价值的，但在社会发展现阶段没有他们就不能创造物质价值的另一部分劳动人民，作为联合劳动的一部分，通过与联合劳动的其他部分订立协议(dogovor)来解决自己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问題。同样很明白的是，他们在自治进程中共同决定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国家机器以及其他许多机关，特别是科学机关逐渐变成联合劳动的一部分和在共同监督下的日常机关。

这些设想的实现意味着南斯拉夫自治发展的整个新阶段，到那时才可以说自治在实践中彻底获胜了。为此当然也还需要其他一些前提，这些前提本身就是长期的社会进程。

178

在这些前提当中,有些前提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如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它就没有今天令人满意的社会进程。可是,从认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到实际上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力,还必须克服许多偏见和落后思想。在这方面与此紧密相关的经常的任务,是进一步改变社会结构和提高整个文化水平。如果没有发扬个性,社会主义的更发达阶段是不可想象和不可能的。只要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没有从精神和思想上大大提高一步,只要人对人类智力和情感的最大成果,即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创作到当代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创造成果不敏感,只要人还没有真正掌握构成人类创造时代的大量人的才华,只要人靠表面的消费机制和精神贫乏在世界上到处乱串,看到的只是做作的、不自然的民间舞蹈,我们就不会有发达的社会主义觉悟,就要准备被别人咬自己的喉咙。

依我看来,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外,在许多其他因素中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指出。一是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必然性;二是为缩短劳动日而斗争,这一斗争不但同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我们还有机会讨论社会主义和民主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强调一点:当代世界新民主关系的实质不是由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花言巧语地描述的资产阶级自由构成的。但是这种民主新关系的实质并不否定当代人在争取更自由关系和生存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今天,作为新的社会主义向往的基本要求是:废除劳动者的雇佣关系,废除剩余劳动并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不但废除资本主义的关系和结构,而且废除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自治思想迄今只有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才得到逐步的运用,正如我们看到的,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自治思想是迄今我们知道的进一步发扬自由的唯一解决办法。我们看到,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任务和要求。制定文献是一回事,而有着复杂的力量对比和各种利害冲突的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在这种有着各种趋向——不但有积极的自治趋向,而且有表现为商品货币关系、官僚

主义和专家治国主义结构和习气的倾向——的矛盾发展中,自治的力量应当有一切可能性提出自己的抉择、问题、看法和批评性估价。鉴于自己的结构和历史遗留,我国社会仍然产生对商品和金钱的崇拜以及集团利益和心理,而极端自私的利益并没有从历史的日程上消失。由于反映和争取一定理想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青年看不到革命所开创的前景和理想。因此,生活民主化的其他形式是这一历史宏图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之一。这些民主化形式包括:在我国社会的基本政治力量中、在共盟中加强民主关系并使其发挥作用,取消对公众舆论的垄断,使按自治原则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我国社会的各种观点能够充分地、自由地表达出来。如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要求、批评、看法和建议等乃至理论观点冲突不是公开地和自由地摆出来,就仍然存在着窒息这些创造性的和人道的趋向的巨大危险。由于公众舆论被垄断;由于仍然有强大的金融权力中心,仍然有很强大的、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实力与官僚主义和专家治国主义势力,在这种相当不利的国际条件下,我国的革命就有可能发生并非所期望的演变。我国的自治社会主义发展仍像一股流水,它费劲地冲刷着各种各样私有制的、小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利益的污泥。只有自治力量的广泛阵线才能取得对旧的政治社会和阶级社会的所有这些顽抗的历史性胜利。在当前条件下政治机构和政治组织仍然是必需的时候,自治力量的这一广泛阵线应当成为我国发展的一个新阵地,成为所有自治力量的这样一个“联盟”:当对自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各种看法时,它应保证所有这些力量能进行平等的、民主的、公开的和批评性的交换意见,而没有歧视,没有对人的解放历史道路上出现的任何思想加以限制。社会主义事业既不能是一些先进分子的事业,也不能是个别组织的事业,更不能仅仅是一个阶级的事业,而应是把自治看作自己自由历史生存命运的大多数劳动者的事业。

(五) 社会主义与自由

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围绕社会主义的历史大争论已多少进入结束阶段。本世纪末有可能导致历史实践的的决定性解决——开始在欧洲辽阔土地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其形式不仅是马克思而且是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所构思的,而在他们眼前展现的首先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内容。正如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在迄今的开始阶段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处于严重低落和丧失威信时期。在欧洲,社会主义在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中遭到了初次大失败。社会民主党至少在一些国家里把一个真正的革命形势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胜利。另一次更惨重的失败是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革命的蜕变。斯大林主义把以前所有的社会主义价值本末倒置,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队伍中一直引起无法形容的思想混乱。十月革命的史诗未能使他们以彻底批判态度和不抱成见地揭示那个以搞运动的方式传给自己的继承人的现实。至于这一过程中人的自由——这是最深刻地关系到人的生存问题和利益的东西——如何达到容忍限度,需要很多时间才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进步运动要摆脱某些关于生存的根本问题的论点,这些论点完全不符合人为进一步解放而斗争的当代要求。

资产阶级利用这一切和其他许多东西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并取得一定成功,是不足为奇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它甚至还编造了许多谎言,因为在当代历史的阶级冲突中,资产阶级的历史生存成了问题。每一个阶级在处于没落的时候,总是利用一切允许的和不允许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特权。进步力量的任务是,尽量少给资产阶级提供反对自己的论据。他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不要用资产阶级阵营中不存在的那种可能性做借口,来为自己的局限性或不必要地缩小进步活动的空间作辩护。社会主义不要重蹈实际上受私有制自私利益

驱使的资产阶级行为的覆辙而走上历史舞台,而是要实现人们关系和自由的新内容。

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未解决的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对封建主义而言无疑是人类发展的进步阶段,但是由于它是基于私有制之上的,因此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人类发展的很残暴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社会仅靠极不人道的手段和行为,靠公民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而繁荣起来;靠写进人类历史最令人伤心的篇章的民族战争和殖民战争,靠损害基本劳动居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危机,靠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靠一旦其政权受威胁时实行政治专政等而繁荣起来。从最早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蒲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想家的批判分析,提供了对所有这些矛盾的深刻分析和丰富材料。假如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没有留下如此斑斑血迹,社会主义就不会有这种历史力量和吸引力。

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考察和解释人类历史,但所有这些进程的实质是为人的自由创造空间,并为建立人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我们不能就人的自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依据展开哲学讨论。我们只想指出,对作为自由实体的人的问题作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对这一自然历史现象的解释很相近,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人的实质上的自由的这个概念,就不可想象世界及其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会有创造性的变化。同样地,关于人的多价结构的概念、关于人的全部潜力的概念最恰当地说明了这一复杂结构,这一切就为理解人类迄今的历史奠定了最好的基础,而这个历史同样地孕育着过去的返祖现象和未来的人道主义。

182

当然,人在自己的历史性斗争中曾追求一系列自己的直接的、最平常的物质利益,但为了满足这些利益,人必须不断地挪动并扩大自己的自由界限,因为尽管从哲学上可以断定自由包含人的存在(bivstvo),但人同时也是社会存在(biče),有自己的某种社会局限性、

可能性和决定性。本体论和社会学的这种关系是一个互为制约和相互决定的不间断的和辩证的过程,没有这一过程,就无法了解迄今的历史,自然也就无法了解未来。

当代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的局限性,人的总体性的片面化、物化(postvarenie)和单向度(jednodimenzionalnost)状况所作的深刻的分析,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切都是人异化的各种形式,人总是把这种异化看成是某种凌辱,尤其是在异化有可能占上风时刻和情况下。将来人的努力和进程大体上也是这样的。人迄今一直是准备为了自己生存的某种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人来说总是意味着自由的某种形式——而牺牲自己的生存。历史上常见的最伟大的英雄主义都是为了保卫某共同体的自由或者是在争取进一步解放的斗争中而作出的。所有这些情况不一定必然是明显的,而无疑不是没有过的。但是这种情况产生于人的存在的人本主义结构,而人的自由是人的重要方面。

183 当代人类的社会主义向往有着同样的根源。资产阶级文明迄今曾经大大地推动了人的生产力和潜力的发展,但是在人道方面总是有很大损失。不仅当代历史的进步是在愈益使人的崇尚良知受到震惊的最残暴的行径下实现的,而且整体看来,人的进一步发展也仅仅是靠极不人道的行为和对人的社会奴役来实现的。现今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仍然表明了真正权力和虚假权力之间、生产一切价值的人和他和社会上的无权地位之间的差别。当今所有这些政治力量在对民主和自由唱颂歌的同时,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愚昧无知和未开化上,寄托在有可能操纵群众上。这些政治力量把人为的需要、表面的消费心理和习惯强加给群众,以使利益文明能站住脚。

我们不应忘记,欧洲的广大群众是不久前才开始进入历史生活的。历史生活,我指的是全部历史生活,不仅仅局限于对物质生存的片面关心。他们的幼稚性、精神空虚和对人类的最伟大创造不敏感(nesenzibilnost),不是他们的过错。我们没有忘记,直到不久以前,人

类智慧的最美妙的产物,从古代艺术到当今的科学成就对欧洲大多数平民来说曾是一部天书。伴随着人类绝大部分的,往往又遭人类反对的东西,是人身上最伟大的、唯一能赋予人的生存以真正意义的东西。可是一旦这种因素与人相脱离,一旦生存仅归结为空洞的经济增长和物种延续,那么所有城市连同其最优秀的手工作品都可能被破坏和遭到毁灭,这是自古至今的野蛮行为。只要人类生存的这一重要方面、人类智慧的创造性、人类这个世界没有被彻底而又真诚地当作重要的思想接受下来,人就要准备把别人仅仅看成是空洞的客体,人的物质生存就会成为发展的唯一精髓和焦点,有着自己建立起来的关系的当今资产阶级社会天天都在令人们相信这一点。

因此,社会主义也是对这种私有制世界的造反,因为后者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人类的财富基本上都归结为消费财富的量,并以此对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开采。社会主义还反对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人的发展仅仅是物质生产力和财富的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呆板和空虚的业余生活。人当然不能在不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

184

力情况下向前进,但人在解决发展中的矛盾时不仅仅是为了使生产力能迅猛地继续发展而且也为了自己,为了提高自己自由的境界,为了进一步繁衍后代,扩大自己历史活动和更人道关系的空间。

在批判资产阶级文明时,我们当然不应忽略它的伟大篇章。在这种情况下这样重要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只有消极的一面。物质利益的冲突必然要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如文化、道德、美学等。资产阶级在为新世界而斗争中也批判旧世界的所有关系。资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不可能成为大多人民的代表,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斗争给其他阶层带来更发达的关系和更解放的思想。法律平等、更多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更强化的政治多元,这些都是人在自由中继续迈出的步履。没有它们,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无法更正常地运转。然而,不管人类运用这些自由所取得的步骤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仍然是充满着经济强权者压倒所有那些庄严宣告人权者

的状况。肆无忌惮地争夺的自私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也表明,人类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些使人类最终处于崩溃边缘的结构上。

185 当今资产阶级世界在自己的民主旗帜上写下了其他许多自由,如普遍选举权、新闻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十分发达的政治多元化、罢工权和妇女平等。这里必须强调一下,我们也早已多次说过,当代人的所有这些重要权利都是在各国社会主义起源中新的进步社会力量进行多年斗争所赢得的。为此许多人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遭受无数的苦难、迫害、监禁和流放,受到审讯和判刑以至被杀害。不应忘记,有一些权利是在进步力量进行了几十年斗争后才得到和被承认的。无论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从来都决心一旦遇到脚下失去历史阵地的危险,就无情地和用暴力践踏所有自己赞美过的神圣原则。甚至发达的欧洲也不过是最近几年才摆脱了残存的法西斯专政,更不用说在非洲还存在着种族主义,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存在着野蛮专政了。

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主义,为了能够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即不是建立在经济不平等和不可避免地导致上述现象的局部利益之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平等、社会成员的互助和消除政治权力机构之上的新关系来防止旧病复发,不能满足于把一切错误和缺陷都归咎于资产阶级旧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懂得,社会主义历史生存的先决条件是理解、承认和进一步发展其所有积极内容、所有资产阶级法权和自由,而这些自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内部由资产阶级和新的社会主义力量过去赢得的。如果以为社会主义力量一旦掌了权,就要废除正是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卵翼下争取到的权利和自由,那是荒谬的。正如这个世界所达到的物质水平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一样,上述的自由范围也是人的进一步解放、人的潜力和创造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学界中,往往把大部分同发达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和议会制度相联系的这些自由,说成是“表面的自由”。如果就

此指出,资产阶级利用所有这些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统治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以及自己的利益强加给全社会,那是不能否定的,这是已多次说过并已证明了的。但是,今天也更加清楚地看到的是,这种人的自由制度使进步力量能够把这些自由进一步扩大,并争得开展工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及劳动关系的许多更大的权利,只有这样,当代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才能存在,也就是说,才能使劳动者受教于必要的民主学校,而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这些自由使科学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自由发展。这些自由培养人们思想上的容忍和斗争,克服数世纪形成的、构成各种各样的教条、偏见、思想崇拜、民族或种族崇拜和不持批判态度的基础的那种原始习气。这一切今天都依然存在,都是对新的历史性努力和社会主义本身的巨大障碍。凡是在打破这些局限开拓道路的地方,社会主义力量在前进中就容易得多。因此我认为,断言这些自由是表面的,那是太简单和肤浅了。这些自由中有形式主义,但这些自由对后来的历史创举是不可缺少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训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来说是最好的教训。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力量和共产主义力量犯了一个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就是把这些现象都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并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本质差别,而把资产阶级权利和自由说成只是徒具形式。这样的错误使自由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付出了失去存在的代价,使它们作出了无数牺牲和失去了自己最优秀的人物。这肯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人的进一步解放。应当永远明白,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大都是社会主义力量赢得的,也是继续进步的基本因素、基本内容和基本关系。这首先指的是社会主义力量打算利用议会斗争的民主机制来夺取政权的那些国家。

186

迄今在通过武装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的国家里,历史地产生的形势是不一样的。我在论述党的那一章中已指出为什么这种新制度会有一党制的结构,为什么这种新制度首先导致政治自由的缩小。我曾指出,这种现象既不能被理解为共产主义的实

187 质,也不能被当作什么优越性。它就是革命的必然,即只能以这个办法使处于少数的革命力量得以保持政权,并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在工人阶级和革命必须依靠的其他进步力量的队伍中某些重要的民主自由没有受到尊重,这些进程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在以社会主义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缺乏民主的思想斗争,在进一步解决革命问题方面缺乏党内和党外民主,以及废止革命中产生的自治进程,这些都导致一党制的巩固和最终导致斯大林主义。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早期社会主义进程的国家主义阶段仍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结构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一结构能以或多或少的民主和资产阶级自由而存在,但仍然不等于消灭了这一国家资本主义结构。这一结构同样会蜕化成斯大林主义,因为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所有这些自由都被取缔了,而斯大林主义则意味着上述关系的最严重变态和暴戾的警察恐怖。

因此,在这种一党制下,资产阶级自由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依然是进一步发展的根本问题。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受到尊重,那么解决社会主义民主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就会容易和有效得多,我们在谈到自治问题时已提到了这些问题。这里首先指的是思想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科学和艺术自由、新闻自由和新闻开展程度自由、工人阶级组织自由工会和举行罢工的权利等这样一些最重要的自由。

由此可见,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无疑地应当进行具体的历史研讨,因为这个问题比起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来说,是无休止的问题。我们可得出结论:一个社会通过国有化消灭了私人资本,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权力——这在西欧世界发展中可能发生——保留甚至进一步发展了上述资产阶级的一切自由(尽管是在社会主义力量的领导下),但这个社会就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而言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按其结构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因而对这样的社会来说,以及对武装革命后的一党制结构来说,进一步变

革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含义和内容问题,则是根本的问题。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国家主义制度下,即使是由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仍然处于雇佣关系,因为它支配不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它不但对整个社会发展,而且对自己的生产和分配全过程都没有任何重大影响。中央集权的积累,对消费、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政治领域在经济进程和其他进程中的绝对统治——这一切都表明,虽然是朝着社会主义迈了一步,但还不是社会主义。掌权的力量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但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在这种制度下仍处于经济和政治异化的状态。这只不过意味着,他们还面临着解放进程。因此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不会在资产阶级自由中消失。尽管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社会主义的自由问题就不成立,但社会主义力量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是,废除资产阶级政治社会,从而废除作为这一社会重要特征的经济和政治异化形式。只有实现自治关系,劳动者才能逐步成为自己生活和历史命运的主人。只有通过这些进程才能扩大人的自由的新范围,才能为实现人的总体,为克服片面的职业化、克服在单一范围活动中变得迟钝和个性上的严重偏激(这一直是各种政治操纵和思想操纵的最适合的基础)开辟道路。

迄今这一进程是在以一党制政治形式来限制政治民主的历史情况下展开的。今天我们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社会主义初期发展的这种类型,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太狭隘和不适合的。政权官僚化、对社会发展重要杠杆的垄断、政权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畸形——这一切的危害性,在一党制下比在多党制下要大得多。我们甚至看到,在主客观力量的特殊交错中,这一进程在这种制度下可能会失去社会主义的一切重要标志。因此我想,有这种制度的国家应力求避免陷入两难境

地(Scila i Haribda)^①,即介乎于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这些力量在这种制度下开始拥有对新闻和决策的绝对垄断之间。根据迄今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主要角色没有力量和决心开始推行国家和一党制消亡的进程,那么在这种制度下政治领域中出现官僚主义和畸形的进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迄今保证社会主义力量避免政治领域实行统治这一最坏后果的唯一进程,是进一步解放人的进程,是在尽量尊重历史地赢得自由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是自治的进程。

我们可以并且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也就是将来在多党制的社会中维护初现的社会主义动机的过程,使社会中的各党不成为凌驾于社会特别是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独立政治权力。我们已经说过,国有化和全面的国家垄断仍然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继续保留这种关系只会导致我们所说的一切形式的经济和政治异化的加强而绝不是削弱。

所以,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完全有既定的历史含义、既定的历史使命,这些含义和使命清楚地反映在人的存在这个决定性的问题——自由问题之中。社会主义民主和新人道主义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正如我们看到的,资产阶级的自由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包括这一全部含义,不管这种自由对实现人的进一步解放是何等重要,而人的进一步解放在实现个性自由和人的自由的新形式中、在实现人对其他人和自然界的新的形式中已有了自己的根基。同样地,这个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更大有效性,不能仅仅归结为科技革命和物质生产资料大发展的问题。这是当今每个社会应当做到和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且,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进步的这一方面将愈益壮大和蓬勃发展。

凡是在消灭资产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一个不把为利润而

^① 意大利西西里岛海湾之名称,意为陷入两难境地。——译者注

生产作为基础的社会(因为为利润而生产总会使个人、阶层、政权和人的关系发生畸形)的地方,社会主义都已历史地为人们所认识。这无疑是迄今每个社会主义革命所进行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不管是短时期或长时期)的重要前提。摆在共产主义时代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面前的今后历史任务是:实现人的进一步自由和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依附,首先是摆脱经济和政治依附。对于这些进程来说,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不够的,它们不能成为这种新解放进程的基础,尽管没有这些自由,没有哪怕是我們提到的某些基本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的顺利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作为新历史要求的这种新的民主、新的社会主义自由,是直接的民主、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劳动者按自治方式组织起来和实行各种形式的管理。虽然我们任何时候也未低估资产阶级的自由并把它看成是人的解放斗争的重大成果(akvizit),但劳动者并不因为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就成为自己的关系、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历史的主人。人虽有这些自由,但仍然处于经济和政治异化中,这种异化在一定的危机形势下有可能对人及其自由采取激烈的暴力形式。自治进程的实现、政治领域的消亡和直接生产者与劳动者在管理自己的直接劳动过程并通过自己的全权代表管理整个社会中的作用的加强,使社会主义开始实现人的解放的新阶段。通过自己的自治组织和社会协议,这样的人由于意识到社会进程再也不取决于某些与他相脱离、相异化的高不可攀和神秘化的领域,因而不会再把生产力的发展理解为目的本身,而是理解为一个更深刻的目的所具有的效果——人的进一步解放。这将意味着,要用如下的方法并在如下的范围内自觉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即尽可能大大缩短人们的劳动日,并最终消灭迄今注定地把人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而总是把大多数人置于从属地位的劳动分工。人必将在克服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在实现自己存在的多价性的基础上和其自身的自由的基础上,来确定自己的历史需要。所有那些使人处于任何从属地位的“需要”,都应当作为对自己的生存的威胁予以摒弃。依我看,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历史性

分工,消灭这一分工的片面性及其把人引向单一的和局部的存在,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区分历史需要和非历史需要、人道和非人道的¹⁹¹基本标准。

劳动日的大大缩短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同时依然存在的,甚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仍然存在的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将转化为必要劳动。虽然社会存在的这一领域到那时也将是必要的领域,但它的必要性将取决于生存的需要。生产劳动将失去迄今异化的性质,将仅仅是人的存在的组成部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新文明的组成部分,这种文明将能够消除人的局部性和使人得到多价性的全面发展。为人的自由和人道主义争取新的历史规模的意义就在于此。

第五章 当代的发达世界 与不发达世界

一、欧洲共产主义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世界的一些根本分析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马克思的辩证法绝不是一个革命的死板公式。鉴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提出某种普遍适用的革命理论和党的理论。历史的变革,变革的形式及持续的时间,取决于许多历史因素,其中有许多因素是无法预料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关系,其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也是这样的。只有墨守教条的斯大林主义才会认为列宁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可以成为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形式。而曾几何时,后来终于表明了,任何教条主义在历史面前都必然受到谴责。

在发达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是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最有趣和最深刻的变化即欧洲共产主义,便与这一切情况有连带关系。欧洲共产主义既有它自己的革命斗争方法也有关于它所争取

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全部主张,因而立即被东欧思想家中的官僚—国家主义势力当作反苏主义、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予以迎击。这本身就表明,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独立自主和寻找自己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例如在这方面由南斯拉夫的反抗和自治思想开了头,已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影响和后果今天还看不透,但它对当代世界今后的全部发展很可能有决定性的意义。

194 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严重分裂,它们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的对抗,直到最近仍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状况的特点。前两类党基本上放弃了革命的斗争形式,逐渐适应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民主条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即使已掌了权,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旧秩序范围内活动。尽管今天共产主义的批评仍首先指责社会民主党是维护旧秩序的党,但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内也有左翼,它对现状不满,仍把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作它的最终目标。在许多社会党那里,除民主的斗争形式外,同时还有着更多的革命内容,而这些社会党也已成为群众性的党,它们非常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它不仅应继续保证已取得的全部公民自由,而且应通过社会组织的自治形式来进一步扩大这些自由。

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当代世界的结构和关系中发生许多其他变化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曾不得不作出抉择:或者是孤立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进步要求之外,或者同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关于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许多主张决裂。鉴于还有许多其他将谈及的情况,共产党如果还有决心想作为新的历史情况下有生命力的社会政治力量,它们就只能有一种选择。这就再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能够最有成效地把握并决定始终是新的、难以预料的各种历史的情况(konstelacija)的思想理论武器。欧洲共产主义的新思想之所以立即遭到指责,与其说是因它为了解决新

条件下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而作的努力而引起的,不如说是因它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即批评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自由的水平,批评社会主义把直接的自治民主问题当作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予以摈弃而引起的。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这些指责的人忘记了,同样的或类似的思想在改变了的历史条件下,从来不会有同样的意义和同样的效果。第二国际结束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表现出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准备用革命手段处理革命形势。不仅如此,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人物把俄国布尔什维克打开通往历史新阶段大门的独一无二的革命功绩化为乌有,从而挽救了资产阶级制度。

195

欧洲共产主义当今的要求是,利用民主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及其他的形式),建立进步民主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广泛阵线,利用许多并非仅是镇压机构的国家机器,等等。这些要求产生于另一种已发生很大变化的历史环境。为了理解这些转变和变化,有必要至少最简略地指出当代历史形势的特殊性。

首先必须再次肯定科学技术的异常进步和人类在世界发达地区所经历的真正的科学技术革命。这一革命使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有了迅速的改善,生活条件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业余时间的利用无比丰富多彩,这就产生了消费社会的现象和当然也有其反面的消费心态。随着第三部类经济同样非常迅猛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形势已经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不再是首先集中于保证生存的起码利益,而更多的是劳动者在经济政治实力的庞大体系中的整体地位。与这种发展相联系,一个强化国家的特殊过程也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国家不仅是权力机关,而且是管理、注册并引导经济进程朝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机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早已成为过去,而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日益成为这些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现实。这种趋势不仅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经济进程的有力影响和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而且也表现为某些国家中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的某些工业部门的国有化。与此相联系,政权的执行机构被加强了,而代表机关则被削弱了。

196 现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资本的日益国际化，不仅建立了强大的跨国公司，而且，资本在某些国家间连成一体，以掌控全面的发展，并避免这一发展中可能发生的民族利益冲突而引起的强烈动荡。这种机构和公司的存在表明：既然各国斗争的结局不再取决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应和可能性，社会主义运动便再也不能仅仅关闭在本国范围内。进步运动越来越大的联合，或者至少是成功的协同动作，就更加必要了。

同时，当代世界还面临着一个十分特殊的新形势，即强有力的毁灭手段的发展。这一发展部分地是所说的科学技术革命的结果。在这种形势下，解决世界冲突问题具有了完全不同的规模和可能性。过去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曾是它们对内政策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而今这一发展逻辑会导致任何逻辑的丧失，因为生物本身的生存成了问题。这里，毁灭性手段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反面，渐渐成为各种制度和各国之间虽然松散但毕竟存在的共处的保障。两个强大军事集团的存在给当代的形势也打上了特别的烙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这种情况的制约，对于这种情况至少是必须予以考虑的。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允许发生可能使其生存成为问题的、比较突然的内部变化。与集团世界并存的还有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进行了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它们的解放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存在很多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世界发展现阶段的特殊标志。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原料基地，转到了这些地区自由国家的手中，这也给今天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因素。还有一个情况也有利于这种形势，即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都具有反集团情绪，所以不结盟运动尽管本身是五花八门的，却是当代历史的特殊因素。

从这些简短扼要的提示中可以看出，当代进步力量的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力量还是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是由一些与之并存的情况所决定的，而这些情况同几十年前的历史情况有很大区别。但是，对

此还应该补充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对研究这些国家里的当代共产主义所经历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影响。当代共产主义是在迄今没有过的政治民主中发展的,在这样的民主中,进步力量要求的组织、出版、思想、罢工等自由的夙愿已完全实现。进步运动正在具有群众性,而又不断积累他们一旦执政时所需要的经验。我指的是在市政管理机构中占领许多阵地的经验,而参与决定、工人监督、工会作用的加强及其自治程度的提高,都反映出劳动者思想发展中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反映出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旧结构中出现新因素的进程。革命进程从而有了另一种动因,因而它的发展阶段也必然是另一种情况,有别于“传统的”发展阶段。对此应补充一点:工人阶级不再被孤立于自己的雇佣关系和经济与政治上的异化状态中,而是在社会活动的各种不同而往往是全新的部门中,同广大的劳动者阶层平起平坐。昔日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基本关系,今天在某些国家几乎已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农民阶层减少到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因此工人阶级与很大程度上同工人阶级共命运的广大中间阶层的关系正在成为新联盟的主要问题。

当今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令人震惊的经验。在看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时再也不能持以下论点,即认为资产阶级自由纯属形式;执政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对于进步运动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某些运动为这种短视和天真付出了代价,不仅使自己的队伍大为缩小,而且从历史的角斗场上销声匿迹达几十年之久。类似的经验也是惨痛的,甚至是极其惨痛的,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名义,那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野蛮的经验。进步运动对于如何评价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如何说明它的特点,可能还处于犹豫不决状态。但是,有一点今天已完全是既成事实:一切爱好自由的进步力量都对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愿望的典范的说法很反感。对此一定要补充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于斯大林主义的狂妄要求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抗,在制定和发展那些唯一配称作

198 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自治的思想日益成为根本的历史思想,一个争取人与人新关系中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战役,就是在这一自治思想的标志下日益开展起来的。尽管在南斯拉夫的情况下,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其不发达状态,这一全部过程是在较狭窄的民主范围内进行的,但自治思想本身及其迄今的部分实现肯定具有历史意义。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某些欧洲共产主义党和运动自己的理论和政治经验。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巴黎公社和争取政治民主斗争的非凡成果,同时还有人民阵线政策的某些积极经验。西班牙共产党人经历了一场悲惨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可以充分地向他们表明,面对当代反动势力的工人群众队伍发生分裂和出现宗派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大利共产党人不仅有对付本国法西斯的足够经验,而且有思想敏锐的葛兰西和杰出政治领导人陶里亚蒂的重要理论遗产。这些运动归根结底必须从所有这些实践的和理论的经验中汲取对于解决自己的历史形势最恰当的认识和鼓舞,而这种形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决不同于马克思或列宁时代的形势。列宁解决本国形势的办法,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对所展现的当代世界新的,而且非常复杂的情况提供答案。但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和实践创造性,如同马克思的深刻理论思想一样,也是可以作为典范的。

这就是说,西欧共产党面临一项像几十年以前一样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同时又没有现成的药方。今天,至少欧洲历史形势的特点不是即将发生某种导致社会的和人类的灾难性的战争冲突。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斗争的战略是必须主要依据对于较长期的前景和发展的观察,而不是依据什么近期的革命斗争。鉴于在这些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民主条件(当然,这从来都不是彻底可靠的,这些国家的运动必须考虑到这点),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造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问题具有了新的轮廓和特征。

首先,根据我们所说的斯大林主义的经验,如下思想可能一直是

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不应在公民的民主权利方面倒退一步，而应通过社会主义新的民主内容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加深。这就是说，应利用这些国家现行宪法所保证的一切民主形式，并在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关系结构中注入新的社会主义因素。这只能意味着，夺取政权并不是一场更深刻的革命转变的开始。这些党必须解决几个重要问题：避免因采取一种宗派主义的、形式上激进但在不久将来没有可能实现的政策而使自己孤立起来；克服对其他社会主义运动和进步运动的狭隘的宗派主义态度；摆脱任何受监护地位，能够自主地作出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并对本国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负责。

这些党至今所关心的恰恰都是这些因素，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社会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为夺取政治阵地而斗争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决定性问题。对于一个发达的西欧社会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理论问题可以留作事情的第二部分，尽管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同第一部分密切相关，因此也不得不略谈几句。第一个时期以夺取政权并把资产阶级国家变成过渡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结束，与此相联系，欧洲各共产主义政党首先向其他一切进步力量建议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些目标进行共同的斗争，同时，在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都尊重政治多元化。这些党同过去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区别基本上有两点：其一，它们仍是革命的党，即公开宣布在夺取政权之后不愿意停留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而是打算通过各种措施消灭它；其二，它们准备以革命的暴力回答资产阶级的暴力。今天，谁也不能预言在这样的政治进程中都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形势，因此任何盲目地和无条件地只依靠和平的议会道路的主张都是非常轻率的。 200

但是，要使这样做能成功，不仅需要广大工人群众对新政权的支持，而且也需要有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地利用各种行动的准备，例如总罢工的方法就是可行的行动之一。因此，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那样，这些力量当前的斗争不能仅局限于议会斗争的政治形式，而且

也要占领其他各种社会阵地,还要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使其思想和行动不再受过去那种对党、领袖、国家和政治机构的非常强烈的偶像崇拜的束缚。在群众的意识中需要有深刻的转变,他们在市政机构和企业中采取当前的行动时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并不以夺取政权而告终,它是对社会关系实行革命变革的时期,而变革的方向就是要在自由生产者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综合社会,消除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

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不仅仅是个别政党,还没有充分地解决对政治因素的基本关注问题。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和其他社会主义力量一起夺取政权的问题,以及随后“自上而下”地采取仍以国有化为主的措施来战胜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力量必须彻底认识到,从所有这些行动来看,这一切都仍然停留在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仍然停留在由社会主义政治力量掌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内。因此,更彻底地澄清这个问题,进一步明确基本目标必须是消除使任何剩余劳动脱离生产者自身的异化状态,而使现行形式和结构都适应这些国家的自治,这不仅是将来的,而且是他们现阶段斗争的根本问题。在可能发生反革命反扑时,动员劳动群众保卫新政权,比动员他们保卫其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权力和管理自己的生产与分配这一新的历史成果毕竟要困难得多。因此,必须写

201 在所有革命旗帜上的、当代历史上令人鼓舞的基本革命口号,就是自治的口号!

在这个时期,西欧共产党人和革命的社会党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发现尽可能适应上述形势的革命和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样一种认识已逐渐成熟起来,即认为斗争条件同几十年以前已大不相同了,坚持旧的公式会使运动遭到明显的削弱和孤立,这无异于把历史舞台让给基本上是在旧社会范围内活动的各种资产阶级势力和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势力。影响他们改变全部政治战略的首先是对那些社会中巨大变化的认识,广大阶层已完全无产阶级化并完全同工人阶

级共命运了；其次是世界的集团划分以及当代核武器的破坏性几乎排除更大规模战争灾难的可能性；最后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变化，尤其是国家的变化和高度发达的政治与文化民主为新的认识和新的历史前景提供了可能性。

大多数社会主义理论家和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在自己的分析中都同意如下观点：我们不应再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仅仅看作是赤裸裸的镇压力量，而且还要看到它也掌握着广泛的“意识形态的机器”[卡里略(S. Carrillo)语]，它的统治也基于这样的机器之上。而由教会、学校、大学、新闻机构等等构成的这一机器的大部分都愿意为摆脱资本垄断而斗争，并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同盟者。它们对社会主义政策的接受和支持，必然会对国家的镇压机构产生影响，这在当代革命进程非常复杂的发展中，从挫败任何反革命企图的需要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这些共产党采取如下方针的理由，即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向它们提供的一切合法条件，同一切关心扩大民主并最终关心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力量进行合作。这就是意大利人的“历史性妥协”，法国的左翼联盟以及西班牙人的和解政策的含义。事实上，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广大劳动人民，都不仅存在于共产党内，而且存在于其他许多党内。而没有他们，要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企图再现俄国或者南斯拉夫经历过的革命形势，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形势是在完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如果这样做，就是否定既定的历史成就，就可能导致人民群众和政治先锋队的分裂，并且为反革命企图提供方便。社会主义必须继承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成就，而且在自由问题上必须超过它。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意义和前景仅在于此。

欧洲共产主义者关于在这样的发展中必须尊重宪法的合法性、多党制原则和选举结果的观点，绝不是什么竞选策略，而至少在这样的形势下是最恰当的解决办法。因此，将来的过渡性社会也不再称为无

产阶级专政,而且法国共产党人尤其坚持从纲领中删去这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表述。这在共产主义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像不久前从西班牙共产党的名称中取消“列宁主义的”这一定语时一样。但是,应该记住,这里谈的是政治,而不是科学!而政治就必须考虑环境的变化及其对运动的一定影响。资产阶级带着这个应保障某些基本自由的“民主”口号进行活动实际上已经有好几十年了,与此相反,“专政”这个词按其词义却是对一些起码的社会自由的否定。谁也没有言及的是列宁曾经非常明确而又有根据地指出,任何阶级的政权都是一定的专政,因为它在保卫其制度时依靠各种暴力手段,这些暴力手段在历史进程中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舞台上了。但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建立之后,在广大群众中,专政的概念具有了完全确定的含义。今天要想使谁相信任何政权都是一定类型的专政,相信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更发达的民主,那是幻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用“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更有道理得多的术语来同“资产阶级民主”的资产阶级术语相对抗呢。

203

此外,发达国家形势的特点还表现为工人阶级不再孤立,在政权问题上它可以指望处于相似的社会关系的广大劳动者阶层的支持和联盟。列宁在谈及俄国革命的一定阶段时曾讲到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可能性,同样,在现在的情况下也可以谈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阶层的政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联盟和政权的实质也必须由构成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的阶级的基本历史利益来决定,这个阶级就是生产者阶级。这并不是因为这个阶级理应具有某种特殊地位或理应享有特权,而是因为它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支配剩余劳动,也就是统治社会。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葛兰西语)在这种政权体系中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必须保障自己劳动的产品不被异化,不管造成这一异化的是什么势力。只要国家还存在,它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将掌握暴力手段,以保卫其领导权,防止任何推翻它的暴力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领导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像资产阶级领导

权是资产阶级专政一样。

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理论家在为“无产阶级专政”一词进行解释和辩护时试图以某些不发达情况为由,如说俄国当时的情况是无产阶级构成社会的明显少数,而且由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内战而使情况更加恶化了。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够的。问题不在于国家或社会环境发达的程度如何。发达程度只能决定社会进程中民主的广度,而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政权的性质。我们知道,列宁把任何一个阶级的权力都说成是专政。但是我重复一遍,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专政”的各种形式对当代社会的发展都是无所谓的。同样,这些形式也不取决于个别人、个别组织或阶级的善良愿望,尽管他们在很多方面可以对这些形式产生影响。因此,资产阶级专政可以表现为各种民主的多党制形式和法西斯的一党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也一样。当然,尽可能地保证发展的多元化,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卵翼下,都有利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它能保证更大的社会自由,而社会自由是个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更充分和更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

204

所以,不能说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对立面的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观点在理论上已经失效。但是,上述具体的历史经验、现象和环境不仅说明在政治斗争中放弃这一术语是正确的,而且指出这样做是必要的。在对个人、整个阶层和阶级以至整个民族实行极权主义的暴政(当代人类把这叫作专政)的一切情况之后,为什么要听任资产阶级把它那时代错误的社会制度叫作民主,而革命力量却仍用名誉扫地的和不受欢迎的专政字眼来称呼自己的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高兴并捞取选票呢?!

我们说过,鉴于紧迫的政治斗争和必须勾画出能排除存在的消极东西并符合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的水平和心理的发达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政党首先关心的是那些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自身不能解决这一重大历

史问题。从迄今的分析中我们看出,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国有化肯定是在限制和战胜私有制社会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我们仍然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社会范围内开展活动,而制度本身在本质上仍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不论代表这一制度的是什么势力。已有许多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认识到了这点,尽管对这整个问题的研究和制定纲领的工作还不够全面和深入。而且,巴索说得好,这些运动还依附于许多政治范围。但是,在进行众所周知的所有政治干预和政治清算的同时,长期以来就已开展了一种标志新的社会革命萌芽的社会运动、社会动荡和探索。这里说的是各种形式的参与和活动,它们是新的社会关系的真正历史前景,因此对待这些进程的态度,肯定是当今社会主义运动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今天,这些政治运动有可能通过各种形式的直接民主,来发展并加强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民主意识和管理经验。从而,在把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之后,他们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国家官僚主义管理和干预的阶段,并且可以立即把国家监督和管理机构的繁杂体系变成自治社会组织的服务部门和职能部门。

阶级斗争发展现阶段的根本特点恰恰是工人监督和自治这一真正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力突破。辩论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了,而且这些倾向和论战也渗透到实际之中。我们可以说,这些倾向和论战是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的:其一是现行的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直接民主问题,其二是社会主义力量夺取政权之后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发展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发达的国家里出现了工人斗争和组织的新现象,而这些现象过去没有以这种形态存在过。“工人委员会”(西班牙)、“企业工团主义”(意大利、法国)以及各种参与形式,首先是参与决定和工人监督问题,成了当今发达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现象。许多新工团主义的理论家——卡马乔(M. Camacho)、高兹(A. Gorz)、特伦廷(B. Trentin)、马勒(S. Mallet)、福阿(V. Foa)等人——对工人阶级中的新形势及其要求已经作过告诫,而这些要求再不能仅仅用经济的要求和目的来解释了。工人阶级的比较发达的部分已经清

楚地看到自己被剥夺的地位,他们的斗争日益具有反制度的性质,即具有改变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本身的方针。如 K. 科茨(K. Coates)所表述的,工人阶级通过其工会行动加强斗争,为了争取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争取对经理的活动进行监督,以及对裁决的否决权和工人履行这些职能的代表权。

与此相关,工人参与和工人监督的历史性问题被提了出来。仍在继续进行的大辩论涉及的问题是:在当前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形势下,甚至在存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情况下,应该支持参与决定的进程,还是立即过渡到工人监督的制度。激进派的大部分,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党人,都非常坚决地支持这样的论点:参与决定绝不是工人阶级争取其权利斗争的典范形式,因为它归根到底是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组合。因此,参与决定的政策可能使实际关系神秘化,使资本主义得到挽救,让工人阶级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承担责任。因此,在这些讨论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行动中,占据上风的论点是:工人监督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工人参与决定的形式,而自治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形式。无疑,这种解决办法是现实关系和可能性的最恰当的表现,也是本身包含有重要历史新因素的解决办法。但是,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参与决定的形式是否也是“训练”工人阶级,使之尽快掌握情况和管理的一切方面的一种可行办法,而工人阶级如不掌握这些,往后的统治是不可能的。要是通过革命组织和工会给这一现象规定一个明确的界限,不是把它理解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而看作仅是更激进的管理关系即工人监督和自治的起点,那就更好了。

谈到这些阶级斗争,至少还应该提及革命运动在议会民主制度下通过夺取在市政机构及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和机构中的各种职能而积累和获得的相当丰富的经验。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这方面积累起来的,从这一经验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除已提到的全部进程之外,劳动者将不是在掌握政治权力之后才开始取得最初的管理社会的经

验,相反,掌握政治权力将是在各种参与和管理形式中已取得的许多重要经验的结果,是劳动者觉悟提高并且有能力立即掌管工厂和社会事务的结果。社会革命通过这些现象便历史地开启了!

207 可以很容易设想,劳动者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夺取社会阵地的斗争将使他们的许多其他创造性斗争形式也浮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对许多并非总能预料到的倡议有所准备。由于这种种原因,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到的,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组织和议会制度进行的政治斗争来评估当代阶级斗争的广度和深度。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也认识到了这点,尽管在我看来它们还刚刚站在就自治和社会主义问题的全部战略进行历史性大辩论和研究的大门口。对目标的提法仍具有浓厚的作为资产阶级民主迄今发展成果的民主主义思想,而国家则仍作为在某种紧急关头出现的救星(*Deus ex machina*)^①,因此劳动者的自我组织不是非常明确地居首位。

由于这一切原因,我不认为,欧洲左翼运动已处于某些戏剧性的历史胜利的大门前,而是处于改变自己的政治斗争思想和全部社会主义战略的大门前。我们看到,在政治议会制度的策略中这一斗争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利用已存在的可能性来夺取尽可能多的社会阵地,无论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和工人监督,还是通过某种初始的自治形式。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可能比较彻底地实现自治的思想,但通过所提到的社会活动的其他形式却可以进行理论探讨,并使劳动者对自治的社会主义内容和进程有思想准备。还要再强调一遍,无论是社会主义力量,还是共产主义力量,都还没有彻底摆脱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解决时代的根本问题的。广大群众在很多方面还不清楚社会主义的这些重要特征及其失败的原因。偶像崇拜和雇佣思想还未成为历史,而仍然是历史的现实。虽然,未来的进程在社会主义力量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之后一段时间内仍

^① *Deus ex machina* 原意为古希腊罗马戏剧中借助戏台的机关解决剧情危急的神。——译者注

不得不考虑到国家结构的存在,然而只有国家消亡和自治进程及自治管理占据统治地位才是最后的历史性胜利。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性,以便使这一自治实践的萌芽,尤其是自治意识的萌芽,也成为统治思想,就像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在工人阶级中直到今天都是统治思想一样。今天已经是我们完全搞清楚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应该干什么的最后时刻了!

但是,共产主义力量在发达国家迄今的这些转变和所取得的进步就已经具有历史意义了。首先,这为建立左派力量和进步力量的联盟提供了可能性,而这些力量过去是处于分散状态的;其次,这就彻底摧毁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使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多么致命的。应该立即指出,走这条欧洲共产主义道路也绝不是沿大城市的林荫大道散步,这点他们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一战略也可能会遭到失败,有时甚至可能是很惨重的失败。但是,这不能成为反对这一战略和思想的任何理由,尽管保守的官僚主义势力和其他势力将会充分利用这点来反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不能忘记,迄今的思想及根据这种思想开展的实践也有过不止一次历史性的失败。

我在这里开展这些关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议论,是因为国际上非常需要开展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在结束这一讨论时,我想再强调一下,在这全部问题中,自治问题无论在进步力量当前的斗争中,还是在他们将来的斗争中,都是个中心问题。我们从理论上如何阐明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运动以怎样的力度朝以下两个方向,而不是只是一个方向来指明政治斗争的战略方向:一是政治的议会斗争的方向和形式及其相应的影响;二是为夺取新的社会阵地而斗争的方向,工人监督、工人委员会、工会斗争的新形式,在公社中夺取阵地和实行可立即着手的改革,等等。也就是说要为不断改变劳动者的思想而斗争,要把那种国家、领袖、政党取代昔日宗教机构并加以崇拜的

拜物教从劳动者的意识中清除掉。并且使劳动者看到,他们自己,即联合生产者及其他劳动者,是这一历史的真正主体和实体。我认为,当代的基本问题的这一面,在具体的革命历史实践中应占优势。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力量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力量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夺取社会阵地,对于一个新的、自治意识的断面,从理论上给予尽可能强大的影响。自治意识是消除那些使劳动者在其被异化的历史存在中成为奴隶的各种形式的拜物教的重要杠杆。

209

二、社会主义与不发达国家

如同资本主义通过自己的市场成为世界体系一样,战胜这一体系的趋势和现实也成了世界性进程,所以,再也不能仅从个别国家的一国范围来理解这一进程了。不发达国家的事态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这也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

如我们所见到的,俄国革命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南斯拉夫革命所实现的革命突破,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必须永远抛弃对唯物史观的机械决定论的解释。19世纪的社会进程未能如列宁在论述本世纪初形势的理论专著中那样对深化唯物史观提供足够的论点。列宁看到了突破俄国资本主义战线的可能性,此前托洛茨基也看到了这一点,但列宁的这个看法不是基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而是基于俄国因各种情况之凑合而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由此又引出了一个可能性,即在各个方面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落后许多的国家里,由组织得很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采取革命行动。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怪现象:这一革命突破不仅没有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希望的那样引起发达国家的革命,而且大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连支持都没有得到。但是,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俄国革命指出,在阐明历史时,对于人的主观因素必须赋予比过去更突

出得多的意义。

当代的革命进程、许多当今的不发达国家即不久前的殖民地和比前面所列举的情况更不发达的国家中的事态和趋势,要求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补充。这些国家及其革命解放力量的大部分都选择了社会主义。但是,这一社会主义方向不是由于这些国家此前的有机发展和阶级矛盾而产生的,而是由于这些国家具有明显国际性质的一系列情况而产生的。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程度很低,具有某些资本主义前期的、部族的、封建的和封建资本主义的结构,然而它们大部分都力求避免欧洲熟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道路,力求尽快地“跳过”这条道路,并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摆在社会理论面前,也是摆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的问题,是过去从来没有以这样的形态和这样强烈出现的问题。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方向不是由于国内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达到的矛盾程度而产生的,也不是由于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整个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反殖解放斗争的性质、国际经验和国际条件而产生的。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对于每一个反帝的解放斗争都有着强烈的影响。 210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显现出了一种迄今所没有过的特殊的形势,它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永远不应忽视的一系列特殊性。有必要至少简单地指出这些特殊性,以便我们更容易和更好地理解所谈到的努力和进程:

——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些国家的社会非常不发达,具有氏族的、封建的和殖民的—资本主义的关系和结构的残余,以及人数众多的不发达的农民阶层。这种情况使一些革命思想家,如 F. 法农(F. Fanon)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唯一彻底革命的力量,因为他们在争取自己的解放斗争中没有什么可损失。

——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反帝、反殖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而昔日的殖民主义者就是世界资本主义。这正是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和革命力量力求在各方面避免和跳过如此露骨地表现出剥削者面目的

制度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社会主义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的社会关系的否定而出现在世界范围的社会,所以这些革命力量选定社会主义是极其自然的。

211 ——选择社会主义也出于这些国家加快发展的内部需要,为的是尽快摆脱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依附,并使自己的国家达到当代发达的水平;没有这种发达,关于社会主义的任何讨论也是无的放矢。

——存在这样的认识,即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道路对这些国家来说过于缓慢,而且这些国家对以前的资本主义宗主国依赖太大,这样的发展会使这些国家在很长时期内保持在新殖民地的地位上,具有无法预料的后果。

——许多国家迄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经验表明,通过国家的积累、干预和计划,可以非常快地取得预期的结果。但从本书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作出许多努力,以便把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更明确地区别开来。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理论的原因,而且也由于非常实际的和人道的原因。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所产生的后果都不一样,而有的后果对于社会主义理念和社会关系及人际关系的存在来说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就像我们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所见到的那样。

——对世界明显的集团划分和双方的企图也是今天的特殊情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的发展。一方自诩为自由世界,另一方自诩为社会主义世界。对世界这样的集团划分只会把个别关系、援助和干涉的性质神秘化。与这种集团划分和集团依附状态相反,不结盟思想和实践的存在和发展首先是民族独立的保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也是历史上迄今所没有过的重要国际因素。

——经济发展的低水平——这也意味着社会意识不发达——同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和发达的生产力形成相对立的状态。迄今的物

质技术成果越是能保证更迅速的发展,上述对立和加速适应的过程对追求尽可能迅速自立的进步要求来说,肯定将增加越多的困难。

——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刚刚开始形成现代的阶级和民族及其政治代表;因此这些运动的某些领袖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阶级对抗,但是过去就已证明,这是必须迅速抛弃的幻想。 212

——这些社会中的许多社会也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所以很多人认为,可以利用某些社会的、心理的和思想的传统来加速发展协作和相互支援的社会主义关系,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私和奴役。

——除了如此特别地标志当代历史情况特征的所有这些因素(其中某些因素我们在前一章里也谈到了)之外,还不应忽视社会主义发展中迄今的许多消极经验和积极经验。这样一种认识日益加强,即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是加强和发展自治关系,并消除按其社会经济性质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国家主义关系。存在着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并不等于也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初的国家-社会主义关系很容易变形为官僚-国家主义关系,而且社会关系中的官僚主义畸形,必然引起人的个性畸形,无论把这种个性叫作社会主义的还是别的什么。

仅仅从所列举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出,不发达国家的形势同发达国家的形势差别有多么大,尽管这一切进程都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在一些国家里资本具有悠久的传统,工人阶级不仅占人口的一半而且经历了许多次革命斗争,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可能性,同那些工人阶级刚刚形成而历史环境同前者根本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话,无论发达国家的斗争条件如何,当代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都不能一夜之间就把国家和党扔到大海里去,那么在后一种情况下就更不可能了。这些力量可以赖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唯一比较有组织的力量就是国家。

由于在不发达国家迄今为止的解放过程和革命过程中,社会主义力量无论人数众寡,都一直没有占统治地位,我们可以设想,这些国家 213

今后的发展将会朝着两个根本的方向进行。各种或多或少进步的资产阶级力量,也希望自己的国家有更大的和某种意义上自我发展的军事力量,都利用国家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杠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构将同比较强大的私人资本主义勾结在一起,这将导致国家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对国际资本的依附将会更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达到极限,而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将是消极的,阶级矛盾将越来越大。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这些国家将面临新的社会革命问题,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都不能解决当代的社会问题。发展的另一个方向存在于这样的情况下:掌握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力量考虑到世界经验,采取对自己的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坚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力量为领导,通过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更大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阻止社会差别的加大,以及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方面,都可以发挥重大的和进步的作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将建立起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同时存在着没有完全分化的、人数众多的农民阶层以及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像某些发达国家曾有过的情况一样,国有化是限制私人资本和垄断资本的主要的政治措施和社会措施,这当然是历史上进步的和革命的措施,但也隐藏着许多危险。

在上述所有情况下,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都面临着非常艰巨和复杂的任务,像迄今一切革命变迁的情况一样。它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已由发达国家资产阶级解决的,而从历史上看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而且,资产阶级是在它取得了对世界上经济、政治完全统治的条件下,在从不发达国家和殖民地国家汲取补充的超额利润的同时,实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从俄国革命到今天,社会主义力量在为新的社会关系而斗争中所处的条件要困难多了。反对它们的不仅有以政治、军事形态表现出来的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而

且同时还有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经济竞争,在这一竞争中,发达资本的处境总是优越得多。这一市场的逻辑直到今天仍是资本主义的,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和生产也有重大的影响。这是以创造利润为宗旨,而不是以满足人们一定的历史需要为宗旨的市场,所以大量的生产和消费者心理的形成日益成为它的特点,而其反面就是把这样的劳动分工和经济、政治的异化固定下来。发达社会里的社会主义力量今天也没有能力向世界提供另一个“市场”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目的应该不仅是满足当代的历史需要,而且是大大缩短劳动日和取消劳动分工。如果在社会主义者掌权的发达国家里还不能实现这点,在不发达国家里就更不能实现。这些国家处于这样的形势下,必然更加感到自己的理想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差距,历史现实无情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

因此,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处境是极其困难的,它们不仅要求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而且也要求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大力支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发达程度,大部分是剥削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即曾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廉价原料基地的结果。另外,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方针则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利用迄今社会主义进程中的积极成果,避免消极后果。完全可以肯定,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对它们自己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也只有它们才能解决摆在它们面前的一切困难和矛盾。任何家长作风,无论是欧洲的,还是别的什么的,在这里既不需要,也不适宜。但是,如果这些力量不利用社会主义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经验和所经受的考验,那也是近视的。社会主义迟早要成为世界体系,所以开诚布公的和批判性的国际对话和经验交流,是其最顺利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

鉴于迄今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以及我在这部分里为了进行一次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而提出的某些见解,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领导不发达国家革命活动的社会主义力量不应把社会制度和

政权等同起来。如果国家机器在社会主义者手中,我们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同时要把政权的性质同仍然会是多种多样的——从宗法氏族的到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的社会经济关系非常严格地和彻底地区别开来。因为,只要是存在着国家垄断管理、国家积累、国家分配和国家计划,无论采取的是分散的还是完整的形态,社会就其社会经济关系而言都是处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些人也把这称为国家主义,或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通过建立自由生产者联合体,通过劳动者自己开始管理其经济进程、社会进程和政治进程的社会政治管理形式——这也要求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觉悟达到一定水平——来废除国家对管理的垄断,从而才能开始摒弃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为此,领导这一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必须利用迄今的世界经验,这些经验说明,把国家官僚主义的和垄断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经济关系混为一谈,几乎肯定会使社会关系和人的个性发生畸形。

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这种危险性恰恰潜藏于它们的不发达状况中,这种状况迫使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比理论上所设想的要长久得多地利用国家政权的杠杆。如果再加上由于我们在前几章里所列举的原因而或多或少被迫限制政治民主的情况,我们就不得不指出,这些力量现在和将来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考验,即如何使制度不致蜕化为官僚—国家主义的利维坦政体。这一运动的很多主要代表人物和理论家已经认识到其中的许多危险。许多人在他们迄今的发展中曾认为,通过宣称他们的政治组织是人民意志和全民愿望的表达者,通过避免阶级对抗,或通过尽可能地保证使人民接近或参与行使政权的职能的主张和努力,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但是很快就能发现,这不过是一种善良愿望(benevolencija),同历史幻想只有一线之隔。在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反帝反殖统一战线,不能原封不动地直接转入下一个建设新制度的阶段。理由很简单,因为那个战线中各种力量的社会地位毕竟不同——且不问其发达程度如何——而且每一种力量都是带着

自己的利益和自己对新事物的看法进入新的历史生活的。而人民,广大人民群众更大量地参加国家管理需要的是一般文化和政治文化相当发达的程度和全面彻底地了解情况。这些国家的革命力量在具体实践中将如何解决所有这些矛盾和困难,首先取决于它们自己的创造性、坚定性和坚持基本方向的决心。但是有一点是再明显不过了,即它们将面临上述一切危险,而其中对政权的最大危险,就是在不得不延长政治领域的无限威力、垄断地位及其近乎完全的仲裁权的情况下,它们陶醉于权力和充满官僚主义的习气。而且,它们抱着最善良的愿望和打算,想尽快实现所设想的目标或跳过某些阶段,并认为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简单地利用自己的社会传统,在这样的情况下,肯定也要犯一些不必要的过失。我们仅举三个例子:在中国,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宣布“大跃进”;在古巴,在生活的某些领域内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在柬埔寨,平等是把整个社会都降低到贫困农村的水平;等等。我认为这都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典型事例,即希望尽可能迅速而彻底地实现社会进步的愿望,是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实际可能和需要的。但是,这一切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从来不是按照彻底计算好和规定好的机遇和后果来创造的,今后也不会是这样。

需要再次强调一下,所列举的一切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都是当代世界的伟大转折。由于它们所处的历史形势也是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组成部分所处的历史形势,它们大部分都必然带有这些新的历史改造的烙印。因此,今天的不发达国家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上进步的 and 革命的解决办法,不过我们要再强调一下,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就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它为私人资本和垄断资本提供或大或小的空间。这样的制度是革命的现实,因为它不仅保证这些国家在世世代代被奴役和被剥削之后取得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而且为以后的社会主义进程创造必要的社会经济前提。我认为,说这些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方针”是正确的,这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自己也使用这个词。关于对现存的一切及其

界限和克服它们的途径的这一批判性历史意识,肯定是全部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种意识可以成为防止许多不必要的谬误和幻想的防护堤,而谬误和幻想很容易发展成为非常有害的神秘主义。我认为,对于未来所有的社会主义愿望和斗争来说,斯大林主义是足以引以为戒的。

社会越不发达,亦即工人阶级力量很弱,贫穷、落后的农民众多,政治机构——国家和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就越大。尽管这些力量面临着前面已提及的许多严重困难,但它们在初期却是这些国家加速发展的思想和方法的基本源泉。有关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一切抉择都是在领导机构内进行的,而群众基本上只是内部冲突、被革出教门和经常被粗暴清算现象的消极观众。在这种不发达的形势下,又由于其他各种客观环境的凑合和某些人物的个性,永远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和危险性,即排他的和赤裸裸的官僚 - 国家主义思想获胜,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不会干别的,而只会把现实关系神秘化,就像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的情况一样。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这些力量陶醉于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包揽一切的权势,它们基本上把实际的革命发展引上了官僚极权主义的轨道,这在那个时候就已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运动内部各个派别之间的粗暴清算,只是这种退化过程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这种退化过程可能在较长时期里阻挠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际进程,即阻挠通过逐渐加强自治的进程使国家和政治领域消亡的进程。本书已多次指出,认为在上面所列举的社会中,甚至是在发达得多的社会中,可以迅速地甚至几乎一夜之间就彻底建立起发达的自治社会,那只是幻想。发达的自治社会也就意味着消除社会的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但是,这是基本的社会主义进程和共产主义萌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宣告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整个历史时代的终结,这点本书已充分阐明了。因此,当相应的阶级力量存在于甚至还不太发达的形态中时,放弃使这些过程开启的机会,那是社会主义力量的重大历史失误。我们也需要再次强调

这样一点：人类不会简单地跃进到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形态中。迄今任何一个阶级在建设自己的阶级关系时都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有过各种各样的失误和弱点（insuficijencija）。工人阶级及其他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历史的失误和失败没有免疫力，而且也不可能有免疫力。但是，尽早地开始自己这一新的历史实践，就可以节省几十年的历史行程。

关于较发达的社会已经说过的看法，我们也可以针对处于不太发达的历史阶段的国家再说一遍。新的政权越是闭关自守、自满自足，越是要家长作风对待群众，使群众成为命令和决议的消极观察者和执行者，同时，加上必然存在已提到的一切经济困难，国际资本的反革命势力首先通过各种军事政变就越能轻易地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这些革命进程的领导力量尽力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本土的特色之上，这些特色渊源于同当代发达世界有很大区别的传统。初看上去，似乎是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任何的家长制。尽管这种做法也是完全对的，有道理的，但他们追求本土特点的愿望首先是出自对于在传统和可能性方面都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这些运动中的任何一个都必须找到自己发展和革命的阿基米德点，任何一个外来的解决办法，不论它多么非凡，在社会结构和传统都根本不同的国家里，不一定会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革命者也曾不得不寻找自己特有的和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南斯拉夫、古巴、越南、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安哥拉等革命者也一样。对于任何一种家长制，尤其是对于家长制的恐惧之所以有道理，还由于一些别的理由。首先由于欧洲工人运动本身也有教条主义，它至今没有摆脱本书所谈到的许多偏见。用这样的社会主义兵器很难穿透复杂的和不发达的社会结构的甲冑。 219

但另一方面也不应忘记，迄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非常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开始其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中国、南斯拉夫、古巴等在社会变革开始时都是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传统的不发达国家，尽管比之所谈到的许多国家要发达。但是，这一不发达状态恰恰是一条共同的线，把这些国家及其进程和可能性同今天处于类似地位的国家联系

在一起。因此我认为,分析研究和利用这些国家在各方面发展的经验,对于今天的不发达国家具有很大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经验中有些是有积极意义的,而有些则对这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和准备为新的人际关系作出最大牺牲的建造大师们来说是真正灾难性的。

因此,我认为,在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中也存在某些必须予以考虑的至高要求,尽管每个国家都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特殊的运作以达到这些要求。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低估本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发展,因为这毕竟是发达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乃至社会主义不可回避的前提。在阶级还没有充分形成的地方,在这样的发展中形成的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变革的前提。同样不应回避已非常令人信服的事实:发达的现代社会不能建立在农村的旧生产方式基础上。农村的生产必须经过彻底的改造,以使其工业化,而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大量减少。

从这些国家迄今的发展中已可明显看出,在这样的发展中,内部阶级斗争和政党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些运动的某些领导人最后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当代世界和当代发展,就不可能理解内部发展的这一切因素,以及它们之间互相冲突又互相交织的情况。这些国家的进步社会力量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将如何解决这些政治问题,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从本书这部分迄今的一些分析和结论中以及从这些力量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中可以看出,它们大部分恰恰将被迫在开始阶段加强政治领域即国家和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而且由于前面已谈过的一切原因,将被迫采取一党制。

许多运动在尽快提高本国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任务方面,面临着对劳动实行物质鼓励还是精神鼓励的抉择,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两级化,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感到奇怪。出于一种合情合理的愿望,即避免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和物质繁荣带来的高度文明而产生的畸形,革命力量往往喜欢把自己的愿望和观念宣布为最高法律和它们的社会主义发展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是,迄今的发展已充分表明,在现

今的社会主义发展中不能完全避免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一定范围,就像不能避免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预、限制和纠偏措施一样。迄今的经验表明了我所提到的一定的不可避免性,但也表明了,如果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方面找不到足够有力的对策,来对付政治领域过大的统治和影响,同时也对付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刺激和只关心物质利益的自发势力及其无法抑制的作用的话,就会出现非常现实而不可避免的危险、缺陷和歧途。在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一个革命运动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有冲破这一切历史的艰难险阻而又很少受到损伤的能力。

领导力量尊重社会主义的社会批评,并愿意就国家所面临的每个重大问题²²¹进行非常必要的对话,因为从来没有现成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也属于迄今社会主义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经验。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领域是避免不必要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偏差的最重要保障之一。

已经说过,十月革命以来,在社会主义力量迄今的一切突破和夺取政权活动中,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是,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力量掌握了国家的政治机器,把资本的主要杠杆国有化了,并实现了一定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还背着许多旧传统关系的包袱,从宗法关系、小资产阶级关系到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前面也已指出,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国家掌握积累和国家计划,这些都仍未超出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而且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是部分的,也可能是全部的,作为领导力量的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因而历史方向也是各种各样的。现今的不发达国家大致是在重复出现另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其不发达阶段出现过的同样的问题、困难和抉择。鉴于这样的形势,迄今社会主义发展中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批判地认识到,不能把掌握在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手中的政权同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我认为,这些力量也必须认识到,存在着官僚化和其他各种缺

陷的危险,这是官僚化—国家主义的管理,即国家社会主义必然带来的东西。如果没有对策,很容易形成一个官僚化—国家主义的阶层,它可以完全取消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对整个社会进程的任何比较有力的影响,从而妨碍并阻止这一进程。因此,应该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克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化,无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异化,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范围内的异化。因此,如果我们按照最深刻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社会主义,那么实现自治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志。

222 现代化意义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建立在任何集体的、当地一律贫困的基础上,尽管农业生产中的合作社形式和集体农庄形式是进一步社会化的基础之一。今天的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生产资料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在工人阶级有发达的文化和社会主义觉悟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这种民主不仅保证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公众舆论的形成,而且保证由生产者掌握社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社会主义是日益认识到自己作为自治者的历史作用的发达的个体之间进行协作的社会,而不是由于盲目崇拜社会的领导层而任人摆布的一群有着千篇一律的集体意识的个人组成的综合体。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发展和关系达到这样的水平需要整个一个历史时期。但是,为避免许多歧途和偏差,还需要有明确的历史目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国家在其发展中的这些情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面临的问题,同不发达国家迄今实现的某些社会主义革命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很多自己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产生于它们的内部结构和作为其外部历史条件的环境。不能机械地搬用那些在较发达情况下迄今有价值的经验、理论和实践成果;同样,不考虑和不研究社会主义力量已掌权的国家迄今的正反经验,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对迄今的历史成果和自身的成果与可能性作批判地认识,发生更严重危机的危险就会大得多。同样,应该抛弃这样的

幻想,即带着原封不动的民族集体主义的意识可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国家主义的利维坦政体可以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即取代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管理社会事务和整个社会共同体。

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革命思想,这是从本书全部论述中得出的论点。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发现人类创造性和人类生存的新领域,如果它不能为解决当代历史矛盾提供理论依据,那么它就不能成为革命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正如历史上迄今任何一个革命原则或革命思想一样,实质上是人之生存新的人道主义理想,是对人的生活、文化和意识的更高级形态的强烈愿望。

但是还应该指出,挥舞马克思的著作和语录,绝不是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真正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证明。更有甚者,那些断章取义地并以意识形态化的方式用马克思著作和语录来为自己的实践作辩护,以为赌咒发誓就足以证明自己具有优越性和进步性的人的非批判态度,可能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恰恰是这种“肤浅的热情”导致这样的情况,即把不符合他们思想的一切,无论是资产阶级文化,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别样说法,统统宣布为颓废主义和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和实践,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环境和代表它的力量的组成部分。它不是什么宣言,而是反映一定历史存在的历史思想。假如马克思主义堕落到只是官方政策的伴侣的地步,假如它的理论活动的范围就是政治决议和强加于它的理论公式,那么它也可

能成为像任何保守的意识形态一样枯燥乏味而没有创造性的主义。那时,它就会失去自己的灵魂,成为徒具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是如下事实的见证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形成自己的烦琐哲学都没有免疫力。因此,对每一个理论步骤和实际步骤保持一定的距离和批判的态度,是胜任并完成历史任务的先决条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辩证思想,我们决不能忘记,其辩证思想是从现实本身的辩证法,尤其是从历史辩证法中汲取来的。而这一辩证法比任何人的命令、评价或设想都更复杂,更难以预料。这是又一个理由,说明在理论方面不能有任何的清一色,而批判性的和热烈的对话是在这一领域里继续前进的重要前提。一个不得不经常选择一定的解决办法的政治领导的伟大之处,恰恰表现在他是否有能力把创造性的对话和争论作为尽量减少自己的片面性的最好保证。

马克思主义的经院哲学在从事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时,长期以来把社会学宣布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科学;它在研究自然辩证法和历史的关系时,如果有谁怀疑自然辩证法,就认为他是罪大恶极的;它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不考虑历史的哲学领域充满了需要分析和阐明的问题;它在研究革命问题时高谈阔论,摒弃任何认为异化范畴可能有助于认识革命的想法;它写的教科书全部是从物质开始,以意识形态结束,而其精神和水平不超出黑教授写的经院式教科书;它把一切怀疑新教条及其现代拥护者的人都宣布为修正主义者和各种机会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复兴已持续了一些时候,它不是来自官僚主义的和官方的机构,而是来自某些自由的、有才干的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仅感到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感到当代社会孕育着如此多的危机,在那些没有预料到有危机的社会里也存在危机,以致人类学问题和历史问题成了检验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理论试金石。

225 同样地,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复兴与对它的创造性解释和运用,首先是在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革命形势下发生的。它或者发生在动荡而严重的国内形势或战争形势下,如中国和南斯拉夫的情况;或者是在对发达国家的复杂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作的分析和评价中表现出来,如欧洲共产主义的情况。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分析并非少见:它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只去寻找“单纯的”形势,而看不到充满非常复杂和矛盾的结构和形势的最新历史形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非此即彼”的激进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可能是非常实用和受欢迎的,但在实践中并非如此。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新的形式既未形成也未得到检验的情况下就非常轻率地抛弃旧形式。他们也非常轻率地把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整个工人阶级的觉悟混为一谈,这是明显的历史幻想,这点已得到了多次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因此,当他们清楚地看到某些机构或组织的消极方面时,就非常轻率地把议会制度、工会和党都抛掉,尽管这些机构还团结着工人阶级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大多数。

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愿意观察新产生的结构和关系的矛盾和特殊性,而是简单地把它们归结到已知的东西上。比如,如果他们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义时期不仅存在畸形的问题,而且是根本上消极的结构的进程,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他们不能对此作别样解释,而只是把它归结为迄今所熟习的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此再迈出一小步,就会把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宣布为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了。

马克思主义恰恰应该在理解和解释一定的历史现象中表现出自己在理论上的深刻性和优越性。我们不能把这些特定的历史现象简单地归结到过去的结构上去,尤其是在今天,新的社会主义关系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同时,这里还不仅有新的矛盾的结构的问题,也有这些矛盾结构的根源、其体现者所援引的理论、管理这些结构的政治组织等附加因素的问题,这些因素使这里的现象更加复杂而不

易被看清,从而在理论上更加难以解释。

还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实践的特点从来都不是表现为摒弃那些能够团结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大多数机构,而是表现为利用一切已成为工人群众斗争组成部分的机构和组织来寻求革命发展的道路。上面所说的激进主义,由于看到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问题是这些机构的必然伴侣,因而对任何形式的政党都经常持抵制的态度。但是,在如此政治化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世界里,他们却因此失去了进行有成效的长期政治斗争和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些基本杠杆。如果没有为了革命顺利发展而考虑在政治组织履行职能中,尤其是在掌权情况下的反面经验,那也是近视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目标并不是建立统治,既不是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不是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名义实行的统治,而恰恰是取消一切统治。

同时,根本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找到全部解决办法,因为某些重要问题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历史辩证法也像哲学和科学一样,不断地揭示问题的新领域,更不必说旧的问题在新的环境下和新的经验中获得新的解释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多价性的理论,即观察和解决这些复杂而困难的问题的各种方案都是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重要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活动塞入某种规定的模式的企图,是幻想、天真和倒退。换言之,必须指出这样一点,只要马克思主义思想仍有生命力,更有创造性并是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革命原则的体现者,“马克思主义”一词本身就是有含义的和有道理的。经过当今的这些历史风暴和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在相应的历史学科中将占据应得的位置,如同迄今一切伟大而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一样。

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遭到一个创造性的思想所遭到的最坏的命运——在很多国家里成为官方的主义——的话,以上的所有这些提醒就都是无的放矢了。这里所说的官方,不是指拥有优先的地位,因为

一定的历史力量永远有权这样做,而是指禁止其他的理论思想和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排他性解释。当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由国家和警察保障它在自由对阵中不致遭到失败时,它的这种地位就已经是最重大的历史失败了。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迄今所遭到的最重大的失败。

由于这一切理由,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不管以什么形式掌握政权和国家而出现的这一全新的特殊形势。迄今,主要是在不发达的情况下,不仅非常轻率地把马克思主义宣布为官方的科学和理论,而且限制并阻挠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较全面的对话。因此,如果我们不从迄今的发展中吸取经验,那是非常轻率和短视的。

前面说的是第一条经验,即无论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必须靠自己论据的力量,而不是靠国家政权的力量赢得自己的优势地位。

第二条重要的经验是:社会主义力量不应把采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方针的力量在其中占优势的政权,同社会的经济关系等同起来。如果不去进行不懈的工作,使劳动者进一步摆脱一切已知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异化形式,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就可能非常容易地蜕化为具有各种明显畸形的官僚主义结构。这就是说,要不断加强和发展直接生产者联合的各种形式,建立使自治关系成为基本社会经济关系的社会共同体。

可是,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什么,这不仅取决于领导力量的美好愿望和意图,而且取决于该国的整个发展水平和一定的国际环境。在不发达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主义力量只能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它作为过渡形势来说意味着已达到一定历史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因此,它在历史上是进步和革命的。但是,这些力量还必须认识到它们是在建设什么,而且必须作出一切努力逐渐消除这样的关系,而不是夸大它并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

的最大成就。

最后,在估计各个阶级的历史觉悟时必须实事求是,而不能因为有了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觉悟,就认为觉悟已经很高了。这是最困难而且最缓慢地进行着根本改造的生存领域。而且,这个领域在最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些阶级的地位,这些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着各种变化。如果再加上传统的顽固性和严重程度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和产生这种生活方式的一切媒介的强烈影响,那么当代历史觉悟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就可想而知了。

只要有一个阶级(这里说的是工人阶级,当谈到当代的革命主体时首先指的就是它)还不打算通过任何群众性的手段(总罢工等)击退破坏其权利和要求的各种企图,不打算彻底否定把别人和自己当作客体的态度,即以任何方式使自身在战争冲突或各种形式的类似冲突中退化;只要它不打算在旧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就为参与的各种形式进行斗争;只要它没有能力摆脱对国家和领袖的盲目崇拜并在取得政治胜利之后立即开始建立作为工人阶级唯一的历史前景的新的自治的社会关系,就不能说它具有很高的阶级意识。从对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不满并确认必须消除这种关系,到认识到自己是现代历史和新社会关系的基本主体,在思想上有很大一段距离。

无论是欧洲发达的社会,还是欧洲工人阶级,都没有达到能够立即抛弃国家和政党的文化水平和觉悟水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体现这一觉悟的机构。这个社会也没有达到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就能完全克服专家治国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的发达水平。但是,它已成熟并发展到可以开启自治的历史进程。这是对这些力量及其政治代表是否成熟的检验。

由于这一切理由,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今天比以往任何 229
时候都更需要。朝上述方向努力的任何一项经验都是宝贵的,就像闭关锁国,把任何批评都看作干涉内政的官僚主义态度是极端有害的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讨论方面,不存在内部和外部的关系。

从迄今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中解放出来,使社会关系革命化,实现一个新的历史人道主义,不可能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党和一个工人阶级的事业。为了获得衡量每一项社会主义成果的较为可靠的标准,需要当代一切革命斗争的经验。通过理论探讨和直接政治联系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对话应该取代那种由小学老师式的批改和评语而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和闭目掩耳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行动中肯定是首先向本国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负责,但也向国际革命运动负责。他们对原则的任何破坏和消极作用,对其他运动都有直接的影响,并给这些运动的阶级斗争造成困难。

当我确定本书这部分的题目及其全部内容时,我的设想是,公民的资产阶级社会已成为历史的时代错误。但是它仍在寻找出路,尽管其方式基本上是不好的,因而导致本世纪数百场人类大屠杀,导致大量军事专政和法西斯专政的建立。那是一个出卖思想和良心的大卖场。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比较深刻的分析,在今天也可以显示出人的物化这一事实,这是反对这种状态和关系的足够的理由。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阶级斗争、发展生产力和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且也是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新生活内容的、新历史文明和新文化的原则。

因此,只有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彻底革命的思想,理解为分析和解决当代历史矛盾和寻求人的进一步解放道路的最有创造性思想武器的思想家和实践家才享有马克思主义的荣誉。只有那些不是把社会主义同万能的政治机构利维坦政体,同对思想和行动的极权统治混为一谈的人才享有马克思主义的荣誉。只有那些愿意在理论上对阵,在实践上实现政治领域消亡并同时建立团结一致的和人人平等的新自治共同体的人,才享有马克思主义的荣誉。个人的自由仍然是社会共同体自由的前提和主要条件。

注解和述评

231

绪 论

233

在本书的此部分中,我列举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思想家们犯的错误的最典型例子。但这就足以说明,任何自以为是并裁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苏联思想家们要是还愿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平等参与理论对话的话,务必深思。因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远远地走在前头了。如果他们还想援引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就应该作出巨大的、自由的和批判性的努力来讲明过去和现在在苏联和世界上社会主义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依然用非批判的、意识形态化的态度坚持那些在历史上已完全名誉扫地的见解,如果继续满足于用个人崇拜这种肤浅的说法来解释斯大林主义,如果继续认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标准就是对他们的官僚-国家主义机构持不批评态度,那么他们不仅将继续落后而且将很容易构成对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实际危险。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用扣帽子,更不用捏造和诽谤来解决问题。对这一切苏联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依附于他们的

人们应当深思。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不希望看到任何令人反感的进程旧病复发,既不希望看到这个旧病复发来自自己的内部力量,也不希望看到它是“兄弟帮助”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结果。

234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起源

当我们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人道主义和反国家主义时(尽管某些人有理由认为革命初期无产阶级还需要消亡中的国家),我们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包括早期和晚期的著作。的确,对于很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思想的所有人来说,有一点是毫不含糊的,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从《论犹太人问题》、《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反杜林论》,以及关于公社问题的手稿,对这个政治异化的官僚领域的抵制乃至敌意,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在早期阶段,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还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异化理论在那时就已对当代文明社会中劳动者的状况作了最深刻和最富批判性的分析。从马克思为第一国际写的关于1866年合作运动的文稿中就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清晰的预示。在这份文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如下论点:雇佣关系这一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由自由平等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共和、博爱的制度所代替^①。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他的后期著作中都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取得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更为突出,而且他首先谈到社会共同体各级管理的问题。马克思写道:“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

235

^① *Prva internacionala*, Beograd 1950, str. 63.

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①

马克思在同一本著作《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多处以富有指导性和批评性的表述写道：它“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②。

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后期著作中找到关于“联合生产者”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国家和政治领域的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谈到自由问题时指出，“在这个阶段上……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③。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一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和历史的全部思想。对此本书其他章节将会谈到。恩格斯在论杜林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同样是经典之作。他谈到了关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及接着必须开始消亡的革命国家的最后行动。恩格斯有一个观点鲜为人知，很少被人引用，即“老年”恩格斯在撰写爱尔福特纲领草稿时，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社会民主党与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把国家摆在私人企业家的位子上的看法，补充说：“这样就把对工人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奴役集中到一只手中。”^④在《反杜林论》中也有几乎同样的思想，恩格斯在书中谈到

^① K. Marx, *Gradanski rat u Francuskoj*, *Izabrana djela I*, Zagreb 1949, str. 4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译者注)

^② K. Marx, *Erster Entwurf zum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Berlin 1962, str. 5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194页。——译者注)

^③ K. Marx, *Kapital III*, Beograd 1972, str. 68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译者注)

^④ K. Marx i F. Engels, *Werke*, sv. 22, str. 596/597.

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和仍存在的雇佣关系。

这是所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讨论的基础之一。在这种讨论中,把社会主义同生产资料国有化、国家所有制以及不仅在经济和计划领域中而且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的国家垄断等同起来。

236 如果我们找出一些关于新闻自由、党内民主、讨论自由等短些的论文和书信,就可以看出,他们仍然肯定人在为其自由生活而斗争的所有积极而重大的成果^①。

有关列宁的观点,本书还会谈到。俄国后来的艰难形势迫使列宁作出许多重大让步。当然当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之后,总是可以从一个历史前景提出一个问题:当时对形势的某些估计是否正确。但假如就此得出结论,说列宁关于国家和革命的设想和主张只是革命前的梦想,与他的实际想法和意向相距甚远,那是对一位大人物的不理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不理解,这种关系在一定时期由于我们将要谈的原因而产生尖锐的矛盾。

在历史决定论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之间无疑会有分歧。列宁很强调主观力量,他不仅从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而且从整个历史情况出发来看待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因而在他的思想中产生了关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环节的这种提法。然而一位人物对整个一场变革是多么有决定性意义。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特别是在1917年10月24日即夺权前一天,在写给中央及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信件中告知当夜发动起义,并说明天会更好。有关这个问题,请看我的《论历史决定和人的自由》一文,发表于《人与历史》一书中,萨拉热窝1967年出版并收入《弗兰尼茨基选集》第4册^②。

^① K. Marx i F. Engels, *Pressefreiheit und Zensur*, Frankfurt a. Main 1969.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ski determinizam i ljudska sloboda, Čovjek i historija*, Sarajevo 1967.

第二章 放弃原则并开始编造神话

237

俄国革命,尽管关于它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是本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如果我们了解当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以及这一形势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激发的各种十分尖锐的矛盾,那就决不会感到奇怪了。大部分社会党人特别是曾任第二国际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反应十分消极。他们的右翼势力和中间势力早在战前特别是在德国投降后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发行战争债券。他们曾同当时的社会党左翼——在德国国内包括斯巴达克分子,在国外包括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生尖锐的冲突。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大派系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教条地坚持通过议会掌权。他们仅仅从法律政治上尊重人的自由角度看待一场真正的革命以及一系列必要的革命措施,特别是在落后的国家和这样一种形势下没有看到一个新的和更深刻的民主的发扬,这样的民主是在由革命群众直接选举出来的工厂企业委员会形式中诞生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这种极端的、消极的想法最为明显地表现在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一文中,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莫斯科,1918年)一文中作出了尖锐的回应。之后考茨基又写了《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柏林,1919年)一文。托洛茨基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反考茨基》(莫斯科,1920年)一文作出回应。考茨基却又发表了《从民主走向国家奴役》(柏林,1921年),文中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史上的黑斑点,并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明显的反动性。

238

共产主义左翼力量的态度则完全不一样。罗莎·卢森堡在其题为《俄国革命》的文章中热烈祝贺列宁的十月革命。她的这篇文章是在狱中写的,由P.莱维,于1922年发表。虽然罗莎基本上十分积极地看待俄国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但她也有不少意见。首先是对农民的

政策和土地分配问题。她不同意解散立宪议会和限制新闻、思想、集会等自由。然而仅几个月后,罗莎在德国革命事件中,在反革命活动蓄谋待发之际,通过实践认识到,她的某些批评不到位,专政和民主问题或政治自由问题提得太抽象。

共产党左翼力量的另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列宁的战前在荷兰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的老朋友和老战友 A. 潘涅库克和戈尔特也十分积极地对待这一历史行动。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亲眼看到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民主的实现,因而密切关注工厂企业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发展和命运,总而言之关注最初开启的自治历史进程。当他们看到,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这些重大原则由于工厂管理“一长制”的实行和政治官僚权力的加强而日益遭到破坏时,当即提出警告:俄国革命可能失败。他们还就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同列宁发生冲突,认为西欧的情况与俄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应该放弃社会主义和工会斗争等所有已名声败坏的旧方法。列宁在自己的著名文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莫斯科,1920年)中对这种观点作了回应。对此戈尔特在《致列宁的公开信》(柏林,1921年)中作了回应,这些文献编印成册。潘涅库克把自己在《新布朗基主义》(1920年)中和戈尔特把自己在《莫斯科的国际》(1922年)中已提出过的批评意见发表于当时发行的小册子中。这些文章后来重新发表于:A. 潘涅库克和 H. 戈尔特合著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和策略》^①中。O. 吕勒的批评更加尖锐,但不是从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是从“苏维埃观念”的立场出发,也就是从自治出发,最后沦为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

239 吕勒在《革命不是任何党的事业》(柏林,1920年)、《组织的基本问题》(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2年)和《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德累斯顿,1924年)中批评布尔什维克实行党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阻碍苏维埃的建立,从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吕勒对

^① A. Pannekoek i H. Gorter,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Frankfurt a. M. 1969.

所有政党都持完全抵制的态度,认为革命只能基于从自己的基层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过类似的争论。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萨普罗诺夫(T. Sapronov)、奥辛斯基(V. Osinski)和马克西莫夫斯基(V. Maksimovski)提出关于集体领导和个人领导的提法。他们主张企业管理的集体原则,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原则是民主制的基石。党内同“工人反对派”小组的争论却重要得多。一些有名望的老布尔什维克,如什利亚普尼科夫和科隆泰都属于这一派。后者写了一本题为《工人反对派》(莫斯科,1921年)的小册子,它成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工人反对派的行动纲领。这个反对派认为,如果工会履行所有的主要领导职能,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就可以避免。他们反对经济中的个人管理,认为党的高层不依托工人阶级。这个小组对党的权力机关的官僚化提出严重警告,并在这个问题上同另一个小组的意见一致,另一个小组在代表大会前也发表了自己对民主集中制的看法,要求彻底实施这一原则,并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助长官僚集中制的方针得到了加强。在这些提纲上签名的有:V. 马克西莫夫斯基、V. 奥辛斯基、T. 萨普罗诺夫、A. 布勃诺夫(A. Bubnov)、M. 博古斯拉夫斯基(M. Boguslavski)、A. 卡门斯基(A. Kamenski)、R. 拉斐尔(R. Rafail)。

所以,不能说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当时完全明白,几乎不存在解决他们所处的复杂而困难形势的任何方案。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再三建议的解决办法无疑是与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出的普遍原则不一致的,与列宁发动革命时的实践也是不一致的。那必定是从已宣布的原则向后退。但是这里重要的一点在于,这是有意识的后退,为的是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这不是列宁的原则立场,不是后来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所说的那样。因此当今的某些人的立场是欠妥和谬误的。例如,M. 鲁贝尔写的《斯大林传记》^①几乎把列宁和斯大林等同起

^① M. Rubel, *Staljin*, Reinbeck bei Hamburg 1975.

240 来。人们必须作出巨大努力才能理解当时的形势,而且不能用这种形势来为所采取的每个步骤,乃至复杂的人物如列宁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作辩护。可以列举出对如下简单化提法不满意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例如鲁贝尔,他们不同意这样的提法,即斯大林主义只是俄国革命的逻辑产物,而俄国革命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

关于列宁这位人物已经有人写得很多了,描述得很多了。这里我仅列举几位新作者:多依彻、卢卡奇、列菲伏尔、贝特尔海姆、曼德尔(E. Mandel)、利布曼(M. Liebmman)、L. 费舍。在这个问题上不必深谈,因为我们认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有充分论据阐明列宁为工人政权、为工人履行监督职能、为使苏维埃发挥实际功能,而不是使其成为形式的议会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阐明列宁怎样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关于工会国家化的论点而进行斗争;阐明列宁怎样反对国家机构官僚化、反对斯大林关于民族自治的主张以及违背民族自决原则的行动、反对斯大林在对待其他民族代表以及在党内的粗暴态度而进行斗争。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就是如此天才人物也不可能使这一切“纯粹”而“圆满”地实现。尤其是今天根据其他的经验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没有可能,而且在许多方面只能后退,并进行妥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列宁不愿因此而丧失前景,最终还要实现已宣告的原则,他从来没有根本倒退。

说到有关国家主义的神话,我们已经说过它是和马克思与恩格斯格格不入的。必须向过去的和现在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强调指出,这种神话和列宁也是格格不入的。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以及在革命过程中写的许多论著中都尖锐地批判了这种神话,批评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这样的想法,即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列宁指出这些人忘记补充说,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无产阶级需要的只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即使国家立即消亡和必须消亡。其次,劳动者需要“国家”,亦即无产阶级应组织成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国家与革命》）

有关党的内部职能问题,有关阻碍自由讨论问题,甚至包括分裂权问题,有必要读一读列宁于1918年在围绕签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展开激烈争论时写的《奇谈与怪论》一文。争论中发生的原则分歧妨碍了共同的工作。列宁在争论中主张一方有分裂党和建立新党的权利。这里不必强调说,而且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也知道,这可能是最糟糕的解决办法,列宁在那种情况下曾竭尽全力避免某些事情的发生。

241

涉及对社会主义发展尤其是开始实行一党制的所有这些极其有意义的和重大的问题,列宁在看到自己的病情使他日益远离斗争舞台时,极力告诫并建议同志们如何制止某些布尔什维克已预料到的、大家不愿看到的进程。最感动人的文件是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件《关于民族问题或民族自治问题》(1922年12月底),信中列宁严厉谴责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F. Djeržinski)在格鲁吉亚搞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列宁的著名遗嘱和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1922年),文中列宁建议对中央委员会作些变动和采取些措施。如果这些变动和措施得以实现,那就会制止许多事情的发生。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曾是特别重大的问题。托洛茨基发表的题为《新方针》(莫斯科,1923年)的文章是当时十分重要的文件。文中突出的重点是党内民主和党官僚化的危险。这是反对派联盟的主题之一,以及关于20年代中期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其他许多观点^①。

说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必须考虑到问题不仅是个性急躁,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过去。斯大林作为老布尔什维克轻而易举地赢得文化水平低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他们不会轻易地原谅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过去,而利用十月起义前夕发生的事件争取他们去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① 参见 *Plateforme de l'opposition de gauche*, Paris 1927。

也不难。

242

第三章 斯大林主义

说到斯大林主义的提法,我首先想到 R. 麦德维杰夫的《斯大林主义》^①(巴黎,1972年)一书和他的文章《一次代表大会的后果》^②。麦氏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比起他的官样文章要走得远得多。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在国外发表。可是作者仍自由地在国内工作。这说明那里的知识界氛围有所变化。

L. 科拉科夫斯基发表了论述斯大林主义行为的著作《没有抉择的人》(慕尼黑,1967年)。科氏对斯大林的性格看得很准。这一性格源于暴躁、不民主、不文明。斯大林阻挠任何讨论和选择,不给人以任何抉择,阻挠任何社会批评,经常将其逼到绝境,任意称其为反革命。

莱利奥·巴索在自己的著作《欧洲左派的展望》(贝尔格莱德,1971年)一书中,如同当今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中常见的那样,指出斯大林用列宁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来制造神话。巴索正确地指出,斯大林力图通过自己的公式“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以他特有的非辩证的方式把个别的经验提升为普遍的经验,并把列宁时代适用于不发达的落后的俄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式绝对化为对所有其他国家都管用的方法和方式。

243 在斯大林派和反对派进行激烈斗争时期,工人自治、工厂委员会、国家消亡等问题根本没有提上议程,而只是在某些地方有模糊的预示。后来,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在其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中才明确地、坚决地提出这些问题。这时托洛茨基看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政治领域的统治造成了什么结果。

多依彻在自己的《未完成的革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7年)

^① Roy Medvedev, *Staljinizam*, Paris 1972.

^② Roy Medvedev, *Posljedice jednog kongresa*,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onn 1977.

一书中谈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就“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获胜”同斯大林展开激烈争论时,十分强调这一争论的战略意义。多依彻的想法是,这一争论命题不仅有助于斯大林用来对付最强大的对手托洛茨基,而且有助于斯大林在相当孤立的情况下致力于建立一个他所构想的制度,并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捆在这个命运上。相反,托洛茨基则认为,应当从世界革命的范围来观察每一单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然后责成该国用不同的态度对待各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指挥它们。肯定的是,这一争论最终具有的意义比其代表人物起初能预见到的要重要得多。至于对斯大林来说,这场论战一开始就具有重大的策略意义。他清楚地看到,党内外群众会支持那些给予群众革命热情和自信心以更多信任的人,特别是在战胜资产阶级—斯帕赫反革命活动之后。

在评价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方面,仍然缺乏一个对列宁全部活动的根本的、无偏见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无疑的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他的革命事业。在我看来,所有的理论贡献在革命事业面前都是逊色的。然而在解决俄国革命范围内这一全盘任务时,列宁不得不从理论上说明俄国的形势并提出必要的解决方案——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到党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乃至农民问题等等,而且还要解决超出当时俄国范围有国际意义的某些普遍问题,这里我们仅列举一些,如帝国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关系问题、民族问题、苏维埃问题、工人监督问题、自治问题、某些哲学问题等等,即一个根本的马克思主义研讨必须指出和阐明的问题。

有几个明显的文件可以说明中央委员会内部有分歧和对可能发生紧张国际形势下斯大林能否成功领导国家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²⁴⁴一个文件是托洛茨基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件,另一个文件是军队领导致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党内笼罩着不满和不赞成斯大林对农民的粗暴政策的气氛。斯大林甚至未得到自己的追随者

的赞同。30年代初发生的柳廷(Rjutin)事件更能说明问题。柳廷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谴责了斯大林政策。柳廷曾任莫斯科市一个区的书记,中央委员。他于1932年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放慢工业化速度,停止强迫集体化,在党内建立集体领导。为此他遭逮捕,并被驱逐出莫斯科。这些足以说明一个如此多疑的、不诚实的和暴戾的人物如何不择手段地不仅对付自己的敌手,而且对付所有那些试图在党内按某种传统的列宁的准则来思考和行事的人。

一、制度的定义

在围绕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大辩论中,潘涅库克在自己的《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的策略》(柏林,1920年)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新布朗基主义》(1920年)一文中对排除自治(工厂委员会)、实行一长制、加强党和国家的官僚化表示一定的怀疑。戈尔特和潘涅库克一样坚决主张自治原则并热烈祝贺十月革命。戈尔特由于对欧洲革命道路和俄国内部发展有不同见解而同列宁发生了冲突。这两位荷兰人都珍重列宁个人和他的伟大事业,但认为党的官僚日益把国家引向违背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向,俄国革命可能会失败。潘涅库克在他的《列宁是一位哲学家》(1938年)一文中把后来斯大林领导下的革命蜕变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潘涅库克认为生产机构是由国家官僚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潘涅库克看来,这个国家官僚阶层是新的统治阶级,它直接支配生产,即支配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被当作雇佣劳力受奴役,潘涅库克写道:“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在那里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或者甚至共产主义),生产机构是由共产党领导人领导下的官僚阶层组成的。这个国家官僚阶层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直接支配生产即剩余价值,工人阶级作为领取工

资的人遭到剥削。”^①后来吉拉斯(M. Djilas)关于新阶级的思想在这方面未能提出什么有创见的新东西^②。这里发生的历史进程终究是复杂的,虽然潘涅库克、戈尔特、科尔施、罗森堡、瓦格纳在他们的《论布尔什维克主义》(1932年)中,透过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厚厚面纱,比起那些满足于官方声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国际论断的人来,更清楚地看到了进程的本质。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斯大林的神话在各个国家共产党的具体斗争中会产生什么影响。事情就是这样的,往往一些错误的指令产生显著的历史性影响。研究这个命题方面非常有名气的卡尔·科尔施在关于社会化问题的一系列小型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不久前以《社会化文集》出版)^③中,以及在《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权利》^④中,都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国有化和社会化的区别,并指出工人委员会和自治对社会主义进程的重要意义。

O. 吕勒在那些年代里转向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立场,认为布尔什维克实行的是党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压制苏维埃的建立,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因此吕勒反对党组织的一切形式,认为每个党都会官僚化,主张工人阶级通过苏维埃的各种形式自我组织起来,成为革命和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基础。这些观点体现在他的《革命不是任何党的事业》(1920年)、《组织的基本问题》(1921年)和《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中。

当时另一位无政府工团主义代表 A. 拉布里奥拉在自己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巴黎,1923年)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正在被国家主义所代替,因而社会主义政党已成为国家主义政党。因此可以预见,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将被工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所取代。

① A. Pannekoek, *Lenjin als Philosoph*,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118-119.

② M. Djilas, *La nouvelle classe*, Paris 1957.

③ K. Korsch, *Spisi o socijalizacija*, Frankfurt a. Main 1969.

④ K. Korsch, *Radno pravo za tvornički savjet*, Berlin 1922.

德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学家 A. 罗森堡于 30 年代初在分析苏联社会制度时得出结论说,这个社会制度与 20 年代初的社会制度相比是同一个类型的,即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农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掌握着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他认为,对俄国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是非常现代化的经济,由此可以采取一系列进步的措施。罗森堡认为,苏维埃俄国要想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在生产者自由的自治基础上组织起来,整个生产就必须按需求而不是按市场和商品利益来管理^①。

后来,持有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这种思想的还有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A. 博尔迪加,以及 P. 马蒂克、S. 马勒、Ch. 贝特尔海姆,还有托洛茨基分子托尼·克利夫。克利夫曾写了一篇认真分析苏联社会经济制度的文章。其他一些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如曼德尔仍持托洛茨基 30 年代中期的论点(《被背叛了的革命》),即过渡的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领导阶级无非就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帮派。克利夫认为,托洛茨基肯定比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更了解斯大林主义统治,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对形式主义有非常的喜好,因此克利夫不赞成托洛茨基关于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论点,而认为这是由国家-党的官僚阶层掌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见《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②。

E. 曼德尔追随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著作《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巴黎,1962 年)中写道,鉴于俄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的某些重要规律,如利润、利润率下降、集中和资本集中等,因此不能说它是资本主义,而只能说它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制度。在他看来,苏联的经济的特征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仍是完全资产阶级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产阶级的分配方

^① 参见 A. Rosenberg, *Geschichte des Bolschewismus*, Berlin 1932。

^② 参见 Tony Cliff, *Staatskapitalismus in Russland*, prvo engl. Izd. 1955; njemačkia Frankfurt/M. 1975。

式之间的矛盾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

这种类型的关系必然是一个过渡制度的特征,因为它丢失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并出现了某些社会主义特点。然而,事情不应只停留在这样的定义上,因为这样一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定义就不精确了。充分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是历史上的新事物,自然就会具有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特征,并会失去旧资本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 247

B. 里齐在自己的《官僚主义集体主义》(1938年)一书中认为,苏联官僚阶层支配生产力,管理生产,决定价格等,所以它是阶级。历史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所有制类型,这种类型是生产资料归一个阶级集体所有。苏联的生产是按一个预先制订的计划来管理的,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则受盲目的市场规律支配。因此在苏联经济中利润和剩余价值没有占统治地位。里齐称之为官僚集体主义,而要挽救这种关系就要回到19世纪资本主义竞争中。

当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 A. 卡洛同意里齐给苏联社会经济制度设的标志。他不同意那些认为这里说的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人的提法,因为商品、市场和利润(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概念。在苏联计划生产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不存在上述范畴。工人生产的是剩余劳动,而不是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因为这一范畴在卡洛看来是同市场紧密联系着的。因此卡洛认为,即使从1928年至1965年这个时期,也不能说苏联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见《苏联社会经济结构(1917—1965)》^①)。卡洛认为,按此框框,由于南斯拉夫发展中还存在市场经济,因而在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已复辟了。几年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南斯拉夫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我国的整个政策时也持这种论点。

R. 希法亭在其论著《国家资本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经济》(1940年)中表示不同意英国社会主义者沃勒尔(R. L. Worrall)的意见。在

^① 参见 Antonio Carlo,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Struktur der Ud SSSR. /1917-1965/*, Berlin 1972。

沃勒尔看来,苏联的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希法亭在探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新现象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锋之一。他认为,在苏联的情况下,国家支配生产资料,运用自己的计划指导经济发展,废止市场和价格机制,扼制经济规律的作用,因此,既不能说它是资本主义,也不能说它是社会主义,而它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极权主义制度。

248 伯纳姆在其著作《经理人的革命》(1941年)中提出了经理人社会的理论,主张经济的和国家的官员是经理人阶级。他认为,十月革命也是经理人革命,当时的苏联、德国、意大利都是最接近这种类型的社会。

从新近对斯大林主义作很有意思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以扬·爱列因斯坦(J. Elleinstein)的研讨为例。他是法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是苏联通史的作者。他曾指明促使某些现象产生的许多历史情况,这些现象在他看来是阶级斗争和极权手段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有害方法的产物,而这些有害方法使苏联如此受害,以致如今它还受其害。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无产阶级专政被归结到一个人身上,政治警察统治着国家和党,这从共产党立场来看是毫无道理的。在爱列因斯坦看来,虽然其基础还是社会主义的,但这种制度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甚至列宁也曾低估了民主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民主,在经济刺激的辅助下,仍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手段。谈到民主时,爱列因斯坦强调指出,这里指的不仅是政治民主,而且是“经济和社会民主、监督、群众主动精神、工会活动、民主管理企业的可能性,在报刊、广播、电视上表达意见的权利,在书刊、戏剧、电影、艺术中的自由”^①。

在同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发生最激烈的冲突中,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最深刻的和最精确的定义。50年代那个时期,南斯拉夫

^① J. Elleinstein, *Histoire du phénomène stalinien*, Paris 1975.

领导中的大多数以及其他理论工作者在分析工作中努力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这样一个成功地进行了如此广泛反法西斯斗争和人民解放斗争并开始社会革命的国家 and 共产党领导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们得出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斯大林主义是革命的蜕化,是官僚-国家主义势力掌权,是复辟国家资本主义关系。仅举几个例子就够了。铁托(Josip Broz Tito)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上就通过国家经济组织和劳动集体高级经济联合体管理基本法草案时作的著名的报告中,在提出关于苏联革命了33年后是否实现了“工厂归工人”的口号的问题时,得出结论说:没有,“工人今天仍没有对管理工厂的任何参与,而管理工厂的是厂长,即国家任命的官员。工人只有干活的可能性和权利,这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的作用没有多大差别。对工人来说差别仅是在苏联没有失业,仅此而已”^①。

特别是在50年代初,铁托多次谈到苏联实行的是“官僚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谈到“斯大林对人民的最反动的、中世纪的态度”;谈到国家资本主义,认为伟大十月革命的成果没有被全部摧毁。铁托得出结论说,“他们没有走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走最糟糕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依靠基层劳动者,而是依靠自己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依靠自己的武力”^②。让我们再从铁托的类似的许多言论和观点中,援引铁托于1951年11月29日回答《战斗报》编辑部关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制度有何差别的问题时的谈话。铁托说,“第一个差别也是主要的差别在于:我们建设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蜕变成在专政的官僚国帮派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个差别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整个社会生活中蓬勃发展,在社会主义民主的迅速发展中除了缺少技术和我国一部分公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发展太慢外,不存在其他什么问题。可是,在我国这种民主发展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在苏联却谈不上任何民主。在那里既

^① Josip Broz Tito, Trudbeničko upravljanje privredom, *Komunist*, br. 4-5/1950, str. 12.

^② Josip Broz Tito, *Govori i članci*, Zagreb 1959, knj. VI, str. 14, 175, 210.

没有政治民主,也没有文化民主,生产中也没有民主,而是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笼罩着真正的恐怖。在那里,革命后34年工厂还没有交给工人管理。在那里,在文学、科学和音乐等领域都没有思想和创作的自由。”^①

250 基德里奇(B. Kidrič)也十分清楚地表述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一进程。他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小的一步。苏联的例子表明,苏联内部潜存着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命运的种种巨大危险。固守国家(官僚)社会主义的阵地,没有继续发展革命‘第一步’要求的東西,必然同时伴随着作为社会寄生虫的官僚阶层的滋长、壮大和特殊化,压制而不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普遍蜕变,起初停滞,接着堕落为特种类型的复辟。国家社会主义越发具有‘纯粹’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自己的中间阶级,但有无所不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意义的官僚阶层)。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普通的垄断主义现在实际上被当作新的经济规律。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绝对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胆地把国家社会主义变成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②

让我们再援引那个时期卡德尔^③的一些论点,虽然其他理论家也有同样的或相似的结论。在我国革命胜利十周年之际,卡德尔在自己的一篇著名的论文中,用相当大的篇幅,首先同铁托的观点一致地指出,官僚主义是阶级制度的最后一个和最顽固的堡垒,也是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卡德尔接着提出问题:官僚主义帮派若不是资本主义阶级残余还会是什么呢?加强官僚主义集中制的倾向若不是力求保护和加强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因素的趋向还会是什么呢?卡德尔接着作出精确回答,指出,“社会主义并不在于生产力从私人资本家

① Josip Broz Tito, *Govori i članci*, Zagreb 1959, knj. VI, str. 283.

② B. Kidrič, *Teze o ekonomici prelaznog perioda*, *Komunist*, br. 6/1950, str. 5-6.

③ 爱德华·卡德尔,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之一,南共联盟权威理论家,自治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阐述者之一。——译者注

手里向独自的国家领导机构的转移,而在于生产资料的真正社会化。所以,问题恰恰在于:劳动人民共同体是否通过每个企业和每个经济部门的劳动集体、通过自己的中央机构真正管理生产资料和剩余劳动,同时大家都在社会共同体的总的经济计划的范围内履行自己的任务,或者是处于独立官方机构中的特殊角色、特权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加强、扩大并成为有特殊利益的独立因素。后一条道路是反革命的进程,是复辟国家资本主义关系使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独特的倾向”^①。

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最重要文件1958年《南共联盟纲领》中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彻底的分析。纲领在指出国家和集中制的加强导致国家和党的机构与官僚阶层越加紧密地融合的同时,得出如下结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着过渡时期的特殊现象,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官僚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的畸形现象。这些现象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机构中上述倾向的直接产物。它们使这个机构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成了社会的老爷。哪里社会主义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和薄弱,哪里的工人阶级的真正社会作用和影响就比较小,上述现象就表现得更加显著。”^②

作为旧社会关系的最后反映的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企图使社会主义关系发生畸形,这首先指的是:当生产力和生产者再也不能忍受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各种形式和管理方法时,他们仍力图保存、扩大和恢复这些形式和方法。”^②(见《南共联盟纲领》)

对斯大林操纵下建立的制度进行极其合乎逻辑的分析而得出如此尖锐的论断,是后来很少见的。当然这些分析和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受苏共二十大的进程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以及南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但是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不会是决定性的。我们同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相当好的关系,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尤为

^① E. Kardelj, Deset godina narodne revolucije, *Komunist*, br. 2-3/1951, str. 110.

^② *Program SKJ*, Beograd 1958, str. 223-224.

好,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要宣称某个社会为别的什么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会因为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进程不一致的复杂现象而在作评价时摇摆不定。更多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这样的提法,即这是一个官僚-国家主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它有显著的畸形,这种畸形不仅使许多社会主义的东西成问题,而且把社会主义的东西抛弃。在评价过程中仍有一系列问题未得到解释:工人阶级的依附地位、关于自治的各种想法、莫斯科审讯问题、斯大林集中营、不人道的程度、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等等。总之,问题仍然存在着。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想通过自己的一个系统研讨弄清,首先自己弄清,在这半个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52 与正确地否定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学者的最新思想相反,S. 斯托扬诺维奇在其《理想与现实之间》(*Između ideala i stvarnosti*, 贝尔格莱德,1969年)一书中,如同A. 拉布里奥拉一样倾向于认为国家主义一词是这一制度的标志,又同M. 霍克海默的提法相似,使用“完整的国家主义”一词(《权威国家》,1942年)。列菲伏尔在其最近的研究中把这一制度称为“极权主义”的生产方式^①——我的分析要求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一定的社会状况——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下定义,而且从它的诞生起、用辩证的方法来理解问题的全部。因此有必要搞清楚在给一些进程下定义时不断出现的范畴。这些范畴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官僚-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畸形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等等。我希望能够看到这些范畴,特别是在过渡时期其是怎样变动的、不停滞的,一个范畴怎样转换到另一个范畴。我能够指出为什么可以坚持国家社会主义范畴,即使它内部是矛盾的;这个范畴——当然我首先把它理解为

^① V. De l'Etat, I - IV, Paris 1976-1978.

这个范畴所反映的一定的社会情况——如何潜在或包含国家资本主义特征,而不管是否还存在着由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权来处理的私人资本残余或者是由国家所有制直接管理的国有化的资本。因此有可能的是(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也发生过),保留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包括全部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新关系建立时初衷冲动的消失,不会导致旧资本主义的复辟,而会导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那么“单纯”的形式。我还可以指明有强烈内部动荡、矛盾和冲突(这些总是一切反革命活动的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怎样发展成官僚主义-国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构,以及这些进程同样又会怎样无痛地恢复国家-社会主义关系和自治社会关系。

由于这些新关系的特征被确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因此 H. 列菲伏尔最近使用的“国家主义生产方式”的定义是可以理解的。必须强调指出,这些定义包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定义,在内容上的差别要比形式上的差别小得多。但是,我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标志,原因前面已提及,但还想补充如下:1. 这一定义在列宁、布哈林、科尔施和潘涅库克以及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都能见到;2. 这一定义明显地指明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首先是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仍存在;3. 这一定义指出通向社会主义的某些过渡形式,如废除私人所有制和有计划地指导生产,虽然不是由联合生产者指导而是由国家指导;4. 这一定义包含着大力强调的经济范围,这是标明社会经济关系特征的最重要的一点;5. 这一定义更明确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展的进程与否定古典资本主义重要基础的进程(国有化进程)之间的关联。

253

如果有人不喜欢关于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开展的是官僚-国家主义反革命活动的提法,那么值得再次强调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说,某些社会力量以什么方式表达出来和代表谁说话以及关于自己怎么想的都是完全无所谓的。无疑地,在这些戏剧性的悲惨的事件中多数人不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丝毫不能以此作辩护。

因为如果大家都和斯大林一样认为,当他们取缔直接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的初始的关系时(列宁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在苏维埃中得以实现的,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这种民主更明显地表现在工人委员会和工人监督中),当他们使工人阶级陷入连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都不存在的如此无权地位时,当他们实行警察恐怖和专制使所有人都感觉不到安全时,当他们破坏对人的任何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声援(这是所有社会主义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时,当他们不仅杀害了本党的同事和十月革命的缔造者,而且杀害了数百万无辜的各种信仰的百姓时——这一切都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了。正是这个谁也没预料到的、被最响亮的社会主义称号描绘起来的现实,成了苏联的实际沉重包袱,直至今日。只要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不彻底澄清这些东西,如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那样,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就会陷入迷惑圈。但是,如果这一切不能发生,如果国家主义-官僚主义路线最终获胜,那么对整个社会主义的今后发展的障碍和可能的危险将增加。

254 如同所有反革命一样,这个反革命也是有预谋的,其戏剧性的开端可以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开始,接着按紧急程序,经政治局追加批准,斯大林发布紧急通令,开始了大规模逮捕和枪决。

为使这一特征更加明确,我们再举一例。众人周知,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已迈上了自治道路。关于“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和“国家消亡”的思想已历史地付诸实践。尽管在开展的进度和方式上有各种批评和责备。当某些政治势力打着谁知道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旗帜,使用各种方式——不采用斯大林式恐怖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企图废止这个自治进程并推行国家主义的集中制时,这跟反革命有什么两样?

因此,既然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除马克思外,从恩格斯到列宁等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这样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实现“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直接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领域的首先是国家的消亡,那么强

行扼杀和废止这些重要的社会主义进程就是反革命行为。但是,假如政治领域的加强和垄断是出发点,那么我们同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有事可干了。我们将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指出,这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完全相反的。

这种探讨特征的做法在马克思主义书籍中不是第一次出现。然而,我对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整个问题、对这一制度的结构和情况以及对消除这些结构的可能性的观点不同于晚年的科尔施、吕勒、马蒂克以及某些托洛茨基分子等的观点(这种不同观点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当你读完我在后面几章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全部分析,问题就会更加清楚了。在这里我应该再提醒一下的是,我认为,对在30年代在斯大林的主导影响下建立的这一社会制度给予明确和精确的定义今天具有非常重大的益处和意义,因为从理论和实践上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恢复名誉,仍然是所有那些把实现更加人道的、创造性的和文明的人际关系看作人的生活的含义的人的任务。

二、围绕党的争论

255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流派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强烈反对任何政治组织,认为它们必然会脱离阶级,导致官僚化、滥用权力,总之会使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偏离方向。这个流派的始创人是佩洛提埃,特别是索雷尔。后者在其著作《关于暴力的思考》(*Refleksije o nasilju*, 巴黎,1906年)和《马克思主义的解体》(*Dekompozicija marksizma*, 巴黎,1908年)中提出了这些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论点。R. 米歇尔斯在其著作《现代民主中党实体的社会学》(*Sociologija partijskog bića u modernoj demokraciji*, 1911年)中提出了关于“寡头的铁法律”,即党内产生特权阶层及官僚化的必然性的论点。这一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其他成员,如拉葛德尔(《工团主义与社会主义》*Sindikalizam i socijalizam*, 巴黎,1908年),A. 拉布里

奥拉(《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Karl Marx, ekonomist, socijalist*, 巴黎, 1923年), O. 吕勒(他的作品已提及)都有类似的论点。这一社会主义流派在看待党的问题上的立场和无政府主义者很相似, 他们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到马拉特斯塔、缪萨姆、桑蒂兰等都激烈反对无产阶级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中建立某种牢固的政治组织。必须指出, 斯大林主义的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受欢迎的经验诱导 60 年代新左派许多年轻成员对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取消极态度。任何新革命组织的建立都会有同样的消极后果。但是事实很快就表明, 资本主义大厦不会被无组织的造反所摧毁, 革命形势的营造不能仅靠某种表面行动而没有国内强烈的客观危机和其他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准备。

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能够最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在当今十分复杂的斗争中指明乐观的解决办法的特别政治组织的思想时,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 指出以下情况就足够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许多工人政党撰写这些党的纲领, 并在国际组织章程中写进自己的主张, 澄清这种不必要的思想混乱。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年)中写道: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 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① 1872年9月他在共同章程补充条款第七条(a)中写道: “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 无产阶级只有本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特殊政党, 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641~642页。——译者注

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①

有关党内民主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每个党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有必要列举几位英国人的思想,可以从他们的思想中对斯大林的党后来为什么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得出最好的结论。在格尔森·特利尔由于批评机会主义的领导而被开除出丹麦社会民主党时,恩格斯于1889年12月18日致信特利尔,信中写道:在当时的秘密团体中,在组织起来进行直接进攻的政党——宪章派那里,这样的开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任何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美国自从罗森堡先生自己幸运地退出以后——恐怕都不会想到按照丹麦的方式对付自己队伍中产生的反对派。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②

马克思早期关于普鲁士新闻检查文章(1842年)中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自由、反对德国革命(1848—1849年)中的为检查而斗争的许多观点都是众人周知的。我们还可以举出晚年恩格斯给A.倍倍尔的信,信中恩格斯反对对有关马克思和拉萨尔关系的文章进行党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当党的领导认为必须对《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实行检查时,恩格斯在1891年5月1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这就好比不正常的光线照在这样的事件上。“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

257

^① K. Marx, *Opći statut Međunarodnog radničkog udruženja; Izabrana djela*, sv. I, Zagreb 1950, str. 34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页。——译者注)

^② *Zbornik Druga internacionala*, Beograd 1951, str. 10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译者注)

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决定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①同样地，在1892年11月19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劝告倍倍尔说，在党内刊物“国有化”是很危险和有害的，“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②。

在迄今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很少研究党的问题、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履行职能的方式问题、成功与失败问题、迄今发生的所有众所周知的现象问题以及各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命运问题。当社会主义力量或共产主义力量掌权的时候，关于党的问题的讨论特别少。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活动特别是民主制与地下党和干部党肯定是不一样。另一方面，党内掌权的力量多少也拥有国家的强制手段，因而领导同自己的党员一下子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如果领导想抑制社会的民主发展（我首先想到的是自治的发展及民主制的所有其他因素，在其他篇章中我还会谈及），他就会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优秀的、最忠实的和最可敬的成员使用最粗暴的政治、国家和警察的暴力手段，如同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发生的一切。这只不过表明，党的道义和民主的法典、党在掌权时期的行为和履行职能，特别是在一党制

^① Pismo Bebelu od 1. V 1891, K. Marx, F. Engels, *Pressefreiheit und Zensur*,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232-2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译者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18页。——译者注

情况下,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当我们在书中常常提到列宁、马克思或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时,必须明确,在每一个伟大历史运动中,尤其是在当今有这些文化和知识遗产的运动中,存在着把主要人物偶像化的倾向。每一个人物都应该是最高理论、道德、政治特征的化身。但是实际情况是各种各样的,历史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人物。他们无疑都是伟大的,其中许多人是天才,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但是他们又历史地受自己个人特性的限制。譬如说,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坐在《新莱茵报》编辑室里,而恩格斯则上了前线任维利希(A. Willich)兵团的副官,这与马克思相比是不可思议的。后来马克思为批判资产阶级作重大贡献而工作,而拉萨尔则鼓动并创立德国工人协会,早些时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而不是马克思)在艾森纳赫(Eisenach)创立工人党。阿克塞尔罗德(P. Akselrod)形象地说,列宁是唯一的一位24小时只想一件事——革命的人物。我们在评价列宁时,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革命事业的天才人物,具有分析历史事件杰出理论才干的人物。但是在哲学领域中列宁缺少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经历的从德国古典哲学经过青年黑格尔的和费尔巴哈的理论斗争的发展道路。因此,不是不可理解的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第二国际的哲学和理论水平,可以看到它关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初创水平低于对自己革命和实践的分析。大家知道后来列宁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缺点,并力求通过加强研究黑格尔及其辩证法来消除这一缺点。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削弱这些天才人物的伟大,而是使他们更接近我们,因为他们是带有必然的局限性和人的弊病的人物。

说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党或多党政治体制,长期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这个问题一直是禁区。也许我属于不仅在国内最先在分析当代社会形势基础上提出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有必要实行政治多元制的论点的那些人。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的问题尚未解决,对此我将在关于社会主义和欧洲共产主

义的篇章中更多地谈及。现在只谈谈以下几点：一个党为了能够在掌权之后坚持在社会中开展更深刻的民主进程，这个党就应当在未掌权时就发扬民主；其次，对执政党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发扬自己的党内民主，并在其他进步力量和组织的帮助下在社会中开展更深刻的民主进程，即废除雇佣关系、政治和经济垄断，总之，执政党要开展自治和更广泛的社会民主的进程。如果没有这些进程，连最民主的党最终也会官僚化并剥夺劳动者和生产者的权利。

当我谈到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初始的社会主义动机的蜕化以及失去共产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的党的蜕化时，当然我不认为在这个党里没有数以千计的真诚、可敬的和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这一点总是使党和社会生活得以复兴的保障。我们应该相信，这一切存在于年轻人身上，他们手中有现代人道主义如此伟大而重要的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不常提及的社会主义巨人（倍倍尔、梅林、R. 卢森堡等）的著作。可是，这个党作为一个组织再也没有作为共产党开展活动，没有内部的讨论自由，没有尊重个人及其思想，没有推动这个党宣告的社会进程。共产党如果压制文化领域中关系的民主发展，如果用警察恐怖来保障自己的权力和秩序，如果用这样的方法阻止关于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迫切问题的一切公开讨论，那么共产党就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特征。因此，我们谈到的这许多人因这种恐怖而未能有所作为，且往往明知其他一些人是无辜的却不敢站出来保护他们。

三、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虽然我在这一章里没有援引语录来证明某些论断，但我仍想提请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语录，因为我认为它们是最合适的提法，是来自他们对社会和人以及对待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的其他领域的态度的最合适的提法。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用

以下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
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
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
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
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
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
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
制约。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在我
看来，我们由此可以明确地得出，对待这个重大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
主义观点是：“社会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我们称之为社会、历史。因此其就有可能朝各个方向开展活动，尽管
就社会关系的物质方面、物质文化的发达水平整体而言它是决定性的，
但不是由于它是更现实的，因为意识同样也是现实的，而是由于它
动得少、稳定，但更耀眼的，正如 N. 哈特曼(N. Hartmann)所说的那样。

从黑格尔哲学，特别是辩证法的命运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意识和
社会存在的这种关系，同时总是要从各种角度观察一定的历史情况和
可能性。青年黑格尔的臆测、施特劳斯对基督教的批评及其把宗教说
成神话，以及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都表明，30 年代德国的社会存在
发生了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急骤变化。这时候他们更需要从
包罗万象的、解释性的黑格尔体系那里得到对现实的批评态度，而鲍
威尔的“批判之批判”与其说是满足于黑格尔的范畴推理，不如说是更
多地打击费希特的反叛的激进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展也是通过
这些努力而取得的，但未能像新兴资产阶级所期望的那样使新的社会
条件和斗争成熟起来。早在 40 年代初无产阶级就已采取的立场表明
了无产阶级用以观察历史现实的意识的一个新纲要。由于他们把整

^① *Rani radovi*, Zagreb 1967, str. 37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4~525 页。——译者注)

261 一个新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过渡的和暂时的社会,他们的辩证法必然是彻底革命的、对这个社会不妥协的。问题完全不在于对黑格尔体系即辩证法的革命方面及其激进性的减弱或是抛弃,因为它已排除了神秘化、理想化的赘瘤。与此相反,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格尔哲学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得以复兴时,G.拉森(G. Lasson)、R.克罗纳(R. Kroner)、H.格勒克纳(H. Glockner)等未能走向彻底的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因为这条道路不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或者停留在黑格尔体系的某些方面上,或者崇尚黑格尔的整体美学和包罗万象的天才。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在20世纪初伯恩斯坦、C.施米特、沃尔特曼等修正主义时期,对于黑格尔及其辩证法遭摒弃,资产阶级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并非重要的,而社会结构和工人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的影响则是重大的。一个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取得合法斗争形式的可能性以及工会和党的合法机构的开展,必然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领导,使他们认为革命时代已过去,从而非辩证地把斗争的重心和前景摆在改良主义的主张上。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抱着这种非辩证的、把斗争和历史运动的时刻绝对化的态度,革命辩证法必然受阻,甚至被当作对马克思学说的“背叛”而被断然抛弃。这样一个修正主义的危险在于,欧洲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形势仍然孕育着强大的阶级博弈、民族矛盾和解决这些冲突的粗暴方法,因此完全不能肯定地得出结论说不存在革命形势,而是恰恰相反。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当时作出的反应和发生的分裂,我们不必感到惊奇。某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后来在法西斯主义下这一分裂的悲惨后果,提出了关于成立第三国际和后来所做的一切是否是错误的行动的问题。然而,对事情必须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来作出评价。社会民主党右翼挽救了资产阶级制度并谴责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在这时刻唯有俄国共产党人真正地履行了自己国际主义的和革命的义务,如同欧洲其他许多共产党人一样,正确地认为,形势是极其革命的,政治力量应投入坚决的斗争。如果我

们再补充一点,即他们力求使自己不孤立于历史舞台上,那么我们会十分明白为什么分裂必然发生,为什么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这样制定的。

把黑格尔革出教门,也是由一个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尖锐矛盾的制度代表人物——斯大林干的。也许是一个彻底的否定辩证法破坏了他的平静的官僚美梦,他更喜欢对哲学现象和历史现象作庸俗的解释。因此黑格尔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主要理论源头之一被驱逐了。列宁甚至曾建议成立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团体,而斯大林却宣称黑格尔的哲学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是彻底绝对的反动!

262

仅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各种方案,由此我于1968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哲学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方案的必要性》的论文,我的论点遭到了东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因为我的论点根本否定对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垄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某些方案,如同我谈到斯大林主义时指出的那样,已经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那么远,而更多地还是一幅画卷。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蜕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是必然的,因为凡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没有自由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就会蜕化。这种蜕化在其他理论领域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苏联主要思想家日丹诺夫身上。他就亚历山大洛夫一书(1947年)发表的《讨论中的发言》一文中和在《关于“红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1946年)的报告中,把哲学的全部历史归结为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庸俗唯物主义论点,同时这一论点的其他制定者立刻宣称任何唯心主义都是反动的,而唯物主义是革命的。这样他们仅仅是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情况隐瞒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这类的唯物主义已具有极反动的性质。这位日丹诺夫的官僚理智地认为,不仅对文学创作,甚至对音乐创作作出评价并作出指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他看来,俄罗斯的音乐应反对新的先锋流派并保留民间音乐旋律。日丹诺夫写道:“在我们苏联社会中,对抗的阶级和新旧之间的斗争已被消

灭。因此,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以对抗阶级的斗争和大动乱的形式进行的,而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国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党手中的有力工具。这无疑是运动的新形式,发展的新类型,新的辩证规律。”^①

换句话说,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思考总是沿着标志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家主义路线、国家偶像化路线及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道路走的。早在1926年发表的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的早期著作中,斯大林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看作仅是党的政权制度,而党通过其他传动工具领导整个社会;把苏维埃看成仅是国家的组织。不但所有其他社会组织都是一个党的传动工具,而且他完全闭口不谈自治进程、废除雇佣关系以及经济和政治异化。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写道:“工会作为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苏维埃作为劳动者的群众组织,主要是在国家方面把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作为工农青年的群众性组织,联合起来以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便于用社会主义精神培养新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中的基本指导力量,领导所有这些群众组织。总之,这是专政机制的概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概貌。”^②

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如果这里不是让任何废除现行机制的自治进程得以存在的地方,那么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斯大林看到的只是如此可塑性地提出的结构,即党-国家及其传动工具的结构为加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国家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只能是一个官僚-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之逻辑结果。

从这样的意识形态中还产生了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规定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确时间!这种主张包含着一个

^① Vystuplenie tov. Ždanova, *Voprosy filosofii*, br. 1/1947, str. 270.

^② K voprosam leninizma, *Soč.*, sv. 8, str. 35-36.

思想,即一旦整个社会生活完全受制于政治的指令、仲裁和监督,从而党-国家的垄断成为全面的垄断,社会主义就必然建成了。他们越是远离社会主义进程(我们在其他篇章中还能看到同时进行的共产主义进程),这一进程就越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和极权主义的形式,并用大喇叭宣布这一进程为社会主义建设顶峰。30年代后期,列宁老班底中的最后留下的一些人(个别人除外)以及一大群其他老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成了新利维坦政体的牺牲品。1919—1935年期间当选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遭到悲惨的结局。1922年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即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26名中央委员有17名被处死或被迫自尽。在党的其他各级组织中也发生过这类事情,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委员会委员在没有公开或秘密审讯的情况下被枪决。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作的著名报告中列举材料说,在1934年七大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占70%)委员被枪决。

一个制度如果不延伸到比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意识形态色彩更浓的文化和社会科学基础领域,就不可能是极权的。斯大林在解决了反对派主要流派问题之后便开始了这一征程,同时通过强行集体化开始了政治领域、官僚-国家主义结构的加强并实行统治,只要有这些结构,所有这些进程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内部思想自由些的每个哲学流派进行诽谤的信号早在1929年12月就已发出,当时他在农业工作者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批评理论工作者,指出他们的思想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米丁(M. B. Mitin)、尤金(P. F. Judin)和拉列切维奇(V. Rajcević)最了解这个信号,他们在第二年(1930年)发表题为《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的文章,攻击德波林集团和机械论者,称德波林分子为“形式主义者”。在这一年里斯大林就被排列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成为第四位经典作家。(如米丁1930年10月在科学院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所为。)然而,对德波林分子所作的评价对斯大林来说太轻

了。于是同年12月初在红色教授学院党组会议上宣布德波林分子是“孟什维克主义唯心主义者”。机械论者被宣布为“右倾”的代表和党内“富农代理人”。这样一来,取代公开的、批评性的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是泛泛的庸俗社会学主义,放任政治领域在理论探讨中作决断,可是这既不是政治领域的任务,也不是它的专长。大约一个月以后,1931年1月底,中央通过了处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这个杂志此前一直是由德波林分子领导的。

原来还存在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讨论以及对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各种成就的自由评价,不过在评价各种贡献的意义上未取得一致,但从那时起理论思想成了政治领域的附庸,不断地下滑。由于理论思想未能自由发展,在选用干部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消极现象,因为最有能力的干部离开这里到自己的才干得以更自由和更创造性地表现和发展的地方去了。

许多人也许对为什么在斯大林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援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语录感到迷惑不解,所以以为斯大林是忠实地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这同时也证明,仅引用某些思想家的语句,决不意味着援引者也有这种精神和思想。如果我们细心研究列宁在1914—1916年如何探讨辩证法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列宁根本不愿意把所有丰富的问题归结为几个原则或规律,而是把它们分成15个“辩证法要素”。这里最重要的是列宁把辩证法理解为批判的,同时也是革命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前言中所写的,他需要辩证法作为最好的思想武器用来处理当时的全局形势。马克思辩证法的这种精神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也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不会在任何事物面前屈服,就其本质来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辩证法的这种精神对斯大林来说总是格格不入的。斯大林把辩证法更多地理解为公布出来的绝对真理,把自己当作高级祭司,而所有其他人只能在他规定的范围内工作。因此,从塞列克托尔

(M. Selektor)和尤金,到罗森塔尔(M. Rozental)和列昂诺夫(M. A. Leonov)的所有著作都是反辩证法的枯燥无味的辩证法教科书。

此外,一种暴躁的、绝对化的和粗野的气质只会产生一种思想,即把丰富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唯物主义或是唯心主义都归结为几个特征。即使是最伟大的哲学思想家也未能预见哲学问题领域如何展开。伟大的恩格斯知道他在当时哲学和其他科学发展的影响下,有时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的结论太片面。但是列宁从来没有认为,那些原则对整个党和一代人是务必坚守的。指出早年的卢卡奇、科尔施、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Th. Adorno)、列菲伏尔、哥德曼(L. Goldmann)、科西克、沙夫、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许多南斯拉夫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就足以看到,在本世纪最后几个十年里提出了多么丰富的问题。

266

在反映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已充分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反映论没有包含马克思观点的重要内容和他的哲学新东西。很少有人会否定反映的存在。问题恰恰不在这里,而在于人的和历史的一个新概念,作为人认识的活动和进程,作为主体亦即人的全部历史实践,而没有这种实践,既没有对人迈出的每一步的理解,也没有对具体历史的认识。反映论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它是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以及其他庸俗的或机械的唯物主义。实践论不仅是马克思的认识论,而且也是人存在的理论,由此才能理解认识过程。因此,所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正确地援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著作,从1844年出版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论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在这些著作中实践思想占主导地位。今天再清楚不过的是,列宁在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对这个问题了解不够。因此后来在自己的笔记中某种局限性占了上风,但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列宁也受到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理解的制约。当时在第二国际队伍中有一种十分普遍的,甚至在主要人物当中的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某

种特别成熟的哲学观点,因此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同机械论、康德主义或一般的唯物主义相融。这都是考茨基、伯恩斯坦、施米特、阿德勒以及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思想。列宁首先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等同起来是荒谬的,这样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澄清了思想混乱。后来在意识形态化和官僚主义化的发展时期,列宁的著作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末,这是列宁未能预料到的,也是他从来都不赞成的。

值得说的一点是,列宁从来没有打算,也没有时间、在哲学方面也
267 未作充分准备,去写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他忙于的重要工作是在另一方面,革命是他的最大事业。列宁在历史和斗争的领域,在分析自己所处时代的众多现象中,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辩证法学家。

我没有打算在这一部分多谈纯哲学问题。因为我曾想写一部理论性的和哲学 - 政治性的著作,这是由于我考虑到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不仅是当前的迫切性,而且可以平心静气地说是整个世纪的迫切性。谨此我向读者推荐我的《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书中列出了所有重大问题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书目。

第四章 社会主义

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看到,革命的概念在其基本的规定性中包含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解决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某些基本矛盾,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落后形式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一冲突中至今总是某些阶级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和历史利益而竞赛,这些“历史飞跃”的形式主要是暴力和武装的。因此革命一词被联

系到解决历史冲突的这一对外的形式上,虽然如我们所见,这种形式不一定是革命概念的确切因素。在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冲突一开始就是十分猛烈的,致使国王的脑袋也落到历史进程的树墩上。在晚些时期,在旧部族也发生一定变革之后,其进行了妥协和各种“自上而下”的革命,以此方式取得同样的历史阶段效果。所以,今天在有了这么多历史的和理论上的经验之后,我们不可以把革命和暴力—武力相提并论。虽然每一个社会变动或社会关系的变革无疑都是减少某些抵抗和运用暴力的行动或进程。但是这不一定是古典资产阶级革命型的或迄今某些社会主义革命型的阶级关系。因此,并不是百分之百致力于阶级冲突尖锐化至历史最高点才是革命的,而最有效地,今天我们可以说以最小牺牲解决同样的问题以利于劳动者,也是革命的。尤其是在今天,国家机构拥有的杀人武器有时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我们必须立即强调指出,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青年时代都不是暴力和武力解决冲突的狂热捍卫者。恩格斯于1847年在写《共产主义原理》一书时对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回答说:“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①

可以看出,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把暴力革命同当时无产阶级的的发展受到压制和阻挠的形势联系起来,这种形势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某

^① Rani radovi, Zagreb 1953, str. 35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4~685页。——译者注)

些国家和本世纪的特征。后来马克思于1872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在共产国际哈什代表大会后的一次谈话中的声明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某些发达国家（当时提到美国、英国还提到荷兰）有可能用和平的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恩格斯也在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前言中指出德国形势的变化，强调地下斗争的意义，并通过议会教会群众对资产阶级可能使用暴力的企图作好准备。就在那时恩格斯也没有放弃武力解决阶级冲突的方法，如果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所迫的话。

假如试图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找某些重大差别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不是什么小差别了。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这些差别首先是由于在不发达的俄国和发达得多的西方国家的不相同的形势。为此列宁不得不采取独特的革命斗争策略，从而给党和这一斗争的策略打上特殊的烙印，并知道那是他的某些学生永久不能理解的东西。如果我们考虑到列宁的大多数论文都是在帝国主义侵犯、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本国革命前夕写的，那么我们就丝毫不会奇怪和不理解为什么列宁特别强调暴力变革。

然而，必须再次强调指出，列宁是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革命辩证法学家之一，由于这一切列宁从未陷入形而上学的、把自己的特殊形势和斗争方法教条化的错误。列宁的最有教益的一篇文章是他同他的从前友人和左翼共产主义及委员会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潘涅库克、戈尔特、吕勒等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的思想同路人的争论。这些人教条地抛弃工会和议会的所有斗争形式，认为正处于阶级对阶级的公开斗争时期。列宁在自己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

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①

在同一著作中的另一个地方列宁告诫: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初期是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这两者是比资产阶级民主还广泛的民主——但这两者过渡的形式是多样的。列宁还告诫: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必须研究、探索、揣测民族特点,每个国家都因自己的特色而不相同,如果忽视这些特点就会有严重后果。在另一篇论文中列宁强调指出:“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②

271

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和布哈林有区别,布哈林和列宁在理论方面无疑都是最杰出的人物。布哈林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年)一书中,把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归纳为包括四个阶段的整个革命进程,并认为这对每个革命运动都管用。第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革命,意识革命化,首先是工人阶

^① *Dječja bolest 'ljevičarstva' u komunizmu; Izabrana djela*, tom II, knj. 2, Zagreb 1950, str. 318-319.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211页。——译者注)

^② *Naredni zadaci sovjetske vlasti*, Ibid., knj. 1, str. 344.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译者注)

级革命化；第二个阶段是政治革命，表现为夺取政权和摧毁旧国家机器；第三个阶段是经济革命，即建立新经济关系；第四个阶段是技术革命，它表现为加快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看到，在这种思想中有相当明显的形式主义，同时所反映的是当时不发达的俄国中的一种形势。50年代以后欧洲和世界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力量对比转向对社会主义力量和共产主义力量有利，这种形式主义的划分阶段被严重摧毁。当然，所有那些更坚持某些理论提法（斯大林主义把这些提法更教条化，原有的现实更少了）的思想家在新时期连同整个运动都遭到了明显的失败。

社会主义力量不得不承受欧洲法西斯主义造成的一些惨败的痛苦，并且看到，死板地、非辩证地坚持某些“革命的”口号和论点是走投无路的。必须给予猛击一掌，特别是在1933年以后，才产生有必要在人民阵线中共同行动的意识，尽管当时人民阵线还是零散的、不彻底的和不完整的，必须吸取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教训，才能使关于进步力量共同行动的这些思想进入这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意识中。

然而，如果我们认识辩证法的某些根本原则的话，在特殊和普遍的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就应该预先准备与把某些特殊情况普遍化的行为批判性地保持界限。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或普遍趋向迄今都没有以同样一个方式展开，将来也不会。条件、传统、发达程度、外部情况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必定给每一个新的历史事件打上特别的烙印。这个问题对我们南斯拉夫来说有特殊的意义，特别在同斯大林发生冲突以后。斯大林否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仅仅是因为我国的革命没有按斯大林制定的公式进行。我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特殊性正是这些新因素之一，如同今天发达国家中情况在改变一样。这促使我把我的第一部长篇哲学著作，也是我的博士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关于普遍、特殊和个别问题的思想》用来阐明这个理论问题^①。

同样地,其他一些历史现象也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出为其作理论阐明的任务。我们从本书中看到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斯大林如何解释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斯大林本应用每个物体都是由一定的质所决定的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证明和阐明迅速而暴力的变革和资本主义毁灭的必然性,因为质只能迅速地、突然地和“爆炸式”地发生变化。战后在他们的实践中提出一个社会主义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斯大林极力回避这一辩证法的跳跃,理由是对抗的阶级不存在了。结果提出了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和平的、进化式的过渡的问题。在本书后面部分我们还会看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及其过渡的思想从本质上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过我们现在只谈既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涉及发达国家的情况,而在发达国家里革命的问题已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了。苏联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 B. M. 凯德洛夫(B. M. Kedrov)试图使这些新论点与对上述辩证法规律的当时的解释一致起来,提出了关于旧质向新质过渡的方式之一渐进性的新论点^②。

凯德洛夫看得很清楚,许多进程不只是以一种急骤的、爆炸式的跳跃,旧质向新质的急骤过渡而展开的,而是存在着进程的某种进化性。凯德洛夫在坚持物体的旧定义的同时,提出关于旧质逐渐变新质的可能性的论点,从而同量与质关系的辩证法思想相抵触。不可否认,质的每次变化,当它向另一个质急骤跳跃时,这个质就会让位于达到这些变化的某个点的质。所有这些先前的变化终究是处于量变的本质中。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我撰写了《量变到质变规律问题概论》(1952年)一书。我在书中得出结论:我们不能仅仅用一个质来

273

^① Predrag Vranicki, *O Problemu općeg, posebnog i pojedinačnog kod klasika marksizma*, Zagreb 1952.

^② B. M. Kedrov, *Postepenost kao jedna od formi prijelaza staroga kvaliteta u novi kvalitet*, *Voprosy filosofii* br. 2, 1954.

决定物体,每一个物体都是多价的,取决于物体本身的特殊结构。“我们把每个物体都确定为众多质的总和。其中一些质对物体的决定更重大些,而另一些则差些。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质理解为第一质、第二质,以此类推。质是受物体本身的特殊结构制约的,所以只要结构本身无变化,质的变化也就不存在。”^①

两年后,出现了关于凯德洛夫的讨论。我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写了一篇专门论文,我认为尚未彻底解决问题,还应当进行一系列精确分析,我作出以下最终结论: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的缺点是:第一,认为物体只由一个质和一系列不重要的属性来决定的思想,科学上是说不通的,就好比是给解决这一重要规律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第二,不应机械地划分进化阶段和革命变革阶段,就是说把进化阶段看成只是量的渐进时期,把革命、跳跃阶段看成只是质变的阶段,是不正确的;第三,认为质可以发生这样的质变以致仍为该质,以便可以不经过激烈转折和跳跃而转为新质,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第四,凯德洛夫臆想的渐进的质变正是质变化中的量的程序,其结果必然是失去旧的量,即急骤转向新质;第五,把那些质变仅限于跳跃阶段是不正确的,因为那些变化在前阶段已发生,虽然跳跃、革命的阶段在根本上和短时间上不同于先前的阶段;第六,在新质因素的积蓄过程中发生跳跃的和革命的变化与关于一个质的论点发生矛盾,这个前提指出一个事实,即这种跳跃存在着(不仅在“大跳跃”阶段),该物体的某些质在改变着;第七,质变的渐进性只有作为某物体个别质长时间的顺序变化才是可取的,而且这些变化的数量会导致该物体的根本变化。这种情况确实不具有某种自己的“中心的革命”和主要的大跳跃,而是包含着一系列的跳跃,给人一种表面感觉似乎革命是在进化式地展开。在后一种情况下,实质是对“进化”的这种理解和认为进化只是量变的渐进

^① Predrag Vranicki, *Prilog problematici zakona prijelaza kvantiteta u kvalitet*, Zbornik radova Filozofskog fakulteta 1954, str. 16.

性的机械思想之间的分歧^①。

我还不认为,所有这些探讨和结论就能把这个问题搞彻底了。我认为,由于有了这些思想我们已经能够从理论上更深入地阐明许多旧的进程以及当今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

二、社会主义的含义

(一) 基本的历史趋向

鉴于书中谈到积极的和消极的异化,有必要就此再谈一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并不简单,在这个问题上理应给予充分的分析。虽然异化问题可以从各方面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来探讨,但这个现象的本质在于对个体的某种分解。人作为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实体是整个社会世界、一切物质和精神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还有创造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潜能,这些潜能成为凌驾于这种社会关系之上的权力,而这些关系常常使人如此受屈辱以致感到自己是它们的产物或者感到在屈从地位中几乎丧失主体。

然而迄今的全部历史,无论是产生阶级之前的或阶级的历史都是人异化的历史。但是异化的一些形式还是有助于人或社会的一部分摆脱迄今历史上存在的某些异化形式,而异化的其他形式还是把人钉在旧关系和旧形式上。这样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意味着人的其他许多能量的释放和人的行动与视野的扩展,总之,意味着人的进一步人道化和开拓人生存的令人惊讶的范围。

275

当某个历史时代被说成是人发展的进步阶段时,并不意味着因此

^① Predrag Vranicki, B. M. Kedrov o postepenosti kao formi prijelaza starog kvaliteta u novi, *Naša stvarnost*, br. 7-8/1956, str. 79-80.

就消除了异化的人的存在。尽管公民、资产阶级时代发展了人生存的所有因素,从那时起才谈得上消除阶级社会,但是资产阶级生存的所有形式,从资本关系到国家,人的生存形式仍然是异化的,不过这些形式在该历史时期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它们历史地达到了马克思在分析中十分精确地划定的界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历史地看,它们是进步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积极的异化。

在社会主义初期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的状况也是这样的,当时还未能消除政治的、经济的和所有意识形态的异化形式。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地是进步的,尽管还存在着异化的生存形式。这种异化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未能清晰地观察到的,也没有意识到潜在于这些形式中的危险。为这些形式而兴高采烈和高唱赞美歌,使他们看不到问题的另一面和出现反面的可能性。斯大林主义就是这种历史盲目性的最典型的例子。各种社会主义力量都清楚地看到作为异化的反面形式、带有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反面特征的类似情况。但是,有时事情被看得抽象,人们没有看到这些形象在自己的历史消极时期或在无政府主义下也会是各种各样的。有过这样的情况,即抽象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区分这些形式时,把资产阶级统治的所有形式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而不看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对社会主义方针的进一步发展比起各种法西斯主义形式是不一样的,而且是更可忍受的。这对进步力量也是一个大教训,同时也是争取进行尽可能有区别的、细心的分析和评判的要求。

276

关于过渡时期问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直到今天还存在着很大的混乱,这首先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把神秘化带进这个问题。非辩证地、死板地划分为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垄断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的做法是违背马克思的思想的。我们已经提到,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的低级和高级阶段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

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但是这里有一点是明确和合乎逻辑的,即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应该具有一些共产主义所特有的东西,而不应该是国家、政党、雇佣关系、阶级、体力和脑力的劳动分工等等,因为所有这些都是遗留下来的阶级-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社会关系形式。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社会主义应该具备共产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开始实现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实现自治、实现政治领域的消亡,首先是国家的消亡,并实现一个新的、直接的、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

由此可见,整个这一社会主义时期即过渡时期是加强共产主义萌芽和因素的一个长的历史时期,而将要消亡的某些重要特征不仅是公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而且也是整个阶级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特征。因为标志着整个这一历史时期的不仅是国家和政治机构的消亡,而且是阶级的消亡,阶级的消失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于这些原因,根本谈不上什么“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建成为社会关系的某种完善制度体系。只有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才会有这样的主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政治领域的绝对的和垄断的权力,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所有重要因素不仅是来自这一主张,而且是来自历史实践。按照这种想法,一旦一切都为国家所有,一旦国家管理并计划整个社会进程,一旦工人阶级对生产和分配的决定权没有任何影响和作决定的可能,总之,一旦实现全面政治垄断和管理,那么社会主义就建成了。这是司空见惯的神秘化,它在东欧官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仍占上风。他们依据斯大林主义这个透光仪,创立了专门的过渡时期理论、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现实社会主义理论。关于这些理论我还要在后面

277

^① K. Marx, *Kritika Gothskog programa*.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译者注)

谈及。

这些理论的缔造者由于预言了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准确年份,而连同这些思想不可避免地走到荒谬的地步。斯大林早在30年代末就这样做了。后来在开始非斯大林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的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和全党一起,确定完成这一过渡的时间是1980年。这只能说明是思想上操纵群众,而绝不是对这个复杂问题的认真的马克思主义探讨。可以看出,苏联最优秀的政治力量,包括赫鲁晓夫及其思想同路人力求消除斯大林主义造成的局面,但他们仍然背着这些沉重的包袱,致使他们不能清醒地观察问题的实质和自己的处境。只要整套领导班子问题未得到解决,只要未能清除妨碍他们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事物以利于自己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斯大林主义神秘化,上述情况就仍将继续存在。

谈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可以说迄今有过许多一方和另一方的偏颇。马克思主义者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因为他们强烈地反对任何政治组织,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个人自由,因为他们主张有必要建立党,然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国家。确切讲,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类似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流派对政治组织总是抱着十分消极的态度,认为政治组织必然会变成权力机关并凌驾于政治组织中的个体之上。早在本世纪初,米歇尔斯在他的著名著作《论党的社会学》中,对上述思想作了最精彩、最鲜明的表述。他总结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断言:政党(这里“政党”这一词是广义的)必须无条件接受的社会学基本规律,可归纳为最简短的公式,这个公式大体上是这样的:组织是统治之母,当选人凌驾于选举人之上,命令发布者凌驾于命令接受者之上,代表凌驾于代表团之上。

278 在民主的各种形式的卵翼下建立寡头是很自然的事,也是每个组织,包括社会主义组织,甚至自由党组织的必然趋向……这样每一个党组织都有一个基于民主基础上的强大寡头。可是处处是当选领导

凌驾于选民群众之上。寡头结构中断了民主基础^①。

吕勒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起初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但20年代初转向了近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立场,虽然他也反对工团主义组织。他认为,集中制会导致群众消极,领导由于自己的地位和生活方式日益摆出资产阶级的架子,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成功地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独裁的—中央集权的组织、政党和工会在取得国家权力时,由于内部需要都会走向官僚主义”^②。

但是,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劳动者的团结一致、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机构的自由和独立,十分强调没有私有制和阶级的社会自我组织。虽然他们的思想是乌托邦的,但人们注意到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即革命成功后有可能立即建立这样一个社会,通过建立委员会和自治看到必然取代资产阶级自私和不团结关系的新型关系。马拉特斯塔也这样写道:“废除国家、没有国家的社会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追求的目的,他们反对基于统治之上的任何政治组织,希望建立人们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建立在利益的和谐和所有人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开展自由和相互的活动之上的。”^③

对此,E. 缪萨姆在自己的著作中说得更肯定和深入^④。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思想表达得特别明确。A. 佩斯塔纳(A. Pestana)于1922年3月在狱中写的《论第三国际》一文中认为,“革命社会化了,而党民族化了”^⑤。他们的最大组织“特拉拜依全国代表会议”制定的、在1936年5月召开的扎拉戈季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西班牙社会主义模式写道:“当革命的暴力阶段结束时,就应公布废除

279

① R. Michels,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Stuttgart 1970, str. 370-371.

② O. Rühle, *Grundfragen der Organization*; iz knjige H. M. Bock, *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str. 402.

③ E. Malatesta, *Anarchie*, Berlin 1975, str. 27.

④ E. Mühsam, *Die Befreiung der Gesellschaft vom Staat*, Berlin 1932.

⑤ A. Pestana, *Betrachtungen und Urteile über die Dritte Internationale; Der Anarchismus*, Olten und Freiburg im Breisgau 1972, str. 361.

私有制、国家、专制原则以及把人分成掠夺和被掠夺、奴役和被奴役的阶段。

在财富被社会化后,无产阶级的自由组织就要着手直接管理生产和消费,当处处都建立起自由公社以后,我们将把新的社会机制搬进车间……”^①

关于生产者组织,在这一纲领中写道:“基层单位(劳动岗位、工会、公社,新社会的所有管理机关)中的生产者、单个的人,是一切社会、经济和道德创造的出发点和基石,公社内部和劳动岗位上的联系机构是车间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由它们同其他劳动中心签订协议。……”^②它们还推荐成立统计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作为各工会之间的联系机构)以及农业委员会。

他们的理论家桑蒂兰在自己的著作《革命的经济机构》(1936年)中也是持这种观点^③。

(二) 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

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谈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态度时,往往并几乎只援引他们晚期的论点,这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已有精确的看法和解决方法。我在本书中已援引了马克思的一些论点,特别是有关巴黎公社方面的,我也援引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经典语句,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下。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预见到,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治、国家的权力,并首先把生产资料转为国家所有。但是,“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

① A. Pestana, *Der Anarchismus*, Olten und Freiburg im Breisgau 1972, str. 381-382.

② A. Pestana, *Der Anarchismus*, Olten und Freiburg im Breisgau 1972, str. 383.

③ 参见 D. Guérin, *L'anarchisme*, Paris 1965, i M. Nettelau, *Histoire de l'anarchie*, Condé-sur-Noireau 1971。

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①。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的态度早在年轻时代,当他们已成熟为唯物辩证法学家时就已是极富有批判性的,一定程度上是反对的。这是由于他们当时进行哲学探讨的结果,同时异化思想有助于他们当时就清楚地观察到人被划分为国家成员和公民社会成员的现象以及这些政治结构造成的政治异化。因此,就在那个时期,虽然还没有像后期那样有成果,马克思就提出十分明确的警告:只要不消除异化的政治形式,人的解放就不会是彻底的。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于《德法年鉴》中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写道:“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②

我们还可以从1844年马克思针对卢格(A. Ruge)的辩论文章中找到同样的思想。马克思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一些政党总是从掌国家舵的其他政党那里而不是从国家本身找祸害的根源。“因为这种割裂状态、这种卑鄙行为、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典古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国家的存在和奴隶制的存在是彼此不可分割的。”^③

^①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Werke, sv. 20, Berlin 1962, str. 26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译者注)

^② *Prilog Jevrejskom pitanju*, Rani radovi, Zagreb 1967, str. 8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译者注)

^③ *Kritičke primjedbe uz članak ‘Pruski kralj i socijalna reforma’*, Rani radovi, str. 17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译者注)

这些思想虽然未形成最终的定义,但它们贯穿在晚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这十分合乎逻辑地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首先是关于当代社会主要阶级力量——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的观点。在批判和反对所有异化,即经济(资本-关系)异化、政治(国家和政治机构)异化和意识形态(宗教和其他神秘化)异化的所有形式的同时,他们不得不相应地把人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解放的进程理解为政治领域、国家的削弱和消亡(这一点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强化政治领域的论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即斯大林主义的论点。

281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军队和加强军队的问题往往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强化国家的论据之一,对此必须强调指出,军队只是国家的因素之一,因此不能以此来评价整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预想是,社会主义将摧毁最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大厦,由此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现有的军队将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维持基本秩序的人民警察,全国人民可以武装起来对付可能发生的反革命企图。正如我们所知,事态走向另外的方向,各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到空前规模,世界分成了两个强大的军事集团,这给社会主义各国增加了义务。

由于这些原因今天不能想象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管其发达水平如何都能够不用自己的强大军事力量保卫自己的独立而得以生存。但是如果社会主义进程能很好地按马克思的精神展开,那就能实现国家消亡、政治领域消亡的进程。这就意味着劳动人民,而不仅是政治官僚,越来越多地把对国家的管理握在自己手中。这种管理的组织越来越少地作为国家的组织,而越来越多地作为自治的组织,从而保卫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军事力量更少地作为国家的军事力量,而更多地作为自治共同体的军事力量。这一发展使得劳动人民日益成为整个社会进程的主体,同时成为保卫这一发展的组成部分。关于武装人民的论点在这一制度中应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在南斯拉夫情况下建立了全民防御体系。保卫社会主义的事情不仅是专门军事机构的事

情和任务,而且是全民关心的事情。关于武装人民的古典论点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应历史地付诸行动。

说到无产阶级专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绕开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问题。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在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理论。第一个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占主导的、以斯大林主义为源头的理论,第二个是把自治进程看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质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理论。

虽然对这个问题还会谈到,因为这是根本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仍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国家消亡和建立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进程的论点,亦即废除雇佣关系和经济与政治异化的论点,还包含着这样的观点,即过渡时期是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化的整个时期,这个社会来自资本主义,并以这些进程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是废除资本主义关系和资产阶级社会、阶级消亡和建立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

282

在斯大林占上风并实行恐怖统治的时代即30年代最终形成的这个论点,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的,是当时在苏联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司空见惯的反映。当时发生了生产资料全盘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农民私有制变成了集体农庄所有制。这一进程是在国家部门最大限度参与下,消灭任何一个不管用什么方式反对这种粗暴举措的人的情况下展开的。这一进程的代表人物宣称,这一进程的结果就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由于苏联和苏联的附庸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改进,于是这一进程的代表人物和所有官方理论家最后不得不炮制出一个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这是斯大林的,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

在这里没有必要列举苏联所有主要理论家就这个问题写的文章,从苏斯洛夫(M. A. Suslov)、波诺马廖夫(B. N. Ponomarev)、尤金,到康斯坦丁诺夫(F. V. Konstantinov)、约夫丘克(M. T. Jovčuk)和费多谢耶

夫(P. N. Fedosejev)以及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所有那些文章都千篇一律。我们只想提及并援引两部著作,其中有些论点被收录到高等学校学生的必读书中。如果以为国家所有制和也完全受国家监督和指导的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占了主导地位就是建成了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在这时候才从自己的基础出发(如同他们认为的那样),那么就应把过渡时期理解为从革命开始到全盘国有化时期。“过渡时期是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以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而告终。”^①由于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两种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这也意味着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理论家们把这种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说成是社会所有制,而没有把由政治领域管理的国家所有制同联合生产者在自己的自治机构中管理的社会所有制区别开来。相反,这样理解的社会所有制在他们看来是修正主义。“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经济特征,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有两种主要形式:国家的(总的)人民的所有制,是最重要的领导的形式和合作社所有制,它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其他关系的内容和发展^②。我们看到,国家所有制和人民所有制被混为一谈。这个官方的论点和看法贯穿在所有著作和教科书中。我们再举一些涉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提法。这些提法,也被纳入高等学校教科书中。这些提法归结为:生产的社会主义社会化始于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以这些生产资料或资本转化为国家所有而告终……产生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两种形式:人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通过国有化,实现了工人的老口号:人民双手创造的东西,应该属于人民。”^③

① *Wissenschaftlicher Kommunismus*, Kol. autora, Berlin 1976, str. 327.

② *Wissenschaftlicher Kommunismus*, Kol. autora, Berlin 1976, str. 357-358.

③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Kapitalismus und des Sozialismus*, Kol. autora, Berlin 1976, str. 440.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按照这种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党领导下整个发展的主要杠杆,它不会分权给其他政党。这对他们来说也是社会主义普遍规律之一。“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成的主要工具。”^①非国家极权化和自治的任何思想都被宣布为修正主义,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同时他们操纵列宁的语录为他们的思想所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普遍的人民所有制基础上,管理和计划通过在工人阶级即同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直接联系的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来进行。修正主义的观点与这些客观要求相违背,宣布把工厂作为‘合作制社会主义’交给了某些集体所有,取消中央国家管理和计划,这样的修正主义观点是与现代生产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相矛盾的。”^②

“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家由于有这种思想而不能摆脱国家主义的框框,必然会把自已的思想宣布为人人务必具有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样我们又回到马克思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状况,因为那企图把一个既定的实践绝对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总是指出政治领域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危险性,并要求政治领域消亡,可是在这里我们仍然遇到完全相反的思想,如同我们看到的,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国家的思想依然存在。国家和国有制在这一理论中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国家所有制甚至被宣布为人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胜利后的国家被宣布为全民国家。“全社会的、人民的所有制必然具有国家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要求有一个这样的中央机构,这个机构了解人民的需要,提出生产目标,有计划地管理对生产基金、自然资源和社会劳动力的使用,协调国民经济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发展,安排并监督分配和交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是代表全社会并

284

① *Wissenschaftlicher Kommunismus*, Kol. autora, Berlin 1976, str. 332.

② *Wissenschaftlicher Kommunismus*, Kol. autora, Berlin 1976, str. 359.

为其利益服务的统一管理中心。”^①

我们看到,按照这个思想,发达的、成熟的或现实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国有化和农村集体化,在这个阶段上整个经济的运转由国家中心指挥、由国家计划指导。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而此前的一切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然后用完全是专家治国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进一步的发展。如利用科技革命,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等等。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是:第一,生产的高度发展,从而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第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能应用于经济目的;第三,系统地建设物质技术基础,为消除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奠定根基;第四,还要更加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工人阶级接近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必要性,通过“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日益转变为全民国家”;第五,不断提高文化水平;第六,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全面合作^②。

285

在确定了过渡时期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这样的之后,在建立了发达社会主义之后,苏联官方的思想(在所有教科书中也出现这样的思想)是:在30年代后期,即斯大林以其粗暴的集体农庄化手段建立了国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计划、管理和支配剩余价值的统一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制度以后,苏联就已结束了这个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政权的辩护士的思想有点奇怪,他们居然在全世界面前平心静气地提出一个论点,即在一个犯下极严重的罪行(致使共产主义运动至今尚未康复)的国家里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难道不需要稍为深入思考并提出问题:怎么能够同这样的人(杀害成千上万为了社

^①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Kapitalismus und des Sozialismus*, Kol. autora, Berlin 1976, str. 466-467.

^②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Kapitalismus und des Sozialismus*, Kol. autora, Berlin 1976, str. 461.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献身的人)手拉手建设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人道主义和团结的社会呢?!

然而,在一个制度内没有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公开讨论和争论的可能性,却有接受政治领域领导的思想的义务——这又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在这样的制度下只会千篇一律地在所有文章和著作中把官方的意识形态法典化,从而走向一种现代的烦琐经院哲学,这对当代发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会产生积极而有成效的影响。因此官方宣称,到60年代苏联已达到发达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并直接准备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这个时期在阵营的其他国家中过渡时期也已结束,并向发达社会主义迈进。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对他们来说,在自己的结构中还有存在资本主义残余(私有农民、手工业者等)的国家如南斯拉夫,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处于他们所理解的过渡时期。因此不必惊奇(如同我国政论界发生的事件),他们为什么在不久前出版的、由“阵营”中几个国家的理论家撰写的题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国际性质》一书中断言,在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阵营”的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已基本建成,而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阵地则刚刚加强。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自治思想曾一直被宣称为修正主义,直至今天他们心里还是这么想的情况下,这确实是莫大的赞誉。

286

事情就是这样。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国家主义思想和自治思想。主张第一种思想的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建设的普遍规律是这样的路子:革命→实行越来越完全国有化的过渡时期→完善生产资料国有化和集体化→建成社会主义,通过在科技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到达发达的社会主义。我认为我在书中已充分地指明,这些进程和结构仍然停留在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有人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生产者自治的开展和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的思想。主张第二种思想的人把培育共产主义萌芽即自由生产者联合体、

具有政治领域初步消亡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自治,看成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标志。后一种思想不设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何日期,因为社会主义是加强共产主义新关系,使旧的资产阶级政治社会消亡,直至这些新关系的完全胜利以及与之相适应,使所有阶级都消失并废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的整个历史时期。

按照这种思想来理解,这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没有这个规律就不能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关系。因此我认为,如果宣布所有这些进程和结构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形式和在这个“历史餐厅”里可以按个人的口味和喜好任意挑选各种社会主义模式,那也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存在着某种每一个社会主义都应具有的社会主义特征——这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即自由生产者的自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自治不是一种模式,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进程有并将有许多模式,我可以说几乎是有多少国家走这条道路,就有多少个模式。因此南斯拉夫的发展模式不是与其他某些模式对立的“社会主义的自治模式”,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或国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是社会主义模式之一,这一模式不会是别的,而只能是自治的。南斯拉夫模式是这样的“模式”,它诞生于不发达国家,和其他许多组织一起处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很不发达的工人阶级和薄弱的民主传统,一党制,整个国家不发达,处于两大集团势力之间,这样的国家为在国际市场上生存而斗争,等等)。因此,这个模式当然也不应成为发达国家的典范。但是,由于提出了自治进程和由此产生的所有其他进程,南斯拉夫成为指明整个问题的实质并历史地-实际地开启揭穿斯大林主义神秘化的斗争的第一个国家。

(三) 自治的历史源头和含义

关于作为最重要的参与形式的自治思想是相当古老的、对其发展

迄今尚无很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的思想。这主要是斯大林主义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数十年的绝对权力造成的结果,致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欧洲工人运动中所有活跃的运动、追求和理论与实践中的创造,统统被遗忘掉。那个时期里出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短文,其中一些文章我们在前面的“注解和述评”中已提到。对自治思想发展的第一篇简短介绍出自 K. 科尔施的《工厂委员会的劳工法》(*Arbeitsrecht für Betriebsräte*, 柏林, 1922 年)。在当今文献中必须提及 J. 乔尔杰维奇(J. Đorđević)和 M. 帕希奇(M. Pašić)主编的论文集《南斯拉夫自治的理论与实践》(*Teorija i praksa samoupravljanja u Jugoslaviji*, 贝尔格莱德, 1972 年);苏佩克(R. Supek)的《参与、工人监督和自治》(*Participacija, radnička kontrola i samoupravljanje*, 萨格勒布, 1974 年)。科尔施一书对自治思想的历史作简短介绍的同时,还提出了摆在工人运动当今发展面前和参与的思想与实践相关联的主要问题。对此还可以补充介绍一些有意思的文选,如 E. 曼德尔的《工人委员会的管理与工人自治》(*Controle ouvrier conseils, ouvriers, autogestion*, 巴黎, 1970 年), R. 苏佩克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自治》(*Etatisme et autogestion*, 巴黎, 1973 年), M. 尼科利奇(M. Nikolić)的《自治与工人运动》I - III (*Samoupravljanje i radnički pokret*, 贝尔格莱德, 1973 年), B. 霍瓦特(B. Horvat)、M. 马尔科维奇和 R. 苏佩克编辑的《自治社会主义》(*Selfgoverning socialism*, 纽约, 1975 年)。

关于异化问题,可以从我的分析和阐述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其他许多著作中看到,这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根本问题之一。这样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彻底了解一定历史关系的结构、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时代的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性质。G. 卢卡奇对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些重要哲学问题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 年)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一条新路线,这条新路线取得了近数十年最显著的成果。尽管对卢卡奇可以有許多非议,但必须首先从人的创造

的积极方面、从不常出现的新思想,即使不是任何其他真正的创造性,去评价其真正的创造性。任何人的活动都是有限的,这是每位富有批判性的思想家,特别是不受唯心主义绝对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清楚的。如果没有卢卡奇当年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就很难理解后来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理论成果以及当代的许多成果。

当在一方开展十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在30年代第一次发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时,苏联哲学家却颂扬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它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理论思想的顶峰。在这部著作中,如同我们多次指出的,这是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归结为贫乏的和低下的本体论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理解的是,这种理论被排除出马克思主义学界,因为不可想象,社会主义尤其是建成的社会主义——如同30年代在苏联所断言的,而今他们的官方理论家仍在重复的——还会有异化现象。只要他们还坚持把官僚-国家主义关系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只要他们还把这种关系的结构看成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就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创造性地和自由地运用于对这一制度的分析中。

289 涉及工人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的整个问题,以及直接民主和自治问题,也是这么一回事。最简单不过的是把俄国革命的整个时期归结为作为国家的苏维埃问题,闭眼不看一个事实,即当时的苏维埃不仅是由工人和部分农民自由并直接选出的,而且已经在工厂发扬自治民主,实行工人监督,尽管在那混乱年代没有多少效果。如今已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当丰富的文献,也有那个时期的重要文献。在俄国理论家和革命领袖当中,列宁和布哈林的许多短小著作无疑是最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17年)、布哈林的《共产党人纲领》(1918年),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1918年)。让我们援引布哈林《共产党人纲领》中的一些段落。谈到各活动领域劳动人民的广泛自治时,布哈林强调不应只停留在监

督上,并按照关于工人阶级直接掌权的思想写道:“这里很明白,光是监督走不远,需要的不仅是工人监督,而且工人要管理工厂:需要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经济部,最后由工农政权机关(各种特别委员会、国民经济苏维埃等)来管理。这些组织不仅监督而且管理。”^①此外,还应提到什利亚普尼科夫和科隆泰,他们是工人反对派的主要人物。当时专门谈俄国工人苏维埃的著作是 A. M. 潘克拉托夫(A. M. Pankratov)的《俄国的工厂委员会,围绕社会主义工厂的斗争》^②。在探讨当时俄国的这些问题的著作中,我们还要提到俄国革命时期的一本由 F. 库尔(F. Kool)和 E. 奥伯兰德(E. Oberländer)主编的文选《工人民主或者政党专政》(*Arbeiterdemokratie oder Parteidiktatur*, 奥尔滕与弗莱堡, 1967 年),此外还有 O. 安维勒尔(O. Anweiler)的著作《1905—1921 年的俄国的委员会运动》(*Die Rätebewegung in Russland 1905–1921*), M. 利布曼的著作《列宁的列宁主义》(*Le Léninisme sous Lénine*, 巴黎, 1973 年)和 Ch. 贝特尔海姆的著作《1917—1923 年时期苏联的早期阶级斗争》(*Les Luttes des Classes en URSS. Première Période 1917–1923*, 巴黎, 1974 年)。

德国革命首先把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当时在全国部分地区成立的)的思想投入当时事件的激流中。当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左派受到这一思想的鼓舞。当时所有著名的共产党人都主张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思想。从罗莎·卢森堡关于斯巴达克分子想干什么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她是坚决主张这一思想的。在声明的第 2 点中,谈到政治和社会措施问题时,罗莎要求,“排斥所有议会的和区的委员会,它们的职能由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及其机构履行之”。在声明第 3 点中写道:“在德国全国城乡、工厂全体成年男女工人中选举产生工人委员会,从士兵中(军官和投降分子除外)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工人

290

① N. Buharin, *Das Program der Kommunisten*, Berlin 1919, str. 54-55.

② A. M. Pankratov, *Fabzavkomy Rossii v borbe za socialističeskiju fabriku*, Moskva 1923; 德国版: *Fabrikräte in Russland, Der Kampf um die sozialistische Fabrik*, Frankfurt a. Main 1975.

和士兵有权随时召回自己的代表,声明第4点规定,全国各地的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选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必须选出执行委员会作为立法和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在后面的几点里规定中央委员会必须至少每3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要重新选举代表。以便能够经常监督执行委员会并保持同各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的经常联系。同时还强调地方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回和更换在中央委员会中的自己的代表。第7点中还特别强调指出,鉴于基层建立了自治,必须在所有工厂中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同工人委员会按协议履行工厂内部事务,协调劳动关系,监督生产,最终接管工厂^①。

我们从 K. 科尔施的短篇论文中援引某些段落。他在那些段落中十分明确地把某些一直模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视野的范畴区别开来。早在 1919 年科尔施在自己写的关于社会化的最初几篇文章中,就生产资料的“社会化”(socijalizacija)和“国有化”(nacionalizacija)明确地区分开来,看到建立经济和政治工人委员会具有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基本含义。科尔施在主张“工业自治”(industrijska autonomija)即参加生产的人们对生产的权力和管理的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绝不是国家所有制,对我们来说,国有化(podržavljenje)只是社会化(podruštvljenja)的一种形式,我们承认社会化的所有形式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化,但只有在它们初生时才能够调节我们所标志的工业自治形式的那种社会生产关系^②。科尔施认为,在过渡时期,还应当有自上而下的社会监督、计划指导,但自下而上的补充监督是很重要的。国有化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含义。“今天都趋向社会化的这两个要求,即自上而下(通过整体)的监督和自下而上(通过直接参与者)的监

^① 引自 O. Flechtheim,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ffenbach A. M. 1948, str. 242-244。

^② *Was ist Sozialisierung?*, 引自 K. Korsch, *Schriften zur Sozialisierung*, Frankfurt a. M. 1969, str. 38。

督,都通过一条道路并行地、稳妥而迅速地实现。这条路今天已被如此多地提及,但却很少被理解为‘苏维埃制度’(Rätesystem)。”^①

291

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提到,坚决主张这一思想的是当时的共产党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潘涅库克、戈尔特、施罗德以及起初的吕勒,他们都是新成立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主要理论家,因此只要援引这个新党纲领中的一些内容就足够了,因为这个纲领基本上是主张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的。“委员会思想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斗争时期处于进一步革命发展的中心。激励群众意识的委员会思想的反响弱或强,是衡量社会革命发展的尺度。争取承认革命的工厂委员会和工人政治委员会的斗争,在一个既定的革命形势下发展成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专政的坚决斗争。这一革命斗争(委员会思想构成这一斗争的实质)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政治表现形式即资产阶级议会的历史必然性为指针。”^②

必须强调指出,社会党左翼的许多头面人物也主张相似的思想。E. 多伊米希在其关于委员会的文章中写道:“完全彻底运用委员会思想就是实际的社会主义。”并指出,不应该忘记这一思想的革命源头。因此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框架内实行委员会制度——这是当时其他流派特别是社会党右派所主张的^③。多伊米希提出委员会思想的同时,认为这一思想基于以下几点:“1. 委员会思想的体现者只能是无产阶级,即为了生活而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的所有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2. 鉴于主张委员会思想的无产阶级抱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目的,所以在委员会组织中不能允许有任何资本主义代表。”多伊米希在书中还认为,这一思想不能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来实

^① *Die Sozialisierungsfrage vor und nach der Revolution*, 引自 K. Korsch, *Schriften zur Sozialisierung*, Frankfurt a. M. 1969, str. 54。

^② Programm der Kommun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KAPD), 载于 *Die Linke gegen die Parteiherrschaft*, Olten-Freiburg 1970, str. 320。

^③ E. Däumig, *Der Rätegedanke und seine Verwirklichung*, 载于 *Theorie und Praxis der direkten Demokratie*, Opladen 1973, str. 79。

292 现,而只能从基层,从车间及车间的委员会出发;委员会组织的机关应当接受自己选民的经常监督,选民可以随时召回代表,如果代表失去自己选民的信任的话。“鉴于委员会思想的目标是使整个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委员会组织不应只是一个党或某些流派的活动场所,它应包括整个无产阶级。”^①

在 U. 本巴希(U. Bembach)编辑的文选中,我们从 R. 维塞尔(R. Wissel)1919年写的文章中,看到关于委员会思想的非常明确的定义。他在文章中把当时各政治流派和党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民主派人士,对以委员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思想以及当时在社会党右派影响下的政府方案,作了概述和绘制了蓝图。

虽然当时德国有关书籍不胜枚举,但看到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最革命力量所主张的委员会思想的力度和明确性,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关于当时德国工人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形成,还有很多著作,这些书中对这些问题的事件有详细介绍^②。

值得一提的是,委员会和自治的思想也是伟大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大利共产党创建人安东尼·葛兰西的主要思想和主要关注之一。当战后出现了同样的事件,意大利工人占领了工厂,并且建立了工人委员会时,葛兰西1919年9月11日在自己的报纸《新秩序周刊》上写道,按照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领导权,它不应立足于工会或党,而应立足于工人感觉到自己是生产者并意识到价值和未来的形式和组织,即工人委员会。“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是一种专门为生产者,而不是资本的短工和奴隶开展活动的一种组织。工厂委员会是这个组织的第一细胞。由于在委员会中有各

① E. Däumig, *Der Rätegedanke und seine Verwirklichung*, 载于 *Theorie und Praxis der direkten Demokratie*, Opladen 1973, str. 80, 81。

② E. Kolb, *Die Arbeiterräte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8-1919*, Düsseldorf 1962; P. von Oertzen, *Betriebs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Düsseldorf 1963; Hans Manfred Bock, *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Meisenheim am Glan 1969; Vladan Pantić, *Radnička veća u Nemačkoj*, Beograd 1972。

劳动部门的代表,代表是按每个行业、每个劳动部门为工厂制造供社会所需的产品而作出的贡献选出的,因此这个机构是阶级的,是社会的。这个机构存在的理由是劳动,而不再是日薪、阶级划分,不再是我们恰恰要清除的一个过去的事实。”

葛兰西和当时其他主导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敏锐地觉察到,新社会的基础不应基于旧政治形态的加强之上,而应基于预示着人与人未来新关系的团结、同等和平等的实现之上。因此,葛兰西在1920年6月5日的《新秩序周刊》中写道,“工厂中工厂委员会的诞生是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新纪元的开始”。这位伟大革命家和人道主义者的见解是,在这个标志着彻底废除资产阶级议会制这种政治—法制形式的新基础上把社会和世界组织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认为,“工厂委员会是历史进程中的第一细胞,它在共产国际中必须达到顶峰,但不再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是作为对世界经济重组,对全体人的、一国的和世界的共同生活的重组”。

在苏联,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和取胜,所有这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都被抛出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好像这些思想从未有过似的,而所有那些仍坚持这些社会主义前提的人都被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并受到最恶毒的诽谤,而且这种情形至今仍以各种方式重复着。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运动同斯大林主义发生冲突时,在寻找对这种戏剧性情况的答案中,对这种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现象进行了批判性的揭示,重新提出了自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然后在关系的每一个激化时期,自治思想都被宣布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反苏主义等等。从当时的许多攻击中,我们仅以A.布坚科(A. Butenko)的言论为例。他写道:“他们力图把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工人委员会)的具体国家形式说成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的规律,使某种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死灰复燃,在批判个人崇拜时期错误的借口下,使苏联社会主义发

展的国际意义和经验受质疑。”^①

294 大家知道,在日益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的压力下,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观点今天被接受,但在这一发展中苏联却保持优先地位,按前面提到的思想,苏联以其“现实的”或“发达的”社会主义“必须居这一进程之首”。既然苏联的特征是仍然存在着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不是在消亡,而是在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就应当服从于个别的实践,并应宣称,国家不但要一直存在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而且国家还应是“全民的政权”,应是“根除官僚主义的机构”^②。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认为国家能根除官僚主义,因为国家恰恰是最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机构。再说,由于国家一直是并将是阶级的统治,国家一直是服务于对不掌权的阶级的压迫。全民国家思想只能意味着要么再没有人受压迫,国家成了多余的,要么人民自己压迫自己,那当然是荒谬的。同样地,如果我们同意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彻底建成的当今官方论点,那么在社会主义建成后接着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按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个阶段里,阶级将被消除,从而国家和当今的劳动分工也将被消除。我们又面临着当马克思主义被斯大林主义取代的时候必然产生的矛盾。我认为,我已充分地表明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一论点源于斯大林主义的主张,即把社会主义与政治领域的绝对统治、全盘国有化和集体农庄化、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国家主义管理相提并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如果按迄今所说的一切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加强真正的共产主义因素即加强自由生产者和自治者联合体的各种多样形式的矛盾而复杂的进程,理解为传统阶级政治社会的一切形式的消亡,那么这种实

^① Nacionalnij kommunizm-ideologičeskoe oružie buržoazii, *Voprosy filosofii*, br. 6/1958, str. 10.

^② *Osnovy marksistskoj filosofii*, Moskva 1958, str. 547.

质上的过渡时期永远不能建成。这样的过渡时期有各个上述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的不同阶段,直至私有制、国家、政治机构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分工的完全消失。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是斯大林主义神话之一。它是一个深刻矛盾的和悲剧性实践的表现,苏联共产党人陷入其中,并力图以此方式为其辩解。

(四) 南斯拉夫的经验

295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迄今基本上是孤立的事件,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的这些经验和问题时,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事件,这一点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提到和讨论过。我再次强调指出,社会组织的自治形式最有力的突破是在俄国革命初期,然后是在德国革命以及意大利和匈牙利事件中。然而,这些重要的社会主义进程都被资产阶级反革命或自己的官僚阶层所镇压。

当我们强调南斯拉夫落后的经济和文化状况以便了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的许多形式和进程时,并不是夸大事实来为某现象辩护,而是必须考虑到严酷的现实,同时也不意味着要为每一个行动辩护。这个问题后面还会讲到。根据所掌握的材料,1938年南斯拉夫人均国民收入为60美元,而同一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为521美元,英国为337美元,法国为236美元,德国为255美元。1937年南斯拉夫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5%,同年美国为21%,法国为29%,丹麦为30%等等。1939年南斯拉夫的就业人口约920,000,当时南斯拉夫全国人口约1500万,其中工人阶级的人数为700,000。如果加上外国资本的影响,即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外国股份在某时期占一半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落后的概貌了^①。

^① *Pregled istorije SKJ*, Beograd 1963; D. Bilandžić, *Društveni razvoj socijalističke Jugoslavije*, Zagreb 1976.

还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当时极不民主的制度,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步力量开展斗争的形势是不利的。从1920年公布的“通令”到1921年颁布的《国家保护法》使共产党的活动被禁止,共产党议员的资格被剥夺。从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受到当局的公开打击和迫害。在那些困难年代,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最高领导成员在斗争中或在狱中牺牲了。

296 使这种形势更加恶化的是南共隶属于共产国际这一事实,在30年代这一事实更加成为斯大林帮派手中的武器。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这里我只想再强调,如果以为,共产党人和整个党能够建立起那种在管理社会方面拥有众所周知的几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极权—官僚主义制度,而同时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人物及其心理和观念没有改变,那是莫大的幻想。有可能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出于政治野心和渴望权力而发生反革命政变,如同斯大林主义体制下发生的那样。这些人已如此远离他们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走上历史舞台的那些原则,以至于他们再也谈不上是共产主义者了。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像那些以任何局部名义而行动的统治者的典型行径。因此在当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日程表上的是:屠杀、假审讯、一些德国共产党人向希特勒叛变、恐怖集中营、伪造历史、把其他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当作他们政策中的小卒子、吞并他国地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领导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and 间谍等等,由于这一切原因,加上本书中谈到的其他许多原因,非斯大林化和铲除官僚国家主义关系的过程,是如此艰难而又长期的,而且不会仅仅是苏共二十大。

对南斯拉夫整个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南斯拉夫出了一位独立的、忠于工人运动的人物,他于1937年不是按斯大林的公式而是在非凡洞察当时历史条件的基础上解决了我国的问题。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走上党的领导岗位的过程是以戏剧性的形式进行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R. 乔拉科维奇(R. Čolaković)的回忆录《关于一代

人的故事》(第3集,萨拉热窝,1972年)中了解到。同样地,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各级中都有十分忠诚的、有才干的和勇敢的人。

我们可以说,当时南共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独立地作出的,往往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意见的。最重要的决定是1941年举行人民起义反对占领者的决定。当时南共约有10,000名党员,南共青团员约有30,000名。法西斯占领,傀儡国建立,南斯拉夫被肢解,南斯拉夫的一些地区被划归其他一些法西斯国家,这一切使南斯拉夫人民处于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是1941年7月4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铁托的意见是一开始就要建立强大的军事组织,而首先是建立游击队,游击队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此外,共产党还要领导广泛的人民阵线,并在斗争中带头。因此,南共成为战场上唯一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铁托早在1941年8月就写道: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在南斯拉夫各主要地区的“主要目的是:把南斯拉夫人民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开展反对帮助占领者压迫和残害我国人民的南奸”活动,“游击队之所以称为人民解放游击队,是因为它不是任何政党和集团的战斗队伍,具体说,它也不是共产党的战斗队伍,尽管共产党人战斗在最前列,而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战斗队伍,在这个队伍中开展斗争的是所有爱国志士和有能力进行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的人士,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因此,“游击队的政治路线是:建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阵线,不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如何”^①。

为了能够对武装斗争有一个总的了解,值得提的是,1941年底游击队战士已有约8万人。第一个无产者旅成立于1941年12月22日。战争后期不仅有师、军团还有整个游击军队,总人数达80万。在斗争中有30万战士阵亡,45万战士和人民解放斗争领导者受伤。在斗争中有5万名南共党员和3/4党的战前干部牺牲。

^① J. B. Tito, *Zadatak narodnooslobodilačkih partizanskih odreda-Govori i članci*, Zagreb 1960, sv. I, str. 1-2.

我们曾提到,当时摆在南共和反占领者斗争面前的基本任务是民族解放。由于领导这一进步运动和斗争的是共产主义力量,合乎逻辑的是,一定的社会进程也随之展开,这种进程最后也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乃至夺取政权和摧毁旧国家。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旧制度的否定态度以及资产阶级和旧制度代表人物同占领者的勾结,都有助于上述进程的发展。所以斗争中的主要口号之一是:不能回到旧制度!由于这一切,人民解放斗争和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开始就宣告要打碎旧政权,建立表现为人民解放委员会形式的新政权。卡德尔早在1941年10月就指出,人民解放委员会是人民政权的临时承担者,并得出结论说:“人民解放委员会今天还不是处处都具有政权担当者的性质,但它一定要具有这种性质。这些委员会今天实际上是政权的担当者,不过确实是临时的。因为它们的职责是,履行这一职能,以利于人民解放斗争直到我们获得解放,直到把占领者赶出我们的国土,那时人民解放委员会就可以转到组织国家管理的事务上去。”^①

在斗争过程中,不但建立了全新的革命军队,而且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43年11月29日)上把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全国委员会成为立法和执行的机构,从而开始了以社会主义力量为首的新国家的存在。战争结束后政权完全被掌握在新的革命的力量手中。

这个革命进程十分明确地表明,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除了俄国道路外可以走另外的道路,就是说,坚持一条道路和一个必须照搬的“模式”的教条主义只会阻挠革命的进程。但是,斯大林势力知道并感受到,他们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行为和方法只有在其他共产党完全屈服和听从情况下才能保持住——而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如此独立性,以及它对自己的革命创造性的自觉,则可能导致在斯大林乐团中冒出

^① E. Kardelj, *Narodnooslobodilački odbori moraju postati istinski privremeni nosioci narodne vlasti-Put nove Jugoslavije*, Beograd-Zagreb 1946, str. 235.

不和音符的危险。斯大林力图针对南斯拉夫领导所做的一切,即迫使南斯拉夫领导完全屈从于自己的观点和行动,这是前面所提到的担心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一方,已不再是革命的而是反革命的政权,这个政权用响亮的革命口号掩盖自己的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在这边是刚刚走出历史性胜利的战斗的年轻革命力量,他们充满活力和对自己力量 and 目标的自信。正因为这样,必然发生戏剧性的冲突。历史地看,这一冲突意味着在这建设世界社会主义新关系中开始迈出新步伐时打破斯大林神话的开始。

斯大林的国家主义官僚阶层为了保住权力不惜使用销毁和伪造证据的最粗暴手段,这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讯中可以看出。在国际上,在依附苏联的某些国家的审讯中,以及在谴责南斯拉夫领导时使用的方式中,斯大林国家主义官僚阶层表明,他们的行为不仅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甚至同最通常的对人尊重也毫不相干。当发生冲突时,在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南共领导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维护资本主义成分。在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二次会议上,指控“铁托集团”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和公然出卖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过渡”,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反对特务和杀人犯铁托集团的斗争是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义务”。我认为,这样的评论也太过分了吧!

299

然而,当年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属于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感受,特别是当时斯大林势力如此拼命地宣传的社会主义经验和思想,直到这个时期一直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产生影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少有人会想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大悲剧。对很多事情不了解,却对很多事情只有相信。必须指出,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信任曾是共产党人在当时困难的,常常是超人的斗争中的重要支撑。历史上真理和谬误的后果总是不一样的。

以共产主义力量为首的新政权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对革命进程有意义的社会措施。首先对所有那些与占领者合办的工业和银行实行

国有化,这样就在几年里对大资产阶级实行了完全的剥夺。还进行了农业改革,规定土地最高限额为 10 公顷,从而阻止了农村大资本的发展。同时切特尼克、乌斯塔什组织及其他占领者帮凶等反革命集团企图拼命地阻挠新政权的巩固,扭转局势以利于自己。据统计,仅头几年里,就有约 800 个分散的组织,约 12,000 名占领者帮凶对平民,特别是对新政权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进行恐怖袭击。他们还指望在同盟国之间发生冲突。

300 如果我们按前几章中提出的标准来确定新政权和头几年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有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力量为首的、非常强大的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支配和管理整个积累的强大的中央政权。同时,在经济的主要部门即在工业和银行系统我们有了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和关系。鉴于存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权,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定性为国家社会主义。此外我们在农村还有小资产阶级关系,在城市还有在中小私有制基础上的关系,更不必说在某些地区还有宗法乃至氏族的关系的心理。从前面所说的可以看到,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和关系可能发展为国家领域、政治垄断、一党制和党与国家融合的进一步加强,从而导致革命蜕化,或者可能发展为通过自治在社会所有领域的加强和国家及政治领域的消亡而使这些国家主义关系得以废除。但是,在那个时期我们对事情还不是很清楚。1948 年的震荡促生了不仅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力量,而且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有决定性意义的新认识。走新的道路来继续已开始的革命这种新认识和决心,是最好的证明,证明问题不是两个官僚阶层之间仅仅就民族问题发生的冲突。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接受历史的考验。

这些努力的最重要成果是: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领域垄断的危险和自身官僚化的危险,认识到要按自治和国家消亡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冲突发生后两年,铁托在人民议会上宣告南斯拉夫革命新时期的开始。“今天人民议会将审议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最重要

的法律草案之一——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工厂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基本法草案。这个基本法的通过将是人民议会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法》之后的最重要的举措。只要生产资料还掌握在国家手中，工人运动的‘工厂归工人’的行动口号就未能实现，因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不是抽象的宣传口号，而是内含深刻意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包含着社会所有制、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纲领。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要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可以而且应该把这一口号付诸实践。”^①

301

让我们再援引1958年《南共联盟纲领》中的一些论述。纲领中对上述问题有如下提法：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也必须是特殊类型的国家，消亡中的国家，其社会作用和组织应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过程将有可能不以国家作用的具体体现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而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加强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确立而展开。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民主和社会自治，是一种能够而且必须逐渐地，即通过演进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的有机形式^②。

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性质，纲领是这样说明的：“工人委员会不是生产资料私有者的代表，也不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工人委员会为了社会共同体的利益管理生产资料，他们在物质和道德政治上的追求鼓舞着他们去劳动。因此，工人委员会既是反对官僚主义又是反对个人利己主义的最合适的社会经济工具。”^③

关于哲学、科学和艺术自由的重大问题，纲领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想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垄断，而是努力通过更深入地认识社会客观现实的办法继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整个南共联盟或是它的个别机构都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其他某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仲裁者。共产党人根据社会利益、工人阶级和全

① J. B. Tito, Trudbeničko upravljanje privredom, *Komunist*, br. 4-5/1950, str. 1.

② *Program SKJ*, Beograd 1958, str. 297.

③ *Program SKJ*, Beograd 1958, str. 347.

体劳动人民最先进部分的社会觉悟程度和社会的物质可能性,利用或运用科学的成果。科学本身就是判断者,而在社会科学方面,检验客观真理的决定性标准只能看社会科学的成果是否符合实际,而这一点在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中将得到最后的检验”^①。纲领指出,共盟反对任何把科学和艺术变成谋求日常政治利益的手段,指出“我国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共盟在科学艺术方向方面以及流派和风格方面的思想作用不要成为教条裁决的作用。……共盟的基本目标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开展思想斗争反对有损于人对其创造力和改变世界能力的信心的一切现象,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理智、更富有内容、更人性化,反对打着科学和艺术自由的幌子鼓吹反动的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破坏社会主义社会道德 - 政治基础的企图”^②。

这样的认识和立场对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南斯拉夫实践中不是简单地、无痛苦地发展的。很多原因前面已提到了,现在再说说两个原因,即整个国家的不发达和仍存在着政治官僚领域和自治领域的十分强大的二元论。后者在这种不发达、商品货币关系、国际资本强烈竞争的条件下,表现出某种与基本目标不一致的倾向(集团占有行为、个别经济部门垄断等)。因此,南斯拉夫发展的突出特点,加上南斯拉夫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国际地位,都使这个自治进程及其发展是“自上而下”,首先是来自南共联盟的领导力量。所以这一进程在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点奇怪,为什么一个彻底社会变革的根本而意义重大的进程主要是通过政治决议和法令来进行的。无疑地这是由于这一进程经历了在发达国家里少得多的困难: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更多的是某种思想的执行者而不是倡导者,所以整个进程的基础总是比所期望的要薄弱;政治领域总想按照当时既定的想法引导全部进程,从而压制了不符合这一思想

① *Program SKJ*, Beograd 1958, str. 399.

② *Program SKJ*, Beograd 1958, str. 417.

的某些倡议；所以总是主要由党来决定什么事是过早，什么事是太晚。问题在于已实现的一个实际进程和趋势与这种评判是否一致。不应忽视一个事实：在政权领域中总是存在着个别人的必然的官僚化，并力图保住在决定权方面的统治地位，这就导致个别人和集团企图阻挠自治进程并加强国家主义集中制[如兰科维奇(A. Ranković)集团]，其结局就等于是反革命，如同我在前面所指出的斯大林主义的例子。民族主义思想的情况与此相似，它把民族的、立国的解决办法与我国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自治方式解决办法对立起来，等等。但是，尽管对这个新开创的自治进程可以指出它的局限性和缺陷(对此自治力量应开展经常的批评工作)，事实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已经达到了这样重要的历史觉悟水平，并已开辟了这一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已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

303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迄今发展中产生这种矛盾是由于很多原因：国家不发达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与之相关的是相当低的文化水平和薄弱的民主传统以及一党的政治垄断，尽管这个党曾领导革命，此外还有很大的对外政策困难和经济困难等等。这一切都对自治进程应该掀起的历史高潮的广度和力度产生了影响。标志着我国发展水平的党内民主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对宗派活动的担心(这种宗派活动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党带来重大的损失并使一个政治组织未能正常地履行职能)，使得迄今对这个问题未能作出更有效得多的解决。在党内有热烈的讨论和意见分歧，对某些思想或评价有不同的意见同时又不产生派别即党中有党，这是有可能的。领导的政治力量应该是十分活跃的力量，如果这个力量在意识和向往方面是先锋的，那么合乎逻辑地这个力量会成为以民主方式解决出现的问题的榜样。

迄今我们有机会看到，在那些毫无道理的情况下作出如此气恼的和行政式的反应，这只会妨碍各级自治的开展，同时导致同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不平等对话(如作为“实践派”成员的某些老师被一

些院系开除,面对公开的新闻报刊进行的攻击无权公开地为自己辩护等)。鉴于我总认为这种措施是与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不相称的,我想再次强调,这对我来说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原则问题。就是说,我认为像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进程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而未能基于广泛的政治多元和民主之上。各种思潮的社会主义力量就应该对发展的每个阶段进行广泛的对话和批判性的阐述。我肯定,在始终不渝地指导社会主义朝着加强自治关系发展的工作中,有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共产党人队伍在内的广泛阵线,一定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获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阵线”中的各部分和各个人对所取得的成果和具体历史条件的看法和评价都会一个样。这意味着真正打破新闻界中的垄断,建立一个批判性的、自治的和社会需要的公众舆论,因为社会期望的是打破经济、政治和精神领域中任何局部的垄断和异化的垄断。

当我们提到60年代实行经济分散管理和大力强调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而使经济出现重大转折时,必须指出,这些步骤从理论上准备不够,深思熟虑不够,所以产生了某些令人不安的现象和关系。出现了新的、强大的金融中心,特别是在银行和商业中。这些中心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比某些当代的资本家还坏。他们对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解是赤裸裸的,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中时而也流露出来,这一政策的代表人物认为,他们可以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全部经营都建立在利润原则之上。专家治国主义势力和官僚主义势力加紧勾结起来。工人阶级和青年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工人罢工、学生示威游行以及理论界的尖锐矛盾是当时最典型的现象。客观条件无疑是困难的,但可以肯定党在那时未能成功地动员自治力量,大家共同对这种过渡的、很不容易的状况承担责任。1968年发生学生游行示威时党基本上持对抗的态度,从而丧失了良机。

当我们重新回顾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的政治行动纲领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要求,包括可以理解的青年最高纲领主义,都被采纳入解决

我国社会问题的方案中。基本要求是：“采取措施迅速缩小我国社会中的巨大社会差距”，要求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明确规定个人收入标准，采取有力行动反对用非社会主义的手段获取财富；“为了更有效和更快地解决失业问题，必须制定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最基本的是保障我国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还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快建立我国社会中的自治关系，排除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官僚主义势力。必须不仅在劳动组织中，而且在我国社会的各级，从区到联邦坚持不懈地发展自治关系制度，从而使直接生产者在这些自治机构中占多数。真正发扬直接自治的出发点是：直接自治者独立地决定自己劳动的所有重要条件，特别是剩余劳动……所有社会和政治组织特别是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民主化应是彻底的和迅速的，以适应自治关系的发展。民主化应包括公众舆论的所有手段。最后，民主化应有助于宪法规定的所有自由和权利的实现……必须有力制止一切企图把社会所有财产分散或蜕变为股份财产的行为，等等。”^①

至于工人罢工，有各种原因引起，持续时间也不一样，但基本上都很短暂。多数情况是抗议性停工一天或数天，作为对工厂中专家治国主义者权力结构、生产劳动价格低的反应，这些都是工人在社会权力机构中参与和影响程度不适当、自治社会关系仍有弱点的结果。N. 约瓦诺夫(Neca Jovanoć)曾对这一现象作过最透彻的分析，可是有人认为这种分析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不相容。而在国家主义—官僚主义者那里，则是被禁止的。约瓦诺夫的这一分析是在他的题为《1958至1969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工人罢工》的博士论文中完成的。从他的探讨、分析和结论中我们了解到，在上述时期里，在南斯拉夫罢工近2000次，主要是在发达共和国，这是可以理解的。相当多的罢工时间很短，一小部分罢工(21.5%)时间超过一天，很大一部分罢工的参与人数很少，罢工最多的是在生产部门，首先是在工业部门

^① *Student*, vanr. broj 2, Beograd, 8, juna 1968.

306 (71.2%)。这些罢工都与损害再生产能力和自治物质基础的经济力量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结构有关。据作者调查,在60年代在工业和矿业劳动组织中以斯洛文尼亚为例,工人的影响力名列最后,所以他们罢工。“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形式上掌权,但他们实际上对自己的代表机关——政治、国家和经济官僚阶层、金融寡头等处于雇佣关系和从属地位。因此工人在形式的社会权力机构中的地位是矛盾的,工人自己罢工的性质也是矛盾的。”^①还可以举出一些材料:自治机构成员参加罢工的工人占罢工总数的85%,很大一部分罢工的真正原因来自宏观体系,即来自劳动组织之外。90.6%的罢工的真正原因是经营条件不好,劳动组织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影响劳动时间而造成的物质损失,80.1%的情况下都由工人弥补了。作者还指出,新闻媒体的反应和没有参加罢工的工人的反应是矛盾的,这也反映出在已建立了自治关系的社会里罢工的性质是矛盾的。然而,问题的实质恰恰在这里,在于自治关系和自治意识的发达程度。因此作者正确地得出结论:罢工是“阶级性质的冲突。如果对罢工作这样的鉴定基本上是准确的,那么罢工和已设定的自治是不可调和的。未来的自治不会没有冲突,但将不会有阶级性冲突的罢工。这样的自治不会轻易地和迅速地实现,但我相信它会到来”^②。

这种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必然反映在民族关系上。最发达的民族在这种金融权利下取得了某种特权地位。所以有些人准确地看到了我国联邦的缺陷,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民族方面,必须从民族纲领出发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没有看到,但现实已迅速地表明,在一个按其结构仍是小资产阶级的国家里,立刻出现各种历史幻影,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些幻影只会引起民族冲突,而不会导致对积累的问题采取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在一个由自己的革命力量指导的,用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办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共同体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

① 约瓦诺夫博士论文手稿,第333~334页。

② 约瓦诺夫博士论文手稿,第342页。

义必将遭到失败。

因此 60 年代初期的特征是在有原则地解决自治中的危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通过宪法进行所谓工人修正案,最终通过新宪法,恰当地、深层次地解决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自治关系。人们看到在许多讨论的议题上,提出自治社会应解决资产阶级议会残留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在一党制的情况下,可能为了某统治集团的利益实行操纵。于是便产生了代表团制,现在我国社会的整个自治组织建立在这一制度上,这一制度也有一系列自己的历史阶段,现阶段仍处于尚未消除政治性质的社会的强大影响之下。

虽然一些国家的宪法不都是这些国家的实际,但这些宪法还是在很多方面揭示了某些进程、关系和意向。鉴于南斯拉夫社会在上述的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矛盾,所以如果想在自治关系方面向前迈进的话,1974 年通过的新宪法就必须提出某些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新宪法第 10 条写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在使用为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在工人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其他联合劳动组织的生产和社会产品分配方面实行自治,以及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中实行自治的基础上”。新宪法第 14 条规定:“保证每个使用为社会所有的资金从事联合劳动的工人在使用社会资金从事劳动的权利时,在其所在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其他一切形式的劳动和资金的联合组织中,同其他工人共同地和平等地管理联合劳动组织的劳动和经营,管理整个社会再生产关系中的事物和资金,调节劳动中的相互关系,就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劳动和资金获取的收入作出决定,并获取个人的收入。

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是联合劳动基本形式,工人在这一组织中直接地和平等地行使自己的社会经济权利和其他自治权利,并决定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其他问题。

任何损害工人的这些权利的行动和活动,都是违反宪法的。”

在其他部门如培养与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保障等领域中的工人

308 是联合劳动中的平等伙伴,通过把自己的劳动同其需求和利益从这些部门中得到满足的劳动者的劳动进行自由交换而取得收入。“总收入是工人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共同劳动和社会总劳动的结果,是在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和在社会确定的获取收入的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劳动和资金而获取的。关于总收入的决定由工人按照宪法规定的自己对从事联合劳动的其他工人和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权利和责任,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作出……”(新宪法第 17 条)

劳动者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地方的、共和国的和联邦的机关以及自己的联合劳动组织。代表每 4 年选举一次,最多只能当选两届,并可提前撤换。“劳动者通过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地方共同体、自治利益共同体、其他自治组织和共同体中在大会上作出决定、全体公决和采用其他形式表达个人意志,通过参加这些组织和共同体管理机关的代表,通过订立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通过参加社会政治共同体议会的代表团以及通过指导和监督对议会负责的机关的工作,行使权力并管理其他社会事务。”(新宪法第 89 条)

仅从新宪法的这些最重要的条款中,就可以看出自治制度的组织和职能的基本方针。两年后即 1976 年通过的《联合劳动法》中的有关自治和劳动关系的其他许多条款使这个宪法具体化了。这个《联合劳动法》对劳动组织和整个联合劳动中关系的运转有着根本的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进一步发展自治关系的这个新行动纲领,是当今自治力量在内部的发达程度和相当不利的外部环境下能够提出的也许是最高的纲领。要实现这个蓝图不会没有困难。现实仍然孕育着许多旧的关系、结构和心理以及向新事物迈出的步子。准则和实际有时接近,有时则相当脱离。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不了解这些不一致和对立。我们仅举出一个最新的例子,即 A. 德拉吉切维奇(A. Dragičević)所作的分析。他指出,我国自治社会的特征是存在着若干基本矛盾:第一个矛盾是“联合劳动与以占有资料作为动机和最终目

的之间的矛盾……”^①劳动联合起来是为了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劳动的实力。第二个“大矛盾是劳动与管理之间的矛盾,这种管理作为专门的职能有各种内容,所以必须在不同时期履行”。第三个“大矛盾是等级的劳动组织与生产者的自治平等之间的矛盾”。第四个“矛盾是筹备职能与通过决议的职能之间的矛盾”。^②德拉吉切维奇认为,在这个重大的领导问题上,必须在自治结构上作出急剧的变革。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有别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自治的全面发展进程能够废除雇佣关系和经济与政治异化的其他形式,这正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目的。只有通过自治进程才能消除我国科学界和艺术界中工人阶级的雇佣关系。巴卡里奇(V. Bakarić)在谈到我国发展的新阶段时,特别强调指出,“在现阶段,我们应当做到使工人阶级直接地、不用党这个中介而成为引导的力量,即在经济中,在社会关系中成为发起一切倡议的决定性因素。过去工人阶级不得不通过国家机关工作,当时工人多多少少处于雇佣关系,因为工人同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在那里面对的是以经理面目出现的企业,工人同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③。当生产者支配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成果和扩大再生产时,剩余价值以及雇佣关系就不再历史地存在。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是否还具有异化劳动的某些特征,如同在一个具体自治社会中这一解放能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一样,都是另外的问题。因此需要有详尽的、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在我国社会里有这样的分析,但还远远不够。

① A. Dragičević, Temeljne suprotnosti udruženog rada i samoupravljanja, *Kulturni radnik*, br. 4/1977, str. 18.

② A. Dragičević, Temeljne suprotnosti udruženog rada i samoupravljanja, *Kulturni radnik*, br. 4/1977, str. 28, 32, 34.

③ V. Bakarić, *Socijalistički samoupravni sistem i društvena reprodukcija*, Zagreb 1974, str. 95.

310 我们已经说过,如果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整个政治制度不是建立在自治关系上,自治关系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功能并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卡德尔的论著《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发展方向》^①是为解决这一重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制定一个详尽行动纲领而作出的最有意义的努力。卡德尔的论著同时也成为南共联盟十一大解决这个问题的依据。卡德尔从马克思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应该废除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些形式,虽然这些形式在一个时期里可以和应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保留。社会主义应该废除政治领域统治生产者和劳动者的一党制或多党制的一切形式,而不管它们有或多或少的民主形式。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不是一个或多个党掌权的问题,而是消除政治领域的权力异化的问题。因此,“联合劳动中的自治现在又成为社会,即社会经济共同体中的自治的真正物质基础,这些共同体从区到联邦执行国家权力,实现劳动者和公民对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民主权利”^②。“我国的整个政治和国家的制度是从自治中成长起来的,这是自治机构在自己的范围内独立执行的新职能与局限于狭窄范围内即中央国家权力的议会制中的某种古典国家职能的某种结合。因此很明白,我们的国家制度作为整体应建立在自治民主制度本身所要求的那样的民主基础上。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应建立在脱离自治者的政治力量的政治垄断之上,而应建立在自治者和他们的自治共同体以及他们的代表团和代表的引导的和决定性的社会作用之上。”这就是说,实行从基层到上层的代表团制。从而权力本身“成为自治多元民主制的工具,并将日益成为公众服务机构之一”。^③

① E. Kardelj, *Pravci razvoja političkog sistem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Beograd 1977.

② E. Kardelj, *Pravci razvoja političkog sistem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Beograd 1977, str. 21.

③ E. Kardelj, *Pravci razvoja političkog sistem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Beograd 1977, str. 109, 110-111.

按自治原则建立的这种结构的社会,应逐渐取消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任何政治垄断。“我们反对一党制不是由于我们想否定一党制的任何积极历史作用,而是由于它同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民主关系不相容,同自治利益的民主多元不相容。此外,一党制发生如此畸形以至远离革命的初期阶段。”卡德尔认为,把我国的制度说成是一党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看不出差别,尽管他们认为在南斯拉夫制度中由于社会的过渡性还存在着政治多元因素和一党制因素。可是,“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度的发展恰恰是对党的政治垄断的否定,而不管这一垄断是表现为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形式”。“我国民主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应是用真正的自治政治多元主义,即用自治主体(局部和全社会)包括真正自治利益的多元主义,来逐渐消除政治垄断的多元主义……工人阶级本身也是有阶层的,所以不应把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归结为一个政治公式。工人阶级的共同长远利益是劳动管理社会,而不是私人所有制的或国家所有制的力量管理劳动。但是,按劳分配原则在工人阶级内部也会引起某种利益冲突。这些冲突有可能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而不是按工人阶级的某个阶层的意愿被消除”。^①

311

我认为可以说,我国社会只要顽强地和一贯地实现这些设想并消除我们曾提到的许多矛盾(当然不可能消除所有矛盾),就能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政治社会中的仍很强势的残余。政治领域以及仍没有受联合劳动足够监督和管理和各种经济实力中心在我国社会中发挥着大于自治的性质和意愿所要求的作用。这一点在投资政策这一重要领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我们再看看公共舆论和新闻刊物方面的不发达状况,可以看到那里的进程不是直线上升和无冲突的。争取积极利用科学成果的斗争,争取缩短劳动日的斗争,也是自治进程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只有劳动分工被消除和发达的自治关系获

^① E. Kardelj, *Pravci razvoja političkog sistem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Beograd 1977, str. 47, 53, 47, 87.

胜,生产者才能在自己充分的人的生存中成为管理者,从而使管理不再仅仅是他们生产者生存的补充。为实现这些目的,必须有全体自治力量的全面参与,而不管他们的观点和评价如何,而社会的先锋的政治力量能够而且应该在这一进程中成为有自治力量的动员者。为了自治的胜利,需要所有那些把当代世界彻底革命事业放在心上的人的热情、参与、自我牺牲和团结。

(五) 社会主义与自由

正如我说过的,由于自由在近几十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学界发生了重大演变,因此不可能在这本书中深入研究关于自由的全部哲学问题。当然,为了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社会的-政治的探讨,必须澄清人、自由、异化等某些哲学问题,在这里应更多地把这些问题当作已了结的前提。我在书中已强调,要使这个社会学命题能够得到彻底的理解,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把人理解为实践、自由的优质实体。比起那种经过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到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把自由理解为意识必然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态度,这是不一样的、进一步发展的态度了。虽然可以说恩格斯的著作有助于某些观点更深入,他的一些语录直到20年代初期一直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用这种精神去理解。

然而,晚期发现的1844年马克思手稿证实了青年卢卡奇从20年代初起的天才预见。卢卡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不仅对这个问题而且还对其他许多根本问题提出了批判性的意见。后来人们看到,马克思摆出了和斯宾诺莎或黑格尔不一样的和更深刻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马克思在提出作为商品实体的人的实质是什么时,作出了如下回答:人的实质在于他的自觉活动,在于他的生产。“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

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①在讨论动物与人的差异时,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仍然是鲜明的。动物只按自己直接的生理需求、只按自己物种的标准和需求而简单地“生产”;而人是摆脱了生理需求按各种标准和自己建立的规则,如审美规则而生产。

这些论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曾有重大的影响。313 所以当今关于人和自由论题的著述非常多。我们在这里只列举几位人物: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弗洛姆、马尔库塞、列菲伏尔、萨特、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邦菲(A. Banfi)、加罗迪(R. Garaudy)、哥德曼、科夫勒(L. Kofler),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有:苏佩克、弗兰尼茨基、彼得罗维奇、达迪奇、马尔科维奇、坎格尔加(M. Kangrga)、斯托扬诺维奇等等。

至于说到资产阶级社会和自由、民主,许多思想家都已指出了事情的真相:资产阶级是多么爱好自由、多么民主和多么自由化,怎样达到了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制度能承受的当今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仅列举讨论这个问题中的两个新例子。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L. 巴索在其关于《政治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对这个历史发展的基础研究,对出现民主时期各社会阶级的作用的分析使我们得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结论。其中的第一个结论是:资产阶级社会对民主的诞生实际上没有起任何积极的作用。”

资本主义在其上升阶段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对国王专政,反对贵族特权,反对官僚暴政,主张经济自由和部分政治自由,主张法制牢固性和社会关系牢固性,但从来不为普选权,所有公民参与管理公共财富和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斗争。在古典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的英国,普选权是全新的成果。在比利时等国家里资本主义迅速获得了胜利。在法国1789年取得胜利的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民主的原则。我们看到市民有积极和消极的差别。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译者注

受显露头角的资本主义破坏的各阶层用民主原则武装起来抵制资本主义的优越地位。小资产阶级成了民主原则的卫士,他们以民主原则名义要求拥有参与管理公共财富的权利,他们渗入新生的不发达的无产阶级阶层,部分地渗入农民阶层。直到1848年民主一直是包含有许多模糊东西的革命格言,但它是反对现行制度的。正是这个民主即所有受害阶层的联盟在1848—1849年两年革命时期遭到惨败^①。

一个由R.巴丹泰(R. Badinter)领导的法国保护自由宣言委员会的想法是很说明问题的。他们写道:“关于所有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和平等权利的原则,未能阻止奴隶制正式存在到1848年。除了1793年的光辉之外,普选权的原则长时间里一直是只有统治者的选举权,统治者剥夺穷人的这个权利直至第二共和国初期(1848年),剥夺妇女的这个权利直至第四共和国初期(1945年),剥夺青年的这个权利直至第五共和国(1974年)。报刊自由不得不等到革命后一百年(1881年),为了把罢工权写入1946年宪法而要产生多少罢工、被囚禁、被流放和遭杀害?1848年以后进行了多少斗争,经历了多少失败和胜利才使社会保障权、休息权得到承认(1936—1945年)?不仅需要一次,而且需要两次、三次革命才能使自由的这些方面成为最终的成果。那个自由从来不是自动送上门来的,而是每一次都要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才赢来的。即使写入了法律的东西,统治者还是长期地认为是犯法而加以惩罚。被大资产阶级当作显示其心胸开阔和心态平和的战利品和纪念品的这些自由,都是大资产阶级失败或后退的残余。”^②

如果我们看一看人类半数性别的权利即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我们就会看到,情况更糟。早在本世纪初,在某些发达国家甚至直到今天,妇女仍处于和男人不平等的地位。没有政治选举权,在法庭面前妇女由自己的丈夫代表。妇女无权提出离婚,而在某些浪漫的国家里,今天还为更现代化的婚姻权利而斗争,如离婚权、堕胎权等等。再补充

^① Lelio Basso, *Izgledi evropske ljevice*, Beograd 1971, str. 218-219.

^② Robert Badinter, *Liberté, libertés*, Paris 1976, str. 27-28.

一点不会是多余的,即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在工资收入方面不久前才实现男女平等。

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罢工,斯大林主义也把这个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神秘化了。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即由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实际管理的社会里,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举行罢工反对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管理,肯定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如果官僚主义—国家主义政权完全脱离劳动者并与之对立,并宣布已建成社会主义,那么上述论点便成为司空见惯的政治诡辩。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一个如此不民主的政权,禁止任何公开的反抗,禁止工人阶级以罢工形式表示抗议,只会表明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经济关系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工人阶级在长期的斗争中已经赢得了罢工权利,如果情况不是确实荒谬,如果工人阶级是真正地在管理自己的劳动、自己的产品和关系,工人阶级就不会采取这种手段。因此,在通过自治的各种形式开始改变社会经济关系的实际进程的社会中,发生罢工现象,如同我们说过的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不合乎逻辑的。自治关系发展的初期,表明关系发生社会主义变化的重要进程初期,还不意味着这些关系在一定时期里是统治的、占主导地位的。各种形式的关系、权利、利益、决策等,从政治官僚主义、专家治国主义到地方主义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这多少会对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地位,对他们无力克服某些困难和个别领域的异化的感觉产生消极的影响。其必然结果是发生罢工之类的抗议形式,特别是在内部自治关系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罢工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意味着自治民主新关系的胜利,在这种新关系中每个集体的成员的命运都取决于他们自己在地方或区、共和国的自治、政治或生产者自治机构中的代表。

至于科技革命和社会公共体的进一步物质发展的大问题,如同许多科学工作者已多次警告的,事情已发展到几乎荒谬的地步。市民的心理、资本主义制度——不管是原始的或当今垄断制度和跨国制度——的逻辑量化、战胜大自然和唯利润的生产,这种文明已充分地

表明了由这一社会关系制度的逻辑产生的悲剧：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人的物化达到了最大限度，人不仅成为生产中创造利润的手段，而且成为消灭其他人、破坏数世纪人类文明以利于某些资本家的局部利益的手段，成为对人类构成新的致命危险的野蛮破坏环境平衡的手段。基于剩余价值生产之上的社会再也无力合理地和人道地解决人类这个生命攸关的问题。社会主义能够通过发展自治关系来消除当代阶级社会的这一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还不能一下子消除遗留下来的劳动分工，从而也不能一下子消除某种剩余劳动。但是，在这个社会里在多大程度上逐渐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剩余劳动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必要的劳动^①。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人类已进入为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变成劳动者的必要劳动的时期。

317 第五章 当代的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

一、欧洲共产主义

以“欧洲共产主义”为称谓的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发展现阶段的思考，并不是（本书也不是）要把自己的思想作为无可争议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强加于人。我的目的和愿望是：就对当代人有重大意义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有许多分歧并发生激烈争论和辩论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此外，理论分析的某种逻辑使我想到，发达资本主义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同志们对这个对话，对迄今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分析和实际成就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不会不感兴趣。

^① A. Dragičević, *Potrebni rad i višak rada*, Zagreb 1957.

本章首先是谈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但在本章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所涉及的东西对全体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几乎全是有用的。他们的一些代表如法国社会党人从他们自己的观点中得出比共产党人更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如在自治问题和自治思想上。我之所以专门谈欧洲共产主义,是因为这一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发生最激进的、进步的演变。它一直努力把自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曾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是在工人阶级中有最牢固基础的、组织上最强的政治结构。

某些东欧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官僚阶层十分迅速地跟着发起攻击,不是由于这些运动的新策略和政治方略的问题,而是由于他们使一个既没有达到资产阶级自由水平又使工人阶级完全脱离实际权力,没有可能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社会主义成问题。最令官僚阶层感到不安的东西不是卡里略对欧洲形势的分析和关于斗争新方式的结论,而是卡里略的下述断言,即列宁所构想的“掌权了 50 多年的无产阶级国家仍模糊不清。取代无产阶级国家的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国家机器,这个机器不过是列宁梦想的‘廉价国家’罢了。如果所有国家都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武器,如果在苏联没有对抗的阶级因而客观上不存在压迫其他阶级的需要,那么这个国家统治谁呢?”^①卡里略接下来的断言更让他们不安,他说,“在这个国家内部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现象,伴有类似法西斯专政特征的一系列形式特征”。卡里略还强调指出,这里说的是形式特征,因为这两个制度毕竟是有重大区别的。卡里略还正确地指出,“作为极权主义形式被资本主义宣传大量利用的斯大林主义现象,削弱了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公民中的民主信任度”^②。卡里略还得出结论:以非斯大林化起步的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之一也许是他没有能力改造斯大林建立的国家机构。这个国家机构没有多少民主化,甚至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保留了许多强制手段,如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卡里略

^① S. Carrillo, *L' eurocomunismo e lo stato*, Roma 1977, str. 192.

^② S. Carrillo, *L' eurocomunismo e lo stato*, Roma 1977, str. 192, 193.

说,虽然斯大林时代的大规模可怕镇压已过去了,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是我们面对的还不是可以认为是工人民主的国家^①。如果不是工人的民主,那还算是社会主义?!

319 社会主义运动中迄今的分裂和各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强烈对抗的问题把所有那些在组织新社会方面基本上都主张马克思的和社会社会主义的主要革命意向的社会主义运动务必接近的要求提上日程。因此必须首先强调,当今最大的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法国社会党和西班牙社会党在争取斗争的民主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作为社会主义实质的自治的基本要求和主张,有些要求和主张甚至比共产党提得还早。某些工会运动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些刊物[如由 Y. 布尔代(Yvon Bourdet)主编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自治》(*L'autogestion et le socialisme*)]都是首先谈到这个根本问题。

在这里仅举社会党的两个观点就足够了。J. P. 舍韦内芒(J. P. Chevenement)在其文章《南欧社会主义概论》中谈到消除集团体系和工人运动中的旧矛盾时指出,“与旧社会关系决裂意味着新社会关系在与积累的逻辑的截然矛盾中诞生,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积累还是官僚主义的积累。这是社会党自治方针的含义,是社会党纲领确认,写入1975年6月通过的关于自治的提纲的”^②。在同一次会议上,西班牙社会党人 F. 布斯特洛(F. Bustelo)在其文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中写道:“我们期盼的社会轮廓还不能完整确定,首先是由于缺少历史模式,还由于当今世界没有实现可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事实。社会党人认为,只有在自由中和在一切有关的人们的充分参与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而没有这种参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论它取得什么成就。如果多数人没有平等地参与组织社会,如果多数人不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在物质方面有进步,但仍存在着多数人屈从于少数人,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这条参

① S. Carrillo, *L'eurocomunismo e lo stato*, Roma 1977, str. 194.

② *Socijalizam u svetu*, br. 1, 1977, str. 51.

与的道路正是要通过自治才能实现的。”^①

虽然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还没有对这一思想加以充分研究和思考,虽然这一思想尚未成为广大劳动阶层的主要见解和基本实践,但自治思想再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不会像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主义时期第三国际那样。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政党的情况则不同。共产党人对这些党的主要批评是,这些党基本上是制度党,它们局限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管理及其完善。的确,这是曾经掌权的社会民主党迄今的成就。不应忽视这些党取得的一定的民主成就和在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方面赢得的一系列成果。同样地,如果我们不指出这些党内部存在着左倾,那是不对的。这个左倾虽不占主导,但成功地在纲领性文件中明确地勾画了作为主要目标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让我们来看一看最依靠国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75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直至1985年的纲领,都可以看到十分明显的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建设民主社会主义、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倾向。在他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应基于这些基本价值之上:自由、公正和团结。“民主社会主义既没有许诺人间天堂,也没有许诺鲜为人知的所有问题,它也不是一个建立新社会制度的现成计划。民主社会主义正是表现在:为自由、公正和团结而奋斗,保护这些东西,并在其中证明自己。这就是我们把社会主义当作长期任务并持之以恒的深层原因。”^②

320

纲领突出强调,社会民主党首先依靠国家,依靠“社会的和法制的国家”。国家的任务是保障自由、公正和团结的发扬。因此国家不应成为大利益集团的俘虏。他们认为,有可能做到使国家成为不依附于大资本利益的国家,因此必须加强工人参与活动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和工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政策证实了国家在建立我国制度中的

^① *Socijalizam u svetu*, br. 1, 1977, str. 45.

^② *Orientierungsrahmen '85*, izd. P. Oertzen, H. Ehmke i H. Ehrenberg, Bonn-Bad Godesberg 1976, str. 11-12.

积极作用。但是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任何的社会国家化。”^①社会民主党人不担心这样的解决办法,即在不可能用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不得不把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制。而在遭到如此多批评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纲领的戈德斯贝尔纲领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在自治和分散管理的原则上管理社会所有。在上述纲领中指出:“任何把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的做法都潜藏着危险。因此必须按自治和分散管理的原则来管理社会所有。”^②但德国人有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老传统。在实践中,社会民主党由于受限于选举联盟,更多的是以国家主义为方向,而自治为方向却少得多。这无疑是使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社会不断发生危机和保守派复辟危险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对这样的情况不必感到奇怪:马克思主义者利贝蒂尼(L. Libertini)认为,“社会民主党从本质上接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愿意对它进行修补和完善,但不愿改变其内部结构”^③。卡里略写道,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不会发生任何混淆,“即使是迄今已定义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亦如此。统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主张,是要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管理这个社会;是要把社会主义抉择加在国家垄断资本之上,但不是加入而成为其统治方案之一”^④。

在分析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时候,当今西欧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有一种想法,即形势在恶化。特别是考虑到跨国公司的建立和活动。普遍的想法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国家的某些机构,专政与限制政治自由在加剧,国家行政和官僚阶层在加强,政党作用在削弱等。[N. 帕乌兰扎斯(N. Poulantzas), E. 曼德尔, H. 列菲伏尔等人。]

鉴于仍然存在着政治多元和民主,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力求以自己

① *Orientierungsrahmen* '85, izd. P. Oertzen, H. Ehmke i H. Ehrenberg, Bonn-Bad Godesberg 1976, str. 27.

② *Orientierungsrahmen* '85, izd. P. Oertzen, H. Ehmke i H. Ehrenberg, Bonn-Bad Godesberg 1976, str. 34.

③ *Socijalizam u svetu*, br. 1, 1977, str. 169.

④ S. Carrillo, *L' eurocomunismo e lo stato*, Roma 1977, str. 127-128.

的行动阻止这种关系的蜕化,并成为坚持维护和扩大已取得的民主自由的力量。因此,贝林格(E. Berlinguer)坚持认为,“一个更高级、更公正和更高生产力的制度的建设,可以并且应该在不影响宪法保障的我们的自由、尊重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和规则下展开。我们应该明白,消除资本主义逻辑的进步过程就是巩固、促进和不断扩大民主生活的形式,逐步限制经济和政治统治集团的寡头形式,最大限度发扬各阶层人民和每个人的参与、责任感和首创精神,扩大和谐精神和国家的社会基础”^①。在谈到智利事件时,贝林格首先不赞同像给议会下定义那样简单地给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下定义,因为“我们没染上议会矮呆病(kretenizam)^②,而染上反议会矮呆病的却大有人在。我们把议会看成是意大利政治生活的基础机构,不仅是今天,而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是这样”^③。贝林格指出建立劳动者广泛战线和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以便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及民族和价值的指导思想进行进步的改造,同时得出了结论:这不会是平坦的道路,不会没有斗争,不会轻而易举。因此,“国内问题的严重性、反动分子冒险的经常危险性和最终为本民族开拓一条经济发展、社会复兴和民主进步的可靠途径的必要性,使得在团结并代表意大利大多数人民的各力量之间达成新的重大‘历史性妥协’的决心更加紧迫和更坚定”^④。

322

自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发达国家的共产党虽然它们同其他某些工业发达的国家(日本)的共产党持一样的观点,但它们试图创立自己的斗争战略与策略以及能够继承它们国家民主和自由传统的发达社会主义思想。因此,1977年在马德里通过的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

① E. Berlinguer, *Komunistički prijedlog*, Zagreb 1977, str. 51.

② 阿尔卑斯山地区特有病症,患者因甲状腺肥大身体变形而成白痴。——译者注

③ E. Berlinguer, *Razmišljanja o Italiji nakon događaja u Čileu*, *Marksizam u svetu*, br. 8, 1977, str. 29.

④ E. Berlinguer, *Razmišljanja o Italiji nakon događaja u Čileu*, *Marksizam u svetu*, br. 8, 1977, str. 40.

党和西班牙共产党联合宣言具有重要意义,宣言指出:“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坚决主张,在政治和社会力量多元范围内开展活动,尊重并保障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如:思考和表达意见自由,新闻自由,集会和达成协议权利,游行示威自由,公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行动,工会自由,工会独立和罢工权利,不侵犯私生活,尊重普选原则,可以通过赢得多数选票对政权进行民主撤换,尊重宗教和文化自由,在哲学、文化和艺术领域表达思想和进行思考的自由。愿意并决心在我们三个党各自确定的思想主张基础上,彼此完全独立地在民主和自由中建设社会主义。”^①

至于提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对迄今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本上是从它的镇压方面来看待国家,并由此提出打碎这个暴力机器。今天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中占上风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葛兰西所主张的。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区别开来。葛兰西没有把国家理解为等同于权力机关,而是看成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政权机器而且通过“市民社会”一系列机关(其中有些机关不一定具有国家性质)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对此,我们可以看一看当今意大利共产党人马歇(G. Marchais)、卡里略等理论家的分析。卡里略把国家镇压机器和意识形态机构严格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后者(如教会、学校、文化、新闻媒介等)处于危机中。资产阶级如不能取得这些意识形态机构的一致,就不能长期地实行统治。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当今革命的战略应当是:致力于改造意识形态机器,把它改变并加以利用(如果不能全部,那就局部)来反对垄断资本的国家政权。现代的经验表明,这是可能的,这是通过民主道路改造国家机器的关键,除非在发达国家发生军事或经济-政治灾难,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②。

我曾提到,欧洲共产主义者对由这种运动和阶级斗争中产生的社

^① *Kulturni radnik*, br. 3, 1977, str. 100.

^② S. Carrillo, *L' eurocomunismo e lo stato*, Roma 1977, str. 30.

会思想只作了最一般的描述,认为这种社会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资本部门以及中小资本部门实行国有化的过渡的社会思想。同时欧洲共产主义者还认为,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力量将赢得大多数居民和国家意识形态机构对自己思想的支持,以及在多党制和广泛社会民主条件下坚持不懈地进行的社会化。法国欧洲共产主义者虽然依然依靠国家的巨大作用,但他们认为,一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将作出决策而国家将进行组织”,国家消亡就会实现。^①认为只要阶级和帝国主义不消失国家就基本上存在。整个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国家-社会主义范畴内,从社会经济关系看仍处于国家-资本主义范畴内。在整个这一思想方面缺乏对参与和自治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而我们只有在深入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国家消亡、雇佣劳动和上述异化形式的扬弃。此外,我想再次提醒,这一部分无疑是最重要的,从一个长远历史前景来看,应该是社会主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社会的当今环境和民主社会提供的可能性,使得工人阶级有机会通过参与、工人监督和加强自治思想,以历史上未有过的更高的觉悟、知识、文化转入掌握政权的阶段。这是夺取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胜利的重要前提之一。今天如果没有管理的丰富经验、知识和信息,就再也没有可能统治和管理当代社会的复杂机制。当今在商品货币关系还存在的情况下,情况是如此复杂,有人罗曼蒂克地高喊列宁的语句,把事情说得如此简单,连女厨师都能管理国家。看来这位女厨师会按某人说的话去管理,然后她再不当厨师了。

324

因此,最广义的工人政权的重要前提是教育、文化、管理经验、消除工人阶级的雇佣观念。在最发达的社会,至少部分最发达的社会里,工人阶级仍有雇佣观念。如果不做这些工作,工人阶级就不会成为统治阶级,也不会成为统治力量的劳动力量。这样的话有人就会以他们的名义用官僚主义所固有的无所不及的偏差和畸形来实行管理。

^① J. Fabre, F. Hincker, L. Sève, *Les communistes et l'état*, Paris 1977, str. 167.

例如巴索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他写道:“我们普遍熟悉的党的模式的建立是为了另一种需要,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或者为了从传统意义上说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这样大革命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但是想要在斗争中引导无产阶级的党在社会的所有领域每日地指引革命目标,不可避免地要有另一种灵活性。首先必须考虑到,自己的活动中心应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平台,即议会平台(这永远是反映国内发生的斗争的平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是以市民-选民的抽象形式,而是以参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特征并极力推动斗争的实际人们的具体形式,组织并引导群众。”^①

在我看来,关于问题的这一面,不仅大部分取决于新政权的性质,而且取决于发达国家中真正社会主义发展的速度和成功率。各国多大程度上停留在国家-资本主义关系与掌权的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界限上,以多快的速度取消这些机构使之朝着消除雇佣关系、雇佣观念和经济政治异化方向发展,都取决于上述情况。还有,反革命势力试图阻止历史前进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在这些机构中的地位、在管理和创造一个新社会中是起到消极或积极的作用。

关于参与和工人自治的各种形式问题,我认为 R. 苏佩克在他的著作《参与、工人监督和自治》中有很好的分析和表述^②。苏佩克在其书中对参与的各种形式进行分类,从中可清楚地看到,问题不是相似的而是十分不同的进程,所以对当代劳动力量的历史实践中还有很多期盼。我还可以举出欧洲一些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表出版的大量书籍。除了我已提到的许多作者外,我还想指出比利时共产党人 P. 如瓦(P. Joye)的观点。他写道:“自治存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景中”,“参与决策不会使制度及其逻辑成问题”。^③ 如瓦考虑到仍存在着资本主义环境,如同其他作者一样认为,“只要参与决

① L. Basso, *Izgledi evropske ljevice*, Beograd 1971, str. 176.

② R. Supek, *Participacija, radnička kontrola i samoupravljanje*, Zagreb 1974, str. 68-70.

③ P. Joye, *Autogestion et cogestion, Cahiers marxistes*, br. 36, juni 1977, str. 1.

策仍把工人关闭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中,工人监督就要努力扩大工人充分自主作决定的行动区域。工人监督的目的不是与资本‘分’权,而是要缩小资本的权力,要把专制庇护下的越来越多的问题拿过来,以逐渐增加工人的实际权力……工人监督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工人监督应使工人能够获得信息,以便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实行有效的无可争议的抑制。这样就有可能通过工人监督确定朝着自治发展的远景”^①。

我曾提到,工会行动的开展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这样或那样的规模,但其内容已大大有别于过去的斗争。K. 科茨写到这个问题时断言:“T. 托潘和我参照英国工会的经验,试图把所有迫切的要求分为4类:工人需要的权力可归结为4句话:获取信息、对经理活动的**监察**、对仲裁决定进行**否决**、争取工人履行自己职能的**代表资格**的权力。争取这些权力涉及的决策领域包括工业活动的整个部门……”^②

关于工人阶级和劳动阶层开展斗争的各种形式,我们想指出在西班牙通过所谓工人委员会开展这一斗争的特有形式。这种形式既不是传统工会,也不是政党,但它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追求。卡马乔在给这种委员会下定义时说:这种委员会是社会和政治的运动,因为归根到底这种委员会提出改变政权的问题。这种委员会在充分自治独立和不屈从于任何政党或任何类型的组织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运动“认为所有工人都是工人运动和委员会的代表,这个运动通过各劳动中心的集会消除传统工会中有组织者与无组织者之间的隔阂。同时这个运动保障直接民主、自主大会的民主和群众今天参与对自己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意味着明天在对企业监督和管理中以一定的方式起重大的作用”^③。

^① P. Joye, Autogestion et cogestion, *Cahiers marxistes*, br. 36, juni 1977, str. 8.

^② *Socijalizam u svetu*, br. 1, 1977, str. 60.

^③ M. Camacho, Razgovori u zatvoru, Radnički sindikalni pokret, *Marksizam u svetu*, br. 9, 1976, str. 12.

从这些论著中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中的社会革命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再也不是(除极个别外)始于夺取政权、由在居民中占明显少数、缺乏更高的教育文化水平、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无产阶级中少数有纪律的先锋队占统治地位。争取各种形式的参与、对决定的监督、管理自己的共同体等的斗争,是培养劳动力量和提高他们的觉悟的革命大学堂。这也是保障夺取政权的行动,不会以那种使雇佣关系和雇佣观念永久化的专家治国制度而告终。

关于这个问题的现象的书刊越来越多。除已提到的作者外,我还要向读者推荐的是:G. 马歇的《民主的挑战》(*Le Défi démocratique*, 巴黎, 1973年); F. 维尔马(F. Vilmar)编辑的《西欧的工业民主》(*Industrielle Demokratie in Westeuropa*, 莱贝克-汉堡, 1975年); 1976年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法国的社会主义潮流》(*Le Socialisme pour la France*);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1976年第9期关于参与决策和工人监督, 1977年第8期关于欧洲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1977年第1期; S. 弗尔灿(S. Vrcan)《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讨论》(《文化工作者》1977年第5期); L. 格鲁皮(L. Gruppi)的《历史的妥协》(*Il compromesso storico*, 罗马, 1977年); J. 比斯乔夫(J. Bischoff)和J. 克赖默(J. Kreimer)编辑的《意大利的社会主义》(*Sozialismus für Italien*, 汉堡-西柏林, 1977年); F. 丰维耶勒-阿尔格尔(F. Fonvieille-Alquier)的《欧洲共产主义》(*L' eurocommunisme*, 巴黎, 1977年)。

二、社会主义与不发达国家

当今研究不发达国家问题的多数研究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课题。我想在本书所阐述的成果和思想基础上把我的最后一章献给就这个问题展开得已很丰富的国际讨论。因此我不想谈论个别的事件,因为只有各个国家的革命力量才能作出答

案,我只想指出,这些国家,无论它们的传统、历史和特点如何,都面临着新的,与许多国家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曾面临过的相似的问题。

这些国家的发展表明两大类问题:第一类大问题涉及为建立一个新的、历史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实行的结构的改变、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从本文中可以看到,这类问题由于沉重的历史遗留和当今的不发达状况对理论和实践来说都是十分复杂的课题。但是我还指出,许多最重要的问题是和那些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发达的国家所遇到过的问题是共同的。十分重要的、决定性的问题是:阶级关系、党的作用和国有化、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中央集中制还是分散管理、国家和党的权力和机构官僚化的危险、计划和商品-货币关系、国家消亡和自治关系的发展、对中小资本的态度。这些都是当今每一代革命者面临的和要解决的共同问题。

另一类大问题完全是属于哲学理论领域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历史、历史发展和规律的重要思想被多次地作片面的和机械的解释。往往看起来似乎在这个思想中不存在人及其利益、观点、思想和追求,而只有固执地决定历史发展每个阶段的无人性的生产力。尽管有人作片面的解释,但事实毕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过自己的童年时代,他们从当时特别是欧洲发展中的经验出发观察问题。我已强调过,列宁基于20年代欧洲发展复杂的历史实践的阐述提出关于“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的论点,这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的思想的理解。³²⁸这个论点指出,历史不会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而“直线”上升,革命运动和组织的主体力量的洞察和行动可以在按其发展水平没有期望的地方作出历史性的突破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就是说,这些变革有了结果,是由于在那个历史时期,在“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存在实行突破的可能性。

在当今不发达的,不久前还是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力量的方针是,在成功进行了民族解放斗争之后,采取有力的社会主义方针,跳越资本主义某些阶段,这些阶段在一个经济基础的渐进发展中是“正常”

的阶段,这表明进一步加深唯物历史观的需要。首先表明的是,每一个历史时刻都富有各种形式的可能性,所以主体力量对每一个历史可能性的选择都是每个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从未有过大宇宙的必然性,而只有各种社会力量争取各种历史可能性的抉择。这些可能性并不仅仅取决于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因为在国家十分不发达的情况下,谁也不能确立以相当发达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意识为前提的社会主义,而是取决于所有历史、国际环境和各种情况。由此可见,在讨论这一思想时应当考虑到这种国际范围的这一组成因素——尤其当今历史已相当全球性了。同样地,我们应当始终不渝地对历史决定论的概念加上人的主观的评价、前提和活动。缺少这些成分,历史决定论就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为什么历史发展不会是“直线的”,而是一个复杂的、螺旋形的曲线。

谈到“超越”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们假设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混杂着许多前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必须指出,列宁通过对历史可能性的卓越观察,早在 20 年代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说过,不发达国家有可能在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今天这种帮助更多地取决于已经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然而,工人阶级的国际声援仍然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各进步党派和工会在物质和道义方面可以做更多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会很高兴地援引杰出的 A. 卡布拉尔(A. Cabral)的话,他于 1964 年在米兰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向欧洲工人运动和左派呼吁:“我认为,欧洲左派和国际工人运动在研究和分析本国的具体形式时要承担智力方面的责任。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进行分析的元素。另一方面,必须从物质上帮助真正的革命解放运动。简言之,必须实地研究和分析运动,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有嫌疑使用镇压手段反对我国人民的事情,我特别指的是买卖武器……此外,还必须大胆揭露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最后我想补充说几句关于国际工人运动

和我国民族解放斗争之间的相互声援问题。只有一点：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反帝斗争的参与者。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切向我们证实，存在着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的目的是统治工人阶级，同时镇压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应当把帝国主义看成是共同的敌人，应当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无休止地讨论声援问题是徒劳的，因为实际上问题在于斗争。我们在几内亚手持武器进行斗争。你们也在斗争，但我不说是手持武器或其他方式，因为这是你们的事。但要寻找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方式和形式。这是你们能够声援我们的最好证明。”^①

关于革命特殊道路和缩短阶段的问题，毛泽东的论著和他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社会关系、发展和可能性的评判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革命整整十年后，毛泽东告诫：中国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但处于十分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以革命的性质和可能的结果比之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一样的。早在1939年毛泽东写道：“但是，现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旧的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这种类型的革命陈旧了。与此相反，它是新的、特殊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类型的革命在中国和所有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展开。我们把这种类型的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亦即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参加这一革命的有若干革命阶级，他们联合起来并建立对帝国主义、卖国贼和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在经济方面，它致力于把所有大资本、帝国主义、卖国贼和反动派的大企业国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同时帮助中小私有经济，但不会消灭富裕农民的经济。虽然新型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但它仍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处于从殖民地、半殖民

330

^① *Afrika i socijalizam*, izabrao i komentirao I. Iveković, Beograd 1976, str. 293.

地和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它是民主的革命新进程。”^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在不发达的中国,在如此特殊历史环境下,可以避免和绕过标志着大资本发展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实质增长和发展的某些阶段。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已实现对大资本的剥夺和新民主政权的建立,容忍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但要引导国家实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按毛泽东早在40年代末提出的观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②。

331 我在本书中已提到,深入和客观地评价一个国家中存在的历史可能性,对一个革命的阶级和集团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不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某些社会结构是不会迅速被废除的。在斯大林统治下强迫和粗暴的农村集体化的结果,必然是加强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措施、机关和专政,从而导致我们提示过的斯大林主义现象。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于40年代末在废除农村私有制的措施方面乱跑,但很快就看到这些措施不恰当和有危险便撤销了。所以在革命武装阶段取胜后30多年,大部分农业仍在私人手中。深思熟虑的和成功的出路在于加强大型农场,这农场提供主要的市场剩余农产品,在这农场里也发展了自治关系。从而为农业合作化和进一步社会化奠定了极良好的基础。

在非洲,多数有社会主义意向的解放斗争领袖认为,可以也应该跳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虽然在对中小资本采取措施方面也应谨慎。一位最著名的人物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阐述了与其他社会主义

^① 引自 V. Teslić, *Kineska revolucija i Moskva*, Beograd 1953, str. 358。这段话不是直接引用文,但加了引号,从内容看是引自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此论著发表时间是1940年,作者说的是1939年。——译者注

^② *Današnja situacija i naši zadaci-Govori i članci Mao Ce-tunga*, Beograd 1949, str. 233。(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1256页。——译者注)

运动的观点相同的想法：“我们必须防止自发和机械地接受历史思想，防止用老一套办法思考革命战略，而忘记了革命战略不断受到国际局势动荡必然产生反响的影响。

接受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变的思想，意味着事实上接受所有社会或所有社会集团的条件是相似的思想。殖民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在被其奴役和压迫的国家里制造了特殊的条件，使得人们看到各种模式和更活跃的历史发展……由于政党的活动，古典的模式被没有资本主义阶段的模式所代替。这就在某些坚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非洲国家中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金融独立、经济计划、社会发展、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合作事务、工人参与管理企业、就党纲和国务活动经常同人民协商、公众管理机关实行广泛的分散管理、在党的监督下建立农村区、免费司法服务和建立人民和解法庭——这些就是几内亚民主党建立的标志着其特征和方向的政权的一些方面。

每个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的党，正如我们说过的，努力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排除出我国的发展进程，这样几内亚人民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① 332

这不仅是理论思考和纲领，而且也是取得了反对殖民制度解放斗争胜利的许多不发达国家的现实，尤其是如果这一斗争是由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向的政党领导的话。但是，有必要再次指出，这些不发达国家里的这些革命力量面临着发展受阻和各种潜在危险等众多困难。这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想不能立即，也不能在短期内实现。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至少意味着社会平等和相互声援——但很难说有自治的权利和义务——它们不得不在激烈竞争和强大跨国公司压力等十分不利的国际条件下建设自己的国家。对由国际资本控制的世界市场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各国生

^① 摘自塞古·杜尔在康纳克鲁党校的讲话，引自 *Afrika i socijalizam, izabrao i komentirao* I. Iveković, Beograd 1976, str. 95-98。

产行为和生产性质。此外,今天我们可以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经验中得出结论:政治领域、国家和党的作用越强大,经济基础、社会物质和文化的发达程度就越弱小。政权的这种初始的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很容易蜕化为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结构,使劳动者的雇佣关系永久化,使民主权利明显缩小。除了来自本国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反革命企图的危险外,官僚主义-国家主义反革命无疑是又一个危险,这种反革命是政治领域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占统治地位并在管理和支配社会生活的所有重要杠杆中拥有神圣不可侵犯垄断的制度所固有的。

有必要强调指出,这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意识到官僚-国家主义蜕变的这种危险,所以在他们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告诫和思考。丁·尼雷尔(J. Nyerere)1967年在开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作出结论:“1962年我曾说过,社会主义是思想立场。我仍相信这种说法是对的。这不是说机关和组织不重要。这是说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机关可能会动摇,会背弃它们的正确目标。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保证人的平等,然后领导要有意愿和决心为群众服务,并同群众保持一致。人民应当是,也应当知道,他们是无限的统治者。不能把社会主义强加于人民。我们可以发动人民。我们可以引导人民,但最终人民应当参与。”

如果人民没有参与到国家所有制,不能监督政策,国家所有制就可能走向法西斯,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如果人民不是权力无限的统治者,人民就可能沦落为以人民名义强加于人民的暴政。如果人民寄予信任的人们不诚心地为人们服务,那么腐败就会毁掉一切努力成果,使人民放弃社会主义思想。”^①

虽然塞古·杜尔当时还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阶级斗争的阐述,但他在上述演讲中关于政治领域的问题十分明确地谈到

^① 引自 *Afrika i socijalizam*, izabrao i komentirao I. Iveković, Beograd 1976, str. 62。

作为社会演变的长期而艰难进程的国家消亡的必然性。他说：“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源自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一理论，国家结构的历史发展必然导致国家的渐渐消亡。我们声明，如果把国家消亡理解为国家分散管理，让大多数人民能够直接地参与影响和监督国家机构的话，我们同意这个论点。社会进步在这里还可理解为政权民主和政权仲裁，后者从字源学意义上说也是民主。”塞古·杜尔强调，他认为国家不会自行消亡，因为他们还处于国家还应作为有组织的主要社会力量得到加强的阶段。因此，“如果随着人民的发展及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的发展而增加需求，作为民族社会的有组织的活动形式——国家掌握更多的资源”。

这里可能产生危险的混乱。从理论上讲，国家消亡不是手段，它是社会组织 and 人的行为成熟的长期艰难进程的终结。当每一个的人还没有取得经历、反响和范例的、集体的观念和意识时，当社会机体细胞还不是实质的活跃的时候，从社会人的高度还不能对国家的消亡预见很远^①。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演讲中没有列举国家消亡的全部命题中的许多问题，还有可商讨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政治领域被固

334

定化的问题和危险的意识，而自治思想对这些国家的理论家和领导人来说还是了解的。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这些不发达国家多数领导力量中有一种信念占上风，即在这一个发展中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公社传统。他们当中有些人如尼雷尔认为，非洲人不需要学习社会主义和民主，因为这些在他们的历史上已有根基。“我们非洲人没有必要转向社会主义，也没有必要教我们民主。二者在我们历史上、在我们生长的传统社会中都有根基。”^②尼雷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他们的基

① 引自 *Afrika i socijalizam*, izabrao i komentirao I. Iveković, Beograd 1976, str. 105-106。

② 尼雷尔文章，引自 W. Treuheit, *Sozialismus in Entwicklungsländern*, Köln, 1971, str. 71。

本传统是：国家永远属于整个共同体，每个人都有权得益于它。我已说过，我认为把旧的结构改变为现代的社会主义的结构是不可能的，虽然有可能利用某些公社传统来作出现代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但是，也许某些传统对这些意向的障碍比最初的时候还要大。在这方面我同意某些研究者如哈吉-瓦西列夫(J. Hadži-Vasilev)的看法，他写道：“不发达的土地私有制成为如下思想的出发点：非洲的传统共同体就是社会主义的机构，就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基础。可是，拥有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非洲农村，如同俄罗斯的村社和旧塞尔维亚的劳动社，**不应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基础**。非洲的传统共同体不应是社会主义的模式，因为它是前阶级社会的典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因为它缺少社会主义的几乎所有基本前提。”他列举了这些传统结构的许多消极方面(农村闭塞、原子化、种族差异、等级差别、各种特权、家族寄生生活等)，得出结论：“传统的氏族共同体自身不会轻易过渡到社会主义型的社会关系。革命政权力量能够做的就是利用人们的某些集体习惯，首先是对发展新的经营方式有意义的互相声援和集体劳动感。”^①

335 非洲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之一 K. 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传统民族生活的消极面。他坚决反对关于特殊的“非洲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其中就有 L. 桑戈尔(L. Senghor)，他在论非洲阶级斗争的著作中反对那种认为由于不发达状况这种斗争不存在的思想。恩克鲁玛在谈到非洲社会主义时这样写道：“‘非洲社会主义’一词近似毫无意义的和什么都不是的词。它被纳入适用于非洲的某种社会主义形式，源于旧非洲社会的公社和平均主义的形式。非洲社会主义的神话被用来否定阶级斗争和模糊源头社会主义的主旨。这样的神话被那些当地政治家所利用，非洲革命使他们转向社会主义，但同时他们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密切联系使他们丧

^① J. Hadži-Vasilev, *Afrika i socijalizam, Socijalistička opredeljenja u Tropskoj Africi*, Beograd 1973, str. 127-129.

失了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他们要求的特征。”^①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当我们谈到不发达国家中的革命进程时,我们看到典型的、复杂的和过渡的情况。各种社会结构的残余犹存;也有想尽快消灭这些残余的试图;在多数情况下各种流派和观点的社会主义力量统治着政治领域。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含义和目标意识尚不存在,因此,掌权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力量一直面临着两大困难:国家不发达、生活各领域都不发达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仍处于世界资本统治之下的不令人喜欢的世界市场。在没有大的震动下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重大的,而且是无比困难的任务。恩克鲁玛以批判的态度探讨非洲形式后,得出结论:“今天在非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政治觉悟能达到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水平。在每一个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里,都会有政府、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阶级。在许多情况下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公开地或隐蔽地站在执政党即政府的后台。在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没有组阁,即不是执政党的地方,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就谋划颠覆,准备政变。”^②

自从开始写本书至今 10 多年来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群众的社会意识未能迅速提高到足以大大改变这种形势的水平。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认为我们可以再次得出结论:在发展初期革命力量只能建立表现各种不同结构性的社会关系类型。政治领域可能会处在有社会主义意向的力量统治之下,这就给这样的政权打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烙印。这个政权至今所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对大资本、工业金融资本实行国有化,在农村和城市的某些部门(商业、小工业、小商贩等)还存在私有制的情况下,经济至今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混合体。在最不发达的国家里仍存在着氏族和封建关系的痕迹。

① 引自 *Afrika i socijalizam*, izabrao i komentirao I. Iveković, Beograd 1976, str. 165。

② 引自 *Afrika i socijalizam*, izabrao i komentirao I. Iveković, Beograd 1976, str. 175。

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关系,虽然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其初期(这个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具有完全革命的、进步的特征。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力量领导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进程,通过这些历史性措施和要求,宣告一个历史性方向,这个方向,许多人称之为“社会主义宗旨”或“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书中我已多次指出,这些力量认识到这种形势和现实可能对今后的社会举措和变革是多么重要。任何“革命的”冒进以及不利用国内外环境中的良机,都存在被反革命势力轻易利用的危机。把国家领域对生活所有方面的全面垄断宣称为建成社会主义,也会导致悲惨的畸形和阻碍社会主义进程持续开展的官僚-国家主义关系和行为。

无论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重要理论是多么明确,每个国家都应从自己的历史条件出发。只有每个国家的革命力量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情况并找到进行这种社会改造的适宜的措施和斗争策略。这些也都是迄今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是从本书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运动迄今的许多探讨中都可以看到的不应忽略的宝贵财富。

337 我认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经解决的问题上没有必要犯不必要的错误。书中谈到在不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的问题。历史的经验足以使我们既不陷入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不陷入教条社会主义,因两者都有消极后果。中国教条主义势力在这个问题上犯的严重错误是众所周知的,这些错误给文化革命和管理中国社会的努力造成了重大损失。粉碎这个教条主义集团对中国最新发展来说是到了一个极限时刻,即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朝着社会主义发展中要摆脱许多教条主义思想束缚,这些教条主义思想只会助长官僚-国家主义的结构和干预。

古巴人也曾面临这个问题,他们一开始就充满过多的革命浪漫主义。如此成功地举行了一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革命变革的力量总是

喜欢过高估计主观因素和决定。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和在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等范畴内是无法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的。因此,切·格瓦拉(Che Guevara)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以为可以用从资本主义遗留下的生锈的武器(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利润、个人物质利益的杠杆作用等)来建设社会主义,那么很容易走进死胡同……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应当用建设物质基础那样的干劲来建设新人。因此重要的是选用动员群众的工具。这种工具基本上应是精神性质的,同时决不能忽视正确地使用物质鼓励,首先应是社会性质的。”^①虽然古巴人在开始时也使用物质鼓励,但曾过高估计精神鼓励,不过还是意识到国有化和国家主义计划会产生的危险。早在1965年,卡斯特罗(F. Castro)在一次讲话中告诫说:“要保护社会主义,就要像防范帝国主义那样防范官僚主义。不应忘记这一点,因为它是非常危险的,是隐藏敌人……它是大邪恶,我们不必抬举它,对它没有什么说的。”^②多尔蒂科斯(O. Dorticos)在一次讲话中说:“进行革命的不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以便协调地动员自己的资源,解决落后的重大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多样性,要求推动能把生产力发展提到更高水平的分散管理进程。过分的集中管理最终会导致压制地方的主动精神,因为地方不了解需求,生产与消费脱节,劳动中的首创精神受阻,生产和分配工作官僚化,地方和地区的生产条件取决于上级行政机关通过的决定。过度的政治集权化甚至包括使用个人权力,成为诱发上述现象的危险。”^③

338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最先认识到,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里的社会

^① *Der Sozialismus und der Mensch auf Cuba, Materialien zur Revolution*, Darmstadt 1968, str. 175-176.

^② 卡斯特罗1965年1月2日的讲话,引自 *Medunarodni radnički pokret*, Dokumentacija br. 3, Beograd 1968, str. 18。

^③ 多尔蒂科斯1967年1月18日的谈话,引自 *Medunarodni radnički pokret*, Dokumentacija br. 3, Beograd 1968, str. 13。

主义发展的这些阶段上,既不能消灭价值规律,也不能消灭商品生产和市场。当在这方面出现激进的要求时,曾有过彷徨、片面性和扩大化。许多人大声疾呼:南斯拉夫正在走向资本主义。那些支持官僚-国家主义关系的国际力量更是如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商品-货币生产,不是市场(它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残余),也不是国家主义的垄断、计划和无所不及的仲裁——从本质上就是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出路只能从自治关系的发展中,从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过程和社会进程占主导地位中和在自治计划和协商一致中寻找。我在本书中也力求这样做。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元素,它们包含着人们新共同体的共产主义远景;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无论是商品-货币关系,无论是市场都不具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那种功能和结果;国家政治领域也不具有在官僚-国家主义制度下的那种权力和意义。但是在这样复杂的关系中,这些新的历史内容承受着高压和影响——从国内的官僚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到外来的各种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影响,因而争取自治的社会关系的斗争不是在历史的大道上漫步。最有觉悟的先锋队和最有才干的社会主义人物、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还将经受许多考验、博弈、困难并作出努力,去赢得人类历史发展这一新的和最重要的阶段的彻底胜利。

主要译名对照表

(本表中页码为外文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

A

- Adler M. 阿德勒 103, 266
 Adorno Th. 阿多诺 266, 288, 313
 Aksel'rod P. 阿克塞尔罗德 258
 Aleksandrov G. F. 亚历山大洛夫 107, 262
 Anweiler O. 安维勒尔 289
 Arhimed 艾赫迈德 211
 Aristotel 亚里士多德 102

B

- Babeuf G. 巴贝夫 15
 Badinter R. 巴丹泰 314
 Bakarić V. 巴卡里奇 309
 Bakunin M. 巴枯宁 133, 148, 255
 Banfi A. 邦菲 313
 Basso L. 巴索 56, 204, 242, 313, 314, 324
 Bauer B. 鲍威尔 260

- Bauer O. 鲍威尔 103
Bebel A. 倍倍尔 86, 256 - 259
Bembach U. 本巴希 291, 292
Berlinguer E. 贝林格 321, 322
Bernstein E. 伯恩斯坦 103, 261, 266
Bettelheim Ch. 贝特尔海姆 39, 64, 240, 246, 289
Bilandžić D. 比兰季奇 295
Bischoff J. 比斯乔夫 326
Bismarck 俾斯麦 86
Bloch E. 布洛赫 266, 313
Bock H. M. 伯克 278, 292
Boguslavski M. 博古斯拉夫斯基 239
Bordiga A. 博尔迪加 42, 64, 246
Bourdet Y. 布尔代 319
Brandler H. 布兰德勒 35
Bubnov A. 布勃诺夫 239
Buharin N. I. 布哈林 19, 45, 153, 240, 253, 271, 289
Burnham J. 伯纳姆 65, 248
Bustelo F. 布斯特洛 319
Butenko A. 布坚科 293
- C**
- Cabral A. 卡布拉尔 329
Camacho M. 卡马乔 205, 326
Carlo A. 卡洛 78, 79, 247
Carrillo S. 卡里略 201, 318, 321, 323
Castoriades C. 卡斯托里亚德斯 168
Castro F. 卡斯特罗 337
Chevenement J. P. 舍韦内芒 319

Cliff T. 克利夫 64, 67, 246

Coates K. 科茨 205, 325

Čang Kaj-Šek 蒋介石 19

Čolaković R. 乔拉科维奇 296

D

Däumig E. 多伊米希 42, 154, 291

Deborin A. M. 德波林(A. M. Joffe) 110, 264

Deutscher I. 多依彻 57, 240, 243

Djeržinski F. 捷尔任斯基 241

Dorticos O. 多尔蒂科斯 337

Dragičević A. 德拉吉切维奇 308, 309, 316

Dubček A. 杜布切克 100

Dühring E. 杜林 28, 149, 280

Đordjević J. 乔尔杰维奇 287

Džilas M. 吉拉斯 245

E

Edips 俄狄浦斯 119

Ehmke H. 埃姆克 320

Ehrenberg H. 埃伦贝格 320

Einstein A. 爱因斯坦 19, 82

Elleinstein J. 爱列因斯坦 248

Engels F. 恩格斯 19, 27, 28, 30, 32, 33, 42, 61, 85, 86, 92, 95, 101 – 103, 105 – 107, 112, 114, 116, 117, 131, 134 – 136, 149, 170, 234 – 236, 240, 254 – 260, 264 – 266, 269, 276, 279 – 282, 312, 327

F

Fabre J. 法夫雷 323

Fanon F. 法农 210

Fedosejev P. N. 费多谢耶夫 282

Feuerbach L. 费尔巴哈 113, 266

Fichte J. G. 费希特 260

Fischer L. 费舍 240

Flechtheim O. 弗莱希特海姆 290

Foa V. 福阿 205

Fonvieille-Alquier F. 丰维耶勒 - 阿尔格尔 326

Freud S. 弗洛伊德 19, 82

Fromm E. 弗洛姆 266, 313

G

Garaudy R. 加罗迪 313

Glockner H. 格勒克纳 261

Goldmann L. 哥德曼 266, 313

Gorter H. 戈尔特 38, 42, 44, 63, 153, 238, 244, 245, 270, 291

Gorz A. 高兹 205

Gramsci A. 葛兰西 42, 154, 198, 203, 292, 293, 322

Gruppi L. 格鲁皮 326

Guérin D. 盖尔尼 279

Guevara E. Che 格瓦拉 337

H

Hadži-Vasilev J. 哈吉 - 瓦西列夫 334

Hartmann N. 哈特曼 260

Hegel G. W. F. 黑格尔 19, 30, 38, 102, 112, 258, 260 - 262, 312

Hilferding R. 希法亭 66, 68, 70, 78, 103, 247

Hincker F. 欣克尔 323

Hitler A. 希特勒 296

Horkheimer M. 霍克海默 252, 266, 288, 313

- Horvat B. 霍瓦特 287
- Hruščov N. 赫鲁晓夫 53, 64, 78, 100, 264, 277, 318
- I**
- Iveković I. 依维科维奇 329
- J**
- Jogiches L. 约吉希斯 153
- Jovanoč N. 约瓦诺夫 305
- Jovčuk M. T. 约夫丘克 282
- Joye P. 如瓦 325
- Judin P. F. 尤金 264, 265, 282
- K**
- Kalinjin M. 加里宁 53, 83
- Kamenski A. 卡门斯基 239
- Kamenjev L. B. 加米涅夫 53, 241, 243
- Kangrga M. 坎格尔加 313
- Kardelj E. 卡德尔 250, 298, 309, 310
- Kautsky K. 考茨基 38, 85, 103, 237, 266
- Kedrov B. M. 凯德洛夫 272 - 274
- Kidrič B. 基德里奇 249
- Kirov S. M. 基洛夫 53, 254
- Kofler L. 科夫勒 313
- Kolakowski L. 科拉科夫斯基 55, 242, 313
- Kolb E. 科尔布 292
- Kollontaj A. M. 科隆泰 38, 239, 289
- Konstantinov F. V. 康斯坦丁诺夫 282
- Kool F. 库尔 289
- Korsch K. 科尔施 64, 245, 253, 254, 266, 287, 290
- Kosik K. 科西克 53, 266, 313

Kosior S. V. 柯肖尔 53

Kreimer J. 克赖默 326

Kroner R. 克罗纳 261

Kropotkin P. 克鲁泡特金 133, 148, 255

Kujbišev V. V. 古比雪夫 53

Kuusinen O. 库西宁 83

L

Labriole A. 拉布里奥拉 65, 148, 245, 252, 255

Lagardelle H. 拉葛德尔 85, 255

Lassalle F. 拉萨尔 256, 258

Lasson G. 拉森 261

341 Lefebvre H. 列菲伏尔 40, 65, 240, 252, 266, 313, 321

Lenjin V. I. 列宁 18, 19, 22, 23, 28, 32 - 34, 38 - 41, 44 - 50, 52, 54 - 61, 63, 65, 66, 68, 71, 72, 80, 85, 87 - 89, 91, 97, 102, 105 - 107, 114, 117, 125, 129, 131, 145, 153, 155, 157, 170, 198, 202 - 204, 209, 233, 236 - 242, 244, 245, 248, 253, 254, 258, 259, 262, 264 - 267, 269, 270, 271, 282, 283, 289, 292, 295, 318, 324, 328

Leonov M. A. 列昂诺夫 265

Levy P. 莱维 35, 238

Libertini L. 利贝蒂尼 321

Liebkecht K. 李卜克内西 153, 258

Liebmann M. 利布曼 240, 289

Lukács G. 卢卡奇 113, 240, 266, 288, 312

Luxemburg R. 罗莎·卢森堡 37, 42, 89, 153, 238, 259, 289

M

Maksimovski V. 马克西莫夫斯基 239

Malatesta E. 马拉特斯塔 133, 148, 255, 278

- Mallet S. 马勒 205, 246
- Mandel E. 曼德尔 240, 246, 287, 321
- Mao Ce-Tung 毛泽东 329, 330
- Marchais G. 马歇 323, 326
- Marcuse H. 马尔库塞 266, 288, 313
- Marković M. 马尔科维奇 287, 313
- Marx K. 马克思 16, 17, 19, 20, 22, 27 - 30, 32, 33, 38, 39, 61, 68, 79, 85 - 89, 92, 101 - 103, 105 - 107, 111, 113, 114, 116, 128 - 131, 134 - 136, 143, 145, 149, 150, 166, 170, 171, 180, 193, 198, 204, 233 - 236, 240, 245, 247, 254 - 261, 264 - 266, 269, 275, 276, 279 - 282, 287, 288, 292, 294, 312, 318, 327
- Mattick P. 马蒂克 64, 246, 254
- Medvedev R. 麦德维杰夫 53, 242
- Mehring F. 梅林 153, 242
- Mendel G. 孟德尔 19, 82
- Michels R. 米歇尔斯 46, 85, 255, 277, 278
- Mikojan A. 米高扬 83
- Mitin M. B. 米丁 264
- Molotov V. M. 莫洛托夫 53, 83
- Mühsam E. 缪萨姆 85, 133, 148, 255, 278
- Münzer Th. 闵采尔 15
- N**
- Nettlau M. 内特劳 279
- Nikolić M. 尼科利奇 287
- Nkrumah K. 恩克鲁玛 335
- Nyerere J. 尼雷尔 332, 334
- O**
- Oberländer E. 奥伯兰德 289

Oertzen P. von 厄尔岑 292, 320

Ordžonikidze S. 奥尔忠尼启则 53, 83, 244

Osinski V. 奥辛斯基 239

Owen R. 欧文 148

P

Pankratov A. M. 潘克拉托夫 289

Pannekoeck A. 潘涅库克 38, 42, 44, 63, 64, 98, 153, 238, 244, 245, 253, 270, 291

Pantić V. 潘蒂奇 292

Parvus (A. L. Heljand) 帕尔乌斯 32

Pašić M. 帕希奇 287

Pelloutier F. 佩洛提埃 148, 255

Pestana A. 佩斯塔纳 278

Petrović G. 彼得罗维奇 313

Platon 柏拉图 102

Plehanov G. V. 普列汉诺夫 265

Poulantzas N. 帕乌兰扎斯 321

Ponomarjov B. N. 波诺马廖夫 282

Preobraženski E. A.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53, 289

Proudhon J. 蒲鲁东 133, 148

Puttkamer 普特卡默 257

R

Rafail R. 拉斐尔 239

Rakovski H. G. 拉科夫斯基 53

Raljcević V. 拉列切维奇 264

Ranković A. 兰科维奇 302

Rizzi B. 里齐 66, 78, 98, 247

Rjutin 柳廷 244

- Rosenberg A. 罗森堡 64, 245, 246, 256
- Rozental M. 罗森塔尔 265
- Rubel M. 鲁贝尔 38, 85, 239, 240
- Ruge A. 卢格 280
- Rühle O. 吕勒 38, 42, 85, 98, 238, 239, 245, 254, 255, 270, 278, 291
- S**
- Santillan D. A. de 桑蒂兰 133, 148, 255, 279 342
- Sapronov T. 萨普罗诺夫 239
- Sartre J. P. 萨特 110, 313
- Schaff A. 沙夫 319
- Schmidt C. 施米特 103, 261, 266
- Schröder K. 施罗德 291
- Sékou Touré 塞古·杜尔 331, 333
- Selektor M. 塞列克托尔 265
- Senghor L. 桑戈尔 335
- Sève L. 塞夫 323
- Smith A. 亚当·斯密 69
- Sorel G. 索雷尔 85, 148, 255
- Spartak 斯巴达克 15
- Spinoza B. de 斯宾诺莎 312
- Staljin J. V. 斯大林 18, 19, 38, 41, 45, 48, 49, 52 - 60, 63, 64, 72, 75, 78, 80, 82, 84, 85, 91, 97, 103 - 114, 117 - 121, 130, 145, 155, 165, 168, 239 - 244, 246, 249, 253, 254, 262 - 265, 272, 276, 277, 282, 284, 285, 288, 296, 298, 318, 331
- Stojanović S. 斯托扬诺维奇 65, 251, 313
- Strauss D. F. 施特劳斯 260
- Supek R. 苏佩克 287, 313, 325

Suslov M. A. 苏斯洛夫 282

Šljapnikov A. G. 什利亚普尼科夫 38, 239, 289

Štambuk V. 什坦布克 287

T

Tadić Lj. 达迪奇 313

Teslić V. 特斯利奇 330

Tito Josip Broz 铁托 248, 249, 296, 297, 299, 300, 301

Togliatti P. 陶里亚蒂 42, 198

Tophan T. 托潘 325

Trentin B. 特伦廷 205

Treuheit W. 特罗伊海特 334

Trier G. 特利尔 86, 256

Trocki L. D. 托洛茨基 19, 32, 33, 45, 46, 48, 53, 66, 67, 91, 98, 99, 209, 237, 240, 241, 243, 244, 246

V

Vilmar F. 维马尔 326

Vollmar G. 福尔马尔 32

Vorošilov K. 伏罗希洛夫 53

Vranicki P. 弗兰尼茨基 313

Vrcan S. 弗尔灿 326

W

Wagner H. 瓦格纳 64, 245

Weber M. 韦伯 46

Willich A. 维利希 258

Wissel R. 维塞尔 292

Woltmann L. 沃尔特曼 103, 261

Worrall R. L. 沃勒尔 247

Z

Zinovjev G. E. 季诺维也夫 19, 241, 243

Ždanov A. A. 日丹诺夫 104, 107, 262, 263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近期出版书目

- 1.《日常生活》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 编
- 3.《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 [匈]费伦茨·费赫尔 编
- 4.《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著
- 5.《激进哲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6.《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日常生活札记》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7.《卢卡奇再评价》 [匈]阿格妮丝·赫勒 主编
- 8.《超越正义》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9.《后现代政治状况》 [匈]阿格妮丝·赫勒,费伦茨·费赫尔 著
- 10.《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1.《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
[匈]乔治·马尔库什 著
- 12.《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 [匈]乔治·马尔库什 著
- 13.《现代性能够幸存吗?》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14.《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著
- 15.《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6.《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7.《历史与真理》 [波]亚当·沙夫 著
- 18.《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阿格妮丝·赫勒,费伦茨·费赫尔 编
- 19.《人的哲学》 [波]亚当·沙夫 著
- 20.《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等 著
- 21.《被冻结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 [匈]费伦茨·费赫尔 著
- 22.《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南]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 23.《道德哲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4.《个性伦理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5.《历史理论》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6.《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
[捷]卡莱尔·科西克 著
- 27.《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波]亚当·沙夫 著
- 28.《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匈]米哈伊·瓦伊达 著
- 29.《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治论文集》 [匈]米哈伊·瓦伊达 著
- 30.《人和他的世界——一种马克思主义观》 [捷]伊凡·斯维塔克 著